

YANHUANGCHUNQIU

炎黄春秋

1993/1 总第10期

包玉刚在香港的股市大战

『大右派』陆安平在哪里？

国民党副总裁陈诚之死

张艺谋前妻说张艺谋

班禅大师圆寂纪实

省委书记夫人和将军、部长斗酒记

史学家吴晗的历史悲剧

徐帅生前留下肺腑之言





徐帅生前留下肺腑之言

史学家吴晗的历史悲剧

省委书记夫人和将军、部长斗酒记

张乙汲 张乙汲

包玉刚在香港的股市大战

“大右” 那里

班禅大师圆寂纪实



顾问:

伍修权 楚图南 费孝通
谢冰心 杨静仁 冯文彬
王朝闻 赵朴初 胡絮青

特邀编委:

王俊义 冯其庸 张 铨
张国琦 李学勤 李 晋
刘颖南 苏双碧 常 征
温济泽 廖盖隆 戴 逸
韩劲草 魏久明 魏 巍

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社长:方 实

丁洪章

宋文茂

总编辑:洪 炉

副总编辑:刘家驹 杜卫东

总经理:徐 乳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1003-1170

印刷:1201工厂

社址: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北京图书馆分馆内

邮码:100802

封面设计:邹大力

专稿

要找寻炎黄时代的古文字

/胡厚宣 85

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

..... 12

春秋笔

刘伯承元帅

少年时期的轶闻趣事

塾师是石达开遗将

元配夫人程宜芝

/丁隆炎 2

和将军、部长斗酒记

/水静 42

齐越的话筒生涯/刘淮 86



殒星篇

史学家吴晗的历史悲剧

/宋严 28

吴晗和他的妻子袁震/宋严 36

郭沫若朝山/任斌武 26

班禅 大师的圆寂

/ 单超 20

古籍专家杨伯峻二三事

/ 楚泽涵 56

[神州光]钓鱼台的
国宾卫士

/ 陈淀国 69

**[九州景]**

烟赋 / 汪曾祺 54

[人海浪]**储安平** 你在哪里?

/ 逸藪 邓加 38

我和张艺谋

/ 肖华 58

[同根结]**包玉刚在香港的
股市大战**

/ 傅桃生 51

国民党副总裁陈诚

大殓纪实 / 宅巍 德英 72

[法制苑]**西南边地吸毒贩毒透视**

/ 徐剑 78

[古镜台]**轩辕治国** / 蔡柏顺 92

炎黄历历明(诗)

/ 魏传统 84

[轶闻录]

柳亚子以诗换酒 / 刘宏伟 25

康有为茅山庐墓 / 朱亮 50

冯玉祥轶事三则 / 刘作忠 95

陈立夫与丁小路的乡谊

/ 江辉 寇丹 96

陈立夫为访台大陆记者题辞

..... 封三

新年新语 95

刘伯承元帅少年时期的轶闻趣事



丁隆炎

一、塾师是石达开遗将

100年前,刘伯承元帅出生在四川开县赵家场一个普通的农家。小时候,他叫孝生。

孝生的祖籍原是离此百里外云阳的姜子山。多年前,那里发了一场山洪,房田被毁,孝生祖父刘正富只好携老带幼,流落到开县赵家场,以租种田土为生,同时凭一手铁匠好手艺赚些补贴,故人称刘四铁匠。

刘四铁匠还是个多面手,通晓木瓦泥篾各行,他识字不多,却背得下好多圣贤诗文,自己也能随口编唱一些四言八句,尤为出色的是吹唢呐,遇远近人户有红白喜事都去吹打一番。正是由于他勤耕苦作,心灵手巧,落户几年,便创下了一份家业,买了田地,扩大了铁匠铺面,还开办了制粉酿酒两座作坊,成了本地很叫人眼热的殷实人家。

孝生的父亲刘文炳,正是在这样家道兴旺的时候降生的。

刘文炳4岁时,刘正富便请来一位落第老秀才为他专设家塾,10年后又把他送到开县县城出名的大学问家熊老举人学馆里就读。又几年后,老举人向刘正富拍了胸口,断言文炳只要科场应考,必定大展青云之志。在老师与父亲一再促使下,刘文炳到27岁时才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第一次参加了开县的县试。

他居然出手不凡,在数百名考生中名列第三,获得了贡生的学位!

红榜公布当日,刘正富立刻在开县有名的酒楼大摆宴席,向熊老举人敬谢师恩,也请来不少亲朋同喜共庆。之后,刘正富又雇来了一匹高头大马,给儿子披红挂彩,由亲朋们一路簇拥着回家场。

一路上鞭炮锣鼓齐鸣,好不热闹。快到赵家场摆渡时,便见对岸站着黑压压的一群人在欢叫,刘正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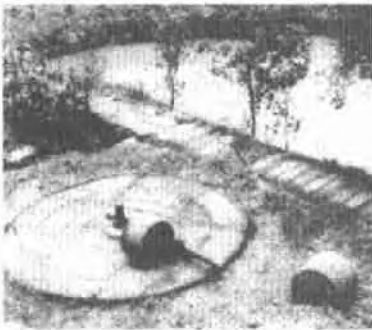
得意地拂须道:“文炳,看,乡亲们为你荣光,向你道喜来了!”

刘正富大错特错了,那里等着的,不是一支道喜的队伍,而是一支报丧的队伍,它不但报了刘文炳锦绣前程的丧,也报了刘正富的命丧,报了刘家从此败落的丧!

渡船刚靠岸,这伙“贺喜”队便拥上来。竟全是当地出名的地痞无赖,大约二三十人。他们头戴草编凸形“乌纱”帽,脖子上插两根茅草,敲打着瓦片石块,吹着骡匠的牛角,也簇拥一个骑瘦毛驴的“状元郎”——一个痴傻的披红袍的哑巴。等刘文炳下了船再次骑上高头大马时,他们也让那驮载着哑巴的毛驴与他并排而行,一路怪笑怪叫着走上岸坡。

刘正富早已气得脸色铁青,肺鼓欲裂。他看明白了,今天这场合是当年曾与他争过地界、结下了冤仇的黄家所主使。他打定了主意不予理会。可文炳的5个哥哥平时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汉子。于是,刘家兄弟几位年青气盛的亲朋便放开了手脚,拳头耳光雨点般飞向无赖们!谁知,无赖们竟无一人还手,只抱头“唉哟唉哟”地叫。

刘家人中计了,竟然以为对手只是一群胡闹的混蛋。殊不知,他们背后的主使者早有言在先:打不还手!事后验证,凡见一处红赏钱——
▽刘伯承在家务农时的碾盘



吊，见一钵血赏大洋一圆，无赖们哪还会怕挨打？怕的只是挨得不重，见不到血。

于是这场官司使得家道中兴的刘家败落了！1892年中秋后，刘正富百病缠身，撒手而去。

两个月后，刘文炳的妻子周寅香生下了第一个儿子。为纪念祖父，孩子取名孝生，这便是后来的刘伯承元帅。按公历算，刘帅生于1892年12月4日。到1992年正是他的一百周年诞辰。

孝生才到4岁时，父亲刘文炳便开始教他识文断字。头一课便是祖父的临终遗言：

“读书知礼义，知礼万事明；
既读且耕种，田亩定康兴；
再莫应官试，无欲心方静；
但求人品贵，休问枯与荣！”

刘文炳自己也是按父亲的遗言身体力行的。从此，他设在堂屋一角的两竹架书堆上方，出现了“泥脚人书角”的几个大字。他写得一手好字，常有亲朋来登门求字。刘文炳总是欣然应从，自那日后，他也总是落上名，盖上官印，用的也是妻子所赠别号：“泥脚书角主人”！

孝生读《三字经》《百家姓》《小儿经》《千字文》。只要教过一遍，第二天晚上他准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儿子很乖又很要强。倘若不能按时完成父亲的要求，或见父亲稍稍表现不悦时，不待父亲说一句重话，自己的眼泪便扑簌簌地往下掉，以表示他知错的羞惭与改错的决心。

刘文炳从附近一座先主庙那里，请来一位正浪迹天涯的道士模样的人，给孝生当家塾先生，他叫任贤书，又叫老道公。

孝生启蒙之日，刘文炳按惯例请来了亲朋，门前张灯结彩，堂屋两侧，他亲手撰写了副对联：

打扫一片光明地，震古旷今，研读经史，未可动功名之念；

休问四方兵戈事，修身笃行，唯求忠信，只欲望学问有成。

原来的柴草屋也修葺一新，另置了一大一小两张木床，两张课桌。两面墙上，一面是祖父刘正富的临终遗训，一面是刘文炳自己专为儿子启蒙日而作的箴铭诗文：

“有儿意足，
一把茅遮屋，
虽使薄田耕不熟，
添个新生黄犊。
读书不为功名，
勤耕非求家富，
忍忍、忍退、忍静，
甘作世间有识闲户！”
落款是：

“大清光绪二十四年冬日，书于明昭儿启蒙日。泥脚书角主刘文



△刘伯承同母亲和四弟的合影



△黄桷树古道。1911年刘伯承由此离家投身辛亥革命。

炳。”

这对联与箴铭已充分表达了他对儿子的希望，同时也是给任老先生的嘱托，按今天的话说，就是规定了一个“教育方针”！但刘文炳犹怕老先生领会不足，又一再殷切告诫：“我决无令儿曹青史留名的奢望，只是遵家父遗言尽我孝道，也使后人于乡党中立一人品，不欺人害人，更无半点伤天逆上之言行。当今世变日多，政争兵斗纷繁莫测。望老伯切勿对他言及非圣上皇纲、礼义法纪所相容的朋党言论政见。所教均以礼义待人，勤俭养家、保身安命为要旨。三复斯言，望老伯体察我苦口衷心！”也就是说，刘文炳要用读书将

儿子培养成为自己一样的一个泥脚夫子。

任贤书老人全都爽朗朗、痛快快地应承下了！

刘文炳又怕儿子不落教，专削了一块竹板，上写“格打勿论”四字。如今还置于拜堂的讲席之上。

其实这一切都与任贤书老先生的观念与教法，以及他留下来执教的目的全然相反。

这位任贤书却不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他浑身都有赚钱的本事，就是创下一个大家业在他也并非难事。那么，他在这个穷家留居了七八年之久，到底为什么呢？为解开这个谜，只有先说清楚他的来历根底了。

任贤书何许人也？年青时赶过考，打过考官，愤而离家出走，后来投军、打仗，可他投的不是一般的清朝官军，而是洪秀全领导的旨在推翻满清王朝的太平天国军，而且不是一般的士卒，是天国大将翼王石达开手下一员统军之将。在他来到刘家的30多年前，石达开因不满天国内部将领们争权夺利，发展到互相残杀，便率领了自己麾下几十万人马离开了天王，想另找地方再建天朝霸业。经过万里转战到达四川西部大渡河边时，只剩下了万余人马，遭清军包围聚歼。石达开本人也被俘凌迟，只有任贤书等少数将士突围逃脱。

任贤书这番经历当年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人就是刘文炳。那也是他在刘家住了多年，与刘文炳虽称呼依旧，但已结下了亲如父子的情谊之后，又是在他已暗中决定回归洞庭故里之前。其间多年他守口如瓶，滴水不漏，这并非信不过文炳，而是不想给这个胆小怕事的人徒增心理负担。刘文炳也不负所嘱，从未对家人露过一字，只是在他临终前才告诉妻子。时任老先生已离去一年。刘文炳说出任老先生的这番来历，目的在他临终时给妻子留下的一句话：“告诉孝生，世代代勿忘任爷爷深恩大德！”

刘文炳妻子谢世时，满清王朝已被“民国”取代30多年，她当然不隐瞒了，故赵家场的老人们几乎无人不晓：“刘伯承元帅的翅膀，是任老道公插上的！”

不过，要说任老先生当初便料定了刘伯承元帅后来的伟大道路与辉煌功业，那就太“先验论”了！但不必讳言：任老先生的特殊经历，使他具有能从6岁的孝生身上看出他的某些特殊素质的慧眼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也才能说清楚他留下来的真正原因。

他为着这样的目的——把自己毕生的追求、学识与经验传授给一

位后人，不一定是期望他再次举起天国的大旗，总也会怀着某种希冀的！但刘文炳却给他规定了一个只能造就一个书呆子、老好人的教育方针，他怎又违心地应承了？不，他只是暂时敷衍地应承了，心中却已经想好了一个说服他改变这个方针的妙计，不过要等几年才行使。目前，对于一个6岁的孩子，最重要的是打好文化知识的基础，所以这应承又不是违心的。

仪式之后，由老师设堂开教，蒙师与学生上下坐定，其余人则按尊卑长幼各就其位，静听老师讲课，等于是今天的教学观摩，以察看老师的教学能力。

老先生走上高高讲坛时，先举起戒尺，威严地喊道：“刘明昭。”这是刘伯承刚取的学名。

坛下的孝生好生紧张，慌忙应道：“嗯。”

任老先生一板打在讲席上：“要立起来答：学生在！”“学生在！”孝生连忙立起，低头轻声应答。

“要抬起头！记住，今后无论坐立行走，都是长者先，幼者后，长者呼，即刻应，如有问，先鞠躬。懂吗？”“懂。”

任老先生接着给学生领读《论语·学而篇》：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他以浅近、切实、亲切的语言把这段课文讲解得清清楚楚，使得在座的亲朋都听懂了。

喜宴之后，送走了亲朋，一老一小的师生回到他们的居室小屋，孝生回身叩门，一头倒在铺上：“我的妈呀，今天把我的魂儿都吓脱了！”

任老先生则静静地站在屋子中间，看着新筑的粉白四壁，铺上软柔柔、齐崭崭的被褥，明亮亮的灯光，暖融融的炭火盆，香喷喷的一碗茶正置于他的书桌上。一切都好似孝

生父母向他捧呈的一颗热腾的心，这是敬师的心，又是爱子的心！老道公想着看着，禁不住满腔热泪滚滚而下。

孝生骇然从铺上挺身而起：“爷爷，你咋个哭啦？”

老道公坐在他身旁，将他紧紧搂在怀里：“爷爷高兴，是我有一肚子快憋爆了的话终归找着了一个人说了呀！孝生呵孝生，爷爷一天不死，就给你讲一天！”

6年后，12岁的孝生已成了一个肩宽臂粗的半大小伙子，比同龄人要高大些，壮实些。他变得更不爱说话，嘴总抿得很紧，脸上总带着温雅、沉稳的微笑。

6年来，他一直与任老道公朝夕相处，就像他的影子一样形影不离。在小室内一道学习不用说了，如今孝生还要担负起田地上的一半农活，因为母亲接连生了几个弟妹，家事就够她忙的，父亲近年又得了咳病，天寒时气都喘不过来。一应的农事重活凡孝生能替代的都不等父母支派便主动承担下来，老道公则总是与他同出同归。劝阻是无用的，“我一人在家闲得慌。”他说。此后，一家人只好随由他去。不过，道公也日见老迈衰竭，只能给孝生当个帮手，两人也常去深山采来竹石，孝生不但跟爷爷学得了刻笔筒制石砚的功夫，而且在技艺上还略胜一筹。每隔十天半月，爷孙便一起到赵家场赶集，卖了东西买回油盐杂品，再同饮一碗茶，共分一块油饼，彼此都视为这是最快活的享受。

越到后来，刘文炳越不大过问儿子学习上的事，对自己原先规定的教育方针，更是忘到了九天云外。不是对儿子不关心，也不全是他精力上顾不过来，而是对老道公的无比信赖。经过几年来的接触观察，他已充分认识到老人的学问见识比自己高强得多，人品上更令他高山仰止，把儿子交给他完全放得下心。何况儿子的成绩无可挑剔。他写得一

手好字,偶尔看过他的诗文也还词达意顺,颇见笔底波澜;农事上样样在行,肩上传压的是他这样的年龄本来不应担也担不动的重担,真可谓耕读并重,文武都还来得。他时时默默望着儿子的目光,不仅是心满意足的,还带着感动与怜惜之情。

一天,刘文炳向老道公提起,父亲死后分家,几个兄长占尽好田好屋,却将他分在这半山之上的茅屋里,又是那样几亩费力大收成低的荒田旱土,当时心中便忿忿不平,但还是遵循了“兄弟分家,含糊相让”的古训,忍下了这口气。如今膝下添人进口,自己又落下了病痛,眼见温饱已难以为继,便萌发了想邀约几位亲朋与诸兄长理论一番,讨回一个公平的念头,问老道公意下如何。

不想,道公却发出了大不以为然的“怪”谈:“文炳呀,你自己好生看看,你占的一个什么样的钟灵宝地呀!你的屋基背靠华山,山形如一把圈椅靠背,这草房是不是座落在椅垫当间?你再看,前头下方台地岂不正好如同脚踏,那绕成半圆,波光闪闪的浦里河,像不像蔚然天成的黄金护链?你再放眼远望,接山连天的稻田里无数谷草垛,多么像一齐向你静肃待命的军帐,其间赵家场连肩靠臂的屋宇,又多像翘首回立的庞大战马阵群?”

刘文炳举目望去,也不由得一阵开怀大笑:“哟,真是的!这些年原来我坐在一把金交椅上哩!”

“不单是金交椅,还是统领千军万马的帅席宝座呢!”

刘文炳信鬼神但不信风水,他以为道公这话只是一句笑谈戏语。道公却仍一本正经慨然道来:“老夫看了几十年风水了,却还从未见过如此大好气象由一家占却的佳地!实实对你说吧,那年我一脚踏上你的门前,心里也着实吓了一大跳哩!这儿,可是一个出将入相之地呀!还似有神灵在冥冥中昭示于我,这华盖宝运,大概就应在我一见就觉得

气宇不凡、当时正拉着我手的小人孝生头上!也就在那时,我就打定了留下不走的主意!当时没说出来,怕的是你误解我这流浪老汉想赖在你家里呵!”

刘文炳还是不信,却又觉得这话十分中意入耳。

“可惜,他不该生在一个吹鼓手之家,连老子进了县科也被除名,还敢指望他出将入相?”

“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自古来英雄豪杰起于艰难竭蹶之家,苍松柏长于风摧雪复之地!文炳呀,你可不要误了儿子的天道好运,挡住他的追风腾云之路呵!”道公这时不但更加严肃认真,而且有点气哼哼的批评刘文炳的意思。

“爷爷,你老今日咋个,生这么大的气?”

“我生你的气!孩子发蒙之日,你就用铁链把我手脚捆得死死的,动都动不得。我怎不生气?”

道公拉着他一一看了依然留在墙上的对联与书幅,“你自己看看,又是‘休问四方兵戈事’,又是‘甘当世间闲户’……你,不单把我捆死了,还在自己掌心划了一个圈,让一匹千里马只能在这个圈里跑。你呀,气得我当时就想不辞而别。”

“爷爷,这些,都是娃儿他爷爷临终时训言再三的呀!”

“令堂大人,你,都是善良本份、谨遵先贤圣哲教诲、秉承了我炎黄祖先美德的好心之人,今日,我既然挑明了,泄露了天机,你能不能相信我?总不至于把你儿子往邪路上指引吧!能不能允我按天道所示,让你的千里之驹任其意志、竭其全力往前奔驰?”

“爷爷,我悉听尊意!但愿天佑神护,果能如你所言,那才是万幸万福呵!”

老道公与刘文炳这段对话,是真有其事,还是后来的文人墨客根据刘帅已经成为名震中外的伟大军事家的事实所杜撰?据开县几位长

期研究刘帅生平事迹且著述很多的同志说:“家乡父老中所有关于刘帅的传说数这个传说最一致也最广泛。但他们一直不敢把它写进书里,怕把老道公写成了一个先知的神灵,更怕被疑为宣扬封建迷信。但他们确信这段对话千真万确!是老道公真是个神,世上真有风水之说?不,不是!是老道公为了打破刘文炳给他规定的“教育方针”,取得对少年刘帅的教育自主权才说出这样一番话的!至于他自己是否真相信风水之说则又当别论了。笔者深以为然!

老道公虽蛰居于这深山小镇,但对于当时国内外大事还是颇有了解的。他从这里观看世界的窗口便是赵家场新近设立的一个书报邮传行,每逢赶集卖得笔筒石砚之后,常到这里浏览一下贴在墙头的《京报》《国粹学报》《申报》《渝报》等等,时或也花三五文钱买几张带回来,老道公眼花看不清,便叫明昭朗读。久之,明昭对这些时事报纸也发生了莫大兴趣。

老道公由这些报上得知,当今列强勃兴,得益于科学之逐日发达,赖此方得制造出尖利兵器,而后方有其国富兵强之今日。近来使老道公寝食不安的是,他愈来愈明白,欲使明昭成为自己所希望的栋梁之才,仅凭古籍书本与自己的经验学识,是不能使他获得必要的充分知识的。唯一的途径是适时送他去就读新学,始能懂得当今科学的根基学问,也便是报上所说的测算、物理、化学等各门学科。但刘文炳目前的家境是决计做不到这一点的,老迈无力的他更只有望洋兴叹!

殊不知吉人天相,一位贵客适时到来,带来了老道公认为是天从人愿的好音。

这是一个晴和的冬日晌午,一乘小轿停在竹篱外,走下一位着青贡呢长衫、团花马褂,戴软边礼帽,架一副金丝眼镜的人。

刘文炳端详良久，才激动地大呼：“华英大哥！”连忙捋下泥脚裤管，抹了下并不存在的马蹄袖管，一腿前伸，一手触地，行着见面的大礼。来客也适时躬身从地上将他拉起来：“都什么年头了，老弟咋还讲这种腐败的礼仪？”

来客与刘家老少一一拱手见面时，当见蹲在竹篾中慌慌地立起、手里还拿着刻刀的老道公，不等文炳介绍，便一个长揖到地：“想这位便是任老世伯了！”又不待对方说话，便说：“老伯，我一到家，逢人便听到你老的大名。今日一见，果真是慈颜仙貌……幸会幸会！”

刘文炳忙向老道公介绍客人。

来客刘华英，是早年刘文炳在开县熊老举人学馆读书时一位同窗，本县灯草坝人氏，世家出身。两人本不同宗祠，但因彼此敬重，意气相投，多年相处莫逆，后又从各自家谱上查得同宗渊源，其后更是亲密无间，胜如兄弟。刘华英去过日本、南洋，现时弃商回乡办了一所汉西学堂。

“听说大哥的生意正红火着，咋又想起办学来？这不是丢下金饭碗，端起泥钵钵么？”

刘华英便由这话题纵论天下大事，由此而言及他此次回乡办学的抱负。

他说，据他对当今世界多方深研细察，凡列强之崛起，无不发端于变法维新。尤其东瀛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以区区三岛，勃然而兴，而今竟能称霸东亚。我们老大帝国，若要精励图强，只有以力学日本维新为方法、为目的！而维新之举，百端待兴，首端又在于兴办教育，开启民智，使国家英才辈出，而后方可进而兴办实业，以科学手段促物产丰富，兵器先进，使得国富兵强……

刘华英正谈得兴致勃勃，坐在矮板凳上刻竹简的明昭突然抬头问道：“大伯，这回皇太后也出来讲维新，会不会又像前几个那样，到出拐

的时候又把底下几个承头的维新人士抓来杀头呵！”

刘文炳对儿子这番话本身已吃惊不小，更对他居然斗胆插言，且带着质询口吻，便怒不可遏道：“你算哪把夜壶！嗯？……”

刘华英却对这个孩子刮目相看：“呀——不用说，你就是人人道及的我们任老伯为我家文炳培养出的那个少年才人？好，好！端的是出口不凡！叫什么来？”

赤脚的明昭慌慌从竹篾中立起，讪讪答道：“刘明昭！”

“说说，你从何得知皇太后圣上如今也力倡维新，得知前几年维新失败之事？”

明昭说了他所以得知一星半点时间，是爷爷常从赵家场书报邮传行买回报纸，叫他代读而来。

“讲维新的也不过是一些想救国救民的天真汉子，其实是办不成什么的。中国之弱，外有列强，内有腐败，当朝对列强卑躬屈膝，对百姓苛政如虎……大伯，我对你不生疏哩，我看过你在《渝报》上的文章……所以才敢给你说，我不……不大赞成维新哩！我赞成‘欲御外侮，先驱家贼’的主张……”

“依我之见，维新也罢，革命也罢，办教育则是两边都赞成的，开启民智对中华古国之复兴总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你吧，明昭，如不是有任老爷爷循循善诱，哪得如此通达世情，你说是吗？”

刘华英的到来，老道公喜出望外，如能让刘华英答应收下明昭这个学生，并资助他的学习与生活费用，岂不是明昭从此插上直搏九霄的翅膀？

老道公心里还有个想法，如明昭今后的学习有了着落，他也该乘时归去了！这些年在街头飘零，对于故乡的思念无时稍释。前几年怕官府追究罪责，如今老了，眼看来日无多，纵有什么不测之事也无所谓了，只要死前还能看一眼别来 50 年的

故土与亲人就行。主意已定，便于饭后对刘华英说：“他大伯，老夫有一事想单独与你说说……”将刘华英拉进了他与明昭所住的偏房。

刘华英一脚跨入小室时，便由这简朴的斗室内浓烈的书卷气氛吸引了。几架竹柜井然有序分类置放着经史诗文各类书籍，正欲细看书目时，墙上一则笔走龙蛇的书幅更醒目地扑入眼来：

男儿何不带吴钩，
收取关山五十州，
请君暂上凌霄阁，
若个书生万户侯。

光绪三十年秋，刘明昭书录唐人李贺诗以自勉

“这是明昭写的？这娃儿，何来一手大人的笔功？”

“你先不忙看他这支大人的笔，看他这颗大人的心吧！”老道公从一个藤条箱里取出一本抄写得恭谨的诗本，题名为《少年征夫刘明昭习作》。

刘华英打开诗本，便迫不及待站起吟哦道：

昨日听客议，中原烽火急；
狼兵去复来，路尸相枕藉；
城廓毁炮火，千村化尘灰；
议罢复长叹，恨无龙城将；
仗剑救黎元，挥师卫帝乡；
窃据私谓客，勿乃太悲伤；
但看三五载，杀敌有刘郎！

刘华英举本高叫：“好，好！此李杜再生之才也！”复又吟道：

运煤去山北，窑工面皆黑；
矿主颜如珠，非是吸人血？

……

“大伯呀！此子可畏呵，乃文炳之幸，我刘氏宗亲之幸！我真想给你老磕头谢恩哩！”刘华英两眼闪烁，激动不已。

“他大伯，我有句要紧话直言相告吧，文炳身患顽疾，这个家的杠轭我看他是再拖不动了，再拖怕是哪

天会一蹶不起。……你莫如将明昭带去你的学馆就读，一为不让孩子断了深造的机缘，二也能给这个家松松担子，学费、食宿上的花销，只好由你这位大伯承担了……”

“这毫无问题！老伯，刚才我就想说这话了。转念一想，我的学堂新办，师资虽有，但谁有你老伯的学识与教力？将孩子从你老身边带走，只怕会误了他，大伯，我看还是……”

“不行，不行，老汉自知，当今西洋人赖以建造邮电、舟船、铁辙之车与新兵器的诸门学问，我都是个白丁，如再以我之所知施教，至多成一个志大才疏的清淡客，而与世界进步相去万里之遥。大伯学堂之兴办，乃明昭前生修来的洪福，枯苗逢雨之佳音，况老夫今年70已过，快入土的人了，还能陪他几时？只有将孩子托付给你了。此后来日之成未可料定，但他决非忘恩负义之人，必将对你大伯结草衔环以图报……”老道公当然不会把他将离此归乡的意思说出来。

“好好，既如此，就包在我身上了！”刘华英爽快地应承了。“过了年就叫他去应考。”

老道公欣喜得两眼泪雨纷纷，仰头对天喊道：“上苍呵！你还是有眼的呵！以千载难逢之天时、地利、人和赐予明昭一身，莫非你欲降他以大任么？”说完，又向刘华英长揖一礼。

刘华英捧着老道公的双手，早已热泪盈眶：“老伯，有你这番话，我更得竭尽全力，决不负老伯重托！”

这年，开县县衙将举行第一次新学堂优秀学生的会考。从中选拔成绩最优秀的免费保送开县高等小学堂或夔府学堂。刘明昭以五名优秀生中的第一名去参加会考。

刘华英又特地赶来告诉刘文炳说：“各学堂同时可推选年龄45岁以下的教师去应试，对其中优秀授予贡生学衔。汉西学堂推举了三名教师，其中有你刘文炳。”

刘文炳未加思索，便断然一挥手：“大哥，你饶了我吧！打死我也不得去！”

“去不去由你，但你得听进我的几条理由：第一，名正言顺，名单上有你，不是现写上去的，早有呈文在案；第二，本学堂原推荐的三名应考教师中有一人父亲新丧，循例于服孝期不能应考，按章可以由学堂另举补缺；第三，有老山长和我联名荐举，本学堂同仁附议无疑；第四，本次县上会考，评议会首席判卷还是我们刘老山长，有他玉成，录取当是不在话下。这又并不是他欲弃权舞弊，而是他深信你的才智学识必能写出令众评议与考生心悦诚服的文章来！你以为如何？”

刘文炳一时只觉得脑子里轰然，又是怦然心动又是疑惑重重；刘华英突然向他敞开的这道门，无疑是出自他和老山长深情的关切，但到了这个年纪万一有个闪失，岂不貽笑大方……

“好，你自己细细思量后才回我的话吧！”

刘文炳细细思量的结果，还是父亲的遗言占了上风——“再莫应官试，无欲心方静，但求人品贵，休问枯与荣！”

“大哥，我还是决计不去！土埋半截的人，要它功名何用？再说，我不信当真是皇上新政牌子亮出，端的便世道大变？”

刘华英顺手从桌上拿起一摞报章，指点着念道：

“‘变法之行，宜以育材兴学为第一要务！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乃为新政之大端，亟待毅然决然，舍旧而谋新，必风声所树，士人观听一倾，推诚相与……’这是张之洞、袁世凯等政要大员向皇太后的联名奏章。故皇太后才有此废止科举、改由学堂选拔人才，授学衔补仕林的诏文。看，御批可是毫不含糊的，按照所陈，择要举办，宜以办学举材为先！文炳，你那番顾虑实是不了解

世情而生的偏狭之见呀！”

刘文炳终于将这番话听进去了，点头应允了！

却没想到，这一次应考比他十几年前的那次招来的，是一场更大的惨剧！

考场仍是十几年前刘文炳参应县上科试的文庙，如今也改为一座学堂了。建筑颇为雄伟，庭院间松柏成荫，三面都是大敞厅，厅内已特为这次会考用屏风隔了一间间考座。

考试时间未到，考生们都聚集在松柏下闲谈。

刘华英将刘文炳父子特意打扮了一番，服装是连夜赶作的，颇华贵而高雅。刘文炳着一件竹青色缎面夹袍，外罩一件高领对襟黑条纹呢背心，脚下是黑色牛皮的朝元鞋。论装束可说是在考生中最阔气最新式的。但现在这身打扮实把他害了。下得轿来（轿子自然也是刘华英执意安排的），跨入大门，一见这众多陌生的面孔，他就觉得浑身刺挠！加之过于华丽的服饰使他显得不伦不类，一下子便引得别人投来专注而异样的目光，成了众“视”之的！人们都好象无声地在相互发问：这是个什么人？是当官的老鸨犯了么？他没认得的人，只好形单影孤干站着，手脚怎么放置都觉得不对头。

只有儿子一直立在他身旁，也只有儿子一眼便看出他内心的紧张与惶悸，却又找不出适当的话对他说，只是眼巴巴看着如芒刺背的他，目光是意味深长的，像是怨责他不该如此羞愧，又像是在鼓励他应当挺起腰杆来，落落大方些。

好在，铃声响了，他跟在人后进了考场，按自己的编号找到了考座。一接到考卷，他便顿时地轻松自在了，今天是第一堂考试，试题是《人间闲话之琐记并随感》，试题试卷都是夔州府衙下发，当堂才开启火漆封泥的。但这题目却早被当过县上教谕的刘华英猜到了：无非以民声皇德再颂新政之亟待施行。也如当

年熊老举人在他第一次上考场之前一样,告诫再三,捡朝廷诏谕中的话,不惜“膝头”苦,笔下三跪九叩,多喊万岁,未有不成好卷之理。况刘文炳久居乡间,熟悉民情,深爱田园之美,于这笔下极富古人的现成溢美之词,写起来竟是不费吹灰之力,且声情并茂,一挥而就。更因他想考后再不受人侧目,在有的人还刚刚下笔时,便第一个交了卷,匆匆走出考场,钻进了停在太门外候着的轿子里。

次日,刘华英还不待复考名单公布,便从内部得到消息,刘文炳的初考试卷,在应考教师中名列第一,刘明昭的名字也在复考学生名单上。

由于在初考中一显身手,刘文炳自己也隐约有了一点宝刀不老的自信感,到复考之日,他一大早便起来了,洗漱停当之后,换了一身朴素合身的衣着,又焚了一炷香,暗自对天祈祷,保佑他这回如愿以偿,只求得一学衔,决不作官为宦……

谁知,在他临起身欲赴考场时,刘华英匆匆赶来,在门口将他堵住了,说:“兄弟,且不忙上轿,我有话同你说。”

两人回客房坐定之后,刘文炳不免大吃一惊!这位华英大哥全无往天那种春风得意、笑口常开的神色,现时却沮丧、委屈。

“咋啦?大哥……”

“兄弟,你……今天不去考了吧。我……我没想到……没想到……上头查出,你……你并未到我的学堂报到上任,所以……所以是不能作数的……”刘华英声声哀叹。

刘文炳虽感扫兴,但以他说的原由并不怀疑,更不想令他难过,便说:“这也是实情中事,大哥,这回我总算了却你的帐,也解了我一身的绑索。有明昭参加考试,或能得个免费外学,我就阿弥陀佛了。”

正说着,明昭跑来了:“大伯,我……我也不考了!”

刘华英不待他说话,拉着他就往外走。不料,明昭就势坐在地板上,掩面大哭:“不,我不考,不考……”

“明昭,大伯不叫我考,是人家说我在学堂只有其名而无其实,你是汉西学堂正经推举来会考的学生,为何也不考了?”

明昭哭得声咽泪噎,断续道:“爸,一伙人今日一早在考场门口贴出了白头帽子说:倡优皂隶人的子弟不许应考,今日再有欲图混珠鱼目,他们就拒考……”

刘文炳一听,登时便身子剧烈摇晃起来,刘华英忙上前将他撑扶住,他的两腿已僵直得提举不动。刘华英又拉过近旁圈椅让他坐下,却听得“咔嚓”一声,他像一柱枯柴似的倒下了,口里涌出大股大股殷红的鲜血……

明昭此刻唯知天塌地陷般的悲哭与呼号。对父亲在他出生前曾在县考中得第三名而后因是吹鼓手出身被除名的事,他是从父亲口中听说过的,但略而不详,后来又听华英大伯说了十几年前那桩案的始末,他才完全明白过来,却已是后悔莫及了……

刘文炳在县上客棧睡了几日,才雇了一乘布轿,由明昭陪同着回到赵家场来。

到家后,明昭母亲似也早得了信息,并不惊惶也不怨恨,更未哭泣,将丈夫迎入了她早已熏了檀木香、洒了石粉、铺好干净被褥的屋子里。

明昭早已在心里纳闷,为何不见道公爷爷身影呢?等把病人安顿熨贴后,母亲才对他说:

“你们走后第二天,爷爷说他要去一趟开县给你爸买几味药,不知为啥还不见回来……”

明昭不等母亲说完,心里便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连忙跑回自己的小屋。发现在自己的枕头下留有一张字条,上写:

“明昭:

吾之来,已告汝父,吾之去唯茫茫天地可知!未敢告此去何方,实吾自身也未卜来日凶吉,唯有以此残命委之于天而已矣,更不欲汝今日时常记挂,来日徒劳奔波。有生之日,吾与汝两心为一,非万重关山所能阻隔也。

明昭,吾之爱孙,爱弟子,爱传人,临行千呼万唤,唯有一愿,望牢记吾平日所教所望,吾纵将丧之沟渠,葬身荒野,亦将长笑而无憾矣!

任贤书叩拜谢汝父母。

光绪三十二年清明前夕。”

明昭读完此信,顿觉小屋内凄风四起,寒气透骨,室中所有物件都令他想起往日的一切,都令他意识到这一切从此都一去不复返。他不敢哭,怕父亲知道老道公悄然离去,再添悲痛,加剧病情,唯有两行热泪涌泉般向下迸流。

直到这日午夜,当家人都已熟睡,他才奔至浦里河畔,面对滚滚江流,哭倒在地,撕心裂肺般呼喊着:“爷爷——我的爷爷!……”

刘文炳自那日被背回家后,再也没离过床。一年之后(即1907年初春,明昭还不足15岁时)便怀着对面前这个世界的满腔愤恨,对妻子的无限疚愧,对一大群儿女如焚的焦虑与深情眷恋,大睁着双眼离开了人世。

他只活了45岁。其中竟有20多年是在寒窗苦读中度过的。他熟悉中国经典古书的每章每页,能背诵下其中每篇为历代公认的范文,能写一手好诗好字,最后却只能将这一切遗憾地带入了坟墓。

但他决非毫无意义地白白活了一世,什么也不曾留下。不,他留下了也许对于中国后来的历史具有非同小可影响的遗产。这便是他用自己整生的足迹,用自己的血给儿子明昭写下了一条教训:圣贤书里找不到穷人的道路,封建科场不是他们的进身之处;他也倾尽心血,同

二、元配夫人程宜芝

光绪三十一年春节期间,13岁的刘明昭参加了开县灯草坝汉西学堂的入学考试。

汉西学堂将开设各类新学科,以培育皇上诏书所示之维新政体所需的各项人才。由于主办的监学是当地素有文名且家资富厚的刘华英,堂长与教员都是闻名遐迩的饱学之士,故而吸引了数百名学子前来应考。

学堂分甲乙丙丁不同等级班次,相当于今天的重点小学。

明昭虽中了该学堂甲等一班第一名,令所有考师颇为难的是,他的成绩似乎应直接上中级学堂更合适些。但刘华英还是决定收下他。私下打定的主意是请几位老师在测算、自然等课上给他另开“小灶”,来年再作打算。

正当明昭欢欢喜喜准备着行装,等开春之后便去入学时,又突然冒出了一件使他很意外的事来。

明昭早听妈当笑话说起过:他出生时便定了一门亲事,女方姓程。此事还是爷爷与程女祖父早年就说定的。起因是爷爷有一天挑着担子归来途中,路遇一个中暑倒地的人,爷爷丢下担子,将他一气背了几十里送回他家,救了那人一命。此后两人换了兰谱,结为兄弟,还言明日后两家孙辈有年龄相当之男女,再结生死之缘。程女先明昭两年出世。等明昭下地,程家爷爷便将她的庚帖送来了。其后,程家爷爷去世。本来就有多代人得过文武功名的程家一直比刘家富裕,近年又越发兴旺了。女父程昌华考中过武秀才,又捐得了一个什么官衔,家有上百亩良田,场镇上还开得有砖瓦窑和匹头铺,日子很是红火。相反,刘文炳在父亲去世后处境每况愈下。到近年,两家

的往来已完全断绝。刘文炳更是自惭形秽,哪怕在场镇上碰上程家的人,也故作不认识。至于程家爷爷当年送来的孙女庚帖,早已不知丢哪个犄角角去了。即或找到,刘文炳也决计不会把它当一回事的。

怪事便出在汉西学堂张榜公布刘明昭考中甲班第一名之后,刘文炳虽心中欣喜万分,却因那年自己得中县榜,获贡生学衔,竟因当过吹鼓手的卑微家世被除名,受尽屈辱的往事记忆犹新,再不敢丝毫张扬。只妻子周氏煮了一碗荔枝圆蛋强压着儿子吃下(按旧习俗,这是儿子来日状元及第的意思),别无表示。但事过不几日,竟有一位稀客来登门祝贺:“亲家,恭喜恭喜啦!”此人便是程女之父程昌华。

程昌华坦诚说出自己此来的根由与用意:“令郎年幼志高,我想请你父子明日到寒舍一叙,也让小女见见她的换帖人,你看如何?”

“岂敢岂敢,不瞞义兄,文炳尚不无自知之明,实在是不敢高攀!”刘文炳称义兄,意在使对方明白,他不因父辈前言而令程家勉为其难。

程昌华当然听明白了。面虽有尴尬之色,却仍能体谅刘文炳内心的苦衷,便耿直道来:“文炳兄弟,我不仰你的学问人品,这几年,你是觉得自己艰难些,怕我家嫌弃,生了些隔阂。我程昌华不是见利忘义的人,何况家父生前告诫,不要忘了老世伯的救命之恩。今日,我把话留在这了,明日,二月初八,观音娘娘生日,好日子,请你父子光临寒舍作客。来不来,则在你了。告辞!”

程昌华说完便向夫妻二人连连拱手,扬长走出院门。

刘文炳最终觉得这无疑又是一个意外佳音,兴奋得久久站在原地,

时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在儿子身上灌注了一个上等人品的所应具有的一切美德;他所遭逢的不幸又从反面向儿子证明:与世无争,只求自己当个好人并不能使自己从此便得以安宁清静,退隐田园为一家温饱勤耕苦作也终于不能如愿以偿!儿子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有智有才、善良勤劳的父亲的教育,又有他的悲惨经历的借鉴,才有他自己后来所选择的伟大道路,并创立下与日月同辉的不朽功业。

当然,还应当看到,刘明昭最初的觉悟与成长,不止得益于父亲,更得益于他有幸与一个太平天国将领朝夕相处七八年之久,将他毕生拼搏与思索的成果于数千个日夜不息的传授中点滴不漏地接受下来,在文武韬略上奠定下最早也最坚固的基础。刘伯承元帅,这个盖世英雄的出现,不仅仅是由于他个人有着奇特的天赋与良好的启蒙环境,而是与他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战斗中成长壮大的历史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父亲死后,刘明昭在刘华英与岳父程昌华资助与强行促使下,在汉西学堂、开县高等小学堂、夔府中学堂又读了三四年书。

其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以推翻满清皇朝结束中国几千年君主专制政体的革命浪潮已在各地风起云涌,各地群众自发性的反抗斗争也不断发生。刘明昭早已在教室里坐不住了。在他16岁时赠同学的一首诗里写道:

少年狂夫吞声哭,
泪眼望断巫山雾;
脚底波涛头顶雨,
难浇心中恨与辱;
惜无双翅御大风,
觅我赤心报国途。……

又过了二年之后,刘明昭终于走出课堂,告别故园,走上了投笔从戎的报国之路。

搓着两手泥。脸上挂着他多日未有的喜洋洋神色。

次日，明昭去了程家。

他身着母亲给他特意换上的青布长衫，圆头缀面布鞋，黑呢瓜皮小帽。当他走到程家的高门楼前，看门的老人家怎么也不相信来的是未来的姑少爷。他那副尊容实不是他想象中新近中了汉西学堂“头榜”的学生。

只见他青布长衫之外，脖颈下头竟围着一块类似奶娃子口诀的圆兜。这东西又并非多余。因他的鼻孔下确实如龙出洞吊着长长的鼻涕。模样倒也不丑，不知为何嘴角鼻尖却是红红的。

来到程家厅堂后，以程昌华为首的全家老少或坐或立早就围了一



△顺泸起义总指挥——刘伯承

圈，等着与这位少年才子见面，一睹他的风采，也为给同时躲在帘后窥视的小姐事后提出各种观感。

面对过这样一个怪头怪脑、怪模怪样的相亲者，人群里顿时发出咔嚓的窃笑声。程昌华本人顿时也心寒如冰，只为不违礼节，还是客客气气招呼着来客：

“明昭贤侄，快请坐，请坐！”

他坐下了。坐姿也怪，将屁股挂了一个椅角，身子像搔痒地扭动。

“昨日未见到你。想请你过来叙谈叙谈，你别拘谨，随便一些，随便一些，嗯？”程昌华只以为他脸皮儿薄，太紧张了。

“不咋个，不咋个！‘呼——’”明昭抽搐了一下鼻腔，吸进两条“龙”，又用袖管横着擦了下鼻孔。

“你……听说读了很多书，练得了一身好功夫？”

“不咋个，不咋个！‘呼——’”明昭又来了那么一下。

全堂轰然笑起来了。

“听说你自己还写得有诗，背一首来听听如何？”

他又摇头又摆手。“我……不咋个，不咋个！”

“你屋里墙上的字，‘男儿何不带吴钩’总是你写的，没假吧？”

“是……，写得不咋个，不咋个！‘呼——’”又是一个横指鼻子的动作——当地人称之为“打横指”。

又问了些题目，回答都是“不咋个”！程昌华失望了。

“以后，有空常来走走。家父与你爷爷是八拜之交，我们也是世交了嘛，好不好？”

“好，好，我……我告辞了！”

他站起来，行过礼，没忘了又打了一个“横指”，便走出程家门楼。

读者，此事是不是笔者胆大妄为，对伟大人物居然敢于胡编乱造，对少年刘帅的形象竟肆意歪曲？

笔者不敢说此事千真万确，只能将材料来源如实写在下面：

程家女名叫程宜芝，是刘帅 18



△刘伯承在川军时期

岁时与之结发的妻子。两人在一起时聚时别生活过十几年。后刘帅因革命需要，浴血疆场数十年，有家不能归。到全国解放时，程宜芝已 60 岁。自刘帅离家后的二三十年间，她一直孤守在刘家的几间草屋里，与她和刘帅所生的独儿刘俊泰相依为命；由于刘俊泰早年中了鸦片烟毒，一直不能劳动，时常犯病发疯。一家生计除了从刘家分得几亩薄田的租入之外，主要靠着程氏的勤耕苦织，将男人女人的担子挑在一肩，才勉强过上了半温饱的生活。也正因为这样一个普通农家妇守着一个疯病儿苦度岁月，国民党才放过了他不共戴天的共党“头子”、在战场上一次次席卷成万精锐“国军”的刘伯承将军留在他们统治区的亲属，总算熬过了漫长寒夜盼来了黎明。时将军正在重庆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之职，也曾托人带回口信，希望与程氏一见，妥为解决所有她希望解决的困难。程宜芝知道将军已在长征途中与他志同道合的一位女战友结婚。不用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更不用说，将军的家庭十分美满幸

福,便也捎去口信:“你不要回来,我也不去你那里,我对你毫无怨言,也无大困难需要你帮助解决,只望你勤勉国事,挑好老百姓给你的千斤重担。我母子已得到政府照顾,成分评了红军家属,每月有五斗米补贴,不劳你分心了。”

程宜芝死于1957年。她的儿子刘俊泰则饿死在1961年困难年间。

刘俊泰膝下也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刘天俭,一直在四川奉节县当小学教师,现已退休。刘天俭曾多次被省、地、县评为模范教师,获得过先进称号与荣誉奖状。但当地很少有人知道她是刘伯承元帅亲孙女。

刘天俭一直伴着祖母程宜芝长大。程去世时,天俭已27岁,是孤独的祖母“翻古”怀旧的忠实听众。天俭记得,祖母常把祖父称为“打横槓的不咋个”爷爷,每说起爷爷上门相亲的事,都笑得气喘泪落。

“奶奶,爷爷是咋整起的,好好一个人,咋会成了红嘴红鼻子,鼻涕眼泪跟倒流?”天俭曾问。

“我想,他是临进门抹的海椒面吧!你爷爷小时候‘烦’得很哩,鬼板眼多得很。谁知他咋个装得那么像,硬是把我一家蒙倒了!”

“奶奶,你家又咋个相中了!”

程宜芝给孙女留下一段故事:

程家在赵家场外松林湾,与刘家相距不过20多里。明昭用那装傻的办法“麻”过了程家一时,但程家很快便由各种渠道了解了真相。程昌华深明大义又善解人意,他当然由此猜出了娃儿的心思,不过在委婉地表示不愿意。为什么呢?是年幼无知,还是如乃父一样有股贫而无谄的傲气?他并不深究,仍主动来刘家走动。与刘文炳兄弟相称,不再喊亲家,也不再提亲事,每次来都用真诚的劝说,让文炳夫妇收下他的金钱或物品的馈赠,并嘱:别告诉娃儿,他心气高,让他专心读书吧!”

明昭在汉西学堂读了一年书后,春节前回到家,因年节家境更加

拮据,靠刘文炳在镇上摆上红纸摊为各家书写春联,赚几个钱好办年货。这时刘文炳咳病刚好转,受不得风寒,此事只好由明昭替代了。

刘明昭往年也是父亲卖字的帮手,对此并不生分,老式春联如“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之类,记得很多,挥笔而就,比父亲写得还快还好。

这一年,在汉西学堂功课都考第一名的明昭,在镇上更是小有名气了,字也写得比往年刚劲秀丽,更何况,他还不专写老式的现成春联,只要买主提出要求,如期望儿子发奋读书,新媳妇生个胖娃娃之类,他都能于一皱眉之间编出对仗工整,合辙押韵的新楹联来,令许多老学究都来围观,赞叹不绝!因而生意特别的好!

这日,已到腊月二十九,直到黄昏将临还在忙乎。

正在这时,又来了一个40开外的老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大嫖,你老要对子么?”

“是的,是的。我家小姐,她的如意郎君呀,跑了,不见了,她想去找他,又怕羞又怕找不着,不去找么,心里又总念着,都快憋出病来了。所以,叫我来求一副对子,祝他郎君在外头清静平安,就这么个意思。”

明昭听说那郎君从军去了,略一思索,便挥笔写下:

剑胆行远,当家国倾危,血性男合当身许;

芳心念友,祈天神护佑,有情人终成眷属。

写完,默想片刻:怀着歉意说:“大嫖,写得咋个,请你老将就着拿回去吧。”

“要得要得,我们小姐要的就是这话。不过,你还得在边边上落上你的大名。”

“大嫖,春联不兴落名字的。”

“哪里话,我们小姐闺房里的字画咋都有名字?”

“你家小姐识字?”

“她呀,是今日也来过场镇上,偶然见到你相公字写得好的,她都站这儿看了好半天,只是她不好意思当面求字,不好说得,才叫我来。”

“哦——”明昭今日确见到几个女子在看他写字,都是有了点岁数的,再不疑有他。便只好在对联下方落笔写了一行小字:

“开县贫子刘明昭敬书”。

老嫖把对联夹在怀里,才掏出一个红纸包来,塞在明昭掌心里,乐哈哈笑颠颠地跑了。

明昭感到纸包好沉,连忙撕开,竟是亮晃晃的10块龙头大洋!

他如梦初醒,猛然猜出她家小姐是谁了,抬头又见那老嫖翻动着两只小脚,奔逃似的身影已到镇街尽头。

16岁的程宜芝送上这10个银圆,其实是送上一片痴情,送上她遵奉自小所受的礼教所倡导的女子德行的坚恒不移的决心,也送上了她终生的不幸!

这不幸当然不能怪罪她的丈夫无情,而是他将自己如火的情和爱,全都付诸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20岁时,她与18岁的刘明昭结婚之后,从此便是离别、等待、贫困、操劳、国民党统治下的恐怖惶惶、一个被烟毒伤害了又患精神病儿子的疯叫,伴随着她度过一生;正如他们的孙女刘天俭所说:“我的可怜的奶奶呀,一天好日子没过过,凡是女人该享的福她都没享过,凡是女人的不幸她都受够了!”

但刘天俭也说了:“我骄傲,不但因为我有一个称誉于国于世的、为国家民族舍弃一切的伟大爷爷,也因为我有一个虽然一生默默无闻,却集中国妇女忠贞、坚忍、勤劳的美德于一身的伟大奶奶!”

(责任编辑:刘家驹)

(丁隆炎:军队作家,现任四川作协副主席、四川影协副主席等职。)



徐向前

下面发表的是徐向前元帅于1982年8月14日上午,在寓所接受当时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和党史研究室的其他几位有关同志缪楚黄、刘经宇、佟英明、叶心瑜访问时的谈话记录。谈话中涉及四方面军为什么在1933年7月退出鄂豫皖根据地?1935年4月张国焘放弃川陕根据地是不是退却逃跑?怎样看张国焘在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随后又执行右倾分裂反党路线的危害?1935年8月9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南下时是否使用了“武力解决”的措词?西路军为什么在1937年3月遭到了失败等许多重要历史问题。他指出,过去同这些问题有关的有些说法是不够准确的,1977年9月他署名发表的《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一文,有几个地方也应当更正。他指出,张国焘是有野心的,他想自己当头,后来成了叛徒;他先后在鄂豫皖、川陕两个根据地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把这两个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搞空了;他在肃反方面和湘鄂西差不了多少。徐帅还阐述了四方面军一贯使用的“围点打援”的运动战的作战方法。徐帅说,写党史一定要实事求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这篇记录是由叶心瑜根据录音整理,并经过徐帅审定的。徐帅这个谈话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党史资料。徐向前元帅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已不幸于1992年辞世,为了纪念和缅怀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并应《炎黄春秋》杂志的要求,现特将谈话记录全文发表于此,以飨读者。

廖盖隆

1992年9月8日

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

廖盖隆(以下简称廖):上次我们给徐帅写了一封信,想请徐帅谈一些问题。

徐向前(以下简称徐):你们的信,我已看过了。还有什么?

廖:如还有时间,也请谈谈西路军的问题。

徐:可以。还有什么问题,随便谈吧。

最近两、三年内,写战史、写回忆录的人很多,有些问题找我谈,就引起我对这些问题的思索,也引起我对过去问题的回忆。我们都是党员,要把党的历史按本来面目研究出结果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论的方法,实事求是的方法,研究出结果来,得出正确的答案,这的确是很重要的问题。你们花了不少心血,看了不少材料,研究好了,把问题提出来,引起我们回忆思索,是很好的。最近两、三年内,有好多同志写回忆录,一些问题已经谈了。有些问题要回忆回忆,究竟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情况。过去有好多框框,现在没有框框了,冲破了框框,就能得出正确的答案,提供正确的参考资料。

你们的信提出了一些问题,其中提到1977年9月我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整理者)。那篇文章是我签了名的,我要负责。我看那篇文章有

三处不正确,被歪曲了,需要更正。现在有个问题,我看了吕继熙(吕黎平)写的文章,又把我那篇文章的看法重述一遍。因此,我感到有些问题自己也需要根据事实进一步研究。这样我就叙述些历史背景,提供历史事实,请党史工作者研究。那篇文章有三处讲得不对:

一、关于“张国焘擅自决定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的问题。

过去,也有的文章说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是逃跑。一些同志研究了这段历史,认为这个结论不对。四次反“围剿”失败了,苏区不能存在,怎么办?只有退出鄂豫皖。我回想当时召开了黄柴畈会议,有二十多人参加,我也参加了。会议临时决定离开老根据地,到平汉路以西,兜个圈子,打败敌人再回去。原来是这样计划的。结果过了平汉路以西,敌人追得很厉害,仗打得很多。我们在枣阳的新集和土桥铺一带打得很凶,损失也很大。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们也没有什么退却不退却的问题。我们是被迫撤离的。第二天早上我们冲破敌人的阻击,向西走。关于这个问题,在延安的时候,陈云同志,还有康生找我谈过。他们问,你们到四川是不是有计划去的?我就把战斗的经过说了一下。我说不是有计划的,是被迫的,开始是准备兜个圈子,等打下敌人再回去。后来回不去了。回不去就往西退。起初准备

在豫西建立根据地,不行;又准备进入陕南一带建立根据地,也不行。那时杨虎城已守住漫川关,胡宗南已经追来,进入陕南,我们去汉中的路被堵住了。我们在敌人追击下,越过秦岭转到西安附近。在西安附近,遇到敌人重兵堵截围追。经过激战后,我们再越秦岭,到了汉中。接着我们就到了四川。那时四川军阀混战,反动统治力量薄弱。到了四川我们就站住脚了。我对陈云、康生叙述了这一过程。至于中央给张国焘有什么电报,我没有看到过,也不知道。但今天看起来,退出鄂豫皖是不是退却、逃跑?当时被围困在苏区里面,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想在苏区继续战斗下去,就有被消灭的危险。所以只有在外围兜圈子,结果被迫兜到四川去了。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就是这样的情况。我把历史背景讲出来,你们可以考虑考虑。

二、1935年(左路军)南下时,张国焘是否发过“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问题。1977年的文章说有这样的电报,是不对的。我没有看过这样的电报。帮助我写文章的同志,是按照传统的说法写的。那时我很忙,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多加思索。有人以为我对这个问题很清楚,其实我对这个问题不清楚。在毛儿盖开会的时候,会议决定是到川陕甘去搞根据地,于是才兵分两路北上。(你们可能已看到张国焘写的《我的回



△红军时期的徐向前

忆》，他也谈到这点）原来是决定一路走的。中央主张一路走，我和陈昌浩也是主张一路走，同中央红军一块走。但张国焘要把红四方面军分两路走，他有野心，想当头头。张国焘决定要把四方面军分两路走，我们是没有办法的，他是红军总政委，中央对他也没有办法，我们对他更没有办法。我和陈昌浩带四军、三十军到了包座，到了班佑、巴西一带，在巴西停下来。张国焘和朱老总、刘伯承同志带九军、三十一军到阿坝。我们在巴西停下以后，我和陈昌浩曾经给张国焘去过两次或三次电报，催他过河。我们说，草地久驻不行，一是外面敌人在调集兵力围追

堵截，二是我们这个地方吃饭也成问题。那时，驻巴西的四方面军天天都向中央报告，陈昌浩究竟每天向中央报告些什么，中央有什么指示，我也记不太清楚了。我们给张国焘的电报中还说，你们应该赶快过河（嘎曲河），从阿坝快些来，争取时间出草地。最后我们还去电报说，你们实在不好走，我们派四军的三十一团带粮食来接应你们。而张国焘回电说，那里是草地，嘎曲河下雨涨水，实在过不去。

接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张国焘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我们也说危害。我们执行过张国焘路线，我们也不便怎么说。

关于“武力解决”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小插曲。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我们四方面军文化太低，一方面军人才多，我们请求中央派人来红四方面军，中央就派了叶剑英同志来当参谋长，还有陈伯钧、张宗逊、彭绍辉等同志。“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是没有看到过的。当时，他们（一、三军团）夜里走了，我们不知道。早上，前面部队打电话来，说他们走了，还筑了工事，放了警戒，打不打？当时接电话的是陈昌浩，他手中拿着话筒，面对我说：“这事怎么办？”我肯定地对陈说：“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怎么说也不能打。”这句话是我亲口讲的，这是事实。我不回避上述的事实，我不隐瞒事实。

还有，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发给谁，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是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

指定人译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过去都是这样传说。但要南下的电报是有的，我们南下了，这是违反了纪律，我们承认了错误。

三、关于西路军过黄河的问题。1977年的那篇文章说是张国焘擅自命令四方面军过河的，西路军失败是执行张国焘路线的结果。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的确是我率领四方面军过河的，这是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来电决定的，是中央军委的命令。我和先念见过面，谈过这件事。他也说是中央决定过河的，不是张国焘擅自决定的。因为我们接到中央的命令后，四方面军总部找了李先念，要三十军先头过河。后来三十军过河了，九军过河了，总指挥部过河了。敌人赶上来了，四军、三十一军没有过成。

我看过去说张国焘擅自命令西路军过河，西路军过河是违背中央命令的说法，是不对的，不能把中央命令说成是张国焘的命令。今天要实事求是，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搞清楚它。1977年的文章中那种说法是不对的。如果文章再版，就要修改，或者现在就要写说明，因为那样说法不对。不能把要求（指张国焘曾经提出的西进的要求——整理者）当成事实，不能把中央命令说成是张国焘的命令。西路军过河是中央军委下的命令，不是张国焘的命令。

关于西路军过河的问题，在延安时高岗问过我，我对他讲过这个问题：西路军过黄河以后，如果不打一条山，不在永昌、山丹建立根据地，一过黄河我们就往西面走，打嘉峪关，把玉门、把安西守起来，把敦煌守起来，那里没有好多敌人，建立根据地，还可以立住脚。马步青是怕我们的，我们有准备。以后青海的马步芳追上来后，跟我们打起来了。在永昌地方打敌人，时间打得太久。那

地方北面是沙漠,南面是祁连山,中间是狭道,好象弄堂。在那里搞根据地,一是吃饭问题不好解决,二是那里是少数民族地区,有民族隔阂,人也少。况且敌人是骑兵,我们是步兵,他要吃掉你,搞久了,不行,无法建立根据地。在延安时,高岗问我:你对西路军怎么看法?我回答说:西路军过黄河后,不打一条山、不在永昌、山丹一带搞根据地(那是中央指示搞的),一过黄河,我们就往西走,打嘉峪关,把安西、玉门守起来,把敦煌守起来,那里靠近苏联,一是有饭吃,不挨饿;二是不受冻;三是有弹药补充。陈云同志他们从苏联搞了武器。如果补充了大炮、机关枪,马家军再多一倍也不够我们打。过去我是这样看法,今天我还是这样看法。这不是“事后诸葛亮”,而是研究问题。

西路军的失败究竟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过黄河后,轻视马家骑兵,这是我们的错误。西安事变后,毛主席打电报给我们,问是否可以回来。我们也往东打过,但路被敌人堵了,没能回得来。如果那时过了黄河不打一条山,不搞根据地,一直往西走,西路军是不会失败的。

因为你们提问题来,所以我给你们讲这些情况。过去那篇文章有些地方是不对的,要更正。

你们提出来的问题,我回答的就是这些。看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你们是研究党史的,过去的框框都没有了,思想都解放了,要用新眼光来看旧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如实反映当时情况,我觉得很有必要。你们研究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好,有价值,把材料整理出来,对党史是宝贵的贡献。

你们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廖:关于张国焘电报的问题,宋佩夫同志^①曾经来党史研究室谈过,说四方面军的电报都经过他的手。他说没有发过要“武力解决”字样的电报。



△白雀园。1931年,张国焘在这里坐镇红四方面军的“大肃反”,使2500多名红军指战员遭到逮捕、杀害。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

徐:电报都是经过他发的。“文化大革命”中整他,就是说他是张国焘忠实的“走狗”,被关在地下室好几年。

廖:宋佩夫同志说要四方面军南下的电报是有的。

徐:张国焘原是中央代表,我们都是受他指挥的,哪里知道中央还有另外的意见!原先我们稀稀拉拉的,接到南下电报后立即过去。他还要我们准备,要我们过去。毛主席来征求过意见,我的意见是一起走。我考虑的不是别的,是不愿意把四方面军分开,这支部队从鄂豫皖一

直打过来,很不容易,一个南下,一个北上,这样不好。

我是1929年去的鄂豫皖。后来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也到了鄂豫皖。1931年11月7日成立了红四方面军。第三次反“围剿”时,我们南下打英山、广济等地,以后奉命回来。张国焘在白雀园肃反,杀了不少

^① 宋佩夫(1929—1991)江西萍乡人,1925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入共产党。1935年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后任红军总部三局局长,建国后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干部,把那时部队的指挥员、几个党代表、政治委员都搞掉了,县委书记、地方干部也被杀了不少,军队干部杀了一批又一批。鄂豫皖肃反比湘鄂西好不了多少。第四次反“围剿”,那么紧张,他们还杀人。连我的老婆①也杀了,我那时也感到紧张。

我和张国焘、陈昌浩私人感情并不好。我对陈昌浩说,肃反杀了这么多的人,是不对的。我曾要求调中央去工作,张国焘、陈昌浩不同意,我也就没向中央提。

1977年的那篇文章,在三个问题上犯了错误的。当时有当时的框框,当时有中央文件,有“西路军事件”,有那样的传说,说退出鄂豫皖是错了,西路军过河是错了,当时就是有这些框框。

廖:宋侃夫同志建议我们写信给叶帅,请他回忆这段历史。因为电报是他交给毛主席看的,请他回忆有无“武力解决”中央的字样。我们已经给叶帅写了信。

我们研究室的同志看到1937年中央政治局批判张国焘的会议记录,毛主席的发言中谈到,叶剑英同志把电报交给他看,电报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样的话。

徐:我没有看到“武力解决”字样的电报。吕黎平的文章引了我的文章,你们写文章是否也引了我的文章?那篇文章是我签了名的,我要负责的,不管怎么说,我是要负责的。只有再版时更正。

郭春福(徐帅秘书):1977年,《人民日报》为了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请徐帅写文章。《人民日报》社推荐军事科学院的几位同志同《人民日报》的同志帮忙写了那篇文章。他们写好稿子后交给我,徐帅叫我先看,我对这段历史不熟悉,文章中出现的问题应该由我负责。

徐:我怎么能把责任推给你们呢?责任我是要负的。

廖:总之,张国焘要求四方面军南

下的电报肯定是有的,主要是电报用什么措词现在有不同的说法。

徐:南下电报是肯定有的。我们同意南下,是犯了错误的。

廖:中央看到张国焘要四方面军南下的电报,感到处境危险,所以立即离开四方面军北上了。

现在还有个问题,也请徐帅谈谈。鄂豫皖苏区发展得很大,后来川陕苏区也发展得很大,部队发展到8万多人,一说10万人,这说明四方面军有成功的经验。另外,最近在南充市召开川陕根据地学术讨论会,会上有的同志说川陕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其中有张国焘的功劳,因为他是头头。到底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川陕苏区是有成绩的,但成绩该不该算在张国焘头上?张国焘在政策上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川陕苏区有那么大的发展。至于打仗方面,大家都晓得,张国焘不会打仗。为什么打胜了呢?仗是徐帅、曾中生②、旷继勋③、许继慎④……等等同志指挥打的,不能说张国焘有什么功劳。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看?

还有西路军的问题。这牵涉到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对张国焘退却逃跑有些批评的看法,毛主席说,西路军失败说明了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到底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有什么关系?

徐:到陕北后,我们同张国焘没有直接关系了。我们主要是与中央军委联系,我们直接隶属于中央军委领导,是受中央指挥的,受毛主席指挥的。西路军有个军政委员会;主席是陈昌浩,副主席是我。我们西路军主要是军事上的问题,是战略战术的问题。我们过黄河后瞧不起马家军,结果吃了几个大亏。我在延安对高岗说过,我们过黄河后不打一条山,不在山丹、永昌建立根据地,一直往西走,和苏联联系上,有吃有穿,不挨冻受饿,弹药又可以得到补

充,我们是打败马家军的。这就是西路军的问题。

过去说西路军过黄河是张国焘退却逃跑。西路军到底执行了谁的命令?据我看,过黄河不是张国焘的问题,是中央下的命令,不是张国焘下的命令。你们是研究党史的,该中央负责,还是张国焘负责?可以查一查当时的材料。

张国焘这个人,他是有野心的,最后成了叛徒。但是,不要因为他是叛徒、坏蛋,就认为他一切都错了。我对张国焘一生也不太了解,他在二·七罢工运动中,在大革命时期的行为,我不了解。我以前还不是党员,在武汉时期我是新党员,一般党员。

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的确是王明派来的代表,他是执行王明路线的。毛主席说过,王明路线时期,“钦差大臣满天飞”。的确如此。张国焘被派到鄂豫皖苏区,博古到中央苏区,夏曦到湘鄂西苏区。但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时,苏区已经很强大了,根据地有很大发展。张国焘到鄂

① 徐帅前夫人程训宣,黄安人,四方面军妇女干部,1932年在白雀园肃反中被杀害。

② 曾中生(1900—1935),原名钟圣,湖南资兴人,1925年考入黄埔第四期,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北伐,大革命失败后到苏联学习,曾出席中共六大。1930年11月任中央特派员到鄂豫皖苏区,1931年1月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1931年张国焘到鄂豫皖后,他被免职,同年9月肃反中被监禁,1935年8月被杀害。

③ 旷继勋(1895—1933),贵州思南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与罗世文领导遂宁起义,成立红军四川第一路军,任总指挥。后到鄂豫皖苏区任红六军军长,红四军军长,中共鄂豫皖军委副主席,因抵制“左”倾路线,被降职。以后在川陕苏区任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6月在肃反中被张国焘杀害。

④ 许继慎(1901—1931),安徽六安人,1921年4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入黄埔第一期,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两次东征,任叶挺独立团营长。1931年任红一军军长,后任红四军十一师师长。同年10月在白雀园肃反中被张国焘杀害。

豫皖苏区后，完全执行了王明路线。我们南下打英山、浠水、蕲春、黄梅、广济地区，他要我们出安庆，威胁南京。我们打仗的战术是“围点打援”。这种战术是在我们力量不大，武器不如敌人，敌人力量强大的情况下采取的办法。也只有采取这种战术才能取得黄安战役、苏家埠战役的大胜利。这时已经有红十师、十一师、十二师、十三师，以后又有七十三师、七十四师、七十五师。黄安战役是围点打援的典型。后来，商（城）潢（川）战役、苏家埠战役、潢（川）光（山）战役也是这个打法。我们没有炮火，子弹也不如敌人多，我们就采取战壕对战壕的办法消耗敌人，慢慢接近敌人，把敌人围住。他们没有吃的，敌机便空投粮食，结果十分之八、九都投到我们阵地上来了。因为敌我之间空隙很小，空投的粮食一飘就飘到我们阵地上来，我们围住敌人，打他的援兵，最后把他们消灭了。

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后，我和陈昌浩主张在北边赤白交界处休整，可以向白区要粮，可以扩大苏区。但张国焘和中央分局不同意我们的意见，要我们夺取麻城，威逼武汉。我看到省委的一个文件上出现了国民党是偏师的观点。我们围了麻城，敌人的四次“围剿”就来了。那时我们情报很差，中央也没有供给什么情报，敌人到了跟前才发现。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我们打了卫立煌部的李默庵，打了陈继承部的黄杰，把黄杰的司令部也占了。我们打垮了不少敌人，但没有消灭敌人，只是击溃战，因为自己的力量不够。最后，被迫转移。

张国焘是川陕苏区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到四川后，他的错误是明显的。如对地方部队本来应该很好地帮助人家，三十三军帮助他，他却削弱人家，最后他把三十三军番号也取消了。对地方政策，只要是当过保长的，他都杀掉。我有看法，有的

保长还是穷人，是大家把他推出来当的，不应该杀掉，但政策是那样的。张国焘主要是执行“左”的政策，所以搞来搞去，最后还是撤离川陕苏区了。当时我们有好多意见，我也直接讲了，但张国焘不采纳。鄂豫皖苏区主要是“左”的错误，土地政策是“左”的，经济政策也是“左”的，一块银元才买二两或四两咸盐，把小商人、小经纪人当资本家打倒。我说鄂豫皖苏区即使第四次反“围剿”搞得再好，按我和陈昌浩的意见打，把敌人打垮了，敌人还会来第五次“围剿”。蒋介石是三步棋，一是打湘鄂西，二是打鄂豫皖，三是打中央苏区，各个击破。而我们三个苏区是互不相联的。蒋介石把湘鄂西搞掉后，就来“围剿”鄂豫皖。我们即使按原来的设想打，把敌人击溃了，也不过伤其一指，蒋介石的基本力量还是存在的，他还会发动第五次“围剿”的。而我们由于“左”的错误政策，把苏区搞得民穷财尽，人力物力都没有了。农村开个会，你看主要是妇女，男的都当红军去了。当时扩大红军，贫下中农出身的年轻人都参加了红军。如果你看到年轻人没当红军的，那就是地主富农出身的。这样的政治、经济政策是不行的。在四川也是这样。当然我这些想法都是“事后诸葛亮”，但作为历史问题来研究，可以有这样的看法和想法。

廖：张国焘放弃川陕根据地是被迫退出还是退却逃跑，现在还有不同的看法。

徐：是有不同的看法。当时是被迫退出川陕苏区，不退出怎么可以？我把川陕根据地情况给你们谈谈。

，我们粉碎敌人的六路围攻以后，我和李先念极力主张渡过一个师到嘉陵江西岸去，把嘉陵江西岸掌握在我们手里。因为那时敌人溃不成军，西岸都没有敌人，南部县有过暴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都是很高的。川东、川北党组织的基础都很好，我们去以前，革命都已有了一定

的基础。川东的万县、达县、宣汉一带有党的活动。我们主张在嘉陵江两岸活动，一方面回旋余地大，另一方面可以建立新的根据地，同时要准备粉碎敌人新的“围剿”。但张国焘不接受我们的意见。他是中央代表，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把主力全部撤回去。我们回来后，敌人重新整顿，在嘉陵江东岸活动。这时我们接到中央的电报，命令我们派一个师迎接他们。我们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消息：徐海东部队也到了豫西一带。我们也想派一支部队去策应他们，迎接他们。中央要我们派一个师去迎接他们，他们想过长江。我们觉得派少了不行，派多了又派不出来，因为按照四川地形需要我们出较多的兵。中央的电报我看过，我还记得这件事。派一个师的兵力迎接中央是不行的，兵力太少。四川是那样的地形，敌人在后面堵住，这一师人就回不来了。

在四川也是几进几出，加上我们“左”的政策，错误的肃反政策。如旷继勋同志曾任红四军的军长，竟在肃反中被张国焘杀掉。我们到四川开始还不错，但很快群众就有反映。我们是“左”的政策，主观认定人家是地主，就把他杀掉，其实，有的还不真正是地主。有的地方我们占领了一下，后来又退出来，有时进去，有时又出来，几进几出，苏区遭到很大破坏。一是敌人的破坏，一是自己政策上搞错了。

我们本来想打胡宗南的部队，占领嘉陵江西岸。我们在广（元）昭（化）战役后，又把兵收回来。要过嘉陵江，不但遭到敌人阻击，还要爬很高的山。张国焘见通（江）、南（江）、巴（中）守不住了，有点恐慌。我倒不管，因为我不常在后边。我到四川后，几乎每天都到前线打仗，到后方也不过三四次。粉碎刘湘的六路“围攻”后，张国焘找我商量，说在四川地区不大好搞。“左”的政策把苏区搞得民穷财尽，民不聊生，怎么好

搞。到汉中，汉中南面是巴山，北面是秦岭，那地方很小，不适宜搞根据地。敌人来了以后，把你围在那里，就没有办法。我在青江渡会议上曾提出，接应中央红军，派小部队不行，派出去就会被敌人吃掉，大部队也派不出去。在老苏区不行，我们只有在川、陕、甘交界的地方建立根据地。这样，四川可以联接起来，陕南可以联接起来，甘南可以联接起来。川陕甘计划四方面军主力迅速、果断地消灭胡宗南。我们开会讨论今后怎么办时，我就提了上面的意见。于是我就带部队过嘉陵江，张国焘留在后面。我们打到剑门关，剑门关南面和北面不一样，剑门关形势是从南进容易，从北进难。人家说剑门关险要，我也说险要也不险要，从陕西到四川就很险要，从四川到陕西就不险要。我们占领了江油、中坝等地。江油是邓锡侯的部队，我们没有和邓锡侯硬打，我们把它围住了。这时我每天都打电报给张国焘，说我们前面部队已打开局面，你们后续部队要马上跟上来，不然我们前面没有办法。本来我们要集中主力打广元、碧口，碧口是胡宗南的老巢，是嘉陵江和白龙江的汇合处。但张国焘他们不上来，我们就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只有两个军的实力。一个军攻广元、碧口，一个军已打到中坝，差不多要到绵阳了。四川军阀是惊弓之鸟，我们不怕他，少量的部队可以对付大量的敌人。但张国焘不及时跟上来，他们是搬家式的，整整延迟了40天，大部队在那里慢慢行动。大部队本来可以迅速行动，围住胡宗南，可以给敌人痛击。当然要有牺牲，我那时是下决心牺牲的，牺牲几千人、万把人，也要打下来。当时关键性的问题是打下胡宗南。你要打垮胡宗南，不牺牲些人是没有办法的。我差不多每天都打电报给张国焘，而他们却延迟了40天才上来。那时敌人已经把阵地巩固了，搞得好好的。而我们却大搬家，什么都

搬，而且后面陈昌浩还指挥烧房子，搞什么肃反、坚壁清野。这事我一直到延安才知道。他们说什么总指挥部内有暗藏的敌人。我们好多干部、战士死在他们手里。那时部队干部、战士挨了整，不少人牺牲。大部队到了万川坝，那是个很大的镇，人也很多，也很热闹，我在那里还住过几天。部队在那里呆了几个星期，没办法，被迫退出来。当然，张国焘是不是有计划地退出，我就知道了。川陕甘作战计划未能实现，打不开局面了，被迫撤离，退出通南巴，到了懋功、松潘。而且退出通南巴也没有留下多的部队，只留下刘子才率千把人枪，坚持当地斗争。刘子才也不怎么精干。应该多留些部队。

张国焘是否有计划的退却，我不知道。四川那个地方，真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一直要爬到山顶上。通南巴那个地方，小镇子很多，有的镇，山是很险要的，你占领它，堵住山口就没有办法过去。

放弃川陕苏区的过程就是这样。你们今天叫我下什么结论，我讲不出来。因为执行了过左的政策，结果那个地方搞得人力财力都没有了，根据地如果没有人力，没有财力，怎么能存在？一要吃饭，二要穿衣，三要弹药，弹药主要来自敌人。没有人无法打仗，弹药也无法补充。毛主席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道理就在这里。伤其十指，不碍大局，他擦了药又好了。就是说，断其一指才能消灭其主力。胡宗南的部队有补充，我们打仗没有补充。我们每打一仗，都要考虑究竟为什么要打仗，怎样才能消灭它的主力，这是军队存在的重要方面，你打消耗战，怎么能打败他？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就是和敌人拼消耗。你入力没有他多，财力没有他多，物质力量没有他多，怎么能和敌人拼消耗？因此，毛主席主要强调要进行运动战。我们军队是长于打运动战的，我们战士能吃苦耐劳。“围点打援”

也是运动战。我们没有武器，但是能打运动战。一个苏区要存在，一要政策对头，二要苏区不断扩大。政策不对头，苏区就不能扩大。执行“左”的政策，苏区就不断缩小，怎么能存在下去？政策错了，只有退出，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唯一的生路就是打出去。这就是我给你们介绍的当时情况。你们问我的看法，这就是我的看法。

廖：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汇合时，到底有多少人？

徐：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一方面军不知多少。我们确确实实有8万多人。我说8万多人，不仅是正规军，也包括地方部队；真正有战斗力的部队，大约五、六万人。我们有五个军，三十三军其实力很小。我们最大的范围，打到嘉陵江边。我们曾打到川西，打到中坝、江油、绵阳。

中央红军是多少，我不知道。陈昌浩写标语，说30万红军大会师。我在旁边发冷笑，哪有这么多红军？你这样宣传还兑现不兑现？两个方面军会合时，我不是先头部队，先头部队是三十军、九军。李先念是先头部队，但他们也不好问人家，你们有多少兵力？

廖：四方面军南下时损失很大，差不多牺牲了一半。

徐：那差不多。南下差不多牺牲了一半，过草地牺牲很大。一方面军牺牲少些，因为他们没过那么多草地。我走过的这条路很清楚，死的人很多。南下时，主要是百丈关和雅安的战，我们损失很大。我们要和四川军阀打仗，还要和胡宗南、蒋介石打仗。张国焘南下想跑到安全的地方，结果也呆不住。你兵多了，在那安全地方没饭吃；兵少了，人家要吃掉你。

佟英明：陕南战役应该怎么评价？现在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全盘否定；一种是说军事上打了胜仗，但在政策上破坏了同杨虎城建立的统一战线



△1954年徐向前与夫人贾杰在武汉东湖

线关系。

徐：不管怎么评价，陕南战役不是真正打杨虎城的，只是虚晃一枪，我们的真正目标是打胡宗南，不是想打下汉中，但后来打到了南郑城郊。不知道当时情况的人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也就是不身临其境，就不知其中底细。陕南战役只是虚晃一枪。因为我们与杨虎城签订了停战协定，有统战关系。上次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学术讨论会，听说你们参加了会。（叶心瑜：我参加了。）你们对陕南战役怎么看？（叶：《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已经谈了。）

缪楚黄：西安事变以后，西路军是否有两种发展方向？或是向东发展，或是继续向西发展；后来怎么又决定向西发展？

徐：毛主席给我们打电报说，你们如果有困难，是否可以过河来。那已经是西安事变以后了。没有西安事变，我们也准备过河东。宁夏战役计划并不是四方面军过黄河后才定的，而是事先定的。我们红四方面军过河，是中央原来就有宁夏战役计

划。过河后，中央决定打定远营。我们调查一下，定远营在阿拉善旗，是沙漠上的绿洲，地方那么小，这么多部队到定远营，吃、住都很困难，无法解决，那里四面都是沙漠，往哪里走啊！所以打定远营是不行的。我那时是积极主张西进的。我在会上列举了六、七条理由，说明西进的好处：如西进可以拿到武器，可以打通国际路线；西进对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也是鼓励。我们占领山丹、永昌时，九军遇上马家军，在古浪打了一仗。马家军比我们少，损失很大，我们伤亡也很大。这时我和陈昌浩发生争执，我说现在形势是我们处于守势，处境不利。陈昌浩却轻视马家军，说什么完全击败了敌人。他看不到敌人有后方、有补充，而我们没有根据地，没有补充。我和陈昌浩的辩论没有什么结果。反正我讲我的理由，他讲他的理由，我们争论了很久。我是从来不想和他公开争论的，这次实在忍耐不住了，而且这时他也没有张国焘作后台了。

缪：西路军过河后，张国焘有没有给西路军发过电报？

徐：没有，我的印象没有。那时西路军收的都是军委的电报。可能有个别他和别人共同签署的电报，因为他是总政委。

廖：好象有一次西路军想回来。

徐：是这样。在永昌时我们想回来。想叫于学忠接应我们。为什么以后没有回来呢？因为马家军又追上来了。他们超过我们，到了山丹。这时我们前面的一位指挥员回来说，马家军见我们想回去，很快地就调兵来阻止我们，把凉州、永昌之间的空隙堵了。我们已失去返回河东的机会，只好又继续西进。我们是步兵，他们是骑兵；我们一夜只能走六、七十里或七、八十里，敌人是骑兵，走得快。中央有指示，命令我们在永昌一带建立根据地。中央曾批评我们信心不足，中央是这么批评的。其实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不行，北面是沙漠，南面是祁连山，中间是弄堂，地方很小，回旋余地很小。建立根据地不是说一去群众就起来，要有一个过程，要把敌人打垮，要不断取得胜利，群众才能起来。要几起几落，群众真正想通了，才真正起来，根据地才能真正巩固起来，这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建立根据地不行，如派部队出去，派少量的部队不行，敌人要吃掉你，派游击队、筹粮队出去，又出不去，大部队整个出去，那等于整个搬家，准备打到底，打到马家军占领的地方又不行。在这种情况下，最后还是只好西进。

廖：徐帅刚才讲了三个问题，我们准备把录音整理好，请徐帅审定，我们将作为党史资料保留下来。

郭：不供发表。

廖：我们只作为党史资料，供领导参考。

徐：对。我只是给你们提供资料，提供研究这些问题的历史背景。

（责任编辑：刘家驹）

班禅

大师的圆寂

· 单超



专机穿越首都上空轻柔的晨雾，飞向遥远的世界屋脊。班禅大师凭窗俯视，隐约可见辉煌的天安门、挺拔的英雄纪念碑，他不由想起敬爱的周总理。前天——1989年1月7日，就像周总理去世后所有的1月7日一样，他到英雄纪念碑给总理献上一个鲜花编织的花圈。他永远不能忘记周总理。1951年，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签订后，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变。协议明确规定：达赖和班禅的固有地位不予变更。接着，周总理亲自安排班禅返藏事宜，就连衣食住行、随行医生、治安保卫等等，总理都作了细致周到的安排。班禅激动万分，当时虽然才12岁，好像一下长大了，成熟了。1952年5月28日，他登上辉煌的布达拉宫，比他大两岁的达赖喇嘛，亲切地和他进行了碰头礼，互献了哈达，然后友好地交谈。至此，历史上为藏族人民十分关心的两位大师之间的团结和友谊，得到了恢复，这使班禅再次深深体会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班禅大师正沉浸在难忘的回忆中，机组工作人员告诉说：“拉萨就在机下，请大师准备下机。”班禅大师振奋一下精神，望着机翼下拔地而起的一幢幢高楼大厦，心中说：西藏和内地一样，也在日新月异啊！几年没见，拉萨变得让人认不得了！猛然间，他眉峰蹙起，一股酸涩涌向心头……

……1964年，对班禅大师来说是不吉利的开始。一天，他接到约



△供奉在扎什南捷的五世班禅到九世班禅灵骨

请，参加自治区召开的重要会议。一段时间以来，他已经觉察到凶兆将临，那是因为他给毛主席、党中央呈送万言书引起的。几年来，他抱着为藏族人民做些实事、好事的原望，跑遍了藏区，耳闻目睹，他深感有些政策在执行中出现种种问题，给藏胞造成极大的痛苦。当藏胞跪在路旁迎接他，还把全家人多年积攒的血汗钱虔诚地献给他时，他知道，除对他这位大活佛的尊敬外，还希望他能替他们解难除忧。视察藏区后，他煞费苦心地写出洋洋数万言书，指出不少严重问题，提出自己对改进工作的意见。他满以为，他的良苦用心会得到赞扬。然而，当他进入会场后，平时和他十分友好的一些党政负责人，失去了往日的和蔼可亲。会议开始后，他才知道，这次重要的会议，是专门为帮助他召开的，他必须检查“万言上书”中的错误。班禅大师很气愤，反复说明他的良好动机，但那些权威人士却不屑一听。会议进行了几十天，给他戴上好几顶“帽子”，又被请到了北京。这时，他才知道，他的“万言上书”，并没有引起至高无上的毛主席的兴趣，在众多首长的帮助下，他一次次地检讨、反省，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大

为惊愕的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竟把矛头对准跟他打天下的老将？！不久，他这位被叫作爱国大师的活佛，也变成了凡间罪人。有一天，一群佩戴红卫兵臂章的学生冲进了家门，他们是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多数还是藏族，不容分说把他往外拉扯，带上了汽车，直开到中央民族学院的批斗会场。他在咒骂声中被架上台，罚站，挂黑牌，架飞机，脸上、身上还被抹了大小便……他先是气得暴跳如雷，后来精疲力竭……再后来，居然被软禁关押多年！他后来才听说，如果不是敬爱的周总理的关心和保护，也许他早不在人世了。班禅大师一想起那些心中流血、但至今仍不完全理解的往事，总是深深地叹气……

到拉萨后，1月10日上午，他首先去大昭寺朝拜释迦牟尼圣像。

大师对于大昭寺的种种神话传说十分赞赏，他讲起来也格外生动。据说，文成公主从嫁给松赞干布后，松赞干布视公主为天神救度母的化身，亲自参加了大昭寺的修建，以便公主居住，同时供奉公主带去的释迦牟尼佛像。松赞干布上梁挥斧操作时，惊动九天神灵下凡相助。一天，仆人到工地送饭，只见上上下下

有数不清的松赞干布正在干活，不禁惊叫一声：“怪呀！”正挥斧干活的松赞干布闻声下望，一不小心，手中的斧头滑落，把承檐的人面兽身像的鼻梁削平了。后来，人们发现，大昭寺108个人面狮身伏兽的鼻子全是扁平的，班禅大师每念及此，总是赞扬西藏人民的聪明智慧。

班禅大师驱车到大昭寺时，那里已是人山人海，只见寺内香烟缭绕，哈达如云，班禅一一为拥来的信徒摸顶祝福，好长时间他才进入大昭寺。参拜释迦牟尼佛像时，大师高声朗诵安神经，祈祷佛法宏扬，保佑众生安乐。

从大昭寺出来，他望着繁荣的八角街市场，心中又升起一阵喜悦。

1月13日，“日光城”拉萨，好像比往日更加阳光灿烂。当群鸽在蓝天上下飞舞时，班禅大师的车队从布达拉宫前驶过，向日喀则奔去。当汽车爬上岗巴拉大山，他要停下车来祭神。他的经师和随行人员早已做好准备，很快在山顶摆好了祭品，和大师一同进行“煨桑”活动。班禅大师抓起喷香的糌粑面，用力撒向天空，又把一瓶泸州大曲泼在地面，同时高声念诵经文。最后，他望着山下碧波荡漾的羊卓雍湖，举起双手，伸向雄鹰盘旋的蓝天，从丹田里发出响亮的喊声：“——一切——顺——利！”

汽车绕着湖边飞驰。班禅大师心情舒畅，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使他一想起来就兴趣盎然：很早以前，这一带因为水草太好，牛羊肉特别香，羊毛特别白软，这里人也漂亮。有一个名叫卓玛的姑娘，大雁见了她低飞鸣叫，远远近近，都说她是仙女下凡。不远处有位牧主听说卓玛的美名，带着打手抢走了卓玛。在经过一处泉眼时，卓玛说她很渴，如不喝水，便会死去。牧主把卓玛放下马来，卓玛去到泉边。祷告过天神，她一头栽进泉眼，牧主发疯般跑去，企图把卓玛捞起。忽然，天上一声炸



△班禅大师在扎什伦布寺主持开光大典

雷，泉水像箭一样喷射出来。泉水不停地喷，越喷越大，很快把牧主和打手们淹没。泉水一直喷了999天，这里就成了望不到边的大湖。后来，人们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羊卓雍。

班禅大师想到这里，嫣然一笑，他由衷地感谢万能的神灵，只有神灵能帮助人间享受连神灵也难得的幸福。此刻，大师眼前反复出现几个极其亲切的面容，所有烦恼和疲劳全都消失了。

班禅大师还没从北京出发，消息已经传遍了西藏的农村、牧场。特别是后藏日喀则地区的藏胞，一听说班禅大师即将返回扎什伦布寺，要亲手把五世到九世班禅的灵骨安放在国家花巨资修建的“札什南捷”

灵殿进行开光大典时，藏胞们简直高兴得连白天黑夜都分不清了。他们首先找出珍藏多年的银元、玉器、人民币和珠宝，用红巾包好，外覆洁白的哈达，然后准备好节日盛装，打算提前赶到日喀则。如果找不到住处，就蹲在扎什伦布寺或大街小巷的墙角下，即令顶风冒雪过寒夜，心里也是热烘烘的。如果能够亲自感受到班禅大师的摸顶，又能见到前几世班禅的灵骨，那就是一生一世的最大幸福。因此，把全家最珍贵的财物献给大师，才是真正虔诚的信徒。只有虔诚，才能换来今世和来生的幸福。所以1月10号以后，日喀则一天比一天热闹。

1月14日天刚蒙蒙亮，由3万余人排成的人墙雨道，一眼望不到

边地出现在日喀则城外。班禅大师的车徐徐进入人的雨道，他看到，有些人泪花滚动，有些人念念有词，有些人把洁白的哈达、鲜美的花束、大大小小的红包，一齐扔向他的汽车，不多会儿，为他开路的敞篷吉普车，已经被哈达堆成一个小山，车上存不住的哈达和红包，一个个滚落下去，他的眼前，已是哈达、鲜花和财宝的世界。大师激动得念起佛来。忽然，有两个牧民模样的老大爷，一下子冲向大师的汽车，打算用额触一触油漆闪闪的车门。这一下，可忙坏了保卫人员，警卫车上跳下一个身穿藏装的小伙子，一手搀住一个，把两位老人送进人群。班禅大师松了一口气，他真怕吓着那两位老人，只见那两位老人脸上露出笑容时，他从车窗内向他们亲切地招招手。

虽然经过平原到高原的变化，又坐了一天的汽车，班禅大师还是一次次地拒绝工作人员劝他注意休息的建议。他询问开光大典的各项准备工作，他亲自检查从北京带来大批物品到达的情况，他视察接待全国各地来宾的住处是否整洁。关于如何运来北京的啤酒，他曾亲自测量运输车，为如何装上防冻防撞的泡沫板提出合理的建议，当被采纳时，他舒心地笑了。

这次活动，首要的是把前五世班禅的灵骨安置好。“文化大革命”中，先师们的灵骨被造反派、红卫兵扔进山野，抛入河流，多亏虔诚的信徒们，冒着被打被杀的风险，偷偷摸摸寻到一部分，像眼珠一样珍藏起来，后来辗转交到他手中。现在，中央拨款670万元，提供黄金108.5公斤，白银1000公斤，西藏自治区和日喀则又捐赠珍珠宝石，加上扎什伦布寺筹集的100万元人民币，历时3年零8个月，终于建成了1933平方米，即高33.17米、殿内灵塔高达11米的建国以来国家投资最多、规模最大的一座寺庙灵塔。1月15日，大师用了一整天的时

间,和另几位有威望的喇嘛一道,把前五世班禅的灵骨细心整理,然后分别请进5只特制的紫檀木大箱中,用名贵香料和藏红花镶在灵骨周围,又用黄色绸缎包好,分别镌刻上各位先师的坐像和名字。这一切做完后,已是1月16日凌晨了。

按照预定时间——1月17日下午2时,迎请灵骨入灵仪式按时进行。这时,如林的法号一齐吹响,无数香烟缭绕碧空,在众多僧众沉雷般的诵经声中,班禅大师领头,一队身穿袈裟、手拿几尺长特制高级藏香的队伍,引领着5只安放有前世班禅灵骨的檀木箱,从各位前世班禅原来居住的宫殿里出来,到扎什伦布寺各主要殿堂遍行一圈后,在鼓乐和祈祷声中,庄严地送往“札什南捷”。这时,人山人海发出阵阵啜泣、赞叹声。在震撼山谷的

法号声中,班禅大师把先师的灵骨请到灵塔二层的画廊里,然后向先师们献上金黄的哈达,再把灵骨箱一个个放进塔内。班禅大师的每一个动作都是那样认真虔诚,所以,灵骨安放仪式,整整进行了4个多小时。至此,他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一遍又一遍地祈祷先师们安息。当他想到上一世——九世班禅经历过的灾难时,不禁心中隐隐作痛。

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不睦,十三世达赖听信一些大臣的唆使,强令后藏的老百姓缴纳新旧税赋,数目之大,后藏百姓简直无法承担。为此,九世班禅反复提出宽容和减免,但西藏地方政府不但不允,反而威逼更甚。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九世班禅只好轻装潜逃,打算到北京的清王朝申诉求援。历尽艰险才到达青海,后来虽有清王朝的安抚

和帮助,九世班禅还是没被允许返藏。圆寂后,在青海省循化县,找到转世灵童即十世班禅。在国民党统治中国期间,他也未能回到扎什伦布。

迎送灵骨后,下一个庄严仪式,是“迎神安住”。这个仪式,在“札什南捷”二层回廊殿内举行。1月19日上午,高原上阳光高照,灵塔下方的灵台上,1000盏供灯光辉四射,芳香四溢的供果,在灯光下分外鲜美。几百名袈裟僧帽整洁的喇嘛,在专为班禅大师设置的宝座周围静候大师。这时,在法号和铃鼓齐鸣下,班禅大师整装入座,众喇嘛随之就位,和大师齐诵“安神经”,祝祷先灵静住。这个仪式,一直进行三天,大师参加了所有的佛事活动。中央有关各部门负责人、新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预定1月20



△三万余人夹道欢迎班禅大师到达日喀则



△班禅大师为群众布施圣水

日抵达日喀则。班禅大师在客人到达前几小时，便来到彭唐桥头等候。当天，大风卷着砂石，把汽车打得叮咚作响，工作人员劝大师先回去休息，客人到后再请他出迎，大师说：“我要支持胡锦涛。”直到下午5时，客人们才到达。班禅大师的行为，深深感动了胡锦涛和其它贵宾。

“开光”大典，是大师最后一个隆重的活动。“开光”的目的，是把10万神佛的智慧和功德集于一身，这次是汇于“札什东赞”之上，以便五世至九世班禅，供后人供奉敬仰。“开光”，是传统的佛规仪式，凡佛像佛塔建成，都要举行隆重的开光典礼。

1月22日，是大师亲自选定的开光大典的吉日。

22日上午11时，穿戴高级活佛盛装的班禅大师，在众高级僧侣的簇拥下，来到扎什伦布寺跳神大院。抬眼望去，只见数不清的经幡高高挂起，所有的门窗都上了崭新的“香布”，巨大的扎什伦布寺，沐浴在重大佛事活动的气氛中，十分庄严、肃静。

开光大典开始，班禅大师发表了洋洋数万言的讲话。他称颂历史

班禅大师的功德，特别强调他们爱祖国、爱民族的高贵品德。当讲到由于今天的活动，谁都会联想到文化大革命的恶果时，为了启发群众正确对待，他强调指出：文化革命不光给西藏人民造成了灾难，祖国56个民族，无一幸免地全都遭了殃；有的人把文化革命说成汉人消灭藏族文化，是十分错误的；有人因此煽动民族情绪，搞什么独立，那是别有用心，善良的人切切不可上当；今天的活动所以能成为现实，“札什南捷”所以能顺利建成，都说明党和政府知错就改，何况，文化大革命是“四人帮”罪恶的表演，决不能因此怀疑党和国家，更不能反对党、分裂祖国！今天的活动，是党和国家实实在在地关心藏族人民的利益，尊重宗教信仰……

班禅大师的讲话，受到全体到会者的欢迎和赞赏，启发了广大僧俗的爱国主义。

下午3时左右，开光大典进入高潮，班禅大师和贵宾们一道，来到“札什南捷”灵塔祀殿。大师高声诵吉祥经，然后解穗开门。这时，数万名僧俗人众欢呼四起，庆贺开光典礼圆满成功。大师稳步走进灵堂，一

个个点燃灵塔前的金佛灯，向先祖先师们分别献上吉祥的哈达，祈祷佛光永存，光照人间。至此，大师此行的重大任务圆满完成，才觉异常疲劳。

回到住地后，班禅大师的思路仍然在开光大典活动中来来去去，临入睡前，又考虑：客人尚在，明天应该开一个各方人士参加的座谈会，让大家亲切交谈。

第二天，班禅大师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在开光典礼大会上的讲话不完善，应该说到达赖喇嘛。他见工作人员有些不解，就解释说：我和达赖喇嘛都是宗喀巴的弟子，在那样庄严隆重的场合，我很想念我的教友达赖喇嘛！

了解班禅大师的人知道，他经常为历代达赖和班禅的友谊而自豪，也为某世达赖、班禅的不和而悲伤。宗喀巴祖只有两个大弟子，本是同根生，为什么不能友好相处，共存共荣？而今，十四世达赖喇嘛远在国外，并且与祖国越来越疏远，国家却一直真心欢迎他归来！在这样空前盛大隆重的场合，如果达赖喇嘛也在场，该是多么令人高兴啊！

班禅大师来到座谈会上，最辛苦的是他，他却向客人们一一问好，说他们辛苦了，受累了，招待不周之处，请客人们多原谅。客人们很受感动。大家请班禅大师讲话，他说：热爱祖国，是我们共同的义务；建设新西藏，是我们的努力目标；西藏，要防“左”，又要防右；西藏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只要珍惜中央的优惠政策，加强团结，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为了西藏美好的明天，中央真是尽心尽力，尽管经费很紧，对西藏总是有求必应，做不好西藏的工作，怎么说也对不起国家……

重任虽然圆满完成了，班禅大师仍然一刻也不消闲，他要做的事还有一大堆：接待记者们的采访，与宾客商谈工作，陪客人摄影留念，为经师嘉雅活佛祝寿，处理不幸发生

的两起车祸,把突然患病的老父亲送往拉萨抢救,为远道而来的客人送行,参预日喀则地区的发展规划,宴请和表彰优秀工作人员。一桩桩,一件件,他都要亲自处理和安排,特别是成千上万的信徒们还没回去,一定要求他摸顶祝福,他无法拒绝他们的盛情。在一次为成千上万的群众摸顶过程中,大师忽然感到后背一股寒气侵入肌骨,他让工作人员在背上安个热水袋,继续满足群众的愿望。当时,大师似乎有一种不祥之兆,前两天有时一阵阵心闷气喘,还隐隐作痛,但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一天,他的心情是喜悦的,他诙谐地对工作人员说:“我的一大心愿完成了;我已连任两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卸任后,我要安下心来,写写书。”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也出乎班禅大师自己的预料,他的生命已到了尽头,他才51岁呀!

1月27日中午,班禅大师正听取灵塔祀殿工程的总结汇报,忽听外面轰隆隆作响,大家往外一看,只见黄沙蔽日,石砂把玻璃窗敲打得乒乓作响,似乎房子也在摇晃起来。班禅大师惊讶地说:“我从来还没见过这么大的风!”

大风不停地刮着,大师预定的

活动继续进行。他在百忙中,曾答应为20余名有身份的人摸顶祝福,开会后,他按计划进行了。

1月27日晚上,是班禅大师预定的答谢宴会,对日喀则地区的领导,和开光大典的工作人员进行感谢。宴会按时进行。为了与大家共同庆祝开光大典的成功,当晚,在他的住地新宫院内,举办了大家同乐的篝火晚会,宾主都怀着愉快的心情出现在晚会上。有些藏族女干部,很大方地带头歌舞,把晚会引向高潮。班禅坐在扶手椅上,穿着高统皮靴的双脚,自然而然地按节拍在动,他多么想与大家同舞啊!他又多么羡慕人们的舞姿!当晚的同乐,直到22时才结束,大师愉快地告别客人朋友,回到新宫德虔格桑二楼他的住所,同秘书商量今后几天的日程,决定1月28日去日喀则军分区慰问解放军。他和解放军的感情一直很深。和平解放西藏谈判后,他首次回西藏,一路上多亏解放军周到的保护和服侍;多年来,始终是解放军保卫着他的安全。他考虑好如何慰问解放军的具体情节后,边翻阅报纸边听广播,直到深夜零时30分,才闭目就寝。这是此次西藏之行休息最早的一晚。

1989年1月28日凌晨,大师

突觉胸中阵阵作痛,惊醒后呼吸困难。医护人员立即检查。他们从心电图上发现,大师得的是急性下壁及广泛前壁心肌梗塞!工作人员立即请来随行医生和日喀则地区的医生,并急电拉萨和北京求援。当天,北京的专家直飞拉萨,又乘直升飞机急抵日喀则。但是,尽管专家和医护人员竭尽全力,大师还是于当天——28日20时10分圆寂!

不幸的消息立即传遍全国,又很快传到世界各地,国内外有关机关、团体和人士,无不为主师的突然离世而震惊和痛心,大师正是为国家民族多做贡献的英年,竟然去了!

不幸的消息带来多次隆重的追悼活动,人们用各种方式进行悼念,党和政府永远怀念热爱祖国的班禅大师,西藏人民更永不忘怀。

班禅大师圆寂的第三天,国务院决定为大师修建一座灵塔。

1990年7月,江泽民总书记视察西藏时说,国家决定为第十世班禅大师修建金灵塔和供奉祀殿,以纪念这位深受人民爱戴的爱国宗教领袖。1990年9月20日,扎什伦布寺为十世班禅大师灵塔祀殿举行了隆重的奠基典礼。

(责任编辑:仲文)

柳亚子以诗换酒

刘宏伟

抗日战争爆发后,柳亚子客居重庆。某日午后,柳亚子与好友散步路过“嘉陵酒家”,一时兴起,便入堂小酌,吟诗唱和,尽兴之极。不料时至黄昏起身离店时,这二人才发觉谁也未带钱。只好向店主汗颜相告:“我叫柳亚子,就住在前面不远,酒钱待回去取来

再补交。”店主闻之却喜出望外,很快拿出文房四宝,再三施礼道:“柳老先生光临小店,已使小店四壁生辉,哪里还敢讨酒钱?如不嫌弃,请先生留下墨宝作个纪念。”

柳亚子当即挥毫写就一首趣味盎然的《换酒诗》:

金谿换酒寻常事,

难得今宵酒如醇。

三十三年大除夕,

愿拼一醉在嘉陵。

店主将这首诗精心装裱后挂在店堂之中,遂引得各界人士为慕柳亚子之名、之诗,纷纷来嘉陵酒家品酒,一时成为当时重庆的一景。

郭沫若朝山

任斌武



1962年初秋，郭老一行来到舟山群岛。这便为我这个文学后辈创造了一个机遇，陪郭老畅游“海天佛国”普陀山。

郭老上岛最先接触的是部队官兵。见面握手，问候，极为热情，唯言语异常严谨而机械。部队首脑向他介绍岛上守备营长、战斗英雄张学安曾在解放战争中创造了只身打坦克的赫赫事迹。郭老听后，握住张学安的手，感慨了一句：“伟大呀，伟大！”来到连队，看到战斗在“云雾半年风半年”的困难条件下，靠南泥湾精神种出的大红薯，喂养的大肥猪，郭老同样是一声“伟大呵，伟大。”有时，因这一声“伟大”与实情实物相去甚远，不免引起大家直发笑。

那天，算是例外了，他来到正在开掘的坑道，目睹战士们的劳动情景，感触尤深，在一声“伟大”之后，破例赞了两句：“辛苦呵，辛苦！你们筑的是钢铁长城，也是和平的长城。”这评语使战士们高兴得将一双双沾满泥巴的手拍得好响。

几处部队住地看过，郭老好兴奋，好激动。客悦主安，陪同的几位部队头头脑脑也自然高兴。但是，不成想，第二天晚上，郭老说话了。他把陪同诸公请到他下榻的客房，作了一次老朋友式的谈心。郭老说：“我有幸接触了你们的部队，所见一切都好。我们的战士伟大而可爱。要说的话嘛，有一句：那许多类乎鸣笛挂旗，列队欢迎之举，我请求免了。不要只听说郭沫若是这个家那个

长，重要的我是个党内的同志，你们把我当作一位同志看就够了。”

这天郭老走在登“西天”的灰灰山道上，他一景一物地考证着吴承恩在他的《西游记》里，上百处描写过的普陀山富于神话色彩的奇异幻境。仰望宛若悬吊的“磐陀石”，他手指赫然刻于巨石之上的“通灵”二字，考证起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任江宁织造时，曾奉旨送经来普陀，目睹“磐陀石”所留下的奇异印象，与后来曹雪芹构思宏篇巨著《红楼梦》，开笔于神奇的顽石是怎样的一种联系。走进普济寺毗邻的小小文物馆，郭老便又不厌其烦地考证起康熙所留“海国月辉”手书，慈禧所赠《牡丹图》御画及王安石、康有为所题写的诗文，以致流连忘返。

郭老一路观赏考证和谈笑着。在拾阶而上的山路上，郭老累了，双手叉腰站立在一块雕着莲花图案的青石板上，笑问：这沿路铺设的莲花石雕板是何用途？回答是常识性的：供登山拜佛的善男信女一路叩头。郭老睿智地一笑，道：“还有一大用途哩，劳逸结合呵！”众人一阵笑声，一身疲惫顿觉消弭。

在“不肯去观音院”，看过颇有

名的紫竹林之后，郭老又停下来，向大家提了个极有趣的问题：这名为紫竹林的去处为何不见一株紫竹？人们嘟囔着，有说是早年让荷兰“长毛人”挖走了，有说是让“倭寇”掠去了，众说纷纭，郭老一直听大家争争嚷嚷把各自的见地表达完，他才开口：“看，不是在这里吗！”

郭老手上托着一块极普通的石头，人们围拢去细作观察，但见这石头断面上，居然清晰地显现着一株一株一蓬蓬褐红色的紫竹。枝繁叶茂，维妙维肖。奇了！人们就地信手寻找来几块类似的石头，竟然多半显现着这样历历如绘的紫竹。

郭老他把手上的石头托得高高的，用一个诗人的语言说：“植根于泥土中的东西，是谁也挖它不去、掠它不走的。不是有不肯去观音吗，这便是‘不肯去紫竹’了。”

人们不由抚掌称叹。

郭老来至太子塔下一所僻静的小庵。进门看见有供香客游人求签问卜的签筒置于案头。性情活跃的于立群即刻虔诚地跪下拜了几拜，随后按求签程序抽了一支。郭老看过，悠悠笑着凑过去：“我年纪大了，就不必跪了，菩萨是会谅解我的。”说着，也信手抽了一支，交于掌管签柜的老和尚。那和尚看过签号，面显难色，转身给他把“诗”调换了一张。这岂能瞒得过郭老，交睫间他早已明察了一切，他拿着这张尽说吉利话的“上上签”很是恭敬地向那和尚行过礼，说：“师父，谢谢你的美意

喽。这签号不对啊,你还是把那96签兑给我吧。”

老和尚无奈,两手战战兢兢打开签柜,把一张签号相符的“下下签”递于郭老。郭老提在手上掠了一眼,便忍俊不止哈哈大笑。边笑边嗟叹:“灵呵!普陀山的菩萨灵啊!”

于立群抢过去一瞧,竟也拍手打掌几乎笑岔了气儿,“啊呀,连菩萨也会造谣啊!”

大家看过“签诗”,通篇没一句好话。当头一句便是“夫妻反目”。经郭老的秘书和随行的公子作过诠释,大家才恍然明了:原来,恰在那一阵北京正盛传着郭老与于立群反目离异的谣谚。

走出小庵,郭老诙谐地浩叹一声:“原来菩萨们并不伟大啊!”

横亘于小岛北端的佛顶山,是普陀的摩天岭。山陡路险,攀登艰难。可郭老执意要上,于立群也在为他一登佛顶制造舆论,说郭老一向志在险远,尽吾志而无悔矣。

那时登佛顶,唯有一条陡峭的小径,郭老不肯让人搀扶,一路走走停停,在半山腰一个岔路口上歇下来,由此径直上去,便是“菩萨之顶”慧济寺;而往东拐去,便是常年有三名战士值勤的高山哨所。可那样一拐,路就绕远了。哪知郭老上山前已从地图上把这小小哨所搁在他的心上了。查证过方向,郭老拖着幽默的长声说:“我们是来看望战士的,不是来看望菩萨的。”说完,率先迈开劲健的步子,向战士的哨所急奔。

在高山哨所,郭老看了战士们住宿的小石屋哨位,其后,再绕道爬上山顶,时近中午,着实够累了。几天里一直笑声不辍的于立群,扑通坐在一块青石板上,叫苦不迭:“天哪!我可走不动了!”

“嘿!你不是有山必爬,有庙必进,尽吾志而无悔吗?哈哈……。”

郭老双手插在腰间,晃动着硕大的脑袋,同于立群开起玩笑。其

时,一碧如洗的天际,有群苍鹰正结队奋飞。郭老抬头紧紧盯住鹰群,像有重大发现似的由衷地感叹道:“惭愧呵,惭愧!我本以为只有大雁结队而飞,而苍鹰是不能够的。错了,原来它们也能够噢……”

归途中,郭老仿佛陷入深思。当晚,他高兴地向随行的诸公宣告,他将把这苍鹰结队凌空翱翔的发现与感受,融入他的创作构思,联系着郑成功首次出征的心境与背景,改写成电影的一组镜头。

相处几日,我等几个文学徒儿,很想钻点时间的空子,请郭老签名题字,求教请益。

一天,刚用过早餐,郭老在招待所楼面上散步,我同江深、杨玉华等小辈上前与他搭话。小江把他早准备好的一本郭老刚出版的《百花齐放》诗集,递上去请郭老签名。郭老接过去迟疑片刻,才从胸前的口袋里摘下钢笔,在扉页上工工整整写下“郭沫若”三个字。同时歉然笑道:“该给你用毛笔写才是,钢笔字保存不久的。抱歉,抱歉。”我忙把学习创作中所碰到的问题,逐次提出向郭老请教。我晓得,我提的那些问题十分幼稚,可郭老却不厌其烦,以至谈得连上午安排好的活动都忘了。

就在那天,我陪郭老来到著名的“洛阳营”和“人民英雄连”。他在那里尤其对陈毅司令员曾为之题写过“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英雄,实际战争的指导者”两句嘉许之词的第一个舍身炸敌堡的战斗英雄陈金合,不胜感佩之至。大家请他题词。

他提笔在手,稍事思索,便笔走雷霆写下这样的诗句:

洛阳营人民英雄连,

人人都学陈金合人人都做保安,①

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者,

实际战争的指导员。

“员”字一落纸,于立群一头笑着,毫无顾忌地指责道:“这像什么话?人家陈毅同志说的是‘实际战争

的指导者’,不是指导员!”

郭老也嘻嘻地笑了,不无自责地对那部队的官兵说:“见笑,见笑。无非是为了押韵嘛,大家会谅解我的。抱歉啦!”

这一来,郭老可就应接不暇了。一张张求字者的纸条,在案头积成老厚的一迭。

在普陀山最后一日的午后,原安排好下午三点再陪郭老看几个新的去处的。可这天,等到四点也没见他出门。俟四点半已过,秘书站在门外听听,里面仍无动静,就不得不敲门了。

门开了。映入眼帘的一幅情景是:郭老正腕底生风地书写着,背后的地上、床上、沙发上,全摆满散发着墨香的题词。所题全是毛泽东的诗词:《沁园春·雪》、《卜算子·咏梅》、《满江红·和郭沫若》……

郭老握笔在手,朝大家歉然微笑着:“对不起,哪里也不能去喽,大家交给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噢!”

在岛山的最后时刻,他提出要到烈士陵园去看看。

那时,岛上只在定海城北表山之麓开辟了一块墓地,散乱地堆起几十座坟墓。郭老步入墓园,庄重地移着步子,把每座坟茔前的墓碑一一看过。随后,趋步至泛开的山花丛中,亲手采摘下大把散发着芬芳气息的野花,像给孩子们分发节日礼物那样,分作一束束,献给每座坟前。献过最后一束,便又肃立于墓园正中,深深躬下身去,向烈士的墓群行了个九十度的大礼。

是夜,郭老在下榻处又秉灯命笔,为行将破土修建的烈士陵园,书写了“海山增辉”四个笔酣墨饱的苍劲大字。如今郭老留下的四字墨宝,仍高悬于舟山烈士陵园的牌坊之楣,果然使普陀海山更为增辉。

(责任编辑:仲文)

① 安安全也是该部一战斗英雄。

一位历史学家，写了一部历史剧，却为自己及全家以至成千上万人造成了人间悲剧，更为后世留下了一部不堪回首的历史活剧。尽管“导演”这部悲剧的人大都入土了，但是染手此事及热衷此道者都已绝迹和不会再生了吗？这位史学家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人们，再看看这面“镜子”吧！

史学文才两绝畸，
十年京北擅风流。
无端试笔清官戏，
纱帽一丢成秃头。

这是历史和考古学家夏鼐先生为其同窗好友知交吴晗写的一首绝句，只是其最末一句似可改为“丢了纱帽复丢头”，甚至是“丢了一家三颗头”。为了一部清官戏，吴晗一家三个人死于非命。这是“史无前例”期间史有前例的历史悲剧！

11月11日的网雷

1965年11月11日，北京城和往日没什么异样，可是这一天对吴晗和他周围的人却是一声沉重的闷雷。

这一天吴晗带着工作后的兴奋，回到他位于紫禁城西侧北长街的寓所。这是一处四合院，书房设在西厢房。庭院中砖铺的十字甬路，两侧各植一株海棠。幽静古朴，甚合主人的性格和情趣。

吴晗每天回家总是先进书房，放下公文包，脱掉外衣，翻检一遍堆在书桌上的报纸杂志和信函文件之后，到北屋和夫人儿女说笑一番等待吃饭。今天也不例外，只是刚把手伸向书桌，夫人袁震就出现在门口。吴晗侧脸扫了她一眼，只觉神色有异，抬头问道：“怎么？身体不舒服？”他的目光从眼镜片后面担心地投向袁震。

袁震的嘴唇微微颤动着想说什么却似无从说起，指指桌上的《文汇报》就走了出去。

史学家吴晗的历史悲剧

宋严



吴晗遗像

吴晗急忙拿起报纸，这是昨天11月11日上海出版的《文汇报》。一条通栏标题《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冲进眼帘，直穿眼底，震撼吴晗：

“唔？果然……”他急忙逐行逐段地看起来。为什么吴晗对此文如此敏感？又为什么首先想到“果然”一词？且从去年即1964年冬天说起。

这天，吴晗在人民大会堂开完会，周恩来总理叫住他，让他上了自己的车，轻声说：“吴晗同志！有人说你写《海瑞罢官》有影射？”

吴晗愣住了：“没有哇！没有没有……”说了一串“没有”又郑重补充一句：“绝对没有！”

“嗯！”周恩来轻轻答应一声。

“我为什么写《海瑞罢官》和怎样写的，大家都很清楚，市委的同志也都了解……”吴晗极想把事说清，只是实在太突然，一下子无法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

周恩来已轻轻“嗯！”了一声，沉吟了一阵：“你写个报告把情况讲一讲好了！”

吴晗编剧的《海瑞罢官》上演于1961年冬，为什么事隔三年，国务院总理关心起此事来呢？原来，《海瑞罢官》上演不久，1962年江青就找到中宣部和文化部的正副部长，提出要批判此戏，并称：“舞台上、银幕上……大量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当时四位正副部长并没把此事看成某种信号而搁置一边。1964年，江青又直接在北京找人写

批判文章，颇有锣鼓日紧之势，尽管这次又无人肯写，却传入周恩来耳中，才向吴晗了解此事。吴晗遵嘱把写作《海瑞罢官》的始末原由写成报告呈交以后，认为此事也就了结。不料到了1965年春，又耳闻上海有人正在撰写批判文章。这使吴晗心情沉重起来。一天，他敲响北京市市长彭真办公室的门。

“请进！”彭真正埋头于一大摞待批的文件、报告之中，抬头望了一下进来的吴晗：“请坐，教授！”目光仍在面前的公文上。

“教授”是彭真平时对吴晗的亲切称呼，只有在严肃郑重的场合才称他“吴副市长”或“吴晗同志”。

吴晗见彭真忙到这般程度，站在门边迟疑了。

“你坐呀！”彭真没注意吴晗的神情，眼睛盯着公文，随后拿起香烟盒举在半空：“抽烟”。多年共事互相已不讲客套。

吴晗接烟点上，默默地坐下。

彭真把处理完的一份报告放到已办的一摞上，从未办的一摞又取下一份。借此空档向吴晗笑了笑：“没办法，都要在上午处理完。”语气之中稍稍带点对吴的歉意。

吴晗会意地点点头，站立起来：“你忙吧！”

“有事？教授！”这次彭真看出吴晗有话要说，他知道吴晗不是有闲暇“串门儿”的人。

“你太忙，不打扰你了！”

“来来！有事谈了再走。”他发现吴晗从来没有这么低沉过，索性放下手中的红蓝铅笔，走出办公桌，示意吴晗回来坐下。

吴晗不再迟疑了：“好！我长短说，听说有人要批判我。”

“批判你什么呀？我怎么不知道，不会吧！”

吴晗把去年周总理如何过问此事，如何写了报告，今年又如何听说上海有人正在撰写文章等等，扼要讲了一遍。彭真听后反而笑了起来。

在他看来只是一出戏的事情，又经总理作了了结，时过半载，不会再生枝节。再说，《海瑞罢官》演出以后，许多人赞扬，虽然也引出一些有关历史剧的探讨与争论，都属于学术讨论，“批判”二字从何谈起呢！更重要的是，批判一位副市长，自己作为市长、中央政治局委员怎能一无所闻？这种事是要经过政治局讨论研究的，怎么会谁想批就批呢！所以他笑了：

“别听有些人瞎传，批判你，我能不知道？”

吴晗的心理负担减轻了许多，他完全信赖面前这位领导，反而觉得自己未免有点幼稚，解嘲地笑了笑：“这几天搞得思想包袱很大！”

“把心放在肚子里，教授，专心搞你那些学术大作吧！”

吴晗在文教副市长任内工作之外，又主持了几项重要的学术活动。例如：出版《国榷》、标点《资治通鉴》、主编周总理决定出版的《历史小丛书》等等。

吴晗起身告辞，临出门又被彭真叫住：“回家不要对袁震讲这些事。”

吴晗感谢地点点头，轻轻闭上门，脚步轻快了许多。

彭真的思绪却并未终止，多年的斗争经验告诉他，事情不一定像自己说的那么简单。拨通邓拓的电话：“邓拓同志吗？今晚我到你家去如何？”他想听听这位更熟悉文化界的市委书记有何看法或消息。

事情不仅证实了，而且从邓拓处得知，此事一直由江青在操持。

“又是她！”彭真流露出厌恶的神情。

这几年彭真被江青缠得的确够呛！特别是她搞的那个为展示戏曲改革“成果”的“京剧现代戏会演”以来，经常纠缠着彭真不得不把北京市许多重要事情放下，为她的会演服务。江青的骄横跋扈，虚伪乖张，早已引起人们的反感和厌恶。

现在批判文章终于发表了，所以吴晗首先想到“果然”这个词。

他把《文汇报》重重的拍在桌上，双手有些颤抖：“岂有此理！”

“这个姚文元是什么人？”不知何时，袁震又回到书房，站在吴晗身后。

“不知道！大概是上海的。”吴晗说着就提笔展纸。

“写什么？”

“两千字就把他驳得体无完肤。”

“你这脾气什么时候能改改！”袁震把吴晗的笔轻轻抽了出来。

“简直是血口喷人嘛？”他无法平静。

当然，此时的吴晗万万想不到，1965年11月11日这一声闷雷，就是他人生悲剧的开场锣！

《海瑞罢官》始末

许多人曾经不解，吴晗是位史学家，建国后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对戏剧是位外行，为什么突然写起戏来呢？

此事似有很大的偶然性。1959年4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看了湘剧《生死牌》之后（剧中有海瑞出场），针对1958年前后，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不敢讲真话，报喜不报忧的状况，提倡学习海瑞的敢于直言，并讲述了一段海瑞骂皇帝的故事，提议找几位历史学家研究一下，宣传海瑞刚直不阿的精神。会后胡乔木同志根据这一指示，通过钱俊瑞鼓励明史专家吴晗撰写海瑞文章。吴晗深深理解这一指示的重要意义，不久就在1959年6月1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海瑞与皇帝》，随后又陆续发表《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和《论海瑞》等文。由于吴晗文笔生动，这些文章引起京剧艺术家马连良的注意。马连

良晓得了毛泽东主席号召发扬海瑞精神之后,极想把海瑞编成戏演。于是在1959年9月登门求吴晗写戏。

“不行不行,我都没看过几出戏,怎么能写戏呢!”的确,吴晗一直难得看上一次戏。所以,不要说写戏,看戏时也属外行观众。但是居然有人登门约他写戏。他终于在马连良的盛情相邀下,答应试一试。这一试,就使他欲罢而不能了。想打退堂鼓又不好意思,硬着头皮写出个草稿,自己看着都不是个戏!推翻重写,写到第四稿还是有史无戏,演员们说:“您这剧本能唱,不能演!”最后还是戏剧家们建议单写海瑞除霸安民一段。直到1960年秋天才七易其稿定下来。定稿的剧本写徐阶之子徐瑛,依仗权势霸田占女无恶不作,知县庇护徐家,制造冤狱,海瑞微服上任,了解冤情,斩徐瑛、平冤狱、退民田,却因除霸而罢官。

当时吴晗兼职颇多,时间极少,写戏只能“见缝插针”。汽车上、床头旁,想起几句写几句;赶上参加大会,就像中学生上课偷看小说那样写起来。开始剧名为《海瑞》,后来才改叫《海瑞罢官》。此间另有一段原由。

吴晗的老友蔡希陶,是位很有文才的植物学家。一次,出国考察途经北京,吴晗请他吃饭,闲谈中问及吴晗有何新作。吴晗不无自嘲地告诉蔡:“我居然写了一出京戏!”引起老友极大兴趣,一定要看看历史学家写的戏是什么样。因为蔡希陶第二天就要登机出国,就把剧本带回下榻处连夜看完,读后认为此剧并非写海瑞的一生,只是写其除霸罢官一段;提笔在“海瑞”后面加上了“罢官”二字。第二天清晨起身前,急忙让秘书到邮局寄还吴晗,还在信封里装进补偿那一餐的半斤粮票。《海瑞罢官》剧名就是如此而来,这是1960年底,戏已经在彩排了。

事情本来就是这么简单,这么偶然。不料5年之后竟变得那么复

杂,那么“别有用心”,那么“反动透顶”呢!蔡希陶如果知道他加的“罢官”二字,后来竟置自己老友于死地,成为该剧罪状的“要害”,是绝不会“多此一举”的。

“奇文”出笼前后

江青在北京两次找人写批判文章都没达到目的,还是老谋深算的康生指点迷津:“张春桥不是在上海嘛!”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使江青顿开茅塞,立刻秘密乘专机赴沪。

一辆黑色轿车旋风般开到舷梯跟前,车里钻出一人,黑影里只看到两团反射着光点的镜片。“眼镜片”把匆匆走下舷梯的江青让进轿车,又旋风般地向上海京剧院,名义上是首长来看看,实际是物色批判吴晗的人选。张春桥推荐姚文元执笔。从此姚文元执笔,张春桥修改,江青审查,“三点一线”,上海——北京,北京——上海,频繁往来,十易其稿。从起草到发表严格保密了七、八个月,每次都是张春桥带着稿子,以请首长审听《智取威虎山》的音乐为名,审完就走,从不在京久留。江青也一再叮嘱:“不要给周恩来看。”

一声闷雷不仅打蒙了吴晗,震动了北京市委,全国的知识界也“开了锅”。上到白发苍苍的专家学者,下到风华正茂的学子、职工和中学生,纷纷写信写信质问《文汇报》,指责姚文元,人们谴责此文已“超出学术范围”;是“故意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扯在一起,企图用政治帽子压服对方”;是“全盘否定中国的历史”;如此“断章取义的分析作品,其卑鄙程度是令人诧异的。”历史学家翦伯赞则公开申明:“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在不长的时间里,《文汇报》就收到这类来稿来信3千多件,足见此文民愤之大。当然,这些呼声在张、姚把持下难以和读者见面,可是江青却

向毛泽东主席报告说:“他们(指北京市委)封锁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并一口咬定“这是有组织、有步骤的阴谋。”结果激怒了毛泽东,让上海把这篇“奇文”印成单行本在全国发行。

其实,千百万张《文汇报》已飞进北京千家万户,谁也没封锁它,只是谁也没有转载它,难道这就是“封锁”吗?

11月11日这天,彭真仍和往常一样,按时到北京市政府上班,到办公室后才听说这篇“奇文”。急忙找来报纸,看后非常气愤:如果说这是一篇学术讨论,全篇却是一副军阀、恶棍的嘴脸,毫无半点学术气味;如果说这是一篇政治批判文章,又满是毫无根据的扣帽子。更使彭真气愤的是在历次政治局会议上从没提到过批判吴晗,今天发表此文对北京市委连个招呼也不打,纯粹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他知道这是江青搞的。

“叮铃……”《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来电话请示应如何对待此文。

“这样的文章我们不登,我们听政治局的,不是看哪个人的脸色行事!”

按照常规,转载这样一篇不伦不类的文章,那才叫更不伦不类呢!

10天后,上海新华书店向北京发出征订通知。

彭真仍然是那句话:“我们听中央的,不跟着哪个地方跑。”一本也没订。

11月28日,也就是“奇文”发表后的18天,周恩来总理来电话了,要北京市研究转载此文。彭真请示总理本人有何看法。周恩来总理明确回答:“现在不是听我的,而是如何落实毛主席这个决定。”

既然是决定还有什么好说的。11月29日和30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奉命分别转载了此文。《人民日报》转载在《学术研究》版。两报都在文前加了编者按,都强调

了“百家争鸣”、“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两个按语分别由彭真和周恩来亲自定稿。

但是，与文化和学术界不太相关的《解放军报》在转载此文时，却在按语中独此一家和极其武断地说：“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这“一锤定音”定得不同凡响和大有来头。

事情出人意料，“好戏”刚刚开始，那些为吴晗遭此诬陷而抱不平的人，开始被江青以“争鸣”为幌子“引上地面”、“围而不歼”。后来成千上万因《海瑞罢官》受到了残酷迫害。

1965年12月，北京和各地报纸陆续发表一些文章。这些善良的作者都是围绕学术进行讨论。吴晗认为党和人民还是相信自己的，于是在12月27日写出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首先表示对学术讨论和批评的欢迎，表示“通过这次的批评、讨论……取得一致意见，提高学术水平，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情”。文中还列了个时间表，说明研究海瑞、写海瑞是1959年和1960年，而“单干风”、“翻案风”则是1961年的事，意思是研究海瑞，写海瑞并无影射之意，作者不可能去影射尚未发生的事情。又说明《海瑞罢官》的剧作是由写海瑞文章引起的，虽然演出于庐山会议之后，而开始写作却在会议之前。这种时序上的排列对历史学家是至关重要的，而对于野心家们不仅没有丝毫“价值”，反而是攻击的缺口。因为他们的目的不是弄清是非而在于打倒某些人。果然，一篇“自我批评”引来了规模更大、调门儿更高的轰击，吴晗的“罪状”也从为“单干风”、“翻案风”摇旗呐喊，为彭德怀鸣冤叫屈，上升成了“骂皇帝”。攻击的目标也扩大到了“三家村”，把与吴晗一起合写过杂文的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统战部长廖沫沙放进一口“锅”里

“煮”了起来。在此期间，那些以革命面貌出现的“风向专家”们，在江青的指挥下一窝蜂似的一个比一个嗓门儿大，一个比一个调门儿高，大有比赛争夺“极左”冠军，不“左”到极端誓不罢休之势，直到“五·一六”通知把吴晗正式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为什么揪住 《海瑞罢官》不放？

《海瑞罢官》不过是一出京剧，不过是写海瑞铲除恶霸、平反冤案、将被霸占的田地归还农民的故事。在京剧舞台上这种除暴安良的戏不止一出，历代为民请命的清官也不止一个，为什么单单《海瑞罢官》如此十恶不赦？事情要从农业合作化说起。

1956、1957年成立了高级社以后，农业就存在一个如何发展、如何管理的问题。具体的说是“一大二公”还是“包产到户”的矛盾。有的农村自发搞起了“包产到户”。但是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中，强行成立人民公社，实行大跃进，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和农业生产规律。加之农村官僚主义和瞎指挥较严重，给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损失。面对失误，又主观认定“一大二公”是社会主义的，“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的，二者是不可调和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导致了1959年的“反右倾”。不料1959年开始出现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度荒成了首要问题，一度被否定了的“包产到户”，又在一些地方悄然兴起。这种符合实际情况的管理形式，使农民积极性得到发挥。这些地方粮食收成较好，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对此也采取支持态度，此即所谓1961年刮起的“单干风”。到了1962年经济困难初步克服，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又提到了日程上来。“单干风”被认定是关系到所有

制的大是大非问题。“翻案风”则被认为是阶级敌人向党反攻倒算，中央领导人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这些“左”的做法，为一些野心家阴谋家提供了可乘之机。“阶级斗争”被人为地引伸到各个领域。此时正值《海瑞罢官》上演，江青就把此剧与“单干风”、“翻案风”硬扯到一起要进行批判。不过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批判“海”剧的意思。此剧上演后不久，毛泽东曾把马连良请到中南海家中便饭，并请他唱了剧中的唱段，边听边称赞：“海瑞好”，“《海瑞罢官》也好”。所以这时江青想批却没能批成。到了1964年，“阶级斗争”不断延伸，“左”的思潮也日益泛滥，情况就变化了。

1964年农村普遍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并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发起“革命”。这又成了野心家、阴谋家们的大好时机。

康生先在文化、知识界兴风作浪，策动了关于对李秀成的评价、合二而一论、时代精神汇合论、有鬼无害论、道德继承论……等等批判，把学术问题都作为严重的政治问题来围攻。

“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的江青当然不甘落后。60年代初突然跑出来搞京剧改革，意欲借京剧舞台跳向政治舞台，并把批判《海瑞罢官》作为她的“试跳”。

当时京剧改革中有两种意见，一是以田汉为主的“新编历史剧”的改革方法。江青则认为只有“现代戏”才是京剧改革。这本来也只是写什么题材、演什么剧目更便于和利于改革京剧的方法问题，两种见解本可以讨论和并存。但“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江青，却把“新编历史剧”视为她的障碍，在戏改中开展什么“两条道路斗争”，作为她通向政治舞台的捷径，咬牙切齿地把阶级斗争延伸到戏剧舞台上。一方面组织“京剧



▲在昆明的民主运动中,吴晗在西南联大的一次青年集会上讲演(1945年)

现代戏会演”来展示现代戏的“丰功伟绩”,一方面就是要把“新编历史剧”掀出来示众,请看那篇“奇文”之所以标题名曰《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而不叫“评《海瑞罢官》”其意就在于此。另出一出新编历史剧《谢瑶环》也被打翻在地。这次江青不仅亲自出马,而且是一副要拼个“你死我活”的架势。1962年要批的只是单干、翻案和清官,而这次把1961年国际上的“反华大合唱”、“蒋介石反攻大陆”都扯在了一起。《海瑞罢官》不止是“内容反动”的“毒草”,而是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行动了,吴晗也就不仅是“毒草的炮制者”而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吴晗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在“文革”初期的各种文章、标语、大字报中,吴晗是一副“狰狞可怖”的面孔。其实,他是个对党极其忠诚的共产党员,爱憎分明、坦荡无畏的民主斗士,工作勤奋、很有建树的副市长,严谨治学、一丝不苟的历史学家,出语生动、文采飞扬的多产作家,立论准确、讲解精到的教授,性格爽朗、平易近人的社会活动家,



▲在清华大学举行闻一多死难周年纪念会后,部分与会教授在会场门前合影。左起:张奚若、吴晗、朱自清、潘光旦、李广田

在家里还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他也说过违心的话,作过一些违心的事,不过在风云变幻的日子里又有几个人没说过违心话、作过违心事呢!

吴晗,原名吴春晗,字辰伯,1909年出生,浙江义乌县吴店苦竹塘人。家庭是个日渐衰落的中小地主(在苦竹塘则算富户),父亲是个读书人。他6岁入小学,12岁入中学,25岁(1934)毕业于清华大学史学系,先留校任教,28岁任昆明云

南大学文史教授,后任西南联大教授。34岁(1943)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翌年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八·一五”后复员回北平清华大学讲授《中国通史》,39岁(1948)到解放区,40岁以解放军北平军管会副主任身份,接管清华大学并被任命为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同年被选为北京市副市长主管文教工作,48岁(1957)加入中国共产党,60岁(1969)被迫害致死。一生著书和文集20余部,另有论文、杂文110多篇。人们称他为“不知疲倦的人”。这就是吴晗一生的梗概。现在再撷取他生平若干片段以表其人。

“蛀书虫”和“太史公”

他从小爱读书,尤爱读历史小说,家里的书看完了就去借,有时跑几里、十几里去借书。借不走的就坐在人家门口看,有时十几里路借回一本书,沿途边走边看,到家了,书也看完了,转身再往回送。小小年纪就成了苦竹塘内外闻名的“蛀书虫”。

一条小竹扁担,挑着书籍和行

李,活像随公子进京赶考的书童,只不过挑担子的不是书童是吴晗。足蹬家做布鞋,上穿对襟小褂,长衫搭在担上,颤悠悠走进清华园,这与以“洋”、“贵”为特点的清华大学,显得不大协调。吴晗从苦竹塘带出来的这条小扁担,一直保存在身边,直到“文革”抄家才不知去向。

吴晗最初进的不是清华。当时北平三所一流大学——清华、燕京和北大,有个同样的规定:凡考生有一门为零即不录取。而吴晗先考北大,数学为零,落榜;又考燕京,数学仍为零,再考清华,数学还是零。但清华主考者慧眼识才,鉴于他文史成绩格外优秀,就打破成规,破格录取了他,并且插班进了二年级。清华此举震动了燕京、北大。北大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深感原规定不妥拟议修改,而燕京的文科教授洪煨莲、顾颉刚则找到吴晗,希望他回燕京就读。破格录取一个土学生怎么会引起如此震动呢?其中事出有因。

吴晗读中学时因家道中衰,16岁就在村里当小学教员自立并养家,但求学之心仍很强烈。想投考不交学费的黄埔军校,卧病的父亲不同意;想考普通学校,家里又没钱。后来母亲变卖了仅有的陪嫁首饰,使他考入杭州之江大学,又去了上海中国公学。除偶尔得到朋友接济,全靠写稿挣钱上学。在中国公学一篇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很受胡适赏识,得稿费80元,就以此为盘缠来北平考北大,没考上。胡适拜托顾颉刚为他在燕京图书馆暂谋一工作。在燕京图书馆时,吴晗不失时机地完成了一份《胡应麟年谱》,其中纠正了顾颉刚的某项考证错误,也证实了胡适对此的假定。此文一出颇受学者们重视,这才使清华于次年破格录取了他。

然而吴晗虽被录取却不敢入学,他的经济力量无法支撑他走进这座学府。胡适又托清华校长翁文

灏、教务长张子高为吴晗在清华谋一工读生的位子,并把《胡应麟年谱》送来证明其才华,这样吴晗在清华图书馆每天两小时整理清室大内档案,月薪25元。当时的生活水平是一人一个月有四、五元钱就能保持中等平民生活。这一来在校的学、杂、膳费一应解决。吴晗与胡适的关系也就是由此而来。

吴晗当年每天除去二小时工作之外,全部生活只有一个“学”字,三年里不知娱乐为何物,笔记、杂记、卡片箱……须臾不离身。学有心得就撰稿成文,入学一年就在《清华学报》、《清华周刊》、《燕京学报》发表文章近20篇。第二年就被聘为《清华周报》文史部主任。写出了一批有史有据有创见的重要文章。第三年又受请于郑振铎,与巴金、冰心、朱自清等名流作家在《文学季刊》共事,又写出了纠正某些错误记载的学术论文。

这个没毕业就已小有名气的大学生,当时就被人们称为“太史公”。可是也有人叫他为“腐儒”,因为他穿得土里土气,终日神情专注,一副近视眼镜不时滑到鼻尖上,很像乡下土学究。

“难为斗米折腰”

抗日战争时吴晗在昆明任教。由于物价飞涨,入不敷出,由开始时租住的小楼,搬到一座破木楼中。这座新居从瓦缝间望得见天空,楼上的灰尘能掉进楼下的饭碗里。全家已不知肉味,只能在星期天买点牛骨头回来炖汤“享受”一番。母亲为了不挤在一起挨饿,已带女儿返回老家。夫人袁震长年有病,又患了子宫出血,吴晗把自己的血输给她。没有医药费,学生们要为他发起募捐,吴晗谢绝,卖掉了一批珍藏的书。为此,蔡希陶(就是在“海瑞”后面加上“罢官”二字的植物学家)书赠吴晗对联一幅:“书归天禄阁,人在首阳山”,辛酸,谐谑,愤怒不平,尽在其

中!吴晗只能以写稿弥补日用。但是卖稿也不那么容易。

中央编译馆的编辑,挟着吴晗写的《明史》稿走进吴家。

“吴先生,您的《明史》考据精到,独有创见,主编决定出版。只是有一个字请吴先生斟酌一下。”编辑笑容可掬地接着说道,“书中元顺帝至正十一年一段,有‘红军之起’一句,是否可把‘红’字改为‘民’字,以下照改。”

一向虚心的吴晗愕然了:“这是不是说把‘红军’一律改为‘民军’?”

“一字之差,一字之差。”编辑迂回地肯定着。

“这可不是一字之差,原因有二:当时农民起义以红巾裹头,红旗为号,故名红军,并非指今日共产党的红军;二、当时也确有‘民军’一词,但那是专门镇压起义农民的地主武装,二者不能混淆。这是历史,并非我吴晗杜撰,也不是谁可以随意改变的。”

编辑还想劝说,吴晗却说:“这样吧!请贵主编去和朱元璋商量,他同意,我照改不误。”

话已至此,编辑只好掏出支票放在桌上,说明只要改了个字,稿费从优,说着把支票推向吴晗。

吴晗不等对方说完即把支票推回:“我也只好请贵馆原谅,吴某难为斗米折腰,歪曲事实,篡改历史的稿费鄙人不敢领受。”

书稿留下来,支票带走了。吴晗呢?只好再翻箱倒柜寻找可以典当换钱的东西。

他愤怒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陷落,许多专家学者、社会名流被困急待搬往大后方,行政院长孔祥熙却强占飞机抢运家私和洋狗。

吴晗在课堂上愤然谴责:“昔日南宋亡国之前有个蟋蟀宰相,今日抗战之中又出了个飞狗院长。”

抗日战争开始以来,吴晗目睹了种种黑暗景象。“家事国事天下

事”，事事让他困惑，让他愤怒，他开始抨击现实了：“这叫什么抗战？官僚中饱私囊，奸商囤积居奇，而老百姓在饥饿线上挣扎，为保卫国土失去双腿的士兵竟落得沿街乞讨，那么他撤下的妻儿老小又将是怎样的命运呢！”吴晗愤怒地在课堂上引晚唐诗人杜牧的名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痛斥偏安一隅，卖官鬻爵，横征暴敛，让大片国土沦入敌手，让百姓辗转反侧于刀枪之下的反动统治者，他说：“想想三百年前的弘光小朝廷，一千年前晚唐的腐朽衰败和一千三百年前陈后主的亡国，再看看今天的抗战大后方有什么两样？历史是一面镜子，今古对照何其相似。”

吴晗那句名言“历史是一面镜子”就是那时产生的。

有学生问：难道历史的教训总要如此周而复始的重演下去吗？吴晗沉默后沉痛地答道：

“问的好！同学们，我不懂政治，只是稍通历史，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有史以来直到今天的中华民国，不仅是一次次重复着民族的悲剧，而在近百年来又一次次蒙受着民族的耻辱。几千年来民众只有一个愿望，安居乐业，国泰民安，为什么这个起码的愿望就不能实现呢？几千年没能实现的愿望，又为什么直到号称‘民国’的今天，仍是如此渺茫呢？我只能惭愧的告诉大家，我也没有弄明白。”

吴晗的历史研究也就从这时起与现实结合起来。

昆明的“吴晗诺夫”

1943年国民党声称“准备实行宪政”，各地民主人士召开了一系列的宪政促进会。张奚若等教授也在昆明发动了一个宪政促进运动。但由于缺乏组织，活动处于分散状态，周恩来、董必武及时派华岗、周新民、李文宜到昆明帮助民盟建立组织，开展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李文

宜是袁震堂姐袁溥之的同学。当吴晗从李文宜处了解民盟是爱国民主党派，反蒋抗日，成员中又有许多名教授，便欣然参加，并被选为民盟昆明支部青年部长。

吴晗本身是名教授，在知识分子中有信誉，在青年学生中有威望，在中共与昆明民主运动的联系中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他本人由于有了党的指导认识逐步提高。特别是他和袁震到重庆拜访了董必武以后，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对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有了进一步了解，认识上产生飞跃：只有彻底改变社会制度，实行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使他充满力量，开始向旧制度投枪了。后来1959年，他把从1943年到1948年写的几十篇杂文汇编成集，取名就叫《投枪集》，前言中说自己“只有一枝笔，真刀真枪比不上，比他一杆木头枪吧！木头枪伤不了人，不能说放……投它一下如何，管他三七二十一，要是投中了，也会有点痛的……”

这一时期的吴晗，一是撰文著书和演说，以古讽今，旁敲侧击地把矛头直指反动当局；二是积极协助党在昆明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筹建地下印刷厂，创办《时代评论》等等，他已成为人民敬仰，敌人痛恨的民主斗士。

每有集会，他都激昂慷慨大声疾呼：“……八年来内部腐烂的结果，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空前的危机，保证抗战胜利唯一的方法还是民主政治。”揭露黑暗，谴责独裁，召唤民主，呼号救国是他这一时期一切言论的中心。“八·一五”胜利后则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直到1945年震惊世界的“一二·一”惨案，他一直和闻一多、李公朴并肩走在前列，特务机关则把他们诬蔑为“领取了卢布的吴晗诺夫、闻一多夫”。黑名单上有了他的名字，如果不是因为正巧送袁震赴上海治病，继李、闻被刺

之后，第三个就将是——“吴晗诺夫”。谁知他从敌人枪下逃生了，最后却死在……

最后的路程

1966年5月16日至1969年10月10日，是吴晗最后的一段人生历程。这三年四个月零四天，吴晗是在无休止的挂牌子、“喷气式”、谩骂污辱、拳打脚踢的批斗中捱过的，是在“审讯逼供”和“交代认罪”的车轮战中结束的。

他的夫人袁震比他提前半年从苦难中超脱，可是他的女儿吴小彦一直熬到距离粉碎“四人帮”还只剩13天时，再也熬不过去而含冤死去！

1976年10月，是人们永不会忘的月份。就在全中国人民举杯砸蟹，普天同庆的时候，一个19岁的青年，把载有粉碎“四人帮”消息的报纸焚化成灰，放进酒杯点燃，告慰三位亲人的在天之灵。这个青年就是吴晗的小儿子，吴家唯一的幸存者吴彰。此时吴晗离世已近六年。

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尚未公布时，吴晗在周恩来授意北京市委，由副市长万里具体安排下，去北京昌平县参加“四清”。他化名李明光，由吴的秘书郭星华陪同，来到大东流村。这时高音喇叭里终日响着“邓拓吴晗廖沫沙，一棵藤上仨毒瓜”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的喊声。村里只知吴晗是市里来参加“四清”的干部老李，每逢开大批判会，总把吴晗请到主席台上一同喊“打倒吴晗”。这段时间对吴晗来讲，仍不失为“市”外桃园”。可惜好景不长，《“五·一六”通知》一下，郭星华突然找不见吴晗了，打电话向市政府询问，市府业已成了大字报的海洋，连彭真也在批斗会上低头弯腰呢，还有谁管这些事！

吴晗被一辆吉普车拉走，揪到

北京师范大学去挨斗了。

北京师范大学,是50年代吴晗一手操办起来的。他决不会想到正是从这里开始对他的第一场批斗。

北平刚刚解放时,全市是个大烂摊子,最烂的一摊就是学校。北京市委、市政府拟定了改善教育的计划并逐步实施。这一重任自然由文教副市长为主承担。国家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吴晗就像当年挑着扁担进北平那样,终于将北京师范大学创办起来。他还担任历史系的名誉教授,不断到学校来讲课或作报告。他又跑遍西山八大处,利用第六处香界寺创办了教师休养所。另外,教师进修学院、函授大学、电视大学、少年宫、北海少年科技馆和小水电站、工读学校等等,都由他亲自跑、实地看,因陋就简创办成了。若干年后在北京师范学院对他的第一场批斗中,这一切都成了“罪行”,从而开始了越批越烈、越斗越凶的折磨和摧残!

北京的七、八月,是烈日当空、柏油路面晒化的气候,红卫兵们在晒化的路面铺上七楞八角的砂石,不久砂石也烤得滚烫。人们把吴晗按跪在砂石上,上烤下烫地“交代罪行”。动辄被拳打脚踢、皮带抽打,抓起滚烫的砂子往衣领里灌……头打破了,膝盖出血了,人昏过去了!

但是,这样的批斗整不出江青一伙所需要的“材料”。他们需要从吴晗身上挖出向纵深射击的“炮弹”。吴晗一家又被赶出寓所,把他送进市委党校内的“学习班”。

专案组对他“帮助”了几个月仍然没有挖出需要的材料,又在1968年3月投入监狱。

这天夜里吴晗被叫醒。由于夜间被揪去批斗的事经常有,吴晗起身就去摘挂在墙上的牌子——挨斗必有的道具。

“不用那个!”吴晗被喝住,又被推出屋门,戴上手铐,一块黑布蒙上眼睛,推上吉普车,进了秦城监狱。

“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吴晗大声吼了起来。

“这里不许问为什么!”背后一拳将吴晗打进牢房。

谁知吴晗入狱一年,竟罗织不到一条可以作为逮捕理由的罪状。这不能不使江青一伙感到头痛。正巧“军师”来也,1969年3月7日,康生在一份揭发材料中看到:“吴晗是1934年上海社联的吴小甫,是党员,以后不知去向。因此怀疑吴晗是叛徒。”材料来源据说是湖北某人。康生不仅立即派人外调取证,又在路过武汉时亲自去要“吴晗的一段材料”。可是事与愿违,材料证明:吴小甫本人还活着,过去也没加入共产党,不是党员何谈叛变?另外,从1930年到1937年,吴晗一直在清华大学读书和任教,既没再去过上海,更不是什么“社联”。吴晗、吴小甫同时都活在中国大地上,根本不是什么叛徒,好容易捞到的一根稻草又没了。足智多谋的康生又大笔一挥:“我记得吴晗不是叛徒、也是特务!”

原来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苏联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通过地下党向吴晗了解过当时北平学生运动和民主人士的情况。吴晗又经常担负往解放区输送知识分子的工作。解放后的中苏友好期间,苏联大使馆曾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在解放战争中曾经帮助我们工作的人名录》,其中就有吴晗。康生就是根据这份人名录,判定吴晗是“苏修特务”。

吴晗被投入监狱一个月后,也就是1968年的4月,袁震也被关进“学习班”,想以“双管齐下”的方法来罗织吴晗的罪名。袁震一进“学习班”就被关在一间废弃的厕所里。她是一个病了30年的危重病号,夏天都脱不掉棉衣,睡在水泥地上不久,两条腿就瘫了。

袁震被关起来,家里就剩下14岁的吴小彦和10岁的弟弟吴彰,姐

弟二人相依为命,企盼着爸、妈归来。他们原是吴晗的养子养女,50年代时康克清见袁震不能生育,先后帮她抱养了小彦和吴彰。吴晗非常喜爱孩子。加之小彦聪明懂事,吴晗视如掌上明珠,经常把小彦驮在脖子上在庭院跑来跑去。抱来吴彰以后,吴晗更是乐得合不上嘴:“我这是一儿一女一支花呀!”

吴小彦是个个性鲜明的姑娘,在吴晗挨斗的日子里,她曾有两回惊人之举。

1967年4月某夜,一群红卫兵冲进吴家抓住吴晗就打,睡梦中的吴小彦听见爸爸挨打,跳出被窝,光着脚冲到跪在地上挨打的吴晗身边,用身体护住爸爸,大声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迫使其中还有人性者向小彦保证:“把你爸带走批判,不再打他。”斗完放回来后吴晗搂着女儿道:“彦儿!爸没挨打,亏了我女儿。”

又一次是当年一个白天,红卫兵又砸开了门。小彦躲到了海棠树上,当人们对吴晗又连打带骂的时候,小彦气得两眼冒火,“蹭”地由树上跳下来,朝一个正在踢吴晗的人的小腿猛踢一脚,怒斥对方:“回家打你爸去!”当时她才只有13岁,一群比她高出半身的人被镇住了。就是她,在被抄家赶出寓所以后,就挑起了照顾有病的妈妈和比她小四岁的弟弟的担子。病重的袁震实在不忍心让两个孩子跟着他们受罪。把小彦小彰叫到床前,告诉他们不是自己生的,是抱来的,让他们到派出所去改回原姓名并迁出吴家。小彦一听,瞪着妈妈,脸色变青了,像炸药爆炸般吼道:“你骗人!”

“妈妈什么时候骗过你?我的病不能生孩子你是知道的呀!”袁震哀求心爱的女儿相信自己。

“不!抱来的也是亲生的!”一声撕心裂肺的叫喊,扑进妈妈的怀里。母亲也把儿、女紧紧搂在怀里,三个非血缘的骨肉亲人,抱在一起,哭成

一团。

小彦14岁就带着11岁的弟弟，过着人所共知的“狗崽子”生活！

年月再不好，总也有好人，江青一伙再疯狂，也无法将8亿人都拴在她的裤腰带上。小彦得好人帮助见到了妈妈，妈妈的腿瘫了。她又买来针灸的书，照着书在自己腿上扎。每天往返30里路去护理袁震，一来二去竟然把妈妈的腿扎好了。奇迹吗？感天动地了吗？回答不出，只是袁震流着泪，抚摸着女儿那扎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小腿：“不是女儿的医术高，是女儿的心诚！”

周恩来总理得知了吴晗、袁震的消息，坚决让江青一伙允许他们夫妇治病，可是只放了袁震一人。

1969年3月17日，小彦和吴彰高高兴兴接妈妈回来。当晚，万里听说袁震放出来了，悄悄送来一锅红豆粥。不料，袁震又突然发病，脸色苍白，大汗淋漓，大声喘着气。小彦连夜背起妈妈就去医院。袁震的个子比较高，小彦没那么大力气，小彰在身后托着，踉踉跄跄地冲进医院，到了医院却没人管，因为她是吴晗的“老婆”。小彦求他们，小彰求他们，勉强答应抢救，却又不给必要的药，拖到凌晨，袁震从昏迷中睁开眼睛望着儿一女，止不住泪如雨下。女儿问妈妈想不想吃点什么，妈妈说：“就想喝点稀饭！”女儿忙去找，儿子也去找，到哪去找呀！妈妈至死没有闭上含泪的双眼！

3月18日清晨，袁震被推进太平间，姐弟二人带着哭得红肿的眼睛去照了一张像，他们要永远记住这一天！

吴晗在狱里也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了，叛徒不能成立，就逼吴晗承认特务。审讯在加紧，吴晗在吐血，大口的喷血。他望着喷在牢房墙

上变成黑色的鲜血，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逼自己。专案组的人唯恐吴晗死去，只好把他送进阜外医院抢救，因为吴晗的生死，反而能决定他们的命运与“前途”了。吴晗躺在病床上大概已经明白自己必死无疑，也反而平静下来一语不发了。

吊针在输液，审讯在突击。几个人围着吴晗喊叫，吴晗静静地望着天花板。他在想什么？不得而知。也许是他看到袁震领着小彦、小彰向他走来？也许是想起李公朴、闻一多？也许是在讥笑床边的几个人？讥笑他们：“你们喊什么，怕我死吗？你们不是一心要置我于死地吗？我怀着美好的理想死去，你们留着丑恶的灵魂活着。喊什么！……”终于默默地停止了呼吸。这天是1969年10月10日。

吴晗、袁震就这样“走”了。可是身后还留下了小彦和小彰。

又是这位小姑娘，她不服，她要弄明白。她到处上访求告，几乎跑遍了北京的有关单位。万里为她安排了一个工作，她供着弟弟上学。1975年邓小平副总理复出，上访办的态度有了变化，但也只能嘱咐她“要有耐心。”刚刚看到一点希望，“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使她陷入无望的深渊。周总理去世了，她痛哭，她觉得再也没有希望把爸、妈的事情弄清。弟弟已经19岁，长成了比自己还高的小伙子，能自立了。她感到无比疲倦，难承无尽磨难，再也无力挣扎，她终究只有一副稚嫩的肩膀呵！望着父母的遗像，一心想再去享受父母的爱，她服毒了，她去和父母团聚了！可是活着的人该多么遗憾，1976年9月23日她死去了，距离粉碎“四人帮”只差13天，再稍稍坚持一下，就能享受今天的阳光……

（责任编辑：卢弘）

●宋 严

吴晗和

袁震，原名袁震之，湖北光化县人，1906年生，父亲是清末秀才，民国后作过教师和小学校长，担任过县的“国货维持会”会长。少年袁震也随父抵制日货，后跟叔叔袁书堂来到武汉，考入湖北女子师范。正值董必武、陈潭秋在该校任教。袁震和叔叔一家先后加入了共产党或共青团。

北伐军占领武汉以后，袁震即

▼吴晗和夫人袁震在清华大学西院十二号宿舍合影（1946年）



他的妻子袁震

在湖北教育厅工作。大革命失败，叔叔婶婶（王坚白）相继牺牲，堂姐袁溥之被捕入狱，袁震也与党失去联系，由老师张佳敏和表的表兄吴之椿帮助到北平清华大学史学系读书。

袁震才貌双全，在清华被同学誉为“校花”，不幸上到四年级患了结核病，后又发展成肺结核。偏巧吴之椿要到青岛任教，就把袁震转托给同学梁方仲。不久，梁又要南下广州，又转托给刚毕业留校任教的吴晗。吴晗受友人托，细心照料，日渐发现袁震才思敏捷，见解独到，论证清晰，文风犀利，充满爱国主义思想，谴责国民政府对日妥协，还对历史上一贯被斥之为“盗”的农民抗争，称之为起义。这使吴晗耳目一新，不仅觉得袁震与众不同，而且认为胜过自己。吴晗敬重袁震的才思见地，袁震也很敬重吴晗的人品道德与学识。二人因敬而生爱，常常是一个躺在石膏床上，一个站在床边，谈史论文，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

抗日战争爆发，吴晗去昆明任教，母亲、弟、妹也都来到昆明，1939

年袁震经调养已能行走，来到昆明。吴家一家知道来的是吴晗的意中人，欢天喜地准备迎接。可袁震是由人背着走进大门，母亲大吃一惊，原来是个行动困难、不能自理的人。

老太太看袁震端庄大方，知书达理，坐在床上还给自己织毛衣、梳头，遇到空袭总是设法用身体遮掩保护自己，真是个好姑娘，越发对这举目无亲的姑娘产生侧隐之心。

“春晗，袁震是个好姑娘，咱不能不管，只要你答应不结婚，咱老家还有几间房屋几亩地，全卖了给她治病。”老太太是真心要帮助袁震，也要拉住儿子。

吴晗流泪了：“娘！我们是学术上有共同语言，志同道合，才产生感情的。儿子决心和她过一辈子，她同意结婚，我们就结婚，她不同意结婚，我就照顾她一辈子，同生共死的感情是万两黄金也买不来的，娘！你愿意你儿子是个只讲利害，不讲情义的人吗？”

还说什么呢？只有精心照料这个既喜爱又担忧的儿媳吧！老太太终于把一枚戒指戴在袁震的手上。



▲袁震和女儿小彦、儿子吴影在一起

吴晗和袁震的夫妻生活内容就是学术，从某种意义上讲，袁震的思想和观点或有胜过吴晗之处，吴晗常常在讨论中吸取袁震的论点。他学术研究上的变化，走上民主斗士的道路，都受到袁震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

在昆明生活最穷困的时候，吴晗不论多么忙，多么艰难，总是把袁震的身体摆在重要地位，到肉摊上去买骨头，到河边去钓鱼，为袁震输血……都是为了袁震的身体。吴晗在北京北长街寓所的西耳房卧室，其实那只是袁震的卧室，而吴晗则在外间墙边支一床榻。夫妇二人长年隔墙而卧，感情却始终恩爱如初。他们因敬而爱，爱得坚贞，爱得高尚。竟在“文革”中在同一年被双双迫害而死。

吴晗和他的妻子袁震

●宋 严

五十年代，鼎鼎大名、曾任过《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中惨遭羞辱，自杀未遂。绝望后失踪了，传说他死了。但不见遗体。笔者奉命去寻找，处处“碰壁”。有人在江苏省一座寺院碰到一方丈，形象酷似储安平，上去问讯，那人摇摇头消失了。亲爱的读者，你说笔者还要不要找下去呢？……

储安平哪去了？

死了。

什么时候？

1966年。

怎么死的？

自杀。

这是社会上的普遍说法。

1985年夏末秋初，一位负责人要编辑《新观察》创刊35周年纪念册。因为这本刊物是国民党时期储安平创办的《观察》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改组而创建的；而且据说这本老《观察》在解放前影响非常，以致惹怒了国民党政府，被查封。

从这位负责人言谈中知道，储曾经作为《新观察》的特派记者，赴新疆进行过连续报道，这在《新观察》还是首例。特殊的背景，特殊的身份，特殊的贡献，找储安平——了解关于他生前的经历和死后的结局，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很荣幸，这次“外调”任务，交给了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的我。

到哪儿去找？储安平是哪个单位的？一概不知晓。

每张介绍信的开头，接待单位都是空白，内容却都准确：“了解储安平。”多亏储氏是不同凡响的名人，很快有人提供了线索——他曾是《光明日报》总编辑。

抓住这根稻草，我赶紧就上。

虎坊桥前门饭店的对面，我兴冲冲地走进那座米黄色大楼。但是，很快我又茫然地从那座楼里走出来。因为，我去访问的人（一位40岁



△一九五五年四月，总编辑储安平

储安平你在哪里？

逸馥
邓加

左右的中年人），对于储安平其人其事，知道的比我多不了多少。

“储安平与本报没有多大关系。”那人接过来我的介绍信说：

“他不是你们的总编辑吗？”

“是，是，不过——”

“怎么？”

他只在这里呆了70天，以后就不知道去向了！

只有70天？！这是怎样一个70天呀？而他在这70天里又是充当了一个多么不寻常的角色呀！

后来，有一大摞子落满灰尘的材料铺到我的面前，我翻看那些材料，虽然都是历史往事，都已见诸报端，但却依然感到心灵的震颤，感到一股强大的威慑力量。那70天，可不是寻常的70天，而是狂风暴雨、惊涛骇浪、玉石皆焚的70天；而他，储安平，就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走进被毛主席点名批判的《光明日报》，并当上了那里的总编辑的。有人说，他将和胡风一样，注定要成为历史人物。然而，才不到30年的时间，他就被人们彻底地遗忘了，连让他扮演那个重要角色的舞台，都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个什么模样了。

从材料中我得知，储安平是1957年4月1日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因为二三月份，毛主席发表了重要的《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了贯彻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央研究决定，将原为民主党派创办的《光明日报》交还给民主党派，以常芝青为首的中共

党组从《光明日报》撤出，由各民主党派协商推出一名民主人士充任总编辑。当然，这个协议也是征得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同意的。

4月1日上午9时，这位新总编在社长章伯钧的陪同下走马上任。章伯钧向前来欢迎的各部主任介绍说：“我把储安平同志带来了！他是一个作家，增加了《光明日报》很大的力量。”这句介绍实际等于没有介绍，因为储安平是个作家，而且颇有些名声，是尽人皆知的事。人们想知道的是：这位旧社会办《观察》出了名的老报人，今后打算怎样办《光明日报》，怎样带领大家办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张民主党派报纸。形式是新的，内容也是新的，路子该怎样走，大家都没有经验，都想听听总编辑的施政方针。

储安平很坦率地向大家亮出底牌说：“我到这里来工作，李维汉部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他还没有告诉大家，是胡乔木事前到了他家，请他出来主持《光明日报》工作的。乔木同志知道他同许多知识分子过往甚密，由他出面约专家教授撰稿，《光明日报》会办得更加有声有色。接着，他十分得意地说：“李维汉部长曾对周扬部长说过，以后有人批评储安平先生，你要为他撑腰。”最后，他踌躇满志，稳操胜券似地向大家宣布说：“我有信心，但不可能无困难，这是规律。”“我只准备和大家商量，受党的教育要表现在行动中，并需以诚意待人，向人学习！”

这样，这位解放前在知识界中颇享盛名的总编辑，一上任就给100多位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写了约稿信，让他们为《光明日报》写些有见解、有分量、有影响的文章来。他还计划请人来作主笔，为一些学者开辟专栏，在社委会下设顾问团，在编辑部下设顾问组等等……

他的这番热情饱满、大刀阔斧

的行动和设想，在知识界中间引起了很大反响，旧日光华大学的同学为他摆宴庆贺，费孝通先生说他工作“很起劲。把《光明日报》看成他办的企业”，名记者子冈甚至还要写一篇《新总编辑上任记》。遗憾的是，这些人中间有很大一部分在几十天后都成了右派，这又从不同的侧面逆向地证明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4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帮助党整风提意见。储安平这时更是全力以赴地扑到大鸣大放、鼓动那些对党有意见的人出来说话的工作上。用他当时的原话说：“当前最大的问题是鼓励大家鸣放，而《光明日报》在鸣放的报道上落在后面。”于是，他便派出了大批记者，到上海、武汉、南京等9大城市去找那些专家学者采访、座谈，鼓动他们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他唯恐人们在座谈会上提的意见不多，提得不尖锐，还指名道姓地提出几个他认为意见最多的人。有记者临行前向他请示说：“社会上常有这种情况，有些人在社会上有代表性但无事可鸣，另一些人敢于鸣放却没有多大代表性。如遇这种情况，该请哪一部分人？”储安平说：“要找后者！如果他们不愿意出来，就登门拜访。”有的记者对他这番热情的话打了折扣，没有找那些最有意见的人，但绝大多数按照他的意见办了，而且还进一步地做了发挥。例如去武汉的潘文彬，本来让他开一个座谈会，他却开了三个，没布置他写通讯，他却写了三篇，而且字字尖酸辛辣，诸如什么“四顾无知己，比邻若天涯”，“春风绕过武胜关，又吹到别地去了”等等。后来，这些记者一一地被当地作为“纵火犯”给揪了出来，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也就不足为怪了。

就这样，从5月初开始鸣放，到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

是为什么》，《光明日报》共组织了11次座谈会，发表了22块整版将近13万字的座谈纪要。还有大量的消息、通讯和专题报道。

最后，事情走向了高峰，也就像毛主席所说的“达到顶点”。储安平在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已经接近尾声的党外人士整风座谈会上，放出了“党天下”的毒草（原标题是《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事情自然也就因此而走向其反面，储安平便由各民主党派公推出来的、受人青睐瞩目的总编辑，一下子变成了个大右派。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江苏组的会议上，许多代表揭发批判他是“江苏组三个右派中最坏的一个”。人们认清了储安平的真面目，口诛笔伐的烈火遍及报社内外、全国各地，使得他胆战心惊，坐卧不宁，悔恨交加到了无地自容的地步。邮递员给他送信，在门口喊储安平的名字，他不敢出去接，怕邮递员当面同他辩论。到医院里看病不敢说是姓储。储氏姓蒋，怕人一下子认出他是储安平来。最后，他终于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做了长达4000余字的《向人民投降》的发言，几乎是用基督教的虔诚检查自己的罪恶说：“我今天在这庄严的会场上，并通过大会向全国人民真诚地承认我的错误，向人民请罪，向人民投降。我要向自己开刀，剥去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皮！”

6月8日下午2点，他向社长章伯钧提出了辞呈，不再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从此，他的生命旅程由沸点降至冰点。

从那以后怎么样了？我在《光明日报》问那中年人。

“以后就不知道了。不过，他是民盟的人，你可到那里去问，他们也许知道。”

二

在北京沙滩附近的一条胡同里，我找到了民盟中央，填好空白介

绍信，急匆匆地走进院内。

还在路上时我便想，这回一定能够找到储安平的下落。因为，这里曾经是“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指示下，在中央一级民主人士中仅存的5名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陈仕炳、储安平的所在地。毛主席当年曾经指名地批评过它：“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绝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在我看到过的那一厚沓子揭发批评材料中，人们都说储安平是章罗联盟中的重要成员。当初，就是章伯钧将他领到《光明日报》并推荐给编辑部的。关于“党天下”的发言，他在事前征求过罗隆基的意见，并让他看过发言稿的，还有人说，他是罗隆基、张东荪的得意门生等等。

不问可知，有章罗的地方，也必定有储。

然而，向对方问了几个问题之后，得到的答复却是截然相反。接待者一句话就把我挡住了：“储安平在我们这儿只是挂个名，他的活动都在九三学社，你在那里问问吧！”

这时我才想起，在看过的那些材料中有人揭发说：储安平在民盟中只是一般的成员，在九三学社是中央委员，宣传部长，可他6月1日的发言稿没有向九三学社的任何人征求意见（主持会议的许德珩气呼呼地说：“我连知道都不知道。”），可却去到民盟那里交给罗隆基看。可见，他是有意违背九三学社的宗旨，有意躲避学社的监督的！

那么，当年他为什么要一下子参加两个民主党派呢？

历史退回到北平刚见黎明曙光的时刻。各民主党派为了迎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而这时，又正是储安平春

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

1946年4月，他断然拒绝了“南京方面以高级公务员荐委”，只身躲在上海小得不能再小的房子里开始创办《观察》杂志。由于这份杂志都是由社会名流、民主进步人士撰稿，敢于抨击国民党政局的昏暗腐败和宣扬民主、自由的思想，很得一部分知识界读者的喜爱，很快便由创刊时的400份上升到几万份，到1948年底国民党查封时，已经发展到10万零500份了。一个发行到10万份的杂志，在当时的出版界中，就已经是相当大的刊物了。

12月21日《观察》被查封时，储安平正潜藏在北平忙着搜集材料，准备发回一些透视这场使中国历史由此发生转折的平津战役的文章。他有幸躲过了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但不幸的是，却连累到杂志社另外两位同事锒铛入狱。

北平解放后，他从藏身的北平城府学胡同里走出来，一下子就搬进专门招待高级民主人士的北京饭店。日理万机的周总理还专门到饭店里来看望他们。使他感到特别荣耀的是，周总理亲自走进他住的房间，饶有兴致同他谈了话。

正是在这种得意的心情下，他才一改平生不愿参加任何党派的素志，而且不参加则已，一参加就参加了两个。因为两个党派都争取他参加，两边都有他尊重、交往密切的师友。他对朋友解释自己的这番举动说：“两边都请，不好意思拒绝，就两边都参加吧！”说话时，眉宇之间不无得意的神色。

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在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之际，中共就首先想到了《观察》的复刊之事。中共党内两位主管宣传工作的老同志乔木和胡绳，专为此事写信给周总理。得到的批复是：“有那么多的读者，当然复刊！”果然，11月份储安平就又当上了《观察》杂志的主编。复刊后办了一年多的时间，

《观察》杂志改组成为《新观察》，储安平离开杂志转到新华书店任副总经理，1952年又改任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他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此后，他便常以人大代表和《新观察》特派记者身份到全国各地采访和视察，写回的系列报道不仅登载在《新观察》上，还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上转载。储安平的名字在一个时期里还是挺响亮的。

在此期间内，他对九三学社的工作也确实是比较热心，因为主席许德珩是他尊敬的师长，其他如袁翰青、楼邦彦等也都是他多年交往、无话不谈的老友。他在九三学社不仅担任中央委员，还负责主编学社的机关报《社讯》。中共中央决定将《光明日报》归还民主党派主办时，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开会，让他们各出一人组成社务委员会。代表九三学社出任社务委员的，便是储安平。

这样看来，储安平确定是九三学社的人。

三

在北京西四欣赏胡同，我找到了九三学社，见到了一位有关负责人。

“自从打成右派之后，他便一直挂在我们这里，直到自杀时为止。”那位有关负责人对我说。

“他自杀死了？”我急切地想知道准确的下落。

“自杀过，但没有死，他被人救上来了。”

“那么说，他没有死？”

“不——”

“死了？”

“不——”

“那么，到底是死，是活？”

“怎么说呢？他被打成右派后，就回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每月发给他100元的生活费，没让他干重

体力活,也没有让他按时点卯和挨训斥。总的说来,还是不错的,只是在开头两年里随着机关下放人员一起到西山农场里放过羊,干过一点零活儿。回来后他便一直安静地住在自己家里。就是他那房子,也还是学社帮助他从街道上讨还回来的。”

“他的家在哪儿?”

“厂桥棉花胡同,他一直住在那儿,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每日除了读书写字之外,为了遣散闲暇,还在院子里养了几只羊。红卫兵走上街头时,他被横扫出去,作为专政对象,让他拿扫帚打扫街道……。”

1966年深秋的一天,储安平扔下象征扫街的扫帚,不远数十里到北京西郊青龙桥,跳河求死,不想水浅未遂,被红卫兵小将押回九三学社。当时已是深夜11点,院内临时工住的小南屋,暂借他当晚栖身。重返人间的第二天,他首先交上了检讨书,然后向小将们提出“能不能不回家,就住在这儿?”最后要求把一些银行存款单交组织上保管。结果是——“不行。”

于是他消失了,在10月份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他的女儿回家来看他时,家里的东西被抄得乱成一团,在房子中间的一把破椅子上,放着一个小小的行李卷——那是他从九三学社刚背回来的。女儿找不到他,便汇报到九三学社,九三学社汇报给军代表,军代表汇报给中央文革,也报告给周总理。周总理指定公安机关组成了一个专门调查组,叫他们一定要把储安平找到。调查组足足找了两年,荒山野岭,河湖港汊,这么说吧,凡是有人迹到过的地方和人迹没有到过的地方都找遍了,始终没有找到他的任何踪迹。

两年之后,调查组做了个没有结论的结论。康生看到后极为不满地说:“储安平,大右派,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怎么回事?”

能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这样一个拿得起来放得下的人物,就这样轻而易举地从人寰中消失了,杳无踪迹,犹如一丝清风,一缕荒烟……

“以后,他家里人再没有到这儿来找过他?”我一片痴心一片茫然地问。

“没有。”

“他们从来没有来过?”

“来过,要他的银行存折。”

“他们有没有就他的问题,请你们找上级部门,要求重作结论和解决?”

“没有,这儿多年没人来为储安平说过话。”

“你们有没有为储安平问题的解决,做过努力?”

“当然没有。”

“如果连储安平都平反了,不就证明1957年反右搞错了吗?”对方非常不满地反问。

“《新观察》正在编辑创刊35周年纪念册,储安平作为本刊前身《观察》的主编,《新观察》第一位特邀特派记者,你以为可以在纪念册中提到他一笔吗?”

“当然不行。”对方态度十分明确。

我终于不得不一无所获地打道回府了。

后来,在那本装帧精美的35周年纪念册上,果然没有任何笔墨光顾到储安平身上。

时光荏苒,一转眼又是几年时间过去了。

不久前,一次友人聚会上,我听说,有一位老者在江苏某山某寺中,见一方丈,形貌皆似储安平,他即上前拜见,并探询:“请问,您是储安平,储先生吗?”对方一笑,然后摇摇头,隐去。

我闻之,即发异想。

储安平消失已经20多年了,公安机关为此事专门组成了个调查组,一访就是两年,可是始终没有找到一点点线索。看来,他也未必就已死去,也许真像那位长者说的,遁入空门,出家当了和尚。

可是,有人听说后立即驳斥了我的论断,说:“储安平生活自理力很差,他决无这个本事隐遁20多年,不等他做什么修炼,早就饿死了!”

可是也有人说:“也不一定!他虽然生活自理能力极差,但既已出家,便自然习惯于过出家人不食人间烟火的日子。山菜野果,清泉甘露,也可充饥。更何况,他早有过超脱的悟性和淡泊尘俗的念头。”

我记起1957年报纸上登载的一条揭发材料:6月8日,储安平到社长章伯钧那里递送辞呈。

章伯钧问:“你的负担重不重?”

储安平答:“不重。”

章伯钧:“有以下三种情况就困难了!一,身体不好;二,名利心重;三,生活担子压迫。有这三种情况就非出来做事不可!”

储安平:“我没有。”

章伯钧:“你可以超脱一些。你年龄不大,可以多研究一些思想工作。今天能够看到50年以后的事的人,还没有。”

人真的在深山古庙里皈依佛门,修身养性,以超脱物质束缚的悟性去研究、思索人生哲理、天地玄黄和佛门的种种禅宗法事吗?

这可能?

这不可能?

……可江苏的山不只一二,该在哪座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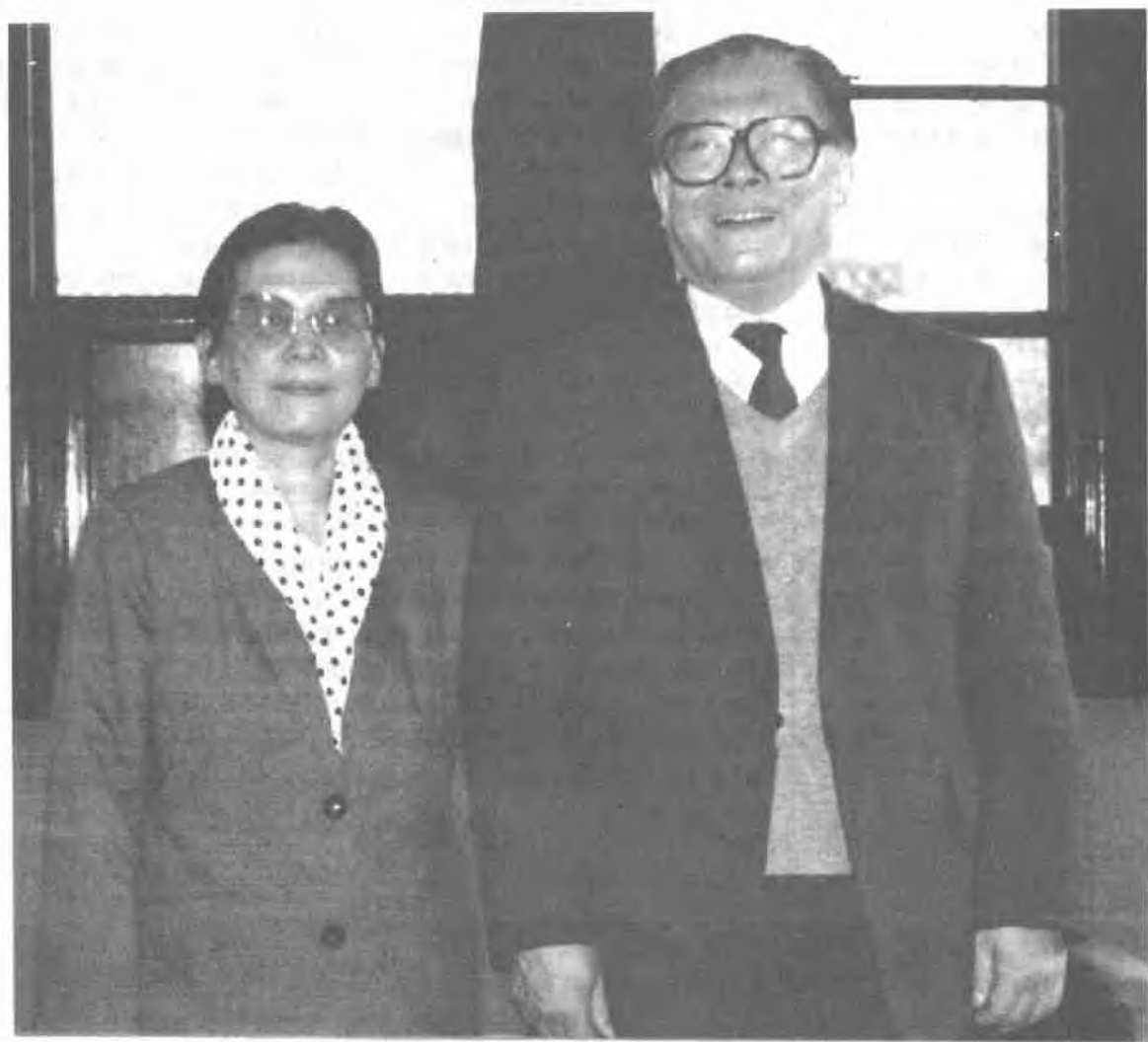
山中庙宇比比皆是,又是哪座佛门呢?

是否该继续——寻找储安平?

(责任编辑:林木)

●水 静

和将军、部长 斗酒记



▲作者和江泽民总书记合影

“文革”之后，我随尚奎去京开会，住京西宾馆。这回我们看望了许多好友，也有不少好友来访，相会在浩劫之余，莫不欣然相庆。提起往事，念及故旧，则无不感慨唏嘘。

这天上午，我下得楼来，准备在大厅等候两位客人。刚想找个地方坐下，只见迎面走来三位步伐雄健的老年军人。我仔细一看，其中一位乃是我的老首长萧劲光大将。解放战争初期，他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辽东军区司令员，当时我已从新四军调到了辽东部队；后来因为尚奎的关系，经常见面，因而很熟悉了。

萧司令一眼就认出我来了，两步跨到我的面前，笑嘻嘻地和我握手，并且把他身边的杨勇和陈士渠两位上将介绍给我。

我向他们一一问好。

“她叫水静，是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爱人。”萧劲光同志向两位将军介绍说，“你们知道吗，她也是一位常胜将军呀。”

我被他说蒙了，目瞪口呆地望着他，我怎么变成了一个“将军”，而且还“常胜”呢？

“她很能喝酒，让我们东海舰队陶勇司令员喝得烂醉如泥。”他继续说，“陶勇在海军里头是最能喝的，能把他打败，算得是个‘常胜将军’吧？”

三位将军哈哈大笑。

于是，我想起了1961年在庐山和周总理喝酒时，他对我说的几句话：“水静呀，听说你酒量很大，把我们廖鲁言部长都灌醉了。他在部长当中，是很能喝的一位。”

我不曾想到，我在喝酒上竟如此名声显赫。

我想，这虽然算不得什么美誉，但肯定也没有贬义。至少我有这么个“特点”可以使朋友们想起我。

看来，酒就有这么一个好处：像一把神奇的雕刻刀，把友谊刻在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的记忆之中。



▲1959年庐山会议后，作者随周总理返回南昌途中合影（左为杨尚奎）

我国是一个有悠久的酒文化传统的国家。据考证，早在新石器时代酿酒就比较普遍了，而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遗址上，便出土了多种酒器。尽管还有些国家酿酒历史比我们长，但是中国酒文化的特色，早已为举世所称道。中国人饮酒提倡酒德、唾弃酗酒以及与此相关的不高尚行为。因此无论城乡，饮酒者颇多，也偶有醉酒者，但酗酒者极少。一般说来，除了喝补酒、养生酒之外，酒总是跟人的忧乐相连的。或排遣忧思愤懑，或渲染愉悦喜庆，碰到不愉快的事了，“一醉解千愁”，高兴起来了，又是“一醉方休”。外国

人喝酒，常常是一个人端着杯子，靠着柜台喝闷酒；中国无论忧乐，总喜欢跟朋友、尤其是知心朋友喝，“酒逢知己千杯少”，这样才喝得痛快。于是，酒便成了友谊的催化剂、粘接剂、凝固剂；酒便与友谊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解放初到60年代上半期，除了一些不正常的历史阶段外，总体来说，人们心情比较舒畅，人际关系比较融洽，特别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人，不管过去交往深浅，见面之后总是友好亲切的；至于战友相逢，更是击胸捶背，兴奋之情，无以言表。这时酒就酿出来了；不喝两杯如何

使得?这在一般干部中是常见的,在领导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当中,也不例外。

我就是这时开始偶尔喝点酒的。尽管我平时并不沾酒,但一喝起来,往往要占上风。究其原因,未必是因为我的酒量大,而是因为我是一个女同志,不显山,不露水,容易被别人轻视、忽视,拼起酒来,又易招同情,所谓“哀兵必胜”嘛。而且,我从不主动出击,等到那些自恃“海量”的同志找到头上来时,他已经喝了几成酒了,我便收到以逸待劳之效。当然,我年纪轻、身体好、心情舒畅,这喝酒不易醉的三个基本要素,我全具备;同时,一定的“实力”也是有的。

所有这一切,使我赢得了一些“胜利”,获得了更多的友谊。酒场不是战场,无论胜负,皆是友情。

二、三十年一晃而去,许多琐事都渐渐淡忘了,而那些酒宴趣事,尤其是比酒更为浓烈的情谊,却清晰得就像昨天一样。

我脑海里记了三位酒友,其中两位,即周总理说的廖鲁言部长、萧司令提到的陶勇将军,早已在“文革”那场灾难中作古了。但我没有忘记他们,永远不会!每当我一杯在手时,心里就会默默地念着他们,虔诚地敬着他们。我多么希望看到他们再次开怀豪饮啊。如果他们真的还能与我对饮,我宁愿自己喝醉,喝得酩酊大醉!

廖鲁言“大意失荆州”

江西老表是很好客的,主要由江西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老干部组成的江西省委班子,同样有好客之风。“文革”以前,除了三年困难时期之外,中央部、委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首次来赣的,省委一定要宴请一次,聊表地主之谊。这差不多已是一种不成文的制度了。

1958年春,中央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同志来江西视察工作,受到省

委的热烈欢迎。因为江西是农业省,每年都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廖鲁言之来,必将进一步促进江西农业的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天晚上,省委为欢迎廖鲁言部长,在滨江招待所举行便宴。除了尚奎和省委其他领导外,主管农业的刘俊秀书记把我也叫去了。一共摆了两桌,几位书记陪同廖鲁言坐一桌,我和几位工作人员陪北京来的其他客人坐另一桌。

便宴一开始,那张桌上就很热闹,书记们轮番向廖部长敬酒,频频举杯,笑语不断。廖部长善饮,碰杯即干;听说在中央部长中,是最能喝的一位。加之刘俊秀不仅好饮,且性格开朗,在酒桌上十分活跃,因此,他们左一杯,右一杯,喝得很痛快,气氛特别热烈。

闹了一通之后,刘俊秀突然起身,把我拉到那张桌边。

“廖部长,我给你介绍一位同志。”刘俊秀指着我对廖鲁言说,“这是我们尚奎同志的爱人水静同志。”

廖鲁言“啊”了声,连忙站了起来。“你好你好,水静同志。”他说着,又转过脸去对尚奎说:“你夫人来了,怎么也不吭一声呢?”

尚奎看了看他,又扫了一眼刘俊秀,笑而不言。他显然已经知道了刘俊秀的用意。

“这样吧,水静。”廖鲁言拉着我的手说,“杨大哥没有向我介绍你,我要罚他三杯,可是他又不会喝酒,我看就由你代劳吧。”

我站在那里,只是摇头,推说不能喝酒。对于这位部长,我虽是头次见面,但却是久闻其名。我听说,他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曾和薄一波等同志一起,在北京草岚子监狱度过了多年铁窗生涯。在狱中,他斗争顽强,坚贞不屈,而且还和大家一起,刻苦学习。当时,狱中支部办了狱中党校,为了取得教材,还做好了争取看守的工作,经常通过那些人买到外文秘密刊物。他和杨献珍懂英文,

还有的同志懂俄文或法文,他们在一起翻译了不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供狱中党校的学员们学习。他就翻译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能否维持政权》,还和杨献珍合译了《马克思学说》。他后来常说:“可以说我的理论修养是在反省院中获得的。反省院中的党校,是我的大学。”1936年出狱后,党又派他到薄一波主持的山西省牺盟会工作,曾任决死队大队长和团的政治部主任,站在抗日最前线……对于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领导同志,我决不能扫他的兴。

他虽是一位大知识分子,但身材魁梧,性格直率,有着燕赵之士的旷达豪爽。从他喝酒的神情以及以往在这方面的“声誉”来看,他是很有实力的,决不像有些人那样虚张声势。因此,我又必须谨慎一些,可不能让他灌醉了。

在僵持片刻之后,刘俊秀凑上来了。这个题目别人不说他也要说,岂会轻易放过。

“廖部长,你罚尚奎三杯,应该,我完全同意。”他故作“公正”地说,“不过,你要水静代喝,她不肯,你就陪她喝三杯,怎么样?”

“可以,只要她喝,我一定陪她三杯!”廖鲁言说。显然,他认为一个年轻的女同志,哪能一口气喝三杯茅台呢?

我还在推脱,说我喝不了这么多。

于是刘俊秀又来给我“做工作”,“软硬兼施”地说:“廖部长陪你喝,这个面子还能不给吗?”

经过一番礼貌的推让之后,我和廖部长都把自己面前的三杯酒喝下去了。

廖鲁言见我三杯下肚,一点反应都没有,便嚷开了:“不行不行,三杯太少了。我第一次来江西,第一次见到尚奎的夫人,三杯怎么够呢?”

刘俊秀在一边也来劲了,拼命给我做“宣传鼓动”工作:“水静,廖部长说得对,应该多喝几杯。尚奎不

喝酒，敬酒也是做样子。你现在应该代表尚奎，实实在在地敬廖部长。”我说：“既然如此，我只好遵命了。”

“好，痛快！”廖鲁言高兴地说。并对服务员说：“换大杯来！”

接着，他又叫人搬一把椅子，加了一个座位，让我和他们一起，边吃边喝。

这时候，他还是很大意，不知道女同志里面也有能喝的。见我大杯也照干不误，便觉得有些惊奇，但是，已经刹不住车了。他原来就喝了不少；后来又跟我连喝了几杯，醉意已经很明显了。而此刻又是酒兴最浓的时候，如何停得下来呢？在他的坚持下，我们又喝了五大杯茅台。

尚奎看看这个样子，再喝下去，他非马上醉倒不可，于是又出来当“消防队员”了。

“算了，算了，廖部长，别喝醉了。”尚奎说，“来，吃点水果，解解酒。”

“没醉，还差得远呢。”廖鲁言有点咬字不清了，“喝，水静，再喝……”

尚奎一个劲地给我使眼色，示意我不要再喝了。于是，我喝完了杯中酒，扣上了酒杯，表示休战。

我知道，把廖部长灌醉了不大好，所以我一直处于备战的守势。只是他已经喝得够多的了。

吃了一点水果之后，尚奎、俊秀和我，以及北京来的两位同志，一同送廖部长回房间，准备喝喝茶，聊聊天。不知谁说，时间还早，不如打打麻将，因为廖部长没事爱搓两圈。于是，立时摆开桌子，搓了起来。

打了不到一圈，廖鲁言的眼睛就很难睁开了。我们劝他早点休息，他说：“没事，打吧打吧！”我们只好陪他继续打下去。

又过了一会儿，显然是酒力涌了上来，他差不多处在一种睡眠状态了。我抓了一张牌还没有打出，只听得“咣溜”一声，他从椅子上一下滑到桌子底下了。

于是他的秘书赶紧把他搀进房间，扶到床上和衣而卧。因为如果这时要给他脱衣服，翻动折腾一番，可能马上就会呕吐的。

“老刘（指刘俊秀）真害人，故意把你叫来陪酒。”尚奎笑道，“他今天醉得不轻呢。”

“听说他的酒量很大，怎么一下就醉了呢？”我说。

“你不知道，没和你喝之前，他已经喝了不少了。”尚奎说，“后来又干了那么几大杯，还能不醉？”

第二天，我和尚奎去看他，只见他里面穿件毛衣，外面罩件毛巾浴衣接待客人。原来他睡到半夜时，吐得一塌糊涂，把枕头、被褥和身上那件毛料中山装全弄脏了。他本打算呆两天就回京的，没有带多余的衣服。偏偏这天又下着雨，空气里湿度很大，拿去洗的衣服，一下又干不了。当时，招待所设备很差，还没有烘干机。这样，他就不得不过来个“礼仪改革”，穿着毛巾浴衣会客了。

我立即找到招待所工作人员，要他们烧个火盆，马上把廖部长的外衣烤干。

尚奎也出来了，见我安排妥当了，便点着我的鼻子说：“你呀你呀，害得人家好苦！”

我说：“书记同志，我可是服从命令呀！刘俊秀也是书记，他叫我去，我能不去吗？”

他哈哈一笑说：“如果不是老刘作了那么多铺垫，恐怕你也不是他的对手。”

尚奎的话是有道理的。就饮酒而言，由于气候、体质以及历史习惯等原因，一般说来，北方人强于南方人，男性胜过女性。这两大优势，廖鲁言全占了。再加上他体型高大，体魄强壮，仅就体量对酒精的平均承受力来说，我这个典型的南方女性也远不如他。他的败北，主要是他太“轻敌”了。喝了几成之后再与我对垒，以其之劳攻我之逸，怎能不受挫？

李葆华硬拼受挫

李葆华在上海的那次酩酊大醉，纯属偶然。

我认识李葆华同志比较晚，但他很快就成了尚奎和我的好朋友。

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之后，李葆华由中央水电部副部长兼部党组书记调任华东局第三书记，并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此后，我们便常在中央或华东局召开的会议期间见面。他的夫人虽很少和他一道与会，但我们还是时有接触，她为人真挚热情，贤淑持重，我们相处得很好。

头一次见到李葆华时，他就给我们良好的印象，修长的个头，非常匀称；戴副近视眼镜，文质彬彬的，是个标准的知识分子。他的脾气好，具有典型北方人那种忠厚淳朴、热情平和，使人觉得容易接近。有些老同志说，这一方面，他很像他的父亲。

我早知道他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革命先烈李大钊的长子，从小就在父亲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斗争，1924年便是共青团员。当时这位10岁的少年，曾以他的聪明机智，经常出入危险之中。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由于段祺瑞政府对革命力量的残酷镇压，李大钊不得不转入地下。这时，国内外寄给李大钊的书信报刊，都由李葆华转送到父亲的秘密住处；可靠人士要找李大钊的，也由他传信和引见。他实质上成了北方党的领导机关的秘密交通员和秘密联络员。李立三从江南到北京办事，被敌人盯上了，也是他奉党组织之命，通知李立三马上转移，才得以脱险。1927年4月间，“反赤（共产党）不反国（国民党）”的张作霖反动政府进行突然大搜捕时，他的父亲、母亲和两个妹妹都不幸被捕；他之所以幸免，是由于

因事偶然外出的缘故。父亲牺牲后他无法在北京立足，在父亲朋友的帮助下，仓促亡命日本，并在那里求学。回国后，一直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西安事变时，他又重返北京，继续做地下工作。所有这些，无疑使我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敬意。

他之所以令我钦敬，还有一个因素，他是我家乡的父母官，政声甚好。他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采取切实的措施，解决“大跃进”的遗留问题，使群众生活得到明显的改善，因而颇得人心。

李葆华 1962 年到安徽任省委第一书记时，工作扎实，作风民主。他经常一不坐小车，二不带秘书，三不带警卫，独自深入城市、农村，“微服私访”。他去粮站打油买面，到菜市场排队买菜，完全以一个普通群众面目出现。下乡也从事先打招呼，直插基层，调查研究。他离开之后，人们才知道他是李葆华。所以他了解的情况比较真实，作出的决定，也就切合实际了。1959 年反右倾时，一位省委书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六、七十名领导干部受株连，而被牵扯到的下边的干部，为数更多。李葆华去后不久，便实事求是地为这些遭受冤屈的同志甄别平反，恢复工作，发挥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因此，安徽有人称他为“李青天”。

有一回，我随尚奎到上海开会，李葆华到我们住处聊天。我跟他开玩笑，也叫了他一句“李青天”。

“你怎么这样叫我呢，水静！”他笑咪咪地问道。

“我家乡的老百姓就这么叫你的呀！”我说。

“我并没有为群众做多少事，你可别听人家乱传。”他说。

“好呀，李青天！”我笑道，“我是你治下的老百姓，有事来找你，你却把我拒之门外……”

他笑着对尚奎说：“老杨，你看你这个水静，也该管管她了！”



▲水静和肖华、杨尚奎在延安

大家痛快地笑了一阵。

认识他不久，我便了解到，他在省委书记中是比较能喝酒的。一次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期间，水利部部长傅作义请李葆华在家里吃饭，同时把华东局的书记和他们的夫人等都请去了，还请了薄一波夫妇作陪。我也参加了这次家宴，并认识了傅作义先生和夫人。这宴会所做的菜肴，别具一格。大家玩得很痛快，席间觥筹交错，谈笑风生。虽然没有谁闹酒，不过我看得出来，李葆华是其中最能喝的。

无论在哪里吃饭，我向人敬酒，或代尚奎喝两杯，那是有的，但从“主动出击”，与人斗酒。如果谁一定要和我喝，且推辞不掉的话，我当然也会奉陪的。在傅作义的家宴上，我没有多喝，而此前又不曾和李葆华一起干过杯，因此他并不知道我的酒量。但是，他显然听说我能喝一

点，并打算什么时候和我比试一下。不久，这个机会就来了。当时，华东局召开华东各省、市第一书记会议，他和尚奎都参加了，我也随尚奎到了上海。那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会议结束之后，华东局特地举行午宴，为各省书记饯行。

宴会非常热闹，因为都是熟人，也很随便。酒过三巡，有的就吵吵闹闹，开始斗酒。李葆华的酒兴极高，一定要跟我喝几杯。我那天原不想喝，既然他“杀上门来”，便打算陪他喝两盅低度酒。可是那些书记们一见李葆华“挑战”，便凑起热闹来了，一个劲地给我鼓气，喜欢起哄的夫人们，更是吱吱喳喳，推推拉拉，非要我们喝茅台不可，一到这个时候，你就身不由己了。

李葆华从小做秘密工作，机敏非凡，虚虚实实地，使敌人莫之奈何。但他对同志却恳切真诚，十分厚

道。喝酒的风格也是老老实实的，一杯就是一杯，说喝一定会喝。所以跟他喝酒很干脆，不像有些同志那样，你早已杯干见底了，他还在那里磨磨蹭蹭赖赖叽叽的，要费大家许多口舌，甚至非按着他的脖颈“硬灌”不可。

我们就这样一杯接一杯，杯杯底朝天喝了几杯。他的脸已经红了，不过并没有醉，还在兴头上。于是“观众”们又一阵鼓噪，我们又继续喝下去。此时，他已是脸红脖子粗，连眼睛都有些红了。

因为下午还要乘火车回省，离开车时间很近了，尚奎怕他喝多了，在车上呕吐，因此出面劝阻，我们这才罢休。

宴会结束时，已是午后两点多钟。稍微休息一下，便要动身。岂知他真的喝醉了，上火车时，是被人家一左一右地扶上去的；一上车便呼呼大睡起来。

过了一段时间，我和尚奎又与他在上海相遇。谈到上次畅饮时，他笑着对我说：“水静，那回你可把我害苦了，我简直是烂醉如泥。我怎么上火车的，一点都不知道。上车后，把吃的东西都吐出来了，也还是晕晕乎乎，不知所。直到第二天早上，到了安徽之后，我才清醒过来。”

“那次是你要跟我喝的，可怪不得我。”我也笑道，“你是我家乡的父母官，我敢不陪你喝酒呀！”

“现在我才知道你喝酒厉害，不会再上当了。”他说，“说实话，以前人家说你喝，我还不以为然呢。”

“你呀，你还得感谢我哩。”尚奎对他说，“那回要不是我解围，你还不知醉成什么样子，说不定会当场出洋相的。”

大家很开心地说笑了一会儿。

“文革”中李葆华这位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后代，同样遭到“四人帮”的迫害。在大奸康生开给江青的一份包括刘、邓、陶在内的123人的黑名单中，李葆华名列第49位。这



▲水静和李先念、林佳楣在北戴河

些都是要以“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等罪名加以打倒的对象，他如何能够幸免？

1976年秋，“四人帮”覆灭前夕，我和尚奎在北京京西宾馆与李葆华再度重逢。经过那场浩劫，老同志见面，分外亲切。谈起昔日国家的安定繁荣，抬眼当时神州的遍地疮痍，以及人事的沧桑，无不感慨万端。

尚奎逝世后，除了偶尔相遇之外，我已很少与政界老友交往。1987年，全国银行系统在南昌召开会议，作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李葆华，偕夫人一道前来南昌与会。得知他们到来的消息，我即到他们夫妇下榻的江西宾馆看望他们。提及尚奎去世，心情都很沉痛。他们极力劝慰我，要我爱护身体，珍惜今后的岁月。

听说我对收集古钱币有兴趣，他们还邀我参观了在南昌举办的“中国古代钱币展览”。这个展览虽然办得比较仓促，但实物资料也还丰富。古钱完好，古人何在？看着看着，心中不胜今昔之叹。

分别时，我们互道保重。他已七

十好几了，虽然身体尚可，毕竟大不如前。往日那股灵人豪气，已经不大看得出来了。我呢，体弱多病，霜侵两鬓，更不似年轻时候。所以我们这次虽然谈了许久，谁也不愿多提当年盛事，尤其不谈昔日豪饮。

我因心脏不好，已经不喝酒了。至于他，我想即使还在喝，也不会喝得很多了吧。

陶勇“马夫前降”

当台湾特务船“满庆盛”号和“满庆升”号于1964年7月上旬窜入我东海防区，被人民海军分别击沉、击伤之后，陶勇将军一拍海图，对秘书大声喊道：“拿酒来！”据说，他每次战胜之余，必定纵情痛饮。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东海舰队司令员、海军中将陶勇，是个传奇式的人物，被誉为中国的“夏伯阳”。这位出身赤贫的虎将，自1929年16岁时参加红军以来，战功赫赫。当然，很难统计他到底喝过多少酒，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他喝的酒和他打的胜仗成正比，他既善战又善饮，据说，在当时的所有

将领中，他的酒量是数一数二的。

在一些宴会上，我发现他的确是海量，似乎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然而，有一回他可是在阳关大道上“马失前蹄”了。

那是在1961年冬华东局开会期间，华东各省、市第一书记都参加了会议，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和军事法院院长陈奇涵也在上海。当时作为东海舰队司令员的陶勇，以东道主的身份在司令部宴请北京的客人和各省书记及其夫人们。陶勇陪领导们坐一桌，夫人这桌由陶勇夫人朱岚作陪。不一会儿，那张桌上便杯盏碰撞，一片喧闹，不时可以听到陶司令员那充满豪气的嗓门砰然訇然。

正在酣畅时，一位书记建议陶勇到夫人这桌敬敬酒。因为女同志嗜酒的极少，就是会喝的也文雅。

于是，陶勇端着酒杯，笑着朝夫人席走来。可以看出，他已有几分醉意，但显然不曾找到对手。到夫人们这儿来只是出于礼节上的需要，所以他举杯说了几句话便仰脖，亮了杯底。

谁知在夫人中除了朱岚之外，都知道我能喝几杯，只是她们自己酒量不大，没有向我挑战罢了。此刻见陶勇一来，能不“兴风作浪”？于是七嘴八舌，吵吵闹闹，一定要我代表她们回敬陶司令。最后，我只好站起来，和陶勇连干了两杯。

陶勇本来敬完就要走的，见我不但会喝白酒，而且干干脆脆，一饮而尽，不禁颇有兴趣地打量起我来。然后问道：“你是哪里人？”

“安徽无为县。”我说。

“我是安徽霍丘县的，我们是老乡呀！”他高兴地叫道，“想不到我们安徽还出了个能喝酒的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我也没想到今天会遇到同乡。”我说。

“我们都爱喝酒，你得认我为大哥！”他说着，也不管我同意不同意，

便拍着朱岚的肩膀对我说：“这就是你大嫂。”

接着，又把我拉到他们那张桌上，要我和他们一道喝酒。

我当时很欣赏他的痛快豪爽，所以也非常高兴接受了这一邀请。

尚奎、曾希圣、江渭清等几位书记和肖华、陈奇涵两位首长，都开心地大笑起来，夫人们也一边为我鼓噪助威，宴会顿时进入了个新的高潮。

陶勇这位沙场骁将，又威风凛凛地驰骋咫尺酒场，引发了一阵又一阵的喝彩声。

仅和我一人拼酒，他就喝了六、七杯茅台。

尽管他确有酒量，身体也好，但毕竟年近50，处于饮酒高峰期的尾端，已经没有很大的弹性了。而且，他原先已经喝了很多，再加上接二连三的高频率的干杯，便有些恍恍惚惚，语无伦次了。

我则不然，尽管不常喝酒，酒量不及他大，但我终归年轻得多，且起先基本上没有喝酒，自然占了许多便宜。所以，我几乎没有什么醉意。

对此，陶勇大为不服，泼泼洒洒地又倒了一大杯，发音含糊地说：“我就不信，喝不过……我的……小老乡！”非得和我再喝不可。

他显然是醉了。朱岚大嫂见情况不妙，赶紧来到我身边央求说：“我的好小姑，别让你大哥再喝了，你看他快坐不稳了。”

我笑道：“大嫂，可不是我要他喝的，是他自己要喝，还要把我灌醉呢。”

陶勇口齿不清地说着，意思是他没有醉，还得跟我喝。可是他一个劲地往桌子底下滑，滑……

在场的人一个个捧腹大笑。

见他这样，我不再和他喝了，而且也劝他不要喝。

直到有人把他扶走了，他还回头来说，要和我再干三杯……

过了两天，他又一次在东海舰

队设宴相邀。这次除了上回那班人马之外，还多了一桌。我定眼一看，全是些少壮派军官，且摆出一副“临战”的姿态。显然陶勇司令员对那天醉酒不服气。直觉告诉我，这都是可以大碗喝酒的人。我不禁暗暗“警惕”起来。

宴开之初，陶勇就大着嗓门给大家敬酒，悄悄地把“战火”往我身上引。我完全明白，他今天加强了“火力”，准备了“伏兵”，非得把我灌醉不可，好让我也出洋相，以报那日之“仇”。

我心中暗暗好笑，你这位被战神宠坏了的猛将，今天可犯了“兵家大忌”：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意图。

作为一个女同志，我决不能醉酒，可不喝是绝对过不了关的。不过，掂掂酒量，如果一对一地拼起来，我也不一定会输给他。我的头脑连转几圈，一个“战斗方案”便已拟定。于是我枕戈以待，静候着耳畔响起进攻的“枪声”。

果然，酒过三巡，序幕揭过之后，陶司令便下达“作战命令”了：

“哎，×参谋长，×主任！”他朝少壮军人席大声嚷道，“那边夫人桌上有我一位安徽小妹，你们替我多敬几杯呀！”

随着他一声令下，三四位年轻军官，一个个昂首挺胸，端着满满一大杯酒，朝我走来，耸立在我的身边，就像是几路彪悍的兵马，包围着一支孤军。

我不慌不忙，从容地站了起来。

“我安徽大哥看得起我这个小妹，请这么多军队英豪向我敬酒，实在是不敢当。”我说，“如果说别的酒不喝还能找出理由的话，这个酒是不能不喝的。因此，无论谁敬酒，我都要干杯。”

少壮派桌上鼓起了掌，别的席也跟着起哄，宴会一下就热闹起来。

“不过，我有个小小的条件。”我说，“我每喝一杯，也请我安徽大哥陪一杯，大家同意吗？”

大家没想到来这一手。等我说完,便哗哗地鼓起掌来:“行、行!”“应该、应该!”

“我不同意!”陶勇挥着手嚷道,“敬谁谁喝酒,干吗拉上我呢?”

“你是我安徽大哥呀!”我笑道,“你要是不陪,这酒我就不喝。”

肖华和陈奇涵一直抿着嘴笑,他们都是用兵多年的军事家,早已看出陶勇设下的“八卦阵”,现在见我出此怪招,打了陶勇一个措手不及,于是也都“拔刀相助”:

“表嫂这个要求很合理!”

“不过分,一点也过分……”

肖、陈二公都是兴国人,是尚奎的同乡。有了他们的支持,我更加理直气壮,寸步不让了。于是敬酒的和被敬的,都把酒而立,笑颜对峙,谁也不想撤退。

陶勇见我识破了他的谋略,便笑着端起杯子走过来,和我们一同干了杯中的酒。

这样一来,别的勇士也按兵不动了,他们害怕,即使把我打败,他们的司令又得倒了。

宴会上虽然没有人喝醉,但玩得很热闹,直到尽兴而散。

在回来的路上,肖华笑道:“表嫂今天这个办法真不错!”

“怎么办呢?他们的目的我一下就看出来了。”我说,“不喝吧,太不礼貌;喝吧,又寡不敌众,非醉不可。只好拽着他放下了。”

肖华对我说:“行呀,表嫂!”陈奇涵微笑着说:“没想到陶勇这位有勇有谋的将军,也没能把你打败。”

“有两位上将出兵相助,那还能吃败仗吗?”我笑道,“再说,任什么虎将、名将,也有个马失前蹄的时候呀!”

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吕正操高挂“免战牌”

在走进四川饭店之前,我们几位就嘻嘻哈哈地“密谋”了一番,如

何把这次聚会搞得更热闹些。

这是程子华为了和他未来的妻子张惠芬正式见面而举行的喜宴。我们这群“红娘”——胡明、佳楣、余叔、刘素菲(刘澜涛的夫人)、贾毓慈(陶鲁茄的夫人)和于文兰(柯庆施的夫人)——都应邀参加了。按一般规律预测,程子华请来的男宾一定会敬酒、逗闹的,而张惠芬则性格沉静,不善言谈,又不会喝酒,搞得不好,可能会冷场的。如果这样岂不是尴尬?

那时我们大都年轻好逗,喜动不喜静。于是一路之上,如此这般计议起来,到达饭店时,也商量得差不多了。进得休息室,一看程子华请的客人,只有两位: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和铁道部部长吕正操。

跟他们很熟悉的胡明和佳楣悄悄告诉我:吕部长能喝,要注意他。

一番闲谈之后,便开始就席了。酒过三巡,一阵客气,席间便慢慢升温,气氛也逐渐浓烈起来。

果然不出所料,一会,二位男士便向张惠芬敬酒,表示良好的祝愿。张惠芬只能“意思”一下。他们见她神情羞涩,也不好纠缠,便把火烧到我们头上。我们也正要派出援兵,以解友人之危,也就“引火上身”了。

几位夫人随之依计而行,于是唏里啦啦嘀嘀咕咕假意商量一下,然后说:“水静,我们决定派你做先行官,先去抵挡一阵!”

“不行不行!”我佯装说,“你们会喝的躲到后边,反而把我这个不会喝的推出来应战,这个‘官’我不当。”

“有我们这些大将在这里,你怕什么!还有主帅压阵哩!”余叔嚷道。

其他几位夫人也跟着“呐喊”起来。

“那我就勉为其难了。”我说,“不过,我要是倒下来,你们可得快上呀!”

于是我端起杯,和两位男士的杯子轻轻一碰,接着一饮而尽。

我正要坐,吕正操一把将我拦住:“慢着慢着!”他笑道,“先行官嘛,怎么一个回合就下阵呢?来,我们再喝一杯。”

“我怎么能喝过你呢?”我装作怯战的样子,接着又说,“反正我有强大的后盾,豁出去了。”

于是我们又对喝一杯。

吕正操活跃豪爽,热情风趣,又找出种种由头,和我继续喝下去,实际上是和我拼酒,想把我灌醉。这位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创造者、智勇双全的抗战名将,驰骋战场,胜仗无数。可是今天完全忽略了这直径不过一米挂零的圆形阵地,也没有把这群叽叽喳喳、看来毫无战斗力的对手放在眼里,因此一杯又一杯,把那喝干了的杯底,炮口似地对准我。

我不再伪装了,拿出先行官的派头,他一杯,我一杯,干脆利落。当然,我心里是作过盘算的。自从1961年在庐山和周总理一人喝完一斤茅台之后,我就了解自己的酒量了,这是“知己”。那么,吕正操的酒量如何呢?我没有和他喝过酒。胡明说他“能喝”,这是一个极含糊的概念,喝四两可以说是“能喝”,喝一斤也是“能喝”,实际上是个未知数。开始的时候,见他喝得挺猛,挺有气派;但几杯之后,我就看出,他的酒量不过尔尔,我能把他拼醉。

果然,一刻工夫,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已反守为攻,而他只有招架而已,没有还手之力了。

他要撤退了。夫人们焉肯干休!

“还早着呢。”她们七嘴八舌地嚷道,“我们的大将还没有出马,元帅还没有升帐,怎么就鸣金收兵呢?”

这位过去善于以地雷战制服对手的骁将,今日踩着一枚“液体地雷”,粘得不能脱身了。显然他知道夫人们在虚张声势,但是,一个“先行官”就如此难打,即使把我灌醉,他自己也怕是要天旋地转了;再有

康有为茅山庐墓

朱亮

茅山道院是著名的道教胜地,当地有句老话:茅山菩萨照远不照近。这一“照”,居然把南海康有为给照来了。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流亡海外十余年,武昌起义,清廷才对维新派人士悉予赦免,康有为回到国内,深感命运多舛,心情抑郁,便乞灵于祖坟的风水了。从1916年起,康有为对茅山发生了特殊的兴趣,几乎踏遍了周围的山陬水涯,想为母亲劳连枝卜得一块“牛眠吉地”。他专心致志地钻研堪舆之学,兼及道藏之书,经几年努力,初步发现几处风水宝地。如何优化选择呢?他采用很别致的筛选办法:在相中的穴位处,深挖下去,埋下小麦,隔很长一段时间,重新把小麦挖出来检查,看看腐烂了没有,如果腐烂了,那块地就不能入选。必须是小麦粒粒不腐,这才算是寻到了真正的龙脉,就这样,他选

定了句容县境内二茅峰山麓五里亭。说来也巧,这五里亭后,是朱元璋曾祖的陵园。朱元璋生前就为自己选定了陵寝,这就是南京的孝陵,孙权墓恰巧挡在前面,朱元璋说:“孙权也是一条好汉,就让他替我守大门吧!”而康有为替母亲选定的墓地又在朱家祖陵前的五里亭,岂不是替朱皇帝家看管五里亭了么?

1920的初夏,康有为把母亲的灵柩自广东南海运来,择吉告窆,以安窆窆。抬灵柩上坟时,沿山路铺上白米,使抬杠的人踏着米铺的小路稳步上山。灵柩后再让附近贫民扫米表分。墓穴的上下四壁都用大石块砌起来,并用糯米汁拌石灰灌浆嵌缝。棺槨是用四条粗铁链悬吊于穴中,六面不靠。墓上则用三合土封顶。外观呈圆形,坚固异常。康母安葬之日,本村的村民无论男女老少,凡到坟山磕头行礼的,一律

发给银圆两枚。邻村村民前来行礼的,则发银圆一枚。

康有为在茅山乾元观庐墓三年中,茶余饭后,常走村串户,出门时,总有一名家人携带文房四宝紧跟在后。每到一家,他口操广东官话,略事寒暄,然后展纸研墨,书写中堂、对联或屏条相赠。山区识字的人本来不多,红白喜事,常要跑几里路央请读书人挥毫。现在来了一位康老爷,既是进士,又是书法家,还是一位赫赫有名的维新派首领,居然肯枉驾瓮牖绳枢之家,奉送墨宝,这对山村农家来说,却是一桩难逢的幸事了。

康母墓是在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被挖的,挖墓人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挖开,墓内并无珍贵的葬品。当地的老农民对康有为的印象很深,反对这种掘祖坟的行为,但老农的意见在“群众运动”中会有什么作用呢!

一两个人,再来上两三杯,他必倒无疑。

“好吧,今天是喝子华的喜酒,就是出了洋相也不要紧。”在一片吵嚷声中,他终于作一次最后的拼搏。

几杯之后,他觉得受不了了,把酒含在口里,喝而不咽。

这如何能“蒙混过关”呢?这些夫人们虽然缺乏“战斗力”,却是经常出入“战场”的,此中种种谋略,她们都了如指掌。

“开口说话,开口说话!”她们喊着。

他假装吞咽的样子,就是不开口。因为一开口说话,露馅了。

都是些熟人,又是在这种喜事的酒桌上,闹起来就“没大没小”了。

我和胡明离开座位,跑到他的旁边,一左一右地拉开架势,要动手捏他的鼻子,强迫他把酒吞下。他又做了一个咽酒的动作,酒还是在口里。于是又上来两个人,捋袖磨掌,好不勇猛。

没有办法,他才一口咽了下去。

大家笑得前俯后仰,连不苟言笑的张惠芬也忍不住笑出声来。程子华见此,更是高兴不已。

“佩服,佩服!”吕正操也哈哈大笑道,“没想到今天败在女将手下。服了,服了。”说着,双手蒙住了酒

杯,高挂起了免战牌。

大家岂肯饶他?动口的动口,动手的动手,“火药味”里,满是欢笑声。

吕正操连连大叫:“诸位诸位,我投降,我投降!”他举起手来,一连笑道:“这总可以了吧?”

我们抚掌大笑,这才住手。

喜庆喜宴,喜气洋洋。今天算是对得起子华和张惠芬了。

事隔十多年,“文革”之后不久,我又碰到吕正操部长,他仍是那么风趣幽默,爱开玩笑。但一提起那次喝酒,他便诙谐地一笑,装着谈虎色变的样子。(责任编辑:刘家驹)

包玉刚在香港的股市大战

· 傅桃生



一九八五年，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宴请包玉刚及其家人，宾主握手交谈



国家领导人杨尚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李嘉诚先生

1977年，香港首富李嘉诚获取了一个绝密情报：香港最大的英资企业——怡和洋行，虽然是九龙仓股份有限公司的大股东，但他实际占有的股权还不到20%。九龙仓地处香港寸土寸金的尖沙咀，其地产一直由英商集团把持着，谁如果能大量购入九龙仓的股票，即使股票价格上涨5倍，也不会超过这块宝地的实际地价。李嘉诚认为，只要买下20%的九龙仓股票，不仅能与英商集团公开抗争，而且还能使这块宝地回归华人的怀抱。

1978年1月到9月，李嘉诚指

挥属下购得了九龙仓18%的股权，同时使九龙仓股票的价格也由原来的每股10港元上涨到了每股30港元。不久，李嘉诚很快就使自己拥有的九龙仓股权与怡和洋行的股权持平。他深知，如果与怡和洋行单独竞争，自己决不是英国人的对手。在这即将进入决战的关键时刻，李嘉诚想到了自己的同胞包玉刚先生。

1978年9月下旬的一天，在香港中环文华阁的一个高级客房里，地产商李嘉诚和世界船王包玉刚进行了一次短暂而又秘密的会晤。

“对不起，让您久等了！”包玉刚

操着上海口音说。

“没关系，我今天上午的其他事已安排好，我们多聊一会不碍事。”

李嘉诚起身与包玉刚握手，并叫服务员送来两杯咖啡。

两位边品咖啡边随便聊起来：

“这儿的午餐部有广西名菜芭蕉鱼，我还是在读中学时吃过一次，味道非常好，我已经订了菜，中午我们好好喝两杯。”

“好！”听李嘉诚叙旧，包玉刚也显得十分高兴：“一个朋友前不久从大陆带来两瓶特制茅台，据说这两瓶酒还是当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酒厂老板为庆贺他而特酿的一套酒中的两瓶，朋友说他是用一幅郑板桥的墨竹才换来的，改日您到我家去品尝品尝。”

“好，到时候一定登门拜访。包兄，咱们还是先谈谈正经事吧！”

“行，有什么事您尽管说，咱俩商量着办。”

“我这次约您来主要是为九龙仓的事。”李嘉诚开诚布公地说。

一听说九龙仓，船王立即显得兴奋而又不安。说兴奋，是他一直想把九龙仓收归自己，既有利于发展自己的船舶运输业，又能从英国人手中夺回华人的主权，遗憾的是李嘉诚手上还有九龙仓近20%的股权，总不能跟同胞相争嘛！说不安，是因为九龙仓掌握在英商集团手中，船王遇到过不少麻烦，由于没有自己的停泊码头，他的货船满载回港时经常没有仓位卸货，空船装货又经常遇到吊装机械忙不过来而挨罚。因此，听到李嘉诚说是为九龙仓的事与他见面，便迫不及待地说：“李兄，九龙仓怎么啦？”

于是,李嘉诚便把他如何收集到有关英商集团持有九龙仓股权的事,如何购买九龙仓的股票,计划与船王合作或请船王出面收回九龙仓,让那块宝地回到华人手中的事都告诉了包玉刚。

包玉刚先生听了李嘉诚的想法后,便慷慨地说:“为了华人的尊严,为了同胞的合作,如果李先生同意的话,我可以我手中的9000万股‘和记黄埔’股票,换您手上的2000万股九龙仓股票。”

“那可不行,包兄,我们之间没有必要占对方的便宜,您如果同意我的设想,用一部分‘和记黄埔’股票换这点九龙仓股票就行了,何必……”李嘉诚知道这样成交自己占的便宜太大,因而不好意思地说。

“我的话已经说在前面了,您老啊就别再推辞了!”没等李嘉诚把话说完,船王就怪嗔地说。

看到船王一片诚心,李嘉诚只得尊敬不如从命:“那好吧,我就厚着脸皮占包兄的便宜了。不过,今后只要您用得着我的地方,尤其是关于九龙仓的事,我定会帮忙。”

“一言为定!”

“决不反悔!”

只听“啪”的一声,两位香港巨富在发誓的同时,击掌成交。此后便是白兰地和芭蕉鱼陪着两位巨富共进午餐。

李嘉诚回府后自然高兴。对于九龙仓来说,他主要是想为国人争口气,从英商集团手中夺回这块宝地,至于九龙仓的码头与仓库,对船王有利,对他地产商就不一定有多大作用,何况九龙仓到了船王手里与掌握在自己手里没有两样,只要成为中国人所有就行了。再说,人家船王可够朋友,一口气答应给他9000万股“和记黄埔”股票,这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他能不高兴吗!

再说船王包玉刚对这次的买卖也比较满意,一方面,他自知自己的

财力不如李嘉诚,与其争斗,不如联手,多个朋友多份力量啊!另一方面,他朝思暮想的九龙仓不久将成为他的地盘,虽然已付出了9000万股“和记黄埔”股票的代价,虽然还要经过许多苦斗,尤其与英商集团的交战,但,为了中国人的骨气,为了自己的事业,他决定豁出去背水一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于是,船王立即召集他的高级职员开会,一方面秘密讨论收购九龙仓股票的措施,并把这一重任交给属下的环球集团;另一方面准备亲自出马拓宽业务,去欧洲作一次业务旅行。

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香港巨富李嘉诚与包玉刚秘密商谈收购九龙仓股票的事传到英商集团首领的耳朵里后,便掀起了一场中英之间的购股大战。英国人也决非等闲之辈,当他们了解到船王要收购九龙仓股票的信息后,于是大做广告,宣称以高出股票面值10倍的价格在港民中收购九龙仓股票。从此,一场争夺九龙仓股权的收购大战进入了冲刺阶段。

此时此刻,包玉刚已开始了他的欧洲之行。在法国巴黎,包玉刚拜会了一些新老客户,签订了许多新的货运合同。这一天晚上,他应邀去参加法国葡萄酒商联合会为他举行的晚宴。晚宴前,副会长弗朗西斯先生正和他闲聊散装葡萄酒的运输问题,一个服务员笑容可掬地朝船王走来:

“先生,您的电话,香港来的。”说完,服务员把船王带到接电话的地方。包玉刚拿起电话一听,知道是他的副总裁打来的:

“总裁,怡和洋行用面值100港元的证券,向香港市民换取九龙仓的股票,他们用的证券除了债券外,还有对市民最有诱惑力的置地股票。总裁,您看……”

包玉刚一惊:这些英国人真不愧是香港的地头王,100港元的证

券换取100港元的股票,这一招高啊!久经沙场的包玉刚稍微停顿一下后,脸上又露出了自信的神色:

“跟现钞相比,您认为100港元的诱惑力还大些?”

“那当然比不过现钞,可是……”

“你们先撑住点,我尽快办完这里的事,马上赶回去处理。”

包玉刚先生接完电话,神态自若地回到客厅,与主人和其他来宾们频频举杯,开怀畅饮,就象什么也没发生似的。

宴会结束后,包玉刚回到下榻的宾馆,向他的副手详细交代了对付英商集团的办法,并委托副手马上回港实施这一方案。

第二天,包玉刚先生和他的贴身保镖乘坐弗朗西斯的私人飞机,向法国西北的莱恩飞去,继续他的旅行计划。此时,他的副手按总裁的旨意,已经登机返回香港了。

自包玉刚飞离巴黎后,香港的英商集团首领判断船王自认失败了,以为胜利在握。这就注定:这场争夺九龙仓的购股大战,船王必胜。包玉刚离开巴黎后并没有飞往莱恩,而是掉转机头飞往勒阿弗尔,从那里又乘飞机去了英国伦敦。在伦敦,船王与汇丰银行董事长赛耶进行了反复磋商,共同探讨了环球集团与怡和洋行争夺九龙仓股票的事。

且说包玉刚的副手回到香港后,立即以董事长的名义召开高级职员会议,宣布将与怡和洋行背水一战的决定。按照船王的旨意,选出了几位在香港知名度较高的经理,分头去和在港的几家银行商谈贷款,并提出贷款利率可以比平时高出20%。与此同时,又委派一些高级职员和几家证券公司谈判发行债券,利率可以高出同期银行存款利息的50%至60%。船王的这一招显灵了。整个香港金融界就象油锅里掉进了滴水,“扑哧扑哧”炸开了。

“怡和洋行抬高自己的股票价格是个圈套，精明的包玉刚怎么轻易地上了他们的当呢？”

“怡和明明在挑战，人家船王能不应战吗！”

“老包这回输定了，他怎么敢跟英国老板斗呢？完了，这下他的家底子算全部赔进去了。”

……

一时间，弹丸之地的香港，街谈巷议几乎全是船王斗怡和洋行的事，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环球集团的几位经理四处奔走游说，这家银行出，那家证券公司进，几经周折，进展还算顺利，可就是合同总签不下来。您想，谁敢给一个即将全军覆没的集团贷款，哪个有这个胆量为他们发行债券。船王似乎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

再说怡和洋行的董事们自从作出用面值 100 港元的证券收购面值 10 港元的九龙仓股票的决定后，满以为稳操胜券，一个个得意忘形。当他们通过新闻媒介得知环球集团的经理们一个个被搅得疲惫不堪时，都得意地哈哈大笑：“这一次定叫你包大人尝尝我们怡和洋行的厉害……”

怡和洋行的董事们正得意的时候，却不断传来收购股票不理想的消息。原来，怡和洋行高价购进九龙仓股票的广告见报后，香港市民议论纷纷：

“英国佬在向船王挑战，我可不愿去支持英国人！”

“是啊！他们占了中国的土地，修了码头，还来耍弄中国人。如果包先生收购九龙仓股票，便宜一点我也愿意卖给他……”

也许正是这些原因，许多香港市民都把九龙仓股票攥在手里。

正当怡和洋行的董事们做着黄粱美梦时，船王结束了他的欧洲之行，顺利地返回了香港。他了解了战

斗的进展情况后，决定亲自指挥最后的“决战”。

这一天入夜，素有不夜城美称的香港依然那样迷人。华灯初上，月悬中天，怡和洋行的董事们正和以往一样，聚集在一起，看电视新闻，商谈明天的工作。突然，电视里传播出爆炸性的新闻：

“亲爱的观众，现在向您报告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明天，港九各证券公司和股票交易市场开盘后，环球集团将以每股 105 港元的现金，大量收购九龙仓股票，预计收购额可达 2000 万股，两日内收讫……”

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使怡和洋行的董事们几乎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一个个呆若木鸡。很快，董事会会议室里的几部电话机几乎同时叫个不停，各个联系点报来的信息一个样：这里的居民在奔走相告，明天把手上的所有九龙仓股票卖给环球集团……

“完了！”怡和洋行的董事们一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

两天之内就用 21 亿港元的现钞收购 2000 万股股标，在香港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奇迹。就经济实力，怡和洋行每股 110 港元能收购九龙仓的股票，可是要在两天内拿出 22 亿港元的现钞谈何容易。更何况环球集团已经把 21 亿港元的现钞握在手里，你上哪儿找现钞去？

当怡和洋行的董事们知道自己上当后，才尝到了船王的厉害。

原来，包玉刚唱了一场“空城计”。他以欧洲旅行为由离开港九后，用以麻痹怡和洋行的老板。趁怡和洋行的董事们做黄粱美梦的时候，环球集团已筹集到 21 亿港元的现钞。于是，包玉刚先生没等怡和洋行诸位老板的梦醒，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了他们重重的一棒，让他们连招架也来不及。

爆炸性新闻播出的第二天，香

港各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引人注目的新闻内容。紧接着，香港市民纷纷翻箱倒柜，查找九龙仓股票。

香港首富李嘉诚特别给包玉刚打来电话：

“包兄，恭喜恭喜呀！我开始看到怡和洋行的广告时，真替您捏了一把汗。我还没有想出良方帮您解围，您竟出人意料地采用了这一高招。妙啊！妙极了！”

“谢谢您的合作！对了，李兄，那两瓶墨竹换来的茅台我们还没喝呢？明晚到我家小酌，怎么样？”

“好，这杯喜酒我一定去喝！”

包玉刚先生原有九龙仓股票 1000 万股，后来从李嘉诚先生那里调换到 2000 万股，再加上这次从市民中高价购买到的 2000 万股，世界船王总共掌握了九龙仓 5000 万股的股权。股份公司的最大股东有权掌管公司的行政大权，因此，包玉刚先生自然而然地占据了九龙仓的最高领导位置。

九龙仓购股大战结束后，世界船王包玉刚先生决定鸣金收兵。有趣的是，怡和洋行的老板们自己觉得输得不光彩，但贵族的傲慢又不允许他们认输。于是，英国人故伎重演，把失败也说成是胜利。九龙码头的高级官员在欢迎包玉刚先生的大会上说：“包先生为提高怡和洋行的资产和信誉作了不懈的努力，我们表示由衷的欣慰，并表示热烈的欢迎！”

包玉刚先生轻蔑地瞟了他们一眼后说：“我也感到非常高兴，不过我高兴的原因与你们不同。我高兴的是，九龙码头又回到了中国人手中！九龙码头新的一页就要开始了！”

（责任编辑：仲文）

（傅桃生：湖北仙桃人，35 岁，《中国证券报》记者；著有《股市风流》、《股市黑幕》等作品。）

烟赋

烟 赋

· 汪曾祺

中国人抽烟,大概始于明朝,是从外国传入的。从前的中国书里称烟草为淡巴菰,是 TOBACCO 的译音。我年轻时,上海人还把雪茄叫做“吕宋”。吸烟成风,盖在清代。现存的几种菸草谱,都是清人的著作。纪晓岚就是“嗜食淡巴菰”的。我的高中国文教师史先生说,纪晓岚总纂四库全书时,叫人把书页平摊在一个长案上,他一边吸烟,一边校读,围着长案走一圈,一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出来了。这可能是传闻,但乾隆年间,抽烟的人已经很多是可以肯定的。

小说《异秉》里的张汉轩说,烟有五种:水、旱、鼻、雅、潮。雅(鸦片)不是烟草所制,潮州烟其实也是旱烟的一种,中国人以前抽的烟其实只有旱烟、水烟两大类。旱烟,南方多切成丝,北方则揉碎,都是撮在烟袋锅里抽的。北方人把烟叶都称为关东烟。关东烟里的上品是蛟河烟。这是贡品,据说西太后抽的即是蛟河烟。真正的蛟河烟只产在那么一两亩地里。我在吉林抽过真蛟河烟,名不虚传!其次“亚布力”也可以,这是从苏联引进的品种。河北省过去种“易县小叶”。旱烟袋,讲究白铜锅、乌木杆、翡翠嘴。烟袋有极长的。南方老太太用的烟袋,花银嘴就有五寸,乌木杆长至八尺,抽烟时得由别人点火。也有短的,可以插在靴掖里,称为“京八寸”。这种烟袋亦称“骚胡子”,说是公公抽烟,叫儿媳妇

点火,瞅着没人看见,可以乘机摸一下儿媳妇的手。潮州的烟袋是用竹根做的,在一头挖一窟窿,嵌一小铜胎,以装烟,不另安锅。1950年我在江西土改,那里的农民抽的就是这种烟,谓之“吃黄烟”。山西、内蒙人用羊腿骨做烟袋。抽这种烟得点一盏烟灯,因为一次只装很小的一撮烟,抽一口就把烟灰吹掉,叫做“一口香”,要不停地点火。云、贵、川抽叶子烟,烟叶剪成二寸许长,裹成小指粗细的烟枝,可以说是自制小雪茄,但多数是插在烟锅里抽,也可算是旱烟类。我在鄂温克族地区抽过达斡尔人用香蒿籽窖制的烟,一层烟叶,一层香蒿子,阴干,烟味极佳。是用纸卷了抽的。广东的“生切”,也是用纸卷了抽的。新疆的“莫合烟”,即苏联翻译小说里常常见到的“马霍烟”,也是用纸卷了抽的。莫合烟是用烟梗磨碎制成的,不用烟叶。抽水烟应该是最卫生的,烟从水里滤过,有害物质减少了。但抽水烟很麻烦,每天潮水烟袋就很费事。水烟袋要保持洁净,抽起来才香。我有个远房舅舅,到别人家作客,都由他车夫一次带了五枝水烟袋去,换着抽。此人真是会享福的人!水烟的烟丝

极细,叫做“皮丝”,出在甘肃的兰州和福建的福州。一在西北,一在东南,制法质量却极相似,奇怪!云南人抽水烟筒,那得会抽,否则吸不出烟来。若论过瘾,应当首推水烟筒。旱烟、水烟,吸时都要在口腔内打一回旋,烟筒的烟则是直灌入肺,毫无缓冲。

卷烟,或称纸烟,北京人叫做烟卷儿,上海一带人叫做香烟。也有少数地方叫做洋烟的。早年的东北评剧《雷雨》里四风夸赞周萍的唱词道:“穿西服,抽洋烟,梳的本是那个偏分”可以为证。大概在东北人眼中这些都是很时髦的。东北是“18岁的大姑娘叼着大烟袋”的地方,卷烟曾经是稀罕东西。现在卷烟已经通行全国。抽旱烟的还有,大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但也相对地减少了。抽水烟的就更少了,白铜镂花的水烟袋已经成为古玩,年轻人都不知道这玩意是干什么用的了。说卷烟是洋烟,是有道理的,因为本是从外国主要是英国输入的。上海一带流行的上等烟茄立克、白炮台、555……销行最广的中等烟红锡包(北方叫小粉包)、老刀牌(北方叫强盗牌)都是英国货。世界上的卷烟原分两大系。一类是海洋型,英国烟为其代表。英国烟的烟丝很细,有些烟如白炮台的烟盒上标明是 NAVYCUT,大概和海军有点关系。一类是大陆型,典型的代表是埃及烟、法国烟、苏联的白海牌(东北人叫它“大白杆”)、以

《炎黄春秋》1993 年第 2 期 要 目

共产国际眼中的毛泽东

陈云江西蒙尘记

中国广告黑洞

与刘晓庆的 12 年交往

“文化大革命”中的外交部“夺权”

《我的前半生》一书是怎么问世的

1954: 班禅达赖进京内情写真

袁崇焕冤案始末

5000 年前的“神秘王国”

中国首例特大泄毒案

及阿尔巴尼亚等烟属之。抽大陆型烟的人数不多。现在卷烟分为两大派系,一类是烤烟型,即英国烟型;一类是混合型,是一半海洋型、一半大陆型烟丝的混合,美国烟大都是混合型。英国型的烟烟丝金黄,比较柔和,有烟草的自然的酸香,比较为中国人所喜欢。

后来外商和华侨在中国设厂制烟,比较重要的是英美烟草有限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大前门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所出,美丽牌好像就是英美烟草公司出的。也有较小的厂出烟,大联珠、紫金山……大概是本国的烟厂所出。

我到昆明后抽过很多种杂牌烟。有一种叫仙岛牌,不记得是什么地方出的,烟味极好,是英国烤烟型,价钱也不贵。后来就再不见了,可能是因为日本兵占领了越南,滇越铁路中断,没有来源了。有一种叫“白姑娘”,硬盒扁枝,烟味很冲。有一种从湖南来的烟,抽起来有牙粉味。最便宜的烟是鹦鹉牌,十支装,呛得不得了,不知是什么树叶或草做的,肯定不是烟叶!

陈纳德的飞虎队和美国空军到昆明后,昆明市面上到处是美国烟,多是从美国军用物资仓库中流出的。骆驼牌、老金、LUCKY STRIKE、CHESTERFIELD、PHILIP MORRIS

……一时抽美国烟的人很多,因为并不太贵。

云南烟业的兴起盖在 40 年代初。本省的农业专家和实业家经过研究,认为云南土壤、气候适于种烟,于是引进美国弗吉尼亚的大金叶,试种成功。随即建厂生产卷烟。所出的牌子有两种:重九和七七。重九当时算是高档烟,这个牌子沿用至今。七七是中档烟,后来不生产了。

50 年代后,云南制烟业得到很大发展,云南烟的质量得到全国公认,把许多省市的卷烟都甩到了后面去了。云南卷烟有三大名牌:云烟、红山茶、红塔山。最近几年,红塔山的声誉日隆,俨然夺得云南名烟的首席。说是已经是国产烟的第一,也不为过分。我于“红塔山”得一字,曰:“醇”。

为什么红塔山能够力挫群雄,扶摇直上?首先,红塔山有质量上好的烟叶。

当年生产的烟叶,不能当年就用,得存放一个时期,这样杂质异味才会挥发掉。据闻英国的名牌烟的烟叶都要存放三年。二次世界大战,存烟用尽,质量也不如以前了。玉溪烟厂的烟叶都要存放二年至二年半。就像中药店配制丸散一样:“修含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这个

“天”就是抽烟的人。烟叶存放了多久,抽烟的人是看不到的,但是抽得出来。他们不知其所以然但知其然,能分辨出烟的好坏。

对烟的评价是最具群众性的,最公平的。卷烟不能像酒一样搞评比。我们国家是不允许卷烟作广告的。现在既不能像过去的美丽牌在申报和新闻报上作整幅的广告:“有美皆备,无丽弗臻”,也不能像克莱文·A 一样借重梅兰芳的声誉,宣传这种烟对嗓音无害。卷烟的声誉,全靠质量,靠“烟民”的口碑。北京人有言:“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点手就来”,这是假不得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红塔山之赢得声誉,岂虚然哉!

玉溪卷烟厂去年给国家创利税 34 亿,这是个吓人一跳的数字。

我 18 岁开始抽烟,1991 年 71 岁,抽了 50 多年,从来没有戒过,可谓老烟民矣。吸烟是有害的。有人甚至说吸一枝烟,少活 5 分钟,不去管它了!写了一首五言诗:

玉溪好风日,兹土偏宜烟。

宁减十年寿,不忘红塔山。

诗是打油诗,话却是真话,在家人也不打诳语。

(节选自即将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十五日夜走滇境》一书。)



古籍专家杨伯骏二三事

楚泽涵

壬申五月，一生手不释卷的古籍专家杨伯骏先生，终于释卷而去。

他是我妈妈彭淑端的表弟，我一直称他为舅舅。在他的去世讣告上，除了列有中共党员、中华书局编审、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及几个大学的中文系、历史系教授、副教授等头衔外，还冠以“著名学者”称号。其实，他的名字是少为人知的，用时髦语言来说，即知名度有限。但是，一个人的知名度与他的成就贡献和品德修养未必都成正比，许多真正的专家贤者，恰恰少为人知。为此，我也须贤不避亲，提笔写写我的杨伯骏舅舅。

1957年，我在101中学毕业前夕，妈妈带着我去看望当时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的舅舅。舅舅听说我志于理工科，就劝我考北大的物理系，并说北大物理系的师资及设备都是一流的。我听从舅舅的劝告，第一志愿报考北大物理系。可惜我学习的功力不够，未被北大录取，而考进了当时的北京石油学院地球物理专业（我对此至今不悔）。此后，在当年那场“阳谋”中，舅舅受到不公正对待，被划为右派，并从北大调往兰州，直到60年代初，才从兰州调回北京的中华书局，便不再教学生，专门从事古籍整理。

一直到“文革”后期，我在任教的石油学院无所事事，而且当时军宣队加给我的若干罪名并未撤销，我爸爸楚图南当时又正“靠边站”，被无休止的“审查”。舅舅是《论语》、《孟子》等一批“宣扬孔孟之道”的大毒草的译述者，其处境当然可想而知。当时我的二姨彭慧及二姨父穆木天都因“浩劫”而病逝于北京师范大学。我家在北京的亲戚，就剩下舅舅这一家。出于亲戚间的关

心，在这期间，我曾陪同妈妈去看望舅舅。

舅舅当时住在朝阳门内小牌坊胡同的一户大杂院里，居室四壁被书橱、书籍塞满，空间不多。我每次去看望舅舅，他几乎无例外都在俯案阅读，书写。他曾多次对我说过：“读书人不管刮风下雨，书总要读，学问总要做，要不然社会怎么进步！”说完，他总是憨厚的一笑，在深度近视眼镜后面的眼睛流露出一种坦然、执着的神情。

“批林批孔批大儒”期间，我曾问过他，现在几位在学界很有影响的人也在批孔，并对过去的学术观点进行反省，对此他是否感到有些压力。舅舅十分坦然地对我说，孔孟之道、儒家思想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些思想能存在，自然有它的根据和基础，但是也有不合时宜的地方，国内外历来对此都有不同的看法，完全可以批评讨论，对一些学人在此时提出的批孔的观点，他不想评论，以免有失忠厚。但是，当适合某种政治需要，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或利用某种合适的政治气候，宣扬一家之言，他是不以为然的。对于以“洪广思”“罗思鼎”为笔名的一批政治打手的文章，他则表示一种轻蔑。他说，批“读书做官论”的根据，是《论语》中有一句“学而优则仕”。其实这句话的全文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优”字是余力、有余的意思，应理解为“做官了，有余力便去学习，学习了，有余力便去做官”。他认为断章取义，望文附义的做法是不足以服人的。舅舅的这些想法，我都告诉了我的父母，他们深以为然。并告诫我，老一辈的学者，功力深厚，看人看事都有一种历史的高度，这是要我们这一辈人去体察领会和学习的。

1975年秋季以后，周总理病重。当时的形势和人

们的心情可用诗经上的两句话：“国事蜩螗，如沸如羹”来概括。一次我去看望他，彼此都倾诉了忧虑的心情。他问起我对今后发展的预测，我说，可用一句宋词来概括：“风不定，人初静”，他马上接口说，下句当然是：“明日落红应满径”了，他寓意深长地对我说，回去告诉你爸爸妈妈，大家多保重，一定要看到“明日落红应满径”的一天！

“文革”浩劫结束后，他先是潜心于《春秋》、《左传》的注释、校译。以后又扩大了研究著述的范围，其中还参与了他叔父、语言学家杨树达先生文集的编辑工作。在此期间，他陆续对我说过他的一些经历，对一些人和事的看法。我记得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他曾对我说过他所知的陈独秀的一些故事。1938年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陈独秀从监狱中放出不久，住在武汉一处沿街铺面的楼上，生活清苦，当时蒋介石想利用陈独秀，派当时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去看他，表示“蒋先生”很想听听陈仲甫先生对国是看法，国难当头之日，也想有所借重。陈当时抖抖布长衫的下摆，对钱说：“身为布衣，耻为肉食者谋。”而且还说，蒋杀了他（指陈）的许多同志，杀了他两个儿子，“国恨家仇，不共戴天”，表示今生今世，誓不与蒋对话。

舅舅对我说，这些事是在抗战期间武汉失守前去看望陈独秀时，亲口听陈说的。舅舅认为陈独秀虽然做过一些错事，但在党的初期有过贡献，后期也没有为蒋介石利用，还是应该正确评价的。当时，“四人帮”刚被打倒，但对一些人和事的评价，都还有禁区及忌讳。在这种环境下，舅舅评价人物的高度及对事实的尊重，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舅舅还对我说过，抗战前期，他曾在冯玉祥处应聘为“国文教员”，陪冯玉祥、李德全夫妇在泰山居住，读书。当时一位姓刘的曾为共产国际工作的人也在泰山居住，蒋介石获悉即下令缉拿此人。冯玉祥知情后，派人送这位刘先生出境，使其脱险。舅舅认为像冯玉祥这样的旧军人，懂得替国家爱惜人才，保护知识分子，甚至宁肯自己冒风险，是有眼光的。在后来他和我的谈话中，也提到过解放以来知识分子的状况，他认为解放初期，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爱国向上的。但过几年搞一次运动，伤害了一些知识分子，情形就多少有些变化。他说，他欣赏东林党人的名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认为这些话应理解为知识分子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感。他真诚的希望能做到“野无遗贤”，让知识分子都能为国家尽责尽力。

进入80年代以后，舅舅搬到团结湖居住，工作及生活条件有了改善。著述活动十分活跃。虽然视力、听力都明显衰退，但有赖于舅妈徐提在生活起居方面的

精心照料，舅舅在晚年才可能有较丰硕的学术成果。

舅舅晚年曾向我说过他早年求学的一些往事。他早年曾由杨树达先生推荐，向当时的著名学者黄侃先生（字季刚）求学。他说，黄季刚先生学问极好，知识丰富、博闻强记，才思敏捷。讲授“经学”时虽指定参考书，但授课时，着重讲自己对典籍及注释的理解、心得和体会，而且触类旁通，侃侃而谈，十分生动。舅舅又说，可惜黄季刚先生在生活上不大注意，一是任性使气，酒又喝得太多，刚过50岁就早逝了，没有为后人留下著述，真是可惜。从舅舅的谈话中，我体会到他对过去的学者的长处、特点是能认真总结，而对他们的短处，也是能理解并引以为鉴的。

1989年岁末，我曾去看望他，当时他和我接触到的众多前辈及同辈学人一样，心情上都有相当沉郁的感觉。他当时由于年事渐高，听力、视力及一般的身体状况都相当衰弱，因此不再做研究著述工作了。一个一辈子以读书、著述为业、为乐的学者，一旦不能看书、写作，其心情的沉重是可想而知的。从他和我的谈话中，我察觉到他的学术思维仍很活跃。他说，他现在读书、写作都很吃力，但想做的事还有不少。例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和黄宗羲，这两位学术上有造诣、在操守上也很有后人推崇的学者，他认为二人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在做学问的功力，在讲究节操乃至有违封建礼教某些传统上。他对顾炎武更为崇敬。他说，他早年就对此有兴趣，也搜集了不少资料，现在想写这方面的著述。和一些大部头的作品相比，他对这种题目更倾注了感情。现在虽有时间，但精力不行了，而且能理解这些的人不多。从他的谈话里，我体会到他对学业永无止境的追求及眷恋。可惜，这是舅舅和我的最后一次长谈。这以后我虽陪同爸爸在年节时互有走访，但考虑到他的身体精力，没能更多深谈。

舅舅于1992年5月13日辞世，我对他的怀念是深沉的。舅舅虽比我年长30岁，但视我为忘年之交。回想起来，舅舅曾委婉地批评我“书不要看得太杂”，后来我爸爸把这句话引伸为，读书要“博而约”，而不要“博而杂”。这些都是值得我深思的。由于阅历、知识结构和从事专业的差异，我不可能对杨伯峻舅舅一生的学术造诣及成就做出全面评价，我对他的理解也可能是片断而支离的。但是他作为一个学者，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在从事学术著述中，涉猎广博，考证周详，态度严谨，在与后辈人谈话中平等谦和，热情忠厚，这些都是值得深刻怀念和学习的。我在大学的一位老师曾教导我：“先辈的优良品德，是留给后辈的最珍贵财富！”我谨以这种心情记下杨伯峻舅舅对我的教诲和启示，并以此作为对他的深沉的怀念。

（责任编辑：卢弘）

我和张艺谋

肖华



小学毕业后，我从北京转学到西安。

我相貌平平，又不大爱讲话，一开始总以为班上没人注意我。过了一段时间，慢慢地和我说话的人多了起来，大概是我把北京学生的“开通”风气给带来了，使他们感到新鲜、愉快，一扫当时班上男女生界限分明的别扭劲儿。班上分组时，同学们选我当小组长。不久期中考试，我的考分排在前五名内。于是，老师和同学们对我越来越有好感了。

一次老师找了我们几个同学，布置办个专栏，采用连环画的形式，分配每人画两幅画。当专栏贴出来时，我画的那两幅明显地超过了其他同学。也就是从这时起，张艺谋注意到了我，他也是参与办专栏几个同学中的一个。在这以前他一直是班里同学公认为画画最好的人。

几乎就在同时，我也注意到了张艺谋。

张艺谋原来在学校的时候叫张诒谋，艺谋是他爱上摄影并决心投身这门艺术事业之后改的。“诒谋”是他爷爷给起的，“诒”字有“赠送”

和“遗留”的意思，很明显，爷爷希望把张家的智慧和长处都传给这个孙子。他爷爷是很有卓识的，认为智慧就是财富，给后代留下智慧，那么一切就都有了。

张艺谋和班上的其他同学有很明显的不同。他少年老成，不苟言笑，说话、走路、一举一动都显得那么有条不紊。完全不像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他是班上的学习尖子，而且不偏科，各门功课都很好。同学们私下里都称他是老师的得意门生。当时，班里的同学包括学习比较好的同学，都怕英语课上被老师提问。因提问不会就得站着。这样，经常是被叫起来一大片，最后叫到张艺谋回答时，老师才会转怒为喜，站着的同学也才能坐下。我也有几次遇到了这种尴尬的场面，感到挺窝火，好像只有他，我们才能得以赦免。我觉得自己在他面前丢尽了脸，一连几天心里都不舒服。

这种理智上的不舒服刺激我更加注意他的一言一行。他个子高坐在后排，尽管我不会去看他，但凭感觉我就能知道他在不在座位上，来了没来。那时学校里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班里编成几个学“毛选”小



组,老师宣布各小组名单时,没有把我和张艺谋编到一个组,我心里感到说不出的失望和遗憾。但在学习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他竟然来到我们这个组,当时我真是喜出望外,真想问问他是怎样换过来的。记得有一次“毛选”小组学习,组长让我担任记录。由于张艺谋坐在旁边,我心慌得冬冬直跳,很多很熟悉的字都忘了怎么写,字也越写越乱,到后来简直跟不上趟,记不下去了。我气恼地把本子递给组长,说:“我记不了,让别人记吧。”组长疑惑地看着我,不知怎么回事。张艺谋轻声地对我说:“不要知难而退嘛。”虽然他没有恶意,是想鼓励我,但我觉得他看出了我心中的慌乱。

我真正看清张艺谋的模样是在一次大扫除中。我坐在窗台上擦玻璃,为了擦得干净,我不停地变换着窗扇的角度。突然在某一个角度上,玻璃中映出了张艺谋的脸。原来他正站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和一个同学说话。他时而还向这边张望。从他脸上的神色看,他一点儿也没有发现我在偷看他。我很惬意,就放心大胆地、毫无反顾地、仔细地琢磨着玻璃中他的脸。他在我们班里算不上最帅的,但吸引力却最大,当然这只是对我来说。我把玻璃擦来擦去,直到自己都觉得再不能老擦下去的时候,才恋恋不舍地从窗台上跳下来。

他对我的好感也很明显。有一次下午放学后,班干部留下开会,散会时天已经快黑了,大家都急急忙忙地往外走。我刚背上书包,他就叫住了我,说要把在课堂上没收的一个捣乱学生的东西交给我。我心里很清楚,他完全用不着交给我,应直接交给老师。看见他慢慢伸过来的手。我不得由也把手伸了过去。当他把东西放在我手里的同时,他的手轻轻地触到了我的手,我浑身抖了一下,急忙抽回手,低下头,匆匆地走了。一路上我的心无法平静,我一会儿庆幸这傍晚的昏暗帮我掩盖了

窘困的神情,没在他面前失态;一会儿又怨恨这昏暗遮挡了我的视线,没能看到他的表情。后来当我回忆起这件事时,他说:“我当时感到你的手又光又凉。”

我们俩越来越想自然地经常见面,为此张艺谋还做过一次不大不小的手脚。当时我是班上的中等个子,坐在第四排。班上的座位一共是八排,张艺谋个子较高,坐在第七排。有一天上自习课时,班主任突然宣布调整几个同学的位子,把张艺谋调到第五排,刚好是在我的位子后面。如果再往前他就和我同桌了。坐在原来那个位子上的女同学很不满意,要我和她一块去找老师反映。我也觉得这事有点奇怪,就和她一块去了。班主任说,张艺谋的家长来学校反映说他的视力不行,坐后边看不见,并开导那位女同学要互相帮助。直到我和张艺谋一块插队时,他才告诉我,这次调位子是他一手策划的,他想和我坐在一起。他向他妈妈说他眼睛坏了,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看不清。他妈妈是医生,立刻拉他去医院检查。检验视力时他使劲说看不清并故意指错方向,妈妈相信了。从那时起,我就感觉到背后有一盆炭火在烤着我。

中学时代,大家虽然年龄小,但对这种事情还是相当的敏感,我和张艺谋之间的这种朦胧的秘密还是被同学们觉察到了。一次我到学校很早,走到教室门口听见里面有几个女同学在议论:“肖华长得一般,张艺谋还老看她!”我抽身就退了出来,心里非常委屈。平时对我有好感的男同学也慢慢地一反常态,处处和我过不去。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几天工夫,学校里就到处贴满了大字报。班上有几个男同学也在我的课桌上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苗圃劳动不去”,下联是“临潼爬山第一”,横批是“真是笑话(肖华)”。说的也倒是事实。当时我们班每月都要去大雁塔苗圃劳动一次,有两

次我因病没有去。春游爬骊山我是女同学中第一个登上烽火台的。然而,看到这副对联,我还是极为伤心,接受不了。有一个坐在后排的男同学,写大字报时好几次故意把墨汁朝着我乱甩,弄脏了我的几件衣服。我明知道他是故意的,可没有办法。有一天他又在乱甩,张艺谋抓住了他的手,劝他不要这样,他才悻悻作罢。为这我很感激张艺谋,我从他那里第一次体会到了被人保护的安全感。

二

1966年10月,全国性的大串联已形成高潮。我和班上的8个女同学一块,开始了串联。

串联回到西安,已是11月2日,那天突然接到一封信,抬头是:“肖华同学,你好……”,紧接着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定语言“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之类的话。我迅速寻找信末的署名。上面赫然写着:“同学张诒谋”。我的心一震,他的形象从极遥远的地方迅速扑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具体。学校的生活画面在一瞬间又展现在我的脑海里……。这是我第一次收到张艺谋的信。

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当前社会上和学校里都动员我们上山下乡,大家都不了解情况,不知道上面的政策是什么?是必须全部下,还是部分下,我们到处打听情况也没有结果。听说你父母在有关部门工作,所以托你了解一下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好做准备。……不管打听到与否,都请给我回信。

看完信,我的心更加混乱了,除了为自己的命运着急外,同时也为他的前途担起忧来。他给我写信,让我去了解情况,使我明显地感觉到他需要我的帮助。

第二天父母一去上班,我立刻给他回了信。

张艺谋的信很快来了。这次省

去了那套“祝……祝……”的格式，开门见山，非常简洁地追述我们在学校的同窗友情：“在明亮的教室里，我们曾一起听课，一起作习题，一起制作计算尺；在课余时间，一起办壁报，打篮球……”一些平平常常的事，经他这么一提，一描述，我的感情一下子掀起了波澜，我感激他一直记着我。我何尝不是这样呢？！

我还没给他写回信，他的第三封信就又飞到了我的手中。信中说，我们学校第一批上山下乡的报名人数已满；第二批马上就要开始报名。去哪里，有什么打算，信中约我到他家去谈。

第二天我就按照他在信中所写的地址去找他了。我举手敲门，手还没触到门上，门竟然开了。

他还是学校时的那个样子，只是略比以前清瘦了些。我问他：“我还没敲门，你怎么就来开门了？”他笑笑说：“你的车子一到我就听见了，而且从窗户里看到了你。”我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原来他在屋里已经偷看我半天了。我突然想起了学校的那次大扫除，我从玻璃的反射里偷看他的事，我暗暗地笑了，这也算一报还一报吧。

这天我们谈得很高兴。海阔天空，他没说过几句关于上山下乡的话，我也没有介意，似乎上山下乡与我们无关。

他家住房很小，是他母亲单位的一间休息室改用的，大约只有七八平方米的样子。一横一竖放着两张单人床，还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门后摆着两个箱子，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了。

从那次起，我每隔三、五日就去他家一趟，听他讲从学校和社会上打听到的各种各样消息，讲得最多的当然是我们最关心的上山下乡的事。从此，我们不再用信联系，这次见面就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

有一次我去他家，张艺谋告诉

我，当天晚上他要和几个男同学到我们学校第一批去宝鸡插队的地方看看。由于没有钱，准备扒车去。尽管在串联的时候我自己也曾扒过火车，但对他的这次冒险行动却十分担心，总害怕会发生什么不测。我把这个担心讲给他听，他半天没说话，只是呆呆地看着我。这时已到了黄昏时候，我们都坐着不动，谁也没去开电灯，似乎在等待着一种东西。我心慌得冬冬的直跳，既担心他的伙伴们来碰上我，可我不愿意离开。他的心情似乎和我差不多，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好一会儿，他伸过来一只手触到了我的脸上，那凉凉的感觉，使我浑身震颤，我直想流泪，我多么希望他把手彻底伸过来，给我一点温存和安慰。可是他没有，那只手又抽了回去，还掩饰地把我的头发向耳后捋了捋，然后就插进了衣袋里，站起来在屋子里踱起步来。看他这样，我便站起身来同他道别。不知为什么我产生了一股无名的怨气，我也说不清楚，这怨气究竟来自哪里，是怨他动手动脚呢？还是怨他没有更亲昵的举动，也许就在这二者之间，总之说不清楚……

那时候，这间小屋成了我最向往的地方。小屋里留下了我们多少的欢乐，又酝酿着我们多少美好的希望啊！

我终于答应和他一起下乡。然而，我又犹豫。我为什么就这么匆匆地答应和他一起下乡呢？张艺谋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很好，我明显地感觉到他也非常喜欢我，可这次下乡，说不定就要一辈子呆在那里。农村的生活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在那个远离亲人的地方，他会永远照顾我吗？他能永不背叛我吗？如果不是这样，我可怎么办呢？第二天我去他家，潦潦草草地谈了几句话，就塞给他一封信：“这是给你的信，我近来的一些想法都写在上面，希望你认真看看。”他当时就要看，我说：“等我走了你再看。”出了门我骑上车子

逃也似地走了，一路上我的心特别慌乱。第三天我接到了他的回信。他对这件事做出反应的强烈程度是我始料不及的。

他在信中写到，说他读完信就像当头挨了一棒，不知身边发生了什么，心里冷极了……大约五年级时，他爸爸晚上来到妈妈和他住的那间小屋，在他们以为他睡熟之后，爸爸不安地讲着，妈妈低声哭泣着，……他难过极了，父母真的要分开，那自己将怎么办？小学要毕业了，学校让填表格。“家庭出身”这一栏他不知道如何填。当他妈妈写上“国民党少校军需”后，不无痛苦地对他说：“孩子你要好好学习，你和其他同学不一样，全靠你自己努力了。”从此，他深深地知道了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他刻苦学习，从不敢惹事。在学校里，他的学习是拔尖的，但他在政治上是凄惨的，他不敢写入团申请书，不敢提父亲，他把痛苦埋在心底，等待着能和别人一样平等生活和学习的日子。现在要上山下乡了，终于有了这么一个平等的机会，而我却又给了他一击。他说：“我心中的痛苦是无法用笔表达的！这一切的一切我是多么希望能得到你的理解和友情！……我有能力，我坚信我将来会有所作为的！无论何时何地，如果有一天我能出类拔萃，能出人头地，我衷心地希望你能与我共同分享这成功的喜悦。……”

尽管信不算长，看完信我已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了。我被他那种倔犟的性格，那种在逆境中奋斗不止，那种不屈的自信心和对我真挚的情感深深地、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在为他疼痛，我觉得再不能让这颗受伤的心痛苦了，我要去找他，我要立刻走到他的身边。我感觉到自己一下子长大了许多，成熟了许多。我突然醒悟到我们俩从开始交往那一起，就不是一般少男少女的游戏，而是两颗心的碰撞。我不顾一切地向他家跑去。

1968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生日。这天,我们这一批知识青年,在锣鼓声和家长的嘱咐声中,踏上了上山下乡的征程。我们坐上汽车,以红旗、锣鼓开道,在市区周游了一圈,然后离开了西安。任何一个人在生活道路上出现巨大转折时,事先预料和事后回忆都是惊心动魄的,唯有在事情正在进行之时是平静的。我既没有欢乐,也没有苦恼,坐在汽车上,心里的感觉就像往常乘坐公共汽车一样,一味看着街道上的人们,似乎并不知发生了什么。

刚到农村的时候,我有意同张艺谋拉开了点距离,为的是不在农村这个新环境里造成什么坏的影响,也不使和我们同来的刘全、李广平他们不自在。但不知不觉中这种距离慢慢地没有了。当两个人之间产生了爱之后,你越想拉开距离,距离反倒会越小。

一次他拿着两本书进来,我要过来,一跃坐在炕沿上随手翻看,好一会儿没有说话。他也一声不吭地坐在炕沿上,他坐得离我很近,慢慢地他把手搭在了我肩上。我的心猛然跳得飞快,我能明显地感到他身土散发出来的热气。我转过脸来看他,他也在看我。突然他在我脸上亲了一口,我顿时羞得抬不起头来,脸上热极了。我们不约而同地从炕沿上跳下来,面对面站了许久。后来他走近我,把手按在我的肩头,我不由得把脸埋在他的怀里。我能感觉到他的心和我的心一样冬冬地跳。好长好长时间,我们谁也没有说话。那天晚上我的脸烧了一夜。后来张艺谋称这次经历掀开了我们爱情史崭新的一页。

张艺谋对他家的情况讳莫如深,很少提起。他们家里人说起这些也总是闪闪烁烁。也许是因为他们为这个家庭背景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局外人很难理解这一点。我和张

艺谋一起十几年,只有很少几次谈到这个问题,并且谈得特别简单。

他家原是陕西临潼,家境原来还不错。他父亲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差,解放后定为反革命。那些年,政治运动接二连三,没有一次他能幸免。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父亲的心情特别灰败,性格越来越沉闷。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已被下放到陕南的平利县。他和人说话时脸上表情木然,一字一顿,只感觉他逻辑性很强,性格很硬。

他奶奶是个随和的人,勤劳而又热情。尽管一生经历了很大的磨难,但却惊人地豁达。我见到她时,她已经80多岁了,还操持着家中的全部家务,做饭、买东西,一会儿也不肯闲着。她老人家很喜欢我,每次去她家,她都变着法儿给我做好吃的。把藏在柜子里的水晶饼、酥饼、果子拿出来给我吃。有时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就拄着拐棍到街上去买。那颤巍巍的步态真使人担心她会突然跌倒,那真挚的笑容使我不由得鼻子发酸。

我每次去都主动帮她干活,和她说这说那。看得出她老人家也很孤独,特别愿意有人和她说说知心的话。她给我详细谈过张艺谋的大伯、二伯的情况。

张艺谋的大伯,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九期学员,1948年去台湾前是个军参谋长,去台湾时还带走了家眷。张艺谋的二伯是黄埔军校汉中分校十五期的学员。毕业后,国民党已经日暮途穷,没有给他分配工作,在家闲呆着。他性格外露,时时发牢骚,说:“老蒋不用咱,我去找老毛!”结果因言而丧命。

他父亲下放到陕南平利县后,全家几口人的生活,全靠他母亲的几十元工资支撑,生活苦不堪言。1975年张艺谋去平利县探望他父亲,临回来时,父亲将几年积攒的一百多元钱和一百多斤粮票交给他,让他带回家,补贴家用。谁知就因这

点钱财差点让张艺谋走上绝路。

平利到西安,长途汽车一天不能到达,途中要在一个小镇上过夜,全车人都下来住旅馆。张艺谋发现钱和粮票都不见了。

这还了得,这可是父亲几年节省下来的血汗钱呀!张艺谋一下子就蒙了,他报告了旅馆的负责人和派出所,可是人已经走了,无从查起,最后把案子转到西安。张艺谋绝望了,一个人在山上转悠,几次走到山崖边,觉得自己家里的政治条件、经济条件是这个样子,自己又无什么前程可言,不如一死了之。这时,他眼前仿佛看到我焦急的脸色和身影,觉得自己这样死了,说不清,道不明,又有谁知道他此刻的心情呢?他要活成个人的样子,不能这样平白无故地死,才罢了这个念头。

这件事对他的影响很大,使他在以后的生活上变得更加精细,更加有条不紊,也更加奋发力。

四

我们俩进了工厂。我进的是408厂,张艺谋进的是国棉八厂。我们双双当了工人,改换了生活环境。

不久,我把我和张艺谋的关系正式告诉了我的爸爸妈妈,并把张家的家庭背景也作了介绍。两位老人当时没说什么,可是好多天都愁眉不展。终于有一天,家中只有我和爸爸时,他郑重地与我谈起了这件事,说:“按理说你和张艺谋的事,我和你妈不应该干涉,但天下哪个父母不疼儿女?张家出身这么不好,会不会影响你的前途?我们怕你跟着受委屈!文化革命,因出身不好,受迫害致残、致死的人太多了!咱们也不想高攀,只求你找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家,能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就行了。”爸爸说这些话时,很动感情,眼圈都红了。我心里也很难受,觉得自己不应该给父母带来这些烦恼。可我又不能接受他们的意见,我心里有许多话想说,我为张艺谋不平,

我为张艺谋痛苦,我流着眼泪说:“张艺谋是无辜的,我不能离开他!”

那天,当我把家里的这件事和我的态度告诉张艺谋时,他低下了头,没有看我,只是喃喃地说:“你母亲是对的,对的。”

那时,张艺谋的感情是非常真挚和细腻的。记得1972年11月份的一天,张艺谋骑车来看我。他从他的背包里拿出一本大影集递给我。说:“这是送给你的生日礼物。”“生日,……噢,”我才想起来,再过两天就是我的生日了。我打开影集,发现影集第一页的右下角“品”字形粘帖着三枚精美的邮票。每张邮票上都有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猫,很逗人喜爱。只有邮票上的面值很让人奇怪,上面那枚是21分,下面第一枚是11分,第二枚是14分。当时一般邮票都是8分、10分、20分、50分等等,哪儿来的这种面值的邮票呢?我疑惑地抬起头来看着张艺谋。他看出了我的不解(也许他早就预料到了,还可能他当初设计时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他笑笑对我说:“21是你过了这个生日就21岁了,11和14是你生日的月日。”原来这几张邮票都是为我画的。我一下子搂住了他的脖子,心中被他这种痴情激起了股股的热浪。拿起影集越往后翻越使我激动,整个影集全都是我的照片,从小到大,各个时期的。每张照片下都用六七厘米长,一厘米宽,规格统一,色彩各异的彩条纸标着时间和地点。我想起来了,刚进厂不久,一次他要去了我的全部照片,说他代我保存。原来他是“蓄谋已久”做这件事的!

张艺谋袒露的这一番至爱深情,极大地震撼了我,使我至今不能忘!一看到这本相册我就会热泪滚滚,在心底里祝福他,宽容他。

五

1978年张艺谋打听到北京电影学院要招生,心里就暗暗下决定

心,积极做着准备。我的心情和他一样兴奋而紧张。我千方百计地到处帮他借书,帮他整理材料。张艺谋精心地裱糊好许多硬纸板,把自己拍摄的好作品收集粘贴成册,并详细地将每一张的拍摄经过写成文字附在其中。五月份,他利用一次去沈阳出差的机会,把这本册子带到北京去找招生的老师们看。那几个老师把张艺谋的作品传着看了一遍,都面露喜色,非常欣赏,说:“从来没有见到过摄影基础这么好的考生!”但一问年龄就直摇头。张艺谋那年已28岁,摄影系最大年限是22岁,他已超出6岁。我真伤心,不由得哭了起来。他劝我不要难过,说:“这不算完,我还要努力,凭直觉我感到这不是最后的结局。”

当时我还真以为他有什么预感、直觉,后来才知道,他在1977年底就给我姐夫和我姐姐去过信,请他们帮忙在北京打听有关摄影专业的招生情况。

的确,这不是最后的结局。正当我们夜不能寐、食不甘味的时候,接到了姐姐和姐夫的来信,这封信使张艺谋上北京电影学院的事有了转机。

我姐夫叫王涤寰,在北京《中国烹饪》杂志担任摄影记者。当他知道张艺谋考电影学院碰壁的事后,决心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

姐夫在信中说,让张艺谋把他所有的作品再精心挑选制作一番,凡是上乘之作都不要拉下,再写一封表明心迹的信,一同寄给他。他已设想了“通天”的办法,要把这本作品和信直接送到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黄镇手中。

王涤寰接到作品和信后,立刻找到和他交往甚密的著名老画家白雪石先生,将张艺谋的情况一一如实相告,求白老先生帮忙。白老先生一口答应下来,表示他愿意举荐。可敬的白雪石老先生没有拖延一点时间,周末就将这些材料带到了黄镇

部长家里。他先把张艺谋的这些摄影作品给漫画家华君武先生看了,华君武先生大加称赞,黄镇部长看后也极欣赏,认为是个人才,就委托华君武先生办理这件事(华老先生当时是文化部部长)。华先生马上打电话给北京电影学院,转达了黄镇部长的意见,建议破格录取张艺谋入学。为此,北京电影学院专呈了文化部一份报告,反复强调年龄大,学摄影不合适。的确,按以前的规定摄影系毕业后只能做二助理,二三年后才能升大助理,再熬二三年才能当上副摄影,要成为独立拍片的摄影师还得拍上几部片子才行,得要熬上七八年。

黄镇部长看了报告后作了批示,说年龄大少学两年。四年长了,上两年也行嘛!人才难得。华君武先生又亲自前往北京电影学院。学院经过研究,给张艺谋的单位咸阳国棉八厂发了一个电报并写了一封信,通知张艺谋速赴北京。

国棉八厂的领导对张艺谋极为支持,把电报和信迅速转给张艺谋,并给他批了一个星期的假。我很高兴,觉得有希望了,就马上把存在银行的50元钱拿出来给他上北京用。张艺谋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我们也领了结婚证。

六

张艺谋学习十分刻苦,在专业方面提高得很快。有一年寒假他为参加“四月影会”制作了一套《啊,一代青年》的照片,我看后大吃一惊。作品的形式和内容远不是我所熟悉的那种“张艺谋特色”,构图也不是他以前津津乐道的“黄金分割”,而是讲究“不完整画面”、“力度”之类的新风格。我当时没能在更高层次上理解这些东西,以致后来那部震惊影坛的《一个和八个》放映时,我并没有感到丝毫的生疏和惊讶。

1982年5月份,张艺谋即将毕业,他来信叫我去北京结婚。我按他

的吩咐做了细致的准备。

我先到张艺谋家里,向他父亲说了我要去北京结婚的事,问是否要买什么东西。他父母拿出两百块钱,说:“咱家经济比较紧张,没有更多的钱给你,这点钱你买几件衣服穿吧。”我没有接钱,对他们说:“我这次去北京什么也不打算买,衣服够换洗的就行了。这钱我不要,家中用吧。”两位老人都很感动。

我到北京完婚后,张艺谋给我讲了他们毕业分配的大致情况。他们摄影系共有26名同学,其中就有十四五是个北京人,而留在北京名额只有10个,这就是说,在北京的同学都得有几个去外地,家在外地的学生想留北京根本就没有什么可能。张艺谋本想留京工作,他认为,搞电影处在全国的文化中心好处很多,信息交流快,容易干成事。可是面对这种局面,留京显然没有希望,这使他非常难过。我建议他回西安,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他向我解释说,西安只有一个名额,而从西安来的则有六个人,先不说争取会有多大困难,就是争取到了,他在西影也不一定会被重用。而且他比别人大近十岁,需要马上投入工作,如果再耽误时间,就没有出头之日了。时间不等人,岁月不留情。再者,他们是他们家中的长子,如果回到西安,家中的大小事毫无疑问地会先找他。他不想陷入家庭琐事中去,只渴望一心一意地工作。

这段时间,张艺谋的情绪似乎特别不好。有一天晚上,我一觉醒来,发现偌大的床上只有我一个人,不觉吃了一惊。四下里一望,黑暗中看到沙发那边有个红点一闪一闪的,是他坐在那里抽烟。我心头一紧,意识到他心里一定有什么巨大的痛苦,我跳下床,蹲下身子,抱着他的腿,轻声问他:“你怎么了?是为了分配的事,还是……”

“睡不着,想坐一会儿,你先睡吧!”这一晚上,我也一夜没睡好。

后来我才知道,学校已经风传让张艺谋他们去广西厂。广西偏远,同学们视若畏途,认为就像发配去西伯利亚一样。张艺谋曾经联络了几个同学争取去潇湘厂,他们认为潇湘厂虽是新建,但毕竟在内地,实力也比广西厂强,加上分配到那里的名额多,同学们在一起容易形成一股力量,容易干成事。谁知这一努力也失败了,这使张艺谋十分痛苦。除了广西厂别无选择。

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在北京住了近两个月后,张艺谋的学校生活和我们的蜜月同时结束了。

张艺谋到广西厂后,想马上拿起摄影机开始工作。他的理想和愿望很多很高,想做一个一流摄影师,想拍出高水平的电影。可是现实是他连摄影机都摸不到,不能练习,不能实践,又何谈一流,何谈高水平?他苦恼极了。一日他忽然想到如果能有一架类似摄影机的机器,供做锻炼基本功之用,等到一旦有机会工作,就会运用自如。他立刻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我“帮助做一个摄影机模型,供锻炼臂力用,重量在30斤左右为好。”并附有他画的图样。我理解他那时的心情,尽管我当时因为妊娠身体极不舒服,还是去为他办了。先到厂里木工车间请人做好模具,又到铸造车间做好沙型,进行浇铸,再到机加工车间去加工打磨。这个30斤重的铁疙瘩,费了不少事,求了不少人,总算做好了。

张艺谋在广西厂也很忙,厂里当时有个《凝视》摄影组(这部电影后来改了名),张艺谋为了早点工作,积极要求参加这个组,做摄影助理。这个组的导演是广西厂从北影借来的。张艺谋说那导演已快50岁了,还没独立拍过片子,北影僧多粥少总轮不上他,像他这样被窝了一辈子的人不在少数。

据说,那个导演由于长时间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精神上的创伤极深,越急越办不好事,说要在白桦

树上找一个像眼睛一样的树疤,全组人一齐出动,折腾了一个下午,也没找到满意的。还有许多相类似的情况,造成了时间、财力上的浪费。广西厂领导痛心地说:“我们再不能花钱让别人练手,一定要培养自己的导演。”

张艺谋对此非常感慨,生怕自己也这样被耽误了。他说要被这样窝个十年八年,他也就完蛋了。他时时刻刻准备着投入到工作中去。

没过多久,他毅然退出了这个摄制组,回到厂里,和同学张钧钊、肖风、何群一起四处游说,要求成立青年摄制组自己干。他们所筹备的就是那部著名的影片《一个和八个》。

七

我的预产期是4月15日,谁知3月29日就破水住进了医院。经过了两天的阵痛折磨,1983年3月31日生下了女儿张末。

第二天,爸爸替我给张艺谋发了个电报,告诉他生了个女儿。

此时,《一个和八个》摄制组正式成立。导演张钧钊,美工何群,摄影是肖风和张艺谋。他向这几个同学说了得女儿的事,大家一齐转着脑子给小孩子起名字。提出许多都觉得不合适,最后张钧钊说:“从今天起我们就开始干事业了。3月31日是我们大伙平凡生活的最末一天,就叫张末吧。”大家都同意这个提议。我女儿的名字就这样和张艺谋的事业联系在了一起。从打末末出生以后,张艺谋在事业上就开始步步上升,连连获得成功。

那时,我们的生活挺拮据,张艺谋拍片没有任何酬金,只有少许的外景地补贴费。他虽在北京工作,工资又在广西厂里;我由于带孩子请了长假,只能拿到百分之六十的工资,每月不到30元。在西安时,我长住在妈妈家,靠父母养活。自来京后自己过日子,唯有精打细算了。我们

每天只给末末买点肉、鱼之类的营养品，自己却一点舍不得吃。张艺谋爱吃面条，我们每天买两斤切面，随便煮煮吃。有时也买点馒头或白面包啃。有一天，张艺谋拿回来一个捣罐说，别人告诉他，黄豆的营养成份很高，每天给孩子吃些黄豆，不亚于牛奶和鸡蛋。他借这个罐子是准备每天给末末捣豆浆喝。我们从自由市场买了两斤黄豆，每天晚上抓一小把泡上，放在暖气上温着，第二天用捣罐捣碎，加糖煮开给末末当牛奶喝，末末很爱喝，我们都很感欣慰。剩下的小半碗豆浆渣，我俩你推我让地都想让对方补点营养。

这段日子我们过的虽然清苦，但平静而温暖。张艺谋能和我一起做饭、管孩子，这是很少有的事。我们每天为末末的营养忙碌着，精心地给她做饭，尽量变换花样，让她吃好。末末眼看着就胖起来，身体也好了，整个冬天没有得过病。末末今年6岁了，说实话，六年中只有那两个月张艺谋像个爸爸。

1985年初，一天，张艺谋回来，一声不吭地在房子里转了两圈，然后来到厨房，看我做饭，一直不说话。我觉得有点反常，抬眼看了看他，发现他脸上的神情很兴奋，我立刻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什么事吧？”我问。他神秘地看了我一眼，缓缓地说：“今天有人告诉我，我因拍《黄土地》得了这一届金鸡奖的最佳摄影奖。”

“真的？！”我惊喜得呆住了。这么大的喜事突然降临，我真料想不到。我为张艺谋高兴，他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的才华被大家认可了。这个冬天一切都是那么欢欣快乐，在我的心里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同年12月，张艺谋与陈凯歌又一起去了美国夏威夷。他们的《黄土地》在这次夏威夷电影节上获得了摄影最佳奖。

张艺谋又要去忙他的第三部片子《大阅兵》了。临走前，他告诉我

说，西影厂厂长吴天明有意把他调到西影厂来。他虽然同意，但知道广西厂不会轻易放人，一时半会儿也调不来，建议把我先调到西影厂，吴天明答应了。

就是这时，我得到通知，我调西影厂的事办妥了。厂里并且破例分给我们一套一间半的房子，我们可以搬到西影厂去住。

搬家时，我们的全部家当只有一张床和两个大纸箱。这张床还是我姐姐在北京给我买的。厂里还借给我们一张写字台和一个书架。我把那半间小屋作为卧室，放上那张床和装被褥衣物的大纸箱，大房子作为起居室，摆上写字台和书架，还有一把椅子。由于没有什么东西，房子里空空荡荡，显得特别大。末末可高兴了，在房子里骑车子，转了一圈又一圈。朋友或同事来家里，我都很尴尬，因为只有一把椅子，让来让去，最后总是大家站着说话。所有来我家的人都说：“你们这个家给人的印象，好象是临时的。”但这个家在我的眼中却是那么完美。我和张艺谋经历了十几年的磨难和分离以后，现在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这是多么值得庆贺啊！

八

半个月后，我上班了。在一大堆新杂志中发现了《人民文学》上发表的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我喜出望外。年初，张艺谋曾嘱咐我，要我注意一下莫言的小说，说他对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很感兴趣。这回发现这一篇，怎能不让我高兴？我一口气读完这篇小说，连忙拿回去给张艺谋看，并谈了自己的感受。张艺谋看完后很兴奋，连声说道：“好东西，好东西。”打这起，他就拿定了主意准备搞这个戏。从此，他简直像着了魔一样。

张艺谋对艺术的执著追求是惊人的。他从山西体验生活回来，带回了一包农民衣服，说是从农民身上

买下来的，带回西安穿，以便找找感觉。那是一条发白的蓝卡叽裤子，一件白布衬衣，还有一条红腰带。我担心衣服上有虱子，就放在脸盆里煮。煮了一会儿，过去一看，两人都傻了眼，由于红腰带掉颜色，脸盆里的水都成了红色，我赶紧用凉水冲，结果蓝裤子还可以，那件白衬衣一块红一块白的成了花衬衣。衣服干了后，张艺谋真大摇大摆地穿了出去。晚上他买了两个西瓜回来，对我讲：“今天穿这身衣服，谁见了都要问是怎么回事，连卖西瓜的农民都说，这样的衣服现在要饭的都不穿。你们拍戏一天挣多少钱下这苦？”

第二天他干脆不穿上衣了，光着脊梁，只穿着那条旧蓝布裤在外面转。女儿末末逢人便说：“爸爸像个济公。”

这年夏天，张艺谋几乎是光着脊梁过来的，而且简直成了习惯。有一次我们带末末去公园玩，出来天已近中午，张艺谋骑自行车一前一后带着我们母女俩，中途他突然停下车来。我还以为有什么事，急忙跳下来。谁知他把上身仅穿的一件汗衫又脱了，光着脊梁骑车。这一下可好，来往的行人都朝我们这一家人身上看，看得我浑身不自在，不知该把目光投向哪儿才好。实在忍不住了，就对他说：“你也讲点文明，怎么能在大马路上光脊背骑车呢，简直有碍观瞻。”“这怕什么？在东大街（西安最繁华的街道）我也敢。”他满不在乎地说。我脑子里立刻出现了画家张乐平笔下的三毛，光着身子在街上走，警察举着警棍威胁他。他竟然捡了一块煤，在身上画了一件汗衫，气得警察干瞪眼。当我们骑到大雁塔十字路口时，我跳下车领着末末走便道，一直拿眼睛盯着马路当中的警察，担心他会干涉光着身子的张艺谋。还好，这位警察并没有说什么。张艺谋居然光着身子在他眼皮底下转过来了。

也就是在这年夏天，张艺谋表

现得特别恋家。他让我与他一起上街挑选窗帘布,买地板革等,还对我说,家里该做几件家具了。我们家里一无所有,我也毫无怨言,因为我知道做一套家具要花许多钱,还要费不少神。我不敢想。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现在他主动提出,我自然很高兴。一连几天,每天晚上他就坐在灯下画家具图,一画就画到夜里两三点。常常我和女儿已经睡了,他画到兴头上,就把我拉起来和他一起丈量房子,研究尺寸,讨论式样。为了准确无误,我们用报纸裁剪贴成家具的模型,在房子里摆布,他声称对绘制家具图样有极大的兴趣。经过几次修改,他画的图纸就相当像样了。在他妈妈的帮助下,我们做了一套很不错的家具。我们的图纸也很快被别人要光了。

这年深秋,《老井》摄制组出发了。由于前期准备工作充分,很快就拍回来一批样片。样片洗出来后,我带末末去看,也许是由于我太熟悉张艺谋了,总觉着他不像孙旺泉,而只是张艺谋自己。连看了几次,才觉得有那么点意思了。我看《老井》时心里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不愿意在银幕上看到他演的那些镜头,另一方面又为他能演好角色而高兴。

张艺谋一当演员,厂里的闲话就多了起来。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风言风语,我对张艺谋还是理解和支持的。看过两次样片后,我给他去过一封信,信中说:“你们送回来的样片我看了,也带末末看了。你演的比我想象的要好,只是还有些拘谨、不自然,应该再放松一些,既然承担了这个角色,就要演好。……”

张艺谋托人捎来了回信,称赞说:“你的信,关于‘床上戏’写得很好,真是我的好女人,明事理,通大义。吴天明打算将其中几段话在摄制组大会上宣讲呢!关于这方面的传闻,你大可不去管它,中国人都太无聊。我们是在认真搞创作。”

他的信使我心里最后一点点

因各种流言蜚语造成的不快也消失了。从样片里看到他背石板、挑水、打石槽,瘦了许多,我非常心疼。

这时,陈凯歌为《孩子王》来西影厂,带来了美国朋友送给我们的四把塑料折叠椅。陈凯歌笑着对我说:“我可是用张艺谋背石板的精神把这四把椅子从北京给你们带过来,又从招待所给你们带到家的。”我感激地连声向陈凯歌道谢。陈凯歌和我攀谈起来,他说:“末末现在一天天大了,你也应该放开手脚,把生活的圈子扩大一些,否则总是家里——孩子——图书室,生活太枯燥了。”我非常感谢陈凯歌,他看到了我内心的寂寞。

张艺谋终于从山西回来了。一天晚上末末睡了,我和张艺谋聊了起来:“人家都说你快成‘脱星’了,你自己怎么看?”

“这是剧情需要,我第一次演就让我给碰上了,有的演员演一辈子戏,也碰不上这种戏,这没什么意思。”张艺谋挥了挥手说。

“你们演床上戏的时候,你离与你配戏的女演员那么近,你有什么感觉?”我知道,我的问话里充满了醋味。

“能有什么感觉,那么多人围着看,大灯光照着。要说有感觉的话,就是你从来不用香水,那些女演员都有一股刺鼻的香水味。”他笑着说。他的话虽然无可挑剔,可我还是觉得,连身上的味都能闻到,离得太近了,叫人心里不舒服。

他接着问我:“你对我演这些戏,以及厂里那些闲言碎语是怎么想的?”

“看见你的那些镜头心里是很不舒服,但我相信你,对于那些流言我是不会往心里去的,因为我知道你的野心还大着呢,你还没有达到你的最高目标,你不会把精力和时间用到别的地方去,以后你达到了目标那就难说了。”

“你说的很对,真是知夫莫若

妻,我的目标无止境,我永远也不会停下来把精力用到别处,所以你就放心吧!”

我听了他的话的确像吃了一颗定心丸,心里觉得踏实、愉快。其实生活往往就是从人们最放心的地方开始发生变化的。

九

1987年8月份,张艺谋他们的《红高粱》组在山东高密县外景地进入了拍摄后期,恰好我有半个月的假期,就给张艺谋写信,告诉他我想带着末末去山东,哪怕只呆两三天也好。张艺谋回信说:你们还是不要来了,天气热,这里条件不好,工作也紧张,无法照顾你们,而且我也不愿意别人有什么看法。希望理解我的一切心理,我没有什么其它意思。……

我的心里很委屈,只要求我理解他,他却不理解和体谅我!

8月17日我带末末去北京看姐姐。

9月2日,张艺谋中途来到姐姐家。他给我、姐姐和姐夫大致讲了一下山东外景地的情况,说这次来北京是为女主角的合同问题。这个女演员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要开学了,学校叫回去,可戏没拍完,摄制组不能等,要下本钱把人借出来。当时张艺谋神情疲惫,嗓子沙哑。我问他怎么成了这副样子,他说:“喊的,一天到晚的在现场喊,很累。”“那你就早点睡吧。”我给他铺好床,他就自顾自地睡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他说今天事很多就匆匆走了。到了晚上十点多钟打来电话说:“今天奔波了一天,现在才完事,你说我还回不回月坛了(我姐姐家在月坛)?我现在宾馆。”

“你太累就算了,现在都十点多,跑回来恐怕已快半夜了,今晚你早些休息。事情办完了,早点回来陪我和末末玩两天。”

……

我回西安不久,日本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的评价揭晓了,《老井》获得了四项奖。消息传来,西影厂一片振奋。当时美国朋友贾佩琳正在厂里。她是在香港和张艺谋认识的,她的丈夫是一位澳大利亚记者,叫白杰明,是一个中国通,和张艺谋也是很好的朋友。她为张艺谋高兴,并和厂里职工一起参加了陕西省委为《老井》获奖而召开的庆功大会。看了《老井》电影后她对我说:“张艺谋的确演的不错,我不是因他得奖才这样说的。”我问道:“好在什么地方呢,你能说说吗?”贾佩琳说:“张艺谋的节奏感和分寸感都掌握的很好。”经她这样一说,我似乎也有了一点具体而深入的认识。我们一起谈了很久,也谈了很多。谈到了中国的文化,谈到了世界级大师们拍的电影,谈到了那些为演好戏。为了他们所热爱的电影事业不惜损伤自己身体的杰出演员。她特别提到了日本电影《楳头节考》。为了剧情的需要,为了真实,演员真的拿石头砸掉了自己的门牙。贾佩琳还说,她来西安很想见张艺谋,她想帮助张艺谋去澳大利亚拍片。其实在这个时候,《红高粱》剧组已经结束了宁夏外景地的拍摄,组里的人员都回来了,只有张艺谋去了北京。

10月17日,张艺谋从北京回来了。晚上9点多钟,我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只见张艺谋脸色灰黄,神态沮丧倦怠地站在门口,我赶紧接过他身上的提包。心想,以前他当摄影师、演员时,每次拍完戏回来,从没这么疲倦,当导演真不容易,这么累人。现在才拍了一部戏就累成这个样子,将来年纪再大些,身体哪能吃得消呢?我问他吃了饭没有,他说上飞机前吃了。我说:“现在你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吗?我去给你做。”他摇摇头表示不吃。接着,他蹲下身子拉开提包翻着什么,我看他无精打采连话都不想说的样子,叫末端来一个凳子让他坐下。他

从包里翻出两件玩具给了末末。我赶紧告诉他贾佩琳已经等了他几天了,明天下午就要回北京。张艺谋说,他就是为与贾佩琳商量去澳大利亚的事才匆匆赶回来的。

第二天,贾佩琳来家里和张艺谋商谈,初步决定第二年(1988年)五六月份去澳大利亚拍一部当地土著风俗的纪录片。在去澳之前的几个月,她打算找一个英语教师帮张艺谋补习英语。贾佩琳问他愿意在哪里补习?是北京还是西安,这两个地方她都可以帮助联系。我心里希望张艺谋选择西安,可他却说要去北京学。我心中有些诧异,因为在我看来,其他一切事务我都可以帮他去处理;二是我学过两年英语,教过两年书,虽然水平不怎么样,还算有些基础,在初学阶段可以帮他的忙;三是我也可以借此机会提高一下英语水平。等贾佩琳走后,我向他说了我的想法,他根本不以为然,并且告诫我说:“关于我在北京学习英语的事要严格保密,不能对任何人讲,我要在绝对没有任何打扰的环境下学习英语。”他说话时的神情十分生硬。我再没说什么,但心里似乎感觉到了点什么。

张艺谋回到家里几天了,总是神思恍惚。我担心他累病了。问他,他总说没什么。我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对头。光是劳累,也不会成这个样子,一定是有什么心事。我很想和他谈谈,可他每天晚上后半夜才回来,再占用他的睡觉时间,又怕他睡眠不足,第二天更没精神。不与他说说又总放心不下,我的心里矛盾极了。一天晚上,他回来时我还没有睡着。听到他躺在床上长嘘短叹,我就转过身来问他:“你近几天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心事?”他沉默了良久,才长叹一声说:“像我们干这一行的人就不应该成家,既连累了别人,也限制了自己。你跟我这么多年,你该清楚,没得到过一点好处,不如让我走,一个人自己过去,混个什么样

算什么样。”

“你都说什么呀?是这些天累坏了吧!”我惊讶地说。但却没有往深处想。

第二天,我洗衣服时,习惯地把每件要洗的衣服的兜都掏了一下。从张艺谋衣兜里掏出一封撕去信封正面的信,我随手打开信,一下愣住了。

信劈头第一句:“你走了,把我的心也带走了。”接着写道:“我的眼睛还很疼,”是“小杨到学校打了我。闹过之后,现在校园里都在议论这件事,大家猜测我外面有人,也有人猜到了你。听说系里要找我谈话,我已作好了准备,等他们来找我,我就向他们说清楚。他们能理解更好,不理解我也不在乎。我认为,只要把事情说清楚了,也就没人敢动我了,……我认为人要活的自在,要勇敢地去追求幸福、爱情,你应该得到幸福和爱情……我想结婚,我希望能得到答复,我期望上天赐给我幸福……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赖在我怀里的样子可爱极了!再有几天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我们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干不完的事,哈哈,你知道我们干不完的事是指什么吗?”接着是大段不堪入目的……

我的脑袋全麻木了,不断地嗡嗡作响。我呆呆地坐了十几分钟。看看躺在床上睡觉的张艺谋,又看看信末的署名,我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可信还在手里嗦嗦地抖动着。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才能稳住我混乱的心情,我来到厨房,没活找活做。闹钟铃响过,张艺谋醒来大概是看到桌子上那堆从他口袋里掏出的东西,感到不妙,他高声地问我:“我的脏衣服呢?”

“在洗衣机里。”我在厨房里回答。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洗衣机前,提起每一件衣服掏兜儿,然后在房子里转了几圈,走到厨房来问我:“看到我的信没有?”

“什么信?”我机械地问。

他回答说是某人给他的信。

“看到了，但我不给你。”

“你要怎么样？想张贴出去吗？”

“没这个打算。”

“把信给我。”他坚决地说。

“不给。”我更坚决地说。他焦急地看了看表，开门走了。整个下午我都是晕晕沉沉的。

下午六七点钟张艺谋回来了。他说还没吃饭，我给他下了一碗面条，自己不想吃，就默默地坐在床上看着他吃。我脑子里一片混乱，似乎丧失了思维能力。张艺谋一边吃一边对我说：“这件事我本来没想瞒你，回来后一直很忙，想等忙完后再告诉你，在山东我们俩还没有什么，到宁夏后，发生了那么几次……，就是这么回事。”他说得很平淡，很不在乎。我胸口却堵得难受。

晚上末末睡了，我躺在床上想着白天发生的事，眼泪不住地流，脑袋和眼睛都在隐隐胀痛。半夜张艺谋回来了，我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做，我实在想不明白。”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他叹了口气说。

“是我不好？”

“不是。”

“那究竟为什么？”

他沉默了好一会才说：“这次出外景工作很累，累的程度是以往不能比的，而且心里感到很孤单。”我心里一震，感到问题很严重。就问：“你的孤单指的是哪方面的？”

“主要是工作上的不顺心。”又是我没想到的回答。

星期天，我带末末去她奶奶家，对他父母说了这件事。他父母非常生气，叫我把那封信复印几份，寄到北京那个学院去。我不同意。

演员们都来录台词了，张艺谋要搬到招待所去住。我试图阻拦他，他态度很坚决。那天晚上我们僵持到夜里三点多，他一再说是工作需要，应该相信他。我怎么能不愿相信他呢？我多么希望他还是以前的那

个张艺谋呀，可是眼前的一切又怎能让我信任他呢。思来想去，为了这个来之不易的家，这个爱情融合而成的家，我最后还是答应了他。张艺谋在招待所住，但每天早上都过来看看我们，既不吃早点，也不说什么，在屋子里转几个圈，呆个十分二十分钟就走了。我至今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是留恋，是不舍，还是怕我承受不了而出意外？

11月31日，张艺谋的母亲去找了那个女演员来说：“我见到她了，对她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她回答说，他们并不幸福。我说，等你有了家庭，有了孩子就知道了。他们从恋爱到结婚已经二十多年了，不可能老像初恋那样亲亲热热，各人都有各人的事业和工作要做；再说，感情不只是表面的卿卿我我。她说，你不能光说我，你儿子愿意，去做做你儿子的工作吧。”

一天晚上，张艺谋气势汹汹地回来问我：“是不是你把那些事告诉了她的男朋友？”

“莫名其妙，我怎么能认识她的男朋友？”我生气地说。

“那又是谁说的？谁这么爱多管闲事？……你到底给她的男朋友说过这件事没有？”

我忽地坐起来，怒不可遏地对他说：“张艺谋你昏过了头！”

末末早已被吵醒，钻出被窝里不敢动，见张艺谋走了，一把抱住我，带哭腔地说：“爸爸为什么和你吵架？”我紧紧地搂着孩子，泪流满面。

那几天，张艺谋的思想一直混乱。那边不断打来哭诉的长途电话，张艺谋也一次次表现出神经质。说实在的，一个人，一天有十几个小时的工作负担，还要承受思想煎熬和不断袭来的刺激，再坚强的人也会发疯。我心里还是不由得被怜悯之情笼罩了。一天，他对我说：“她的男朋友又去学校闹了，她说她招架不住，要求救救她，我得去帮她。”

有人这样对我说：“你的悲剧，不是个人能力的悲剧，而是性格的悲剧。”这真是一针见血！在这次事件中，我采取的还是以以往的处世态度：原谅、理解、同情、忍让，宁可别人负我而我绝不负人。至于结果怎样我没有去想，也没有必要去想。

十

11月15日，荷兰鹿特丹电影节主席鲍尔斯来西影厂参观访问，要求看《红高粱》。当时，《红高粱》的后期制作还没完，只好放映默片，一边放映一边由张艺谋讲解。张艺谋让我带着末末也去看。我进去时放映已经开始了。刚看了一会儿，就听见有人在外面叫张艺谋。他出去了一下，又回来接着讲解。放映完，鲍尔斯兴高采烈地说着他的感受，评价很高。鲍尔斯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他说这部影片很好懂，就是没有讲解也能看明白。他以电影节主席的身份，观看了几百部影片，只看过两部没有完成的片子，《红高粱》就是其中之一，并说摄影非常优美。翻译把摄影师顾长卫介绍给他后，他热情地说：“我希望你们这个片子制作完成后，一通过送审就能参加明年一月份我们的鹿特丹电影节。”在张艺谋和鲍尔斯谈话的时候，末末走过去爬在张艺谋的脊背上。老人问这是谁，翻译介绍说是张艺谋的女儿，老人伸出手摸摸张末的头，又和她握握手。翻译又转向我，介绍说：“这是张艺谋的夫人。”老人向我走过来伸出手，我急忙走过去与他握手。老人说今天见到张艺谋导演一家感到很荣幸，他想和我们全家照一张相。当场，一位西安晚报的记者为我们拍了照。

《红高粱》第一次放映，大家看了后反映都很强烈，三五成堆地交谈着。

那天我也带着末末去看了。末末对《红高粱》已经很熟悉，从默片开始到这次完成双片，看了不下三

四次,对影片中的三首歌极感兴趣,回到家里不停地唱着扭着。

11月26日,张艺谋为《老井》的事去参加夏威夷电影节。这是他第二次去夏威夷。

张艺谋从夏威夷回来后,留在北京和组里的同志一起作“标考”,他把从夏威夷带回来的玩具和巧克力让别的同志给末末捎了回来。当天晚上他打来长途电话。

“你近来怎么样?”传来张艺谋那沉闷的嗓音。

“还那样。”

“末末好吧,捎回来的东西她喜欢吗?”

“挺喜欢的。”

“我当了金鸡奖的评委,暂时不能回西安。”

“……”

“我在北京的情况让制片主任告诉你。”

“嗯。”

“评委们住的这个地方和外界断绝联系,我和谁也无法再联系。元旦我回不去,你和末末过吧,多保重。”

尽管他伤害了我,伤害了孩子,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痛苦,但他心里还惦记着我们,我在心里暗暗地原谅了他。

尽管这时我清楚地感到张艺谋已和我离心离德,可我还是不愿他由此沉沦,因为只有我最清楚他获得今天的成就是多么的不易,这里面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心血!我从心底里希望他能继续稳步地向前走,不致半途而废。厂里要送《红高粱》到上海、福州等地举办“首映式”,张艺谋在家心绪惶惶,想去参加。我劝道:“你还可以辉煌煌煌地干10年,还应该能拍出更多的好片子。一部已完成的片子就不要再为它无价值地浪费时间了,好坏自有大众评说。你应把精力集中在下一部的片子上。”他不听,也听不进去,最终还是迫不及待地走了。他这一

走直到西柏林电影节结束后才回来。西柏林电影节的日期是2月14日至2月23日,正好把1988年的春节夹在当中。不过张艺谋不回来度假节日已是常有的事,我习惯了。

这几个月来,我一直处于昏昏沉沉之中,我的精神垮了,我的感情垮了,我的寄托垮了,我眼中的一切都成了虚幻,成了做假。多少年来,我与张艺谋一起用心血精心筑就的感情圣坛,顷刻之间就成了断壁残垣,对于这个世界我还能相信什么呢?

这个春节我们过得阴冷而又灰暗。

2月23日,是西柏林电影节的最后一天,这几天我一直在等待,等待着西柏林的消息。

11点多了,末末早已入睡,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忽然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吴天明的爱人穆淑兰。她说:“肖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红高粱》在西柏林电影节上得奖了,还是大奖,金熊奖!”刹那间我清楚了,我心里盼的不是这个好消息,我不由得脱口而出道:“我多么希望不得奖。”话出口以后,我自己也有点惊异,我怎么会说出这样的一句话?!穆淑兰说:“你应该高兴,为西影厂也应该高兴。”

“对,我为西影厂高兴。”我真情地顺着说。

穆淑兰走后,我又重新躺在床上,回想起1985年初,张艺谋第一次得最佳摄影奖,我那时的心情像是在做梦,兴奋得不敢相信会是真的。而今天他得的这个奖要比那个金鸡奖大得多,我却丝毫高兴不起来,心中还隐隐地泛着悲哀。

第二天,广播、电视、报纸,到处都在报道《红高粱》获奖的消息。西影厂到处都是标语、彩旗,气氛热烈,规模空前。3月3日,张艺谋从北京回到西安,厂里欢天喜地地组织人员去迎接,吴天明特别叮嘱我一定带上末末去飞机场,托儿所的

阿姨也指定末末去接爸爸。

3月6日是个星期天,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天我和张艺谋带着末末,一块回他妈妈家。走到汽车站,张艺谋说:“我们不坐车,走着回家吧,路上说说话。”我欣然同意了。

他早已打好了腹稿,他转着弯子由远到近,又由近到远地说着。我说:“行了,你的铺垫也太长了,就直说吧!”

“我的感情已经是回不来了,我想和她在一起,过另外一种生活。”他说,“别人爱说什么让他们说去,陈世美也罢,王八蛋也罢,我不是为别人活着。再说,别人说什么都是扯淡,包括我父母和朋友,关键是你的态度。你要不同意,我就只好走最后一条路,背井离乡,浪迹天涯。”

“请便,你爱去哪就去哪,爱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难道你非得要我偿还你为我付出的吗?……你就非要碰个鱼死网破、三败俱伤吗?”张艺谋有些恼怒。

“哼,我已被伤得心在流血,不怕再受伤害。你们伤害别人这么轻松,这么心安理得?!”我愤愤地说。

张艺谋在我脑海里的影子越来越遥远。虽然在我的心底里永有一块圣洁的土地,虽然这块圣土已被玷污,但我依然怀恋着昔日的纯真和诚实。是呀,一个从年少时起就在艰苦环境中拼搏出来的人,竟也会那样软弱——他能克服许多常人无法克服的困难,但却永远不能战胜自身的欲念和自恣。《红高粱》塑造了一个有作为的导演,也最终熄灭了一颗曾经真诚过的心。

《红高粱》主题歌一再鼓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但愿这不是一种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叫喊。对于一个诚实的人来说,应该无所畏惧。我相信这个世界最终会属于真诚与善良! (责任编辑:仲文)

(本文节选自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往事悠悠》一书)

钓鱼台的国宾卫士

陈淀国



一、“总统阁下，请放心……”

北京钓鱼台，座落在阜成门外玉渊潭东岸，是首都著名的园林古迹之一。早在800多年前，金王朝迁都燕京后，这个环境优美、景色绮丽的地方，便成了帝王臣子消遣游幸的场所。1959年，这里才作为国宾馆，以它独特的中国传统的园林风光、幽静的环境、古朴的陈设以及现代的生活设施，接待了来自世界五大洲的贵宾，许多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访华时，都下榻在这里。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外事活动频繁。1990年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短短一个月内，这里就先后接待了96个团组，其中副总统以上的官员就有15位。11月15日，阿根廷总统梅内姆、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泰国总理差猜·春哈旺，三位最

高级别国家领导人不期而遇，同时住进了这座宫廷式国宾馆，这在钓鱼台接待史上还是从来未有的。

1991年有段时间，钓鱼台几乎成了世界外交的中心。仅9月份，在钓鱼台国宾馆下榻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就有：英国首相梅杰、纳米比亚总理根哥布、新加坡总统黄金辉、博茨瓦纳总统马亚雷、意大利总理安德雷奥蒂、泰国总理阿南等等。

所有在这里住过的各国领导人，钓鱼台国宾馆都在他们的记忆中都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美好印象。从设施到服务，从客房到菜肴，从幽雅环境到园林风格，特别是那威武、雄壮的“国宾卫士”，更赢得他们的高度赞扬。

1984年暮春，美国总统里根偕夫人南希来华访问。离开北京前夕，在中国政府举行的送别宴会上，我作为一名官员，诚恳地问里根：

“总统阁下，您这次对中国的访问，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稍加思索，从许多方面谈到了自己的观感，当话题转到礼仪接待上时，他微笑着望了望身边夫人，竖起大拇指，由衷地称赞道：

“中国的礼仪兵，准确地说就是这里钓鱼台国宾馆的卫士们，他们是全世界第一流的士兵！”

在这里担任警卫执勤任务的，是武警北京市总队的一个中队，而在东大门站礼宾哨的，只有一个班，即礼宾班。

不错，他们是武警几十万部队的精华和代表，无论是思想、品德、警容、风度、素质、修养以及军事技术、武功散打……都是第一流的。

多少年来，多少个日日夜夜，在钓鱼台下榻的外国首脑，深深感到在这里最有安全感，最令人放心。

1972年，北京正是冰封雪压的严冬，但是，在国际交往中，一桩重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发生了！

2月21日11时27分。天空阴冷，美国的大型“空军一号”专机，穿过云层，在首都机场缓缓降落，从机舱里走出的是穿着大衣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夫人帕特。前来迎接的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两人紧紧地握手，足有一分钟，周恩来感慨地说：

“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呵。”

当天，毛泽东主席便会晤了尼克松总统。

这两位国际交往史上的伟大先驱者，以惊人的胆略、高瞻远瞩的目光，打开了冰冻20多年之久的中美关系大门，这一超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随着岁月流逝更加显示出其深远意义。

这次震惊世界的来访，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下榻在钓鱼台国宾馆的第18号楼。

尼克松在华短短几天，日程安排非常紧张。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多次会见国宾馆卫士们，并一起合影留念，对他们亲切地说道：

“并不是由于你们保证了我的安全，我才感谢你们，重要的是你们东方式的端庄、质朴以及无可挑剔的素养征服了我，我将永远记住你们。”

钓鱼台国宾馆里，珍藏了许多国宝。那里的盆景，最少也有60年以上的历史。撒切尔夫人访华期间，住在第12号楼。这里墙上所挂的国画，都是明清两代的宫廷画，室内陈设的四个绣墩和那张景泰蓝圆桌，全国独一无二。

这里的总统套间，分总统卧室和夫人卧室，各为50平方米，都在二层。夫人住的龙床重1.2吨，雕有116条栩栩如生、姿态纷呈的龙，给夫人带来温馨、柔和的幽情。

夫人对国宾卫士更为赏识，常常情不自禁地夸他们既充满刚毅、雄威的精神气质，又有着英俊、潇洒、落落大方的风度。所以，每当她的车子从卫兵面前驶过时，她总要叮嘱司机，慢点，再慢点，脱下手套深情地向他们致意……有时车子走出好远，夫人还在挥动着手臂……

西哈努克亲王，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多次在钓鱼台国宾馆下榻。虽然谈不上卫士们的名字，但他们热情的面孔，万无一失的勤务，早给亲王留下好感。所以，只要有机会，他总要请卫兵吃饭、合影、作客，有时还主动打电话到卫士们的宿舍问候。

那是一个严寒的冬夜，鹅毛大雪越下越大，首相无意中发现，哨兵郭荣，冒着刺骨的寒风和飞雪，在他的住处外面放哨，心里非常感动，特地把他自编、自演的电影《柬埔寨》拿来给大家放。亲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不但亲自陪看，还主动当起“解说”……

1984年4月26日，美国总统里根26日到达北京这天，一支由100多辆红旗轿车和两辆从美国运

来的总统专用防弹车，组成浩浩荡荡的车队，从木樨地路口向右拐弯急驶而过，当主宾车距东门礼宾哨15米时，随着班长杨新岗的洪亮口令，举手敬礼，与此同时，另外两个哨兵，一连串干净利落的动作——侧转45°角，收回枪刺，提起枪托，行注目礼……是那么准确，那么整齐，那么自若，那么稳健，立即给这位总统及其夫人留下难以忘怀的美好印象。此后总统每次通过哨位，哨兵总是一丝不苟。总统和夫人也总是情不自禁地向哨兵点头致意。当访问圆满结束，总统告别钓鱼台，最后一次经过东门时，他和夫人按捺不住内心喜悦、兴奋心情，将手伸出车窗，满脸笑容，向雕像一样佇立在哨位上的中国卫士挥手、致谢……刚好，一位新华社记者，抓拍下这一镜头。如今，这张放大照片，仍然挂在他们中队的办公室里，成为新兵入伍后的生动教材。

“人人有双火眼金睛”

钓鱼台国宾馆的18号楼、22号楼和10号楼都是“总统楼”。每年五至十月，是这里的“黄金季节”，外宾特别多，警卫任务自然也就格外繁重，每个哨位差不多都是“三包一”。这样每个同志一昼夜就得站八小时的岗，确实够辛苦了。遇有临时任务，还得加班加点，但谁都是争先恐后地抢着上。

一次，我来到了东门值班室，透过玻璃窗，正巧一辆接一辆的轿车驶进国宾馆。忽然带班员韩风光却向一辆红旗轿车打了个“停车”手势，把它拦在门外。我很奇怪，刚才进入的“奔驰”“皇冠”都没有“车证”，却放行了，这一辆为什么给拦住？

“带班员的脑子，应该是一部‘电脑’。每个人，都有一双火眼金睛，不管什么车，只要‘号’不对，谁也休想进。”中队领导解释着，又讲

了件颇具神奇色彩的“大海捞针”故事。

就在5月初，一个国家的元首访华，当庞大车队驶进钓鱼台时，正是这个带班员韩风光执勤。在这近百辆汽车中，前边的有车证，一目了然，很好辨认。可是后边使馆的、陪同的没有车证，这就得凭着这个“电脑”来识别所有的车号了。车子从三里河东路，拐过红绿灯交通站，到进东大门，前后只有短短几秒钟工夫。在这一瞬间，不但要看清车号，而且必须准确无误地作出反应，放行还是阻拦。该放行的阻拦了，很不礼貌，会引起外宾不悦；该阻拦的放行了，则是严重的责任事故。

1辆、2辆、10辆、20辆……车队鱼贯而入，小韩的脑子在高度紧张地工作。

忽然，一辆黑色“皇冠”轿车驶进他的视野。车型和前边的完全一样，车上坐的也是外国客人，但他在看到车号的一刹那，立即平伸右臂，把它拦在“界外”。原来，这是某国石油开发公司的车子，不知怎么挤进了车队。

1991年8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来华访问，住在钓鱼台。一次，80多辆轿车一齐从外面驶来，正在哨位上执勤的小董和小孙，这时紧张得连眨眼工夫也没有。突然，他们右手一横，向一辆车打出个“停”的手势，果断地将其拦在门外。

原来，这车是日本使馆的，在首都机场临时被借用，编入车队，工作人员一时疏忽，忘记通知有关单位……坐在车上的日本朋友，不但没有因此不高兴，反而竖起大拇指，连连夸奖中国卫士“了不起！”“真厉害！”

有次，万里委员长到国宾馆出席一个要会，因车子临时作了调整，车牌号码仅末尾两个数字与原来的不同，结果车子驶到礼宾哨时，照样被拦住。

当万里委员长亲切、熟悉的面

孔从车窗闪出时,哨兵们才歉然地笑了笑,敬了个礼。委员长高兴地摆摆手,佩服他们有着一双敏锐的火眼金睛……

还曾发生过这样一件带有戏剧性的事:一个国家的高级要员车队,前前后后近百辆,在短短一分多钟全部通过了钓鱼台国宾馆大门,负责安全事务的官员,看到门前卫士好象没有任何反应。过后很不高兴地质问道:

“如此草率,要是恐怖分子混入,怎么办?”

哨兵理直气壮、斩钉截铁地回答:

“请不必担心,我们会对进入钓鱼台的任何一辆车子负全部责任!”

“那你们凭什么?”

“凭车号,凭大脑,凭两眼!”

“那你们要记多少车号?能准确无误吗?”

“有多少记多少,一辆不拉,一辆不错!”

这位官员又仔细地观察几次,不得不佩服地连连点头,特别是当他得知,数十个春秋,他们就是凭着这颗红心、这双锐眼,从未放过一辆不该驶入的车子。那位官员情不自禁地赞道:

“令人佩服,奇迹,了不起!”

那么,他们的这手绝招,是怎么练出来的呢!带班员小韩下班,我便和他“侃”了起来。

这个入伍一年多就当上了副班长的“农村兵”,话语不多,当问起他们“练脑”、“练眼”、“背车号”,特别是那桩“大海捞针”的事迹时,他腼腆地笑了笑,说:

“这没啥,我们几个带班员都能做到。”

小伙子似乎看出我对他过于简单的回答,有点失望,这才又补充了几个字:

“真的没啥,就凭死记硬背,就像电话员背电话号码一样,时间长了,有了点经验、规律,一点不神

秘。”

他把我带到了紧靠大门的一幢低矮的平房,这就是礼宾班宿舍。屋里很黑,陈设也十分简陋,除了木床、桌子、枪柜、衣柜外,再没有什么象样的家当。小韩从铺底下拉出个大箱子,里面全是些木头牌子,上面记着密密麻麻的车号。

“平时,我们就是用它来互相练兵、互相考核的。”

我翻出几个,读着车号,让他们回答车主姓名,或是我说出车主姓名,请他们回答车号。结果,全都对答如流。

除了这些,还有许多临时通知的车号。

“搞错过吗?”我不客气地问道。

“没有,一次也没有。”他肯定地回答。接着又讲了这样一件事:

1991年底,一位外国总统来我国访问,车队刚开进钓鱼台宾馆不久,紧接着又来了两辆小轿车,带班员杨新岗一看车号不符,当即下令“停车”。车停后,下来四位外国青年,以不太流利的汉语说,他们是这个国家在我国学习的留学生,想见见他们的总统。“欢迎你们,但必须先到的贵国大使馆办理手续。”这样,他们把车子开走了。可是过了一阵子,他们换了辆该国大使馆的轿车又来了。由于仍未办妥手续,所以还是没有放行。一个多小时后,他们以为岗哨换了人,侥幸可以如愿,结果还是被拦住了。他们接连三次碰壁,虽然未能达到目的,但却被礼宾卫士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彬彬有礼的举止所感动。末了,敬佩地点着头,重新回大使馆办手续去了……

礼宾班现有13名同志,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的。小伙子一个个长得都很“帅”,论身材,全是1.75到1.80的个头,论文化水平,全是高中、初中毕业,论长相,全是浓眉毛、亮眼睛、黑里透红的脸膛,论穿戴,白手套、黑皮鞋、呢警服……往那威严的国宾馆门前一站,该是多么光荣、

多么神气!

就是他们,日日夜夜、分分秒秒地守卫在这里,不论是数九寒天,还是酷暑盛夏,不论是大雪纷飞,还是暴雨倾盆,始终像蓬勃青松般兀立在那里,始终保持头不歪、眼不斜、腰不弯、身不晃、腿不动的端正姿势。

俗话说,台上三分戏,台下七分功。这话对礼宾班同志,感受太深了。就说上哨吧,每班一个小时,一天就是三、四班,直愣愣地站在那里,几乎是在“静止”中度过的。60分钟,如果是看电影、逛公园、溜马路,不知不觉很快过去了。然而要你一动不动、木桩子似的立正在那里,真有度日如年之感啊!哨位上方,没有屋檐,没有树荫。夏日,站不多久,背心、衬衣全都湿透,汗水从头顶流到脚底,鞋子里都能倒出水来。寒冬,手指冻得似猫咬,披在身上的呢子大衣,几乎成了一层薄纸。股股冷风,刺猾似的到处乱跑,两脚原地不动,就像踏在冰块上,冻得麻木、僵硬……就是为了这一个小时的警戒,他们在训练场上,在日常生活,不知经受了多少艰辛以至痛苦的磨炼,除了规定科目外,他们自找“罪受”,每天都要举100次哑铃,做100次俯卧撑,拉100下60斤的拉力器。为了练出笔直的身板,他们睡觉从不枕枕头,还常常在腰间绑一根长长的宽木条。为了练出铁打钢铸般的站功,他们点名、开会、吃饭从不坐座位,三天两头就要紧靠墙根立它三、两个小时……

这些年来,这个中队,这个礼宾班,多次荣立集体功,多次受到嘉奖,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先进典型,成为几十万武警官兵的光荣、骄傲!

(责任编辑:仲文)

(陈淀国:武警大校、作家,著有《山河碎》《神州恋》《泥土赋》等专集8部,作品多次在全国、全军获奖。现主编《橄榄绿》文艺期刊。)

陈诚大殓纪实



1965年3月5日19时30分。

台湾岛的广播中枢,突然停止了正常节目的播送,开始向全岛播放节奏缓慢、感情忧伤的哀乐。接着,播音员用低沉的声调宣布:

“‘中华民国副总统’、中国国民党副总裁陈诚先生,于今日下午7时零5分,因肝癌症不治,在台北市官邸逝世,享年68岁……”

电波在夜空回荡。

蒋介石命令:立即为陈诚建立专门的医师诊疗小组,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治疗!

1963年金秋的重阳节,在台北信义路的一座官邸里,一群享有盛名的医师,正围绕着一位银发老者,聚精会神地会诊。大夫们脸上那严峻的表情,似乎预示出一种不祥的信号。

那被诊治的老者,态度平和,操一口浙江青田官话,不时地在询问医生。他,便是当时台湾岛上赫赫有名的“二号人物”,“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陈诚。

陈诚在一个月前开始连续腹泻,体重遽降,虽经药物治疗,终不见效。夫人谭祥请来了著名的内科、消化道专家陈耀翰医师和巴大维、张先林两位医学教授,为丈夫会诊。三位专家惊愕地发现,陈诚肝脏肿大并坚硬,表面有蛋形硬块。他们初步作出了一个家人所不愿意接受的结论:肝硬化合并肝癌症。

陈诚身负要职,被诊断为癌症,对于台湾当局的最上层来说,无异又是一次令人震撼的冲击波。

蒋介石指示:立即在陈诚家中设立临时病房,加强护理,尽快确诊。于是,一个设备完善的临时病

房,迅速在陈诚官邸设立,两名医师、三名护士和一名营养专家,常驻病房,日夜护理。

不久,陈诚腹泻得到控制,食欲增进,精神也有好转。这使得谭祥着实高兴了一阵。她以为,延续了一个多月的陈诚健康危机,就此平安度过。

10月27日,专家们经过再三斟酌,决定对陈诚实行“肝穿刺”检查。因为只有这种检查,才能最终肯定或排除令人恐懼的肝癌症。

肝穿刺结合病理化验的结果,打破了医生们暗暗抱着的一线希望:陈诚被确诊为肝癌。

此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谭祥听后一阵晕眩,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

陈诚被确认为肝癌的消息,迅速报到了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命令:立即为陈诚成立专门的医师诊疗小组,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治疗!

一个由国防医学院院长卢致德教授为负责人的诊疗小组很快建立起来。诊疗小组聘定著名的内科和癌症权威巴大维教授、麦克斯博士、张先林教授和陈耀翰医师为顾问医师;指定长期跟随陈诚的沈彦医师为主治医师;董玉京、陈良甫两医师在陈诚身边值班。

陈诚在国外学习的子女,纷纷赶回看望身患绝症的父亲。

65字的遗言,思路清晰,内容完整,但竟未出现“反共”和“反攻”一类的词句,殊堪玩味。

儿女们的团聚,使陈诚充分享受了天伦之乐,精神为之一振。那隐藏在腹部的癌肿,并未受到任何制约,仍在一刻不停地增大,并且逐步由肝脏扩散到了左肺下叶。

在甲辰年的最后几天,陈诚的病况进一步严重。

2月27日,诊疗小组传出警报:陈诚的体温突然降至35摄氏度以下,呼吸每分钟仅有8至12次,脉搏增加到每分钟100次以上,血压也逐渐降低。这一天,他始终处于昏睡状态。当晚,诊疗小组发布第一次病情公报,向社会宣告:“副总统”陈诚已患肝癌症。

同日,美联社从台北发出了一条更为耸人听闻的电讯,称陈诚已进入弥留状态,其生命不会延续一周。

3月3日,陈诚已不能饮食,完全靠输液来维持生命。

早晨8时左右,陈诚用微弱的声音对身边的医生、护士说:

“对不起,请你们离开一下,我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日蒋介石、陈诚就任「总统」、「副总统」

有话对履安说。”

“爸爸，我在这里，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大儿子履安在医生、护士离开后，伏到父亲的床前说。

“你把笔和纸取来，记下我的话。”陈诚说。

在履安取来毛笔、纸张后，陈诚便低声地、但却十分清醒地留下了3条遗言：

一、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

二、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

三、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这65字的遗言，思路清晰，内容完整，是陈诚对人们提出的要求，也应当是他一生经验的总结。然而，与陈诚一贯的思想、言论及当时台湾的政治气候相比较，人们不难发现，其中竟未出现“反共”和“反攻”之类的词句。这是出自偶然，还是陈诚临终有感？人们不得而知。

当晚，陈诚挣扎着坐起来，用手比划着执笔写字的样子。履安连忙递上一支钢笔。

陈诚摇摇头，口中轻声说：“毛——笔。”

履安重新递上蘸好墨的毛笔，并铺放好一张白纸。陈诚试图用颤抖的右手握笔写字，可是，他的力量已经不能握住笔管。

他轻轻地摇摇头，无可奈何地放下了笔。他想亲手写字的努力失败了。

“辞修，你有什么话对我说好了。”谭祥凑近陈诚身边，几乎是咬着耳朵对他讲。

陈诚一句话也没有说，仍旧摇摇头。

陈诚究竟又想到了什么？是他因为还没有考虑好而不想说，还是已经没有力量说出来？这是一个不解之谜。

3月4日上午，陈诚的病情已相当危急，脉搏每分钟在百次以上，血液收缩压已降至80毫米水银柱。

中午时分，“总统府”打来电话，通知陈府，蒋介石与宋美龄即刻前来探视陈诚。

“辞修，蒋先生与夫人马上要来看你。”谭祥附在陈诚耳边轻声说。

垂危中的陈诚听罢，两眼中立即显现出激动的神采，并且吩咐说：“扶我——坐起来。”

谭祥深知陈诚对蒋介石十分尊敬和崇拜，不便违拗，便唤来医护人员，一起动手，把他扶坐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

少时，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一起来到陈诚的卧室。宋美龄由谭祥陪同坐下。蒋介石则走近陈诚身边，亲切地说：“辞修，怎么还坐起来，快睡下！”

“不。”陈诚低声说，“总裁，我的病恐怕不容易好了……”说着，从眼角滚出了泪珠。他心里明白：现在与“领袖”相见，已是生离死别了。

“不要难过，好好保重身体。”蒋介石强忍着悲痛，安慰陈诚说。

坐在一边的宋美龄也拉着谭祥的手，说：“曼怡，你瘦多了，要多保重。有什么困难，随时挂电话给我。”

在蒋介石、宋美龄离去后，陈诚的病况，更加垂危。

下午，陈诚断断续续地向家人吩咐：“我很累，恐怕不行了，别人要来看我的，你们不必再阻止他们，让



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陈诚在清明节记者会上演说

他们进来，见我一面。”

医师诊疗小组根据陈诚的意愿，取消了不少亲友入内探视的禁令，让各界官员以及亲友进来和陈诚告别。

谭祥则放了一张半躺半坐的椅子，在陈诚病榻旁边，终日不睡、不食，默默地望着弥留中的丈夫。一向以庄重、文雅闻名的陈夫人，现在竟常常当着别人的面，失声痛哭。

从这天下午起，信义路陈诚官邸的门口，车水马龙，前来探视的人络绎不绝。台湾当局的要员、元老，纷纷赶来，同陈诚见最后一面。他们在见过陈诚之后，便开始为他的后事作准备，或者沉浸在対往昔的追思之中。

中午，弥留中的陈诚，平静地躺在光线阴暗的病房中，双目紧闭，知觉已失，脉搏仍在每分钟100次以上，血液收缩压已降至50毫米水银柱。他的呼吸已经十分微弱。

下午1时10分，宋美龄匆匆赶到。她与陈氏夫妇有着不解之缘。她不仅是谭祥留学美国的同学、好友，而且当年她与蒋介石结婚，是谭祥之父、民国元老谭延闿做的媒；而数年后，陈诚与谭祥的结合，又是她做的月老。连环的媒妁关系，使宋美龄不能不在谭祥处于生活重大转折的时候，对她多加劝慰和关照。

“陈先生要过去的时候，你们可

一定要叫我啊……”临离开时，她嘱咐着陈诚的子女。

浓重的哀愁笼罩着大厅。

7时零5分，病房的门伴着那撼人心弦悲泣声，缓缓打开。张光璧医师走出病房，收敛了脸上惯有的职业性微笑，面对严家淦、蒋经国等高级官员简短地说：“副总统在7时零5分过去了！”

这位戎马一生的四星上将，终于留下了对国家和人民的众多功过，带着属于自己的荣辱，悄然离开了人世。

灵柩用阿里山一棵直径1.8米、生长了2000年的香杉制成，重达2400余斤。

陈诚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又入黄埔，在终其一生的戎马生涯中，担任过连长、营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司令长官、政治部长、军政部长、参谋总长，衔至四星上将；行政上出任过湖北省主席、台湾省主席，国民党当局撤退到台湾后，更位至“行政院长”、“副总统”和国民党副总裁。他的逝世，是台湾岛的一件大事。

整日待在陈诚官邸的蒋经国，向记者即席发表讲话，他说：“陈副总统的逝世，在国家和党来说，是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在我个人来说，

尤其是失去追随了近30年的导师。”

7时3刻，宋美龄再次来到陈诚官邸，与陈诚遗体告别。

蒋介石对于陈诚的逝世，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他命令组成了一个特别高规格的治丧委员会，组成人员包括：“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行政院长”严家淦、“立法院长”黄国书、“司法院长”谢冠生、“考试院长”莫德惠、“监察院代院长”李鹏骝、“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何应钦、“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顾祝同、“总统府参军长”周至柔、“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代主任委员”薛岳、“国民大会秘书长”谷正纲、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谷凤翔。这个阵容，包揽了台湾当局除蒋介石一人而外的最高级官员。

蒋介石还下令：自3月6日起，全体军政机关、部队、学校、团体等，一律下半旗10日，并停止娱乐及宴会，公祭及殡葬之日，民间一律悬挂半旗，并停止娱乐及宴会。

3月5日夜，天空阴沉、细雨霏霏。8时10分，4名担架人员，小心地将陈诚遗体抬上停放在门口的一辆白色救护车。昏暗的灯光，使人刚好能识别救护车上的“15—00509”车牌号。

陈诚的遗体，用一幅大红织锦丝棉被覆盖着。夫人谭祥呼天叫地地由女儿陈幸、陈平搀扶着，将陈诚遗体送上灵车。

10分钟后，灵车开动了。两辆吉普车在前面开道；由宪兵驾驶的16辆摩托车组成仪仗队，分列在灵车两侧护灵；“政府”官员的10余辆轿车跟随在后。

车队行经中山南路、中山北路、民权东路，而抵松江路市主殡仪馆。

在市主殡仪馆前，由两队宪兵组成的仪仗队，立正举枪，恭迎灵车进入大门，向逝去的“副总统”致敬。

陈诚的遗体被置于化装室的冰库中。尾随而至的各“政府”官员，面



△蒋介石、宋美龄在陈诚遗像前致哀。

△陈诚灵柩出殡情景。

△为陈诚遗体送葬时的孝子陈履安（前）、陈履洁（后）。

向冰库，虔诚地行了三鞠躬礼。

灵堂设在殡仪馆内的景行厅。临时搭成的灵前牌楼朴素庄重。灵帷装缀成宫殿式，淡绿色的灵帷上，镶嵌着雕花的金边，四周围着矮矮的栏杆。在黑色的布幔后面，有一个长方形的停棺台，上面铺着白布。

灵堂正中，是一张50英寸的陈诚遗像，差不多与人齐肩。这是一帧陈诚晚年的照片，头发与胡须均已花白，身着西装，系一条花格领带，遗像四周镶满白花。

灵台中央，放着一座用檀香木雕成的神主牌，上书“显考陈公辞修府君之神主”。陈诚生前曾特地关照家人，要给他立一座神主牌，并希望将来能供入家乡青田的家祠。

神主牌前面放满了祭品。

自凌晨起，“政府”官员、各界人士及外交“使节”，纷纷冒雨至殡仪馆祭吊。

上午11时40分，蒋介石身着蓝色长袍、黑色马褂前来致祭。他神情忧戚，默默在陈诚遗像前行三鞠躬礼，并在灵前献花致敬。

陈诚的两个儿子履安、履洁则在一旁叩谢。

蒋介石行礼后，便由孝子履安、履洁陪同进入化装室，吊视陈诚遗容。

79岁高龄的蒋介石，目睹比自己小11岁的陈诚先己而去，无限伤感，不禁凄然泪下。

蒋介石又向在场的工作人员询问了治丧的情形，并指示要仔细地、认真地把“副总统”的丧事办好。他于11时54分离去。

陈诚的遗体，停放在台北市主殡仪馆，经过4天公祭之后，于10日大殓。

3月9日，“党国”要人和各界、各方的花圈、扁额、挽联络绎送来，分置在灵堂四周。

在巨大的陈诚遗像上方，悬挂着蒋介石亲题的挽额“党国精华”。

在灵堂两边的显要位置，挂着蒋介石亲书的挽联：

“光复志节已至最后奋斗关头，那塔吊此国殇，果有数耶！”

“革命事业尚在共同完成阶段，竟忍夺我元辅，岂无天乎！”

蒋经国的大幅挽联，令人瞩目：

“三十年导师中殁，忧国不忧身，少长皆令照肝胆”；

“千万里疆土待复，为河亦为岳，涕洟原许负弓旌”。

蒋介石、蒋经国，以其各自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在挽联中尽情抒发了自己深沉的感情。然而，也许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们用“光复志节”、“疆土待复”一类的词语来说明陈诚的“遗恨”，恰恰与陈诚的临终遗言并不一致。

10日凌晨，极乐殡仪馆的技术主任计天才及4名化装人员，来到化装室，为陈诚的遗容化装。化装师们先用温水洗净陈诚的遗体，然后便理发、化装，又给他穿上了“七领五腰”的衣服。衣服中包括一套白府绸内衣裤、夹袄、夹裤、丝棉袄裤、白夏布长衫、灰色夹袍、团花蓝长包袍、黑马褂等，共7件衣服、5条裤子，合为12件寿衣；脚上穿的是白色绸布袜和黑色短靴。那套白府绸内衣裤和一件白夏布长衫，都是陈诚生前穿过的。谭祥认为，这样做，可以体现丈夫生前俭朴的美德。

陈诚的遗容，经过第一流化装师的精心化装，栩栩如生。

陈诚的灵柩系用阿里山的一棵千年香杉制成。这节香杉5年前运

抵台北，其直径为1.8米，年轮达2000个以上。陈诚逝世后，由江苏籍42岁的名匠陶祖生，用3天3夜的时间，赶制成棺。

陶祖生8岁即在上海学雕寿器，在台湾曾为于右任、贾景德、阎锡山、胡宗南等人做过棺材。

这只棺材长8尺，高3.9尺，重2400余斤。棺材油漆为内5层深咖啡色福建生漆，外3层紫红油漆。大殓后，将刮去外面的3层油漆，再涂油漆、石膏7次。陶祖生说：陈诚的这口棺材入土后，至少可以维持100年不腐烂。

棺材前面用隶书雕刻着15个大金字：“中华民国陈故副总统诚字辞修之灵”。棺内上层有“天花板”一块，其中央部分雕了寿仙图，中间书“福如东海，寿比南山”8个金字；南边边缘，则以八仙过海的莲花图样缀雕而成。

陈诚的身下垫着绣花褥，上覆绣着八仙的大红衾，头、脚下垫有绣着荷花日月的头、脚枕。

谭祥拖着沉重的步伐，由别人搀扶着，走到灵前，凄然跪下，伏地隐隐哭泣。

孝子履安、履洁，披麻带孝，匍匐在地。

灵堂外面的亲属，双手垂立，低头默哀。

8时12分，大殓公祭开始。身着蓝袍黑马褂、右胸佩戴白花的张群，神情严肃，缓就主祭位，其余11位治丧委员担任陪祭，立于张群身后；再后一排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及“政府”高级官员。

8时20分大殓。这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了10分钟。

盖棺前，在陈诚遗体的四周，又扩建上了蓝、红、白三色灰包；并将陈诚身前喜爱的一顶呢帽和一支竹头拐杖，放入棺内。

在盖棺、敲钉的同时，19响丧炮缓缓响起。

丧炮响毕，由台湾国民党中央

评议委员何应钦、顾祝同、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周至柔、谷正纲在陈诚灵柩上覆盖国民党党旗；之后，又由“行政院长”严家淦、“立法院长”黄国书、“司法院长”谢冠生和“考试院长”莫德惠为灵柩覆盖上“中华民国国旗”。

9时正，蒋介石夫妇由张群和周至柔陪同，来到大殓灵堂。

蒋介石着黑色长袍、黑色马褂，宋美龄穿黑色旗袍和黑色大衣。他们进入灵堂后，便率领“总统府”的全体同仁，在缓慢的哀乐声中，献上用素色鲜花制成的小型花环，并行三鞠躬礼。

蒋介石、宋美龄在献花、行礼后，步入灵帏。蒋介石先立于陈诚灵柩的左后方，凝视片刻，默默致哀，然后便进入右侧休息室慰问谭祥。

这一天，从上午9时开始，至晚上9时结束，为各界公祭。

茫茫的台湾海峡如一道无形的墙，将陈诚的墓地隔绝在水之一方。

墓址选定在泰山乡同荣村一块海拔400公尺的山腰平台上。它的四周是连绵的山峰，山坡上植满了郁郁葱葱的修竹和相思树。从平台上远眺，是一望无垠的良田。由陈诚主持兴建的石门水库放出的水，长年灌溉着这片土地。

墓地依山带水，视野广阔，气势雄伟。

据说，为了寻找这块宝地，还特地拜访了台湾著名的风水高手曾子南。曾氏自称是“地理宗师杨救贫仙师第一弟子、唐朝国师赣州曾文迪的直系第5房第51代后裔”。事实如何，也当真不得。这位“地理仙”曾子南认为，泰山乡同荣村的那块坡地，属于大吉大利的“雄狮出林穴”，为台北“三大龙穴”之一。

在墓地初步确定后，蒋经国曾特地前来视察。他攀登上山坡，立在

预定为墓穴的平台上，极目眺望，连连称赞。他兴致勃勃地对左右说：“这里风藏气聚，山环水抱，万派归源，气象阔大。陈故副总统安息在这里，真是太理想了！”

太子一锤定音，墓址便这样选定了。

墓园的设计，以简朴、庄严、雅致和节约为原则。治丧办事处从七八幢名设计师设计的图样中，选中了由杨卓成建筑师设计的简单、朴实的一份。

墓地工程于7月29日动工，至8月中旬，完成了墓园、墓穴的主体工程。预计全部工程的竣工，将要到10月中旬。

墓园依陡峭的山势而建。从柏油马路进入墓地，便是一个广大的停车场。从停车场拾级，便是通往墓地的台阶。全部台阶共6层240级，宽9公尺。台阶石块，采自牌山的高级山石，为与大自然的风景相配合，均凿成原始形块的“毛石”。6层台阶的中间，有一块大水泥广场，供凭吊者中途休息。广场两端，各有一块高4.2公尺、宽8公尺的墓志铭，刻载陈诚生平事迹。

陈诚寝墓位于240级台阶之最高一层的平台上。墓的形状为一块高1公尺、宽2.6公尺的正方形结实实的水泥体。墓内是磨光的水泥石，外面用纯黑色大理石包贴。其位置座西朝东，面对台北盆地，背靠观音山。平台四周，围着石栏，可供游人静坐。墓的后方，有一座高10公尺、长29.5公尺的弧形护墙，用白水泥建筑，与黑色墓体黑白分明。

陈诚灵柩的殡葬日期，经治丧委员会商定，放在8月30日。

8时零3分，设在殡仪馆大门口右前方的礼炮部队，开始向南方天空鸣放发行炮19响。缓缓的炮声，预示着即将启灵。

8时10分启灵。

8时15分，灵柩被移上灵车。

灵车由一辆拖车改装而成。四



周为白色的保丽板，镶嵌着黑色的图案。平台上置有8根金色铜栏，以黑色铜链穿连。

灵车上置有铜轨，灵柩下装了铁轮。灵柩推上灵车时，不需抬起，只需将轮盘对准轨道，轻轻推入即可。据说这种设备，系参照英、美各国首脑人物的灵车设计而成。

8时20分，随着开道车上指挥官的一声银笛，庞大的送殡行列开始缓缓移动。

开道车走在最前面，接着是以开道车为中心，排成“V”字形的16辆摩托车。

一名陆军上尉军官，撑着“副总统旗”，走在乐队的前面。

后面是由121人组成的陆海空军三军大乐队。乐队不断奏着充满忧伤情调的《送殡进行曲》。每只军号的前端，都围缀着一条宽8公分、长50公分的黑布；鼓的四周围上了宽10公分的黑布，鼓槌上系上了黑色的绸结。一排排披上了黑色丧章的鼓号，失去了昔日铮亮的光彩，增添了沉重、肃穆的气氛。

缓缓行驶的挽联车上，悬挂着蒋介石手书的“党国精华”挽联。挽联两边，挂着蒋介石手题的挽联。车身两边各有一个蓝底白字的立体巨型“奠”字。

12名捧助军官，分成3排，各穿陆海空军制服，双手捧着镶在镜框里的勋章。

三军仪仗队由265人组成。他们所携带的武器都背在右肩，枪口朝下，右手握着枪的护木，在他们右胸口袋的上缘，镶着一条2公分宽的黑纱。他们的武器上也都佩缀了丧章。习惯于走活泼、轻快步伐的仪仗队，现在把进行的速度放慢了一半，显得整齐而沉重。

遗像车上载着陈诚穿西装的巨幅遗像，遗像四周为黑框，并缀满大朵白花；车头挂有一个巨大的“奠”字。在遗像两边的装饰板上的“奠”字的四周，是素色的古典花纹。

两名孝子履安和履洁，都戴着黑框眼镜，手持丧杖，身穿孝袍，头戴高高的孝帽，神情悲戚，默默地走在灵车前。

灵车经过大约2个小时的缓缓移动，在10时20分抵达墓园。

32名穿白色短衣裤、白球鞋、头戴斗笠的工人，合力将灵柩抬下灵车，置于迎灵台上。1刻钟后，这32名杠夫，又冒着炙人的骄阳，抬着2400斤重的灵柩，不断发出喘喘的声音，吃力地爬上240级石阶。

灵柩于11时正，运到墓穴。

11时10分，安葬典礼在墓前一座临时用杉木搭成的丧棚中举行。丧棚上挂着蒋介石亲书的挽额和挽联，由张群主祭。履安、履洁及众家属伏地答谢。

主祭人张群在哀乐声中，向陈诚墓前献花。司仪以哀伤的声调，宣读了“告室文”。

在全体参祭人员面向墓穴行鞠躬礼后，杠夫将灵柩抬起，准备移入墓门。将这2400斤重的棺木抬放到墓穴中，可不是件容易的事。32名杠夫使尽力气，花了1刻钟的时间，衣衫尽湿，仍然不能放进。治丧办事处人员，只好命他们暂时休息，待典礼结束后再行安放。

11时30分，致祭的人群中一

阵骚动。蒋介石在哀乐声中，亲临墓地。这是他在4小时内第二次来到陈诚灵前致祭。

蒋介石仍着蓝袍黑褂，带着无限伤感、忧戚的神情，在陈诚的遗像前献花、行礼，然后，默默地巡视墓穴一周，黯然离去。

11时35分，19响丧炮开始响起。大家面向灵柩，武官们举手敬礼，文官和市民则脱帽肃立。

5分钟后，紧接着最后一响丧炮声，4名号兵从4个不同的方向，同时吹响了安息号。

号声悠悠，一代枭雄长眠地下。

陈诚的墓地与他的家乡青田县，只相距400公里左右，真是近在咫尺。可是，茫茫的台湾海峡如一道无形的墙，将陈诚的墓地隔绝在水之一方。

青田的山，瓯江的水，在呼唤着游子的亡灵。故土才是归宿。

(责任编辑：仲文)

大型普及性新闻知识综合月刊

中国记者

新华社主办，征求
1993年订户。

“文字摄影并重、国内国际并重”是她的特色。普及性、知识性、可读性是她的追求。广大的新闻爱好者是她的朋友。

本刊代号：82-23。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北京新华社《中国记者》
发行组代办邮购。邮政编
码：100803。订价每册
1.95元。

欢迎征订



·徐剑

—

在西南边地，最早发现的感染艾滋病患者是一名外国人。那是80年代中期。这位出生豪门的欧洲人，常年浪迹青楼，终于染上了艾滋病毒。他明知黄泉路将近，便倾注一生的积蓄，云游天下。当他饱览了西双版纳的奇异风光、路南石林的神工巧斧的杰作后，到达滇池之滨的一家宾馆时，已病入膏肓了。开始身体表现为典型的感冒，从未接触过艾滋病的中国医生按照感冒施治，未见好转。宾馆只好请来春城最好的名医，一经检查，发现是艾滋病。顿时，整个宾馆乱成一团，与他同住一层楼的宾客纷纷逃遁，接触过患者的人，把自己衣服鞋袜统统烧掉，手洗掉了一层皮还嫌不干净。十几天内，几乎没有人敢光顾他下榻的地方，一些医院也借口条件不具备而拒收。这位异国游子最后在红土高原上闭上了自己的眼睛，害得他年事已高的白发老母，从国外包专机接运他的尸体回国。

一个异国他乡的艾滋病鬼魂，曾经搅得一个宾馆、一座城市鸡犬不宁，谣传纷纷。而当一群艾滋病魔影徜徉在这一片红土地上时，不啻如一个晴天霹雳。

1989年金秋，云南省防疫站50名吸毒病人的血清中竟发现了21份是棕色。这意味着艾滋病毒感染在我国西南边地出现了！

针对艾滋病在滇缅高原上横行，云南省政府由一位副省长牵头，调集全省最强的医务专家，组成强大的防治队伍，对边陲吸毒地区进行了地毯式的血清取样检验。但由于瘾君子队伍的不断扩大，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患者呈直线上升的趋势，据统计，云南边地吸毒所的艾滋病人已由1990年春天的146例发展到1991年秋天的400例。短短一年时光，艾滋病毒增长速度为200%。那么，造成云南边地艾滋病横行的罪恶之源在哪里呢？

二

源源不断的毒品来自罪恶的金

三角。

金三角位于湄公河流域，泰国、老挝、缅甸三国接壤之处。那里崇山峻岭逶迤连绵，山岚与云天衔接一体，终年阳光充足，气候适宜，土地肥沃，是罂粟理想的种植和生长之地。1852年，英国侵战缅甸之后，一家英国公司带来了罂粟种子，从此，罂粟花就一直在这块土地上盛开。

上世纪来，印度支那三国成了法属殖民地，殖民主义者颁布种种法令，鼓励当地的土著山民大量种植罂粟，法国的技术人员深入到越南西北部、老挝东部指导传授种植、提炼鸦片的技术。法国商贾组织驮队从金三角向自己控制之下的越南、老挝、柬埔寨大肆贩卖鸦片。20世纪中叶，鸦片生产恶性膨胀，毒液开始在中缅两国边民中漫溢，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金三角的鸦片并未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毒品生产基地。它的发展鼎盛时期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

1949年，蒋介石统领的“国军”节节败退，有着西南少数民族血统

的滇籍将领李弥，率领国民党第八军的数万滇籍官兵，在解放战争中，奇迹般地逃出了一代兵家林彪、刘伯承设下的包围圈，逃窜到滇缅高原，渡红河越怒江，沿当年中国滇缅远征军的进军路线，率残部潜入了野人山，在异国之邦开始了占山称王的流寇岁月。

这支国民党军队的残部既远离了故土和亲人，又失去了孤岛台湾的军事支援，数万官兵便与当地的土著结合，以种植贩卖鸦片来维持生计。而当时刚获独立不久的缅甸，又无力清剿，他们便在那里垄断了金三角乃至整个亚洲的毒品生产和

贸易，使其成为世界最大的毒品生产基地。

1961年5月，李弥的国民党第八军残部奉命撤回台湾，金三角的局势发生了逆转，畏蒙和坤沙两大毒品武装集团迅速崛起，从而主宰了金三角毒品生产发展的走向，进入了金三角的“黄金岁月”。

畏蒙，又叫罗星汉，祖籍中国。生于缅甸东部的掸邦果敢镇，血管流动着一半华人一半当地土著人的血液。从他的曾祖父流浪到缅甸后，一家祖祖辈辈就生活在果敢镇，成为当地的华裔首领。李弥残部进入缅甸之后，畏蒙参加了“国军”，并受

到了重用。1961年“国军”回台湾时，他眷恋故土，解甲返乡，推翻了当时统治果敢地区的杨氏家族，在泰缅边境上建立了一个为过境商人提供武装保护的保安公司。接着他又吞并了其它几个贩毒集团，正式建立起自己独立生产和提炼海洛因的基地和工厂，并组织了1000匹驮马的贩毒马帮，全面包揽了金三角所有的鸦片、海洛因的生产贩卖业务，成为名噪一时的金三角的一大毒枭，也是国际公认的统治金三角的毒品国王。

1973年秋天，畏蒙率领保镖潜入泰国清迈府夜丰颂做毒品交易时，被皇家警察逮捕，押送曼谷国家监狱审判。可不久就越狱逃走，潜入马来西亚，次年在吉隆坡又落入法网，遂被缅甸政府引渡回仰光，不明不白地从他所创造的辉煌王国中消失了。他庞大的毒品王国也随之分崩离析，但大部分人员投奔了继畏蒙崛起的坤沙贩毒集团。

坤沙可以说是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在世界上响当当的人物。他的汉名叫张奇夫，1933年出生于缅甸掸邦莱莫山弄占大寨，先祖也是华人，是掸邦莱莫地区世袭的土司头人。1962年，坤沙向缅甸奈温政府宣誓效忠，被任命为弄亮地区民众自卫队指挥官。他凭借着这支大型武装集团，称雄于整个掸邦地区，统领了那里的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和贸易，成为金三角继畏蒙之后的第二大毒枭。缅甸政府不能坐视坤沙的为所欲为，1969年10月，缅甸东北军区司令官丹定上校以召集军事会议为名，将坤沙诱捕入狱。

坤沙被押至仰光陆军监狱后，他的部下成立了“掸族联合军”，开始与政府进行武装对抗。1973年4月19日，坤沙部下张苏泉武装绑架了两名苏联医生，以此为人质要求政府释放坤沙。他回到了掸邦，整顿了队伍，形成严密的纪律和组织系统。然后从掸邦高原南移，长途

▽一名云南省德宏州的傣族男子，因多次走私贩毒被处决。临刑前，他最后一次抱着自己的儿子





△禁毒大会上,14名重大毒品犯罪分子被押赴刑场

迁徙到泰国清莱府的媚茅山一带建立了新的毒品基地。

时值70年代,美欧等国的年青一代在经历了性解放和越战的阴云之后,处于迷惘的失望之中,借以毒品来消遣人生。于是对海洛因的需求不断增加。坤沙抓住这一历史契机,迅速把队伍扩大到5000多人,并从欧美多国购进了大批现代化的武器,全面控制了金三角的鸦片生产。他不惜重金广揽人才,改进了海洛因轻化和纯化的工艺,生产出纯度很高的4号海洛因,即把海洛因的纯度提高到99%。

金三角的海洛因取道曼谷远销欧美大陆,数以亿计的美金也源源不断地流入金三角。

由于金三角的鸦片纯度高,价格低,国际黑社会趋之若鹜,每年的毒品输出总量占世界总量的一半以上,不断引发了暴力、抢劫、卖淫等一系列犯罪活动,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身心健康和许多国家的社会治安。一些国家的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各国首脑联合一致共同禁毒。国际刑警组织也相继组织各成员国进行全球性的扫毒,不仅要打击毒枭,焚烧毒品,更重要的是必须彻底拔除“生产—制作—贩运—销售—吸食”这条毒龙。

泰国作为深受毒品戕害的重要

国家之一,不惜耗费巨大财力,集中优势兵力对金三角的毒源区采取了代号为“狂飙”的行动。1981年1月21日拂晓,泰国12个连精锐部队在边防警察和猛虎队的协同下,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包围了媚茅山中的坤沙司令部。战斗打响后,泰国军队遭到了坤沙集团2000余人的顽强抵抗,双方激战三昼夜,坤沙司令部被攻陷,打死坤沙部下250人,伤200人,坤沙只好退回泰缅交界的掸邦多依郎村,重建新基地。

这次清剿虽给坤沙集团以沉重打击,但几年之后,坤沙集团竟又发展到15000人。

1989年,年近六旬的一代大毒枭坤沙,因不堪身患糖尿病的折磨,主动将其毒品王朝的皇冠禅让于他的得力部下,自己则改名换姓,乔装打扮远走他国作亿万富翁了。

尽管从金三角运往曼谷转口外销的毒品咽喉要道被泰国军警扼住了,但毒枭们的目光开始从南部北移到中缅边境。于是,这片曾经根绝了30多年的烟祸,又重新面临着白色恶魔的冲击和挑战了……

三

啊叮——中国南疆最遥远的边城。碧水悠悠的瑞丽江蜿蜒西去,淌出一条天然的国界,若夏日晚霞消失的时候流连于江堤上,江中心裸

现着青春胴体沐浴的男女青年,会让人分不出哪些是中国人哪些是缅甸人。

30年前,中国总理周恩来与缅甸总理吴巴瑞在版纳首府会晤,圆满地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两国边界问题。但在2000公里的边界上,无天然屏障,多数地方是两国一山,或仅一水相隔,有的只是“一屁股坐下去就是两个国家”的田埂。

金三角的罂粟花,已经跨越了这个历史界碑,伸进了我方一侧的广大山寨傜乡。据统计,瑞丽县200多个自然村,吸毒的有189个,占自然村总数的91%。1988年该县有吸海洛因和鸦片者2500人,占全县人口的3%。瑞丽县所在的德宏州吸毒不断蔓延,从吸食鸦片到炼制毒品,由社会上发展到机关内部,甚至连年龄不足13岁的小学生已成了瘾君子。1985年,全州发现吸海洛因的有331人,1989年发现了3713人。据公安部门统计,与缅甸接壤的云南思茅、临沧、德宏、西双版纳四地的吸毒队伍已逾3万人以上。

孟连县的老高寨,是一个拉祜族居住的山寨,全寨12户人家24个劳动力,就有15人吸大烟。人均口粮只有166斤,全寨只有3头牛,有5户人家住房平均不到10平方米,全寨总收入包括粮食折款仅有6000元。1989年春天的地震之后,国家给每户发了一对锑水桶,一把锑水壶,一个三角架,一口锅,许多人家都把这微薄的带有现代都市生活印记的小东西,拿去换大烟抽掉了。山青水秀的山寨被毁掉了,大片土地荒芜,老高寨人称为鬼寨。

当过生产队长的扎努,70年代曾带领全寨人开荒造田,盖房办学,成绩突出。当他结婚时,驻地的解放军专门送给他家一头大肥猪,以感谢他在保卫祖国边疆中做出的贡献。他成了当地拉祜族农民心目中的英雄。后来由于他抽上了大烟,家里的东西卖光了就偷,附近村寨里

的鸡、狗、猪、粮食，只要能换成大烟抽的，见什么偷什么。为此，乡里专门把他送进戒毒所。出来后，补助他的钱和粮食、衣物等生活生产工具，又很快被换成了大烟土。1986年乡党委开除了他的党籍，现在一家人生活靠妻子带着两个孩子给别人帮工。

在西双版纳州景洪县芒伞乡的光明村，这个有58户人家的哈尼族村寨，三角竹篱笆里，住着一户姓车的人家，篱笆没有一颗粮食、一床被褥、一件衣裳、一个锅碗瓢盆，唯一的物件是一尺多长的黑色大烟枪放在地铺头上。夫妻俩因吸毒成瘾瘦得一身肋骨，无力参加劳动，靠在寨子里吃“百家饭”。

游荡在中缅边境上的毒品，不仅冷酷无情地把瘾君子拉进了贫困的泥沼地，而且也毫不怜悯地把一些优秀人物沦为囚徒。

瑞丽县有一位派出所所长，过去在边境缉毒斗争中先后缴获了3000多两烟土，多次立功受奖，并受到了公安部长的接见，参加全国演讲团到各地介绍事迹和经验。在自我沉醉之中，他却轻松悠然地吸起了海洛因。于是，缴获来的海洛因，由他尽情享受，终于东窗事发，八次进了戒毒所，仍不可救药。

在中缅边境的芒市、畹町、打洛等重要口岸上，每天从缅甸那边来中国边城做生意的商贾小贩，他们日出而来，日息而归，进出关口多，与我国边民交往频繁，吸毒、卖淫、走私等犯罪活动也屡屡发生。和平安谧的边寨已失去了昔日的宁静，纯洁的丽江水呜咽着一支悲歌。

四

春城昆明，是镶嵌在滇缅高原的一颗明珠。但是，这座美丽如画的城市，也流进了罪恶。据有关部门统计，这座城市现有瘾君子8000余人。虽然这是登记在册的数字，未上册或还没有发现的吸毒者究竟有多少，那永远是一个用电子计算机程

序也难揭开的谜底。

黄昏时分，在这座城市的火车站和著名黑市交易场塘子巷一带，三五成群的社会无业流氓聚集在一起。每个人的怀里都揣着美金、宝石、录像带抑或是化妆品、打火机之类的东西，而一些黄货（黄金）、白货（海洛因）、黑货（从古墓里挖出的古董）则是通过秘密的渠道交易。在东郊一个热闹集镇上的茶馆里，一天下来，近百万的买卖就在喝茶聊天之中敲定了。大批的毒品也从这种黑市源源不断地流向了社会。这里不妨撷取一些镜头，对这座边城的吸毒现象进行一次扫描。

镜头之一：在通往当年清兵总管吴三桂夏官金殿的路上，一家个体户餐馆里，有一对穿着时髦正在吃喝的青年男女。突然间那年轻女郎从椅子上滑到了地下，口吐白沫，浑身抖索，男青年发疯似地跑到厨房要了一碗冷水，然后从包里掏出注射器，兑上一小袋海洛因，挽起女人白嫩的手臂，缓缓地注射。顷刻间，那年轻女人缓过劲来，气色也红润了，还显得格外精神。事后她对人说，我的毒瘾一发作，身上感觉到有万只蚂蚁在咬我的皮肤，吸我的血，折磨得我死去活来，这时候让我吸一口“白面”，最好打一针，你叫我干

▽娱乐：对受劳教人员的一种心理治疗

什么都行，死了也不管……

镜头之二：在闹市中的一间民舍里，住着一个女人王国，一位母亲和三个女儿。这四个女人个个骨瘦如柴，嘴唇紫黑，神情冷漠，仿佛黑熊獠牙的现代都市距离她们十分遥远而陌生。这是个十足的瘾君子女人国。为了维持四个女人吸毒的费用，母亲和大女儿先后下海当了暗娼，已无法上学的二女儿和三女儿与街上的小流氓群宿群奸，吸毒鬼混，终日不归家。最可悲的是大女儿生下的一个小女孩，在母亲的子宫里就受到了毒品的侵害，现在一嗅到大人吸吐的云烟，就兴奋得喜笑颜开。当母亲吸毒赶不上顿时，她则昼夜啼哭，弄得四邻不安。

镜头之三：1990年深冬，云南省公安厅缉毒部门向社会各界通报了一些吸毒者残害幼童的罕见要案，其惨象骇人听闻。

受害者是一个不足三岁的女童。这本是一个拥有数十万元的个体户家庭，夫妻因吸毒堕入泥泽而不可自拔，家境变得一贫如洗，父亲则因贩毒成了阶下囚，母亲只得靠卖淫换取毒品，可怜的小女孩就被送给一名女贩毒犯。这个女人竟然把毒品放在小女孩的阴部以蒙混过关。最后这个狠心的女人又将其转



送给一男一女吸毒者。

这两个男女因长期吸毒，心理人格已异化和变态，每次吸毒之后，他就成了残暴的性虐待狂，把小女孩剥得一丝不挂，用烟头烫，鞭子抽，身上痂痕累累，血流不止。当警方闻讯赶来把这个女童从魔窟里救出来时，她已奄奄一息。

镜头之四：一个夏天的清晨，某医院的值班室里，一个漂亮的姑娘背着一个口吐白沫、鼻口流血的男青年前来急诊。医院尽了最大的努力，终于没有挽留住一个滑下深渊的灵魂。当男青年的尸体被一张白床单覆盖住最后一个痛苦的表情后，年轻的姑娘哭得死去活来。她好后悔啊。原来，当天晚上，这两个瘾君子从走私犯那里买了两包海洛因，找了一个隐蔽的房间偷吸，寻求强烈的刺激和快感。两个人吸完一包后，到了深夜二点多钟，男青年仍觉得不够痛快，又单独吸食了半包，不料一会儿就呼吸困难，眼睛发直，不省人事。姑娘见势不妙，左右开弓打了他两嘴巴，也不见反应，等送到医院时，为时已晚。

镜头之五：一个17岁的男孩子趁他父母出差之际，把自己反锁在屋里，给母亲和警察写下了两份遗书，然后，痛苦地拧开了煤气开关，静静地躺在床上，永远地解脱灵与肉的折磨和痛苦。四天之后，人们循着奇臭无比的肉腐味，发现了他的尸体和遗书。且听听一个死魂灵的痛苦诉说：

“尊敬的警察：

自今年初染上毒瘾，我只得离开工作单位到社会上鬼混，每日在外偷窃、骗钱……

我很后悔，但已无用了，唯有选择死亡来解脱污浊的躯体与灵魂，这才是我最后的路！……”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终于大彻大悟了。

镜头之六：尽管监狱的法警送来了最后一顿丰盛的饭菜，他已经

无心再去品尝，从生命的摇篮坠落到人生最后的巢穴。在生与死的临界线上，他却对金钱与人生、幸福与厄运、罪恶与忏悔等进行了一次冷峻的思辨。

他刚过而立之年，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他很想的商品交换的市场上大展其才干，但遗憾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致富心切，一上路就卖海洛因，想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他匆匆购买了7568克的海洛因，自己向境外贩卖了5780克，被公安局查获，临刑前，他给妻子写了最后的遗书：

“亲爱的爱妻：

……1990年这一天，我接到了最高法院“裁定书”，死神终于挑选了我……

我死后，你不要太伤心，女儿全托给你了，你要答应我，一定要将她培养成材，要让她上大学，教导她懂得什么是甜，什么是苦，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同时嘱咐她不要过分追求金钱和物质，避免陷入违法的泥坑。

最后让我在信中吻你，吻女儿！永别了！

丈夫绝笔”

这是一个走向冥府时复苏的灵魂，假如再给他们一次生命的机会，他也许会带着深深的忏悔去重塑人生。可惜，现实生活里没有假如，当你的一切都醒悟过来时，已经晚了，第二天他的发财梦被一颗呼啸的子弹划下了一个喋血的句号。

镜头之七：我在这座中国最大的戒毒所里采访，从一辆警车上带下来几个强制戒毒的女青年。她们一个个穿着时髦、天生丽质，一双双放肆和冷漠的眼神，仿佛在诉说她们人生旅途上那一幕幕神秘而又不堪回首的苦难历程。

被关进房间不久，她们的毒瘾发作，歇斯底里的尖叫和如雷的哭声划破了大墙里的宁静，又是用头撞墙，又是乱扯衣服相互厮咬，血水

口水汗水印满了一地，她们肌肉发紫，冷得直打哆嗦，有的使劲地敲门，哀求地喊：“让我吸一口，行行好吧！”戒毒所的同志说，这是戒毒中最痛苦的时刻，为了让她们安静下来，只好让她们喝掺有镇静药的葡萄糖水。

几天之后，她们的毒瘾开始得到抑制，精神状况好转，我开始了采访。一位16岁的女孩子，笑盈盈地走进了谈话室，虽然神情疲惫，仍然掩饰不住她迷人的姿色。

未等我开口，她一语道破了天机：“你们是不是想从我身上找一本‘密码’去研究研究，然后写成文章发表，供人消遣消遣。我全不在乎，我是作茧自缚，自己毁了自己呀……”

“我有一个很幸福的家，父母都成天忙自己的事，很少有时间管我，我奶奶一直带着我，但父母每次回家来对我的爱特别慷慨，要什么买什么，街坊上的年轻人都喜欢与我交往，我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吃喝玩乐。有一天，一个比我大的男孩子和我呆在房间里，他说，中国人活得没意思，太累了，处处都要受限制，外国，不仅会上赌场饭店，还会享受精品。我问他什么是精品， he说是白粉。我吓了一跳，白粉不就是毒品吗？他笑了一声：那是中国人说的，那玩艺神了，吸上几口，就觉得身子飘进了天宫。从此，他向我打开了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个晚上，他来我家，给了我一支外烟。在这之前，我早就学会了抽烟，可这天晚上，我吸了一口就觉得很苦。他神秘兮兮地说：“吸嘛，一苦二香。”我跟着又吸了两口，顿时觉得天旋地转，一股热流涌向了全身，身体像离开了地面。他看到我的脸上飞起了红云，才笑着说，你现在感觉如何，身体飘起来了吧，我只在烟里放了那一丁点白粉。我自知上当，但身体很需要他的爱抚，他似乎从我的眼神里感受到了这种欲望，扑过来轻轻地吻我，呢

喃地说,我们一起跳舞吧,外国那帮嬉皮士吸过大麻海洛因之后,就喜欢脱得一丝不挂,男男女女搂在一起跳裸体舞。我们也学着享受享受。他的手很利索,很快就把我剥得赤条条的,最后,他也赤裸着,我们搂抱着、旋转着、摩挲着,醉陶陶地倒在地毯上。一阵强烈的撕裂感结束了我的少女时代……

“以后,我陷得越来越深,学着西方的嬉皮士往自己赤裸的身体上涂颜色,边吸毒边跳舞。父母给我买的漂亮衣服、首饰都被我变卖了,后来甚至连奶奶出嫁时娘家送的金银首饰玉镯,都被我偷走了,气得老人大病一场,再也不要我啦。我无家可归,就和那群小痞子到处游荡……”

她哭了,也许这是从她那荒芜的心灵上流出来的真诚的悔恨的泪水。

镜头之八:一位缉毒手里给我捧来了一大摞他的工作手记,夜晚,昏黄的灯光下,我随手翻开那一行行记载着戒毒者迷惘与挣扎的灵魂炼狱实录。

“我是边疆农场的一名职工,与境外仅是一河之隔,出国比走趟亲戚容易。有一天,我跟一位朋友到农场附近的一家山寨喝喜酒,喝得酩酊大醉,晚上住在一户人家的竹楼上。这家的男主人早已过世,留下女主人和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我那晚在她家吐得一塌糊涂。可他们一点也不嫌弃,又是烧酸菜汤帮我解酒,又是端热水替我擦脸,使我有到家之感。以后,每逢节假日,我就买上点心礼物去看望女主人和她的女儿们。帮着干些活,女主人很中意,不久就认我为干儿子,还说,三个女儿随便让我选一个做媳妇。我是领国家工资、吃商品粮的,自然比她们有一种优越感,权衡再三,我毕竟是边野之地的农业工人,想找城里的姑娘比登天还难,就这样,我和她家的大女儿结了婚,当了上门女婿。在这个很长时间没有男性的家庭里,

我生活得很惬意,岳母、妻子、小姨妹都把我当宝贝一样供奉着。

“结婚三年,妻子生了一双儿女,她却一天天苍老了,让人激不起一点情欲的波涛。我回家也没有过去勤了,百无聊赖之中,我就跑到河那边去看录相,一次掏两块人民币,什么漂亮的外国女人都能看到。开始是晚上偷偷越河界,第二天凌晨跑回来,后来入了魔,白天要5元钱的过路费也得干。对方的集镇上简直就是一个万花筒,贩毒赌博卖淫,什么都有,谁也不会管。一次路过烟馆,我不由得想进去看看,谁知一进去就走不出来了。随即,我开始了一个罪恶计划:因我的荣辱与这个家庭四个女人的命运是拴在一起的,岳母早年丧夫,但脸上仍残留着还未最后褪尽的春色,而两个小姨妹与我更没有长幼之分,我就这样动手了,武器就是从河那边买来的“白粉”,让她们先吸,吸到最需要的时候,一点羞耻感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是心理和肉体上的依赖。很快她们一个个都成了我的猎物,什么时间我要其中的一个,都能够如愿以偿,她们彼此都心照不宣,但谁都不会把这腌脏的事捅出去……

就在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把我推向了绝境。那天傍晚,我从农场往家里赶,临近山寨,已暮色降临,路过河边的竹林时,发现我的小姨妹与邻寨的一个汉子紧紧地搂在一起野合,我一时怒从胆中生,脑子嗡地热了,掏出牛角刀就往那男人身上猛刺……

“我进了大狱,我岳母、妻子还有两个小姨妹对我仍然相好如初。她们拒绝出庭作证,还到处为我上诉喊冤。我说,别喊了,我不冤。要说悔恨的话,千不该万不该被那美丽的罂粟花迷住。”

五

亚洲有两大毒品生产基地。

一个是历史悠久产量最高的中

缅边境缅甸与泰国接壤的“金三角”。另一个是近年崛起的中国西部与孟加拉国、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等西亚诸国接壤的“金新月”。

这两大毒品基地不仅从地域状况上酷似三角和一弯金月,故获得了一个美丽而又神秘的名字,更重要的是从地理上座落在我国最古老的南北丝绸之路之上,从西南西北向内地辐射中原古都西安。

南丝绸之路被浩瀚的史籍和茫茫的林海的积尘淹没了,远没有北丝绸之路出名,但它却是最古老的。它从长安出发,跨入百里秦川,经褒斜栈道入汉中,然后过巴山蜀水,由成都西去入滇,经楚雄、大理州、保山地区,沿怒江大峡谷入缅甸的克钦邦,而经印度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大陆。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汉武帝元狩元年,汉朝使臣张骞出使西域大夏国,见到了天府之国生产的蜀布和西昌的邛竹杖,不免大惊,忙询问大夏国国王,得知是从西南的博南古道流入西域。出使归国后,他说游说汉武帝,讲了西南古道的影响,终于使这位一代英明之君洞开了天朝宫门,使长安城下的商旅沿朱雀大道经北丝绸之路走向了遥远的西域和爱琴海岸……

最近几年,这条沉寂了百代的丝绸之路突然开始“热闹”起来,西南边地金三角的毒品沿着南丝绸之路回流,闯过一道道关口,流进昆明经成昆线进入成都,然后漫向西安、兰州等地,与“金新月”的毒品基地连成了一条。

在人类迄今所有的商品交换领域里,惟有贩毒的利润最高。尽管随时都可能掉脑袋的危险,可仍有许多贩毒分子不惜拼上身家性命去孤注一掷,只要一次得手,一夜之间就会由街头流浪汉变为百万富翁。因此,在漫漫的西南故道、怒江大峡谷里,常常会看到一批贩毒分子落入法网,而另一些铤而走险的毒贩子又踏上了通往金三角的危途。近

炎黄历历明

魏传统

自强养性灵，

求是看浮沉。

乾坤难一体，

日月同运行。

天堂自有路，

地狱岂无门。

乞诈何时无，

炎黄历历明。

一九九二年十月八日

年来，贩毒活动更趋向于大宗化和武装化。开始，从金三角运往我国境内的毒品，多是夹杂在来往于滇缅公路上的大型卡车的货厢里，有的巧妙地放在罐头里，有的把白面装进避孕套、有的吞咽到肚子里或塞进阴道和子宫。一些国际贩毒集团和贩毒分子，搞大宗贩运就广泛使用武装保护。贩运数字由此急剧上升，仅一年九个月破贩毒案 4961 起，7737 名贩毒犯落网（其中外国和港澳台毒犯 1200 多人），缴获毒品 3999.89 公斤，其中海洛因 2725 公斤。

这是已经查获的，而更多未查获的，早已出境或流经成都转道西安，从古丝绸之路出去了。金三角和金新月的毒品纷纷向黄河流域、三秦大地涌入。一位长期羁留于军旅的领导干部，偶然出差回一趟西安远郊的老家，暂短停留中，发现故乡的厚土上不仅出现了罂粟花，还有不少家庭因吸毒而导致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他惊呼“金三角的毒魔跑进长安城了！”

其实何止金三角的毒品呢，相接成一条黄金路的金新月的毒品，已在不断地向西安城进攻。金新月的毒品产地主要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伊朗接壤的地方。其中以阿富汗的毒品产量最高，据联合国的一项报告称，1990 年阿富汗鸦片产量逾 2000 吨，已成为世界上

第一鸦片生产国。阿富汗的鸦片产地，主要集中在阿巴边境的兴都库什山区和赫尔曼德河谷。这里是亚热带半湿润地区，土地肥沃，有良好的天然灌溉系统和丰富的雪水。苏军侵阿后，大批的圣战抵抗者就通过种植鸦片大麻，制成毒品以换取武器。这就使位于阿巴边境之间的佳伯栈道的毒品生意空前兴旺起来。因这里的交易极易脱手，从中国西南偷运出来的部分毒品，也就从西北部地区往西亚贩卖。特别是在原古丝绸之路上的伊朗，自两伊战争后，吸毒人数猛增，是迄今世界上吸毒者占人口比例最多的国家。据官方统计，在全国 5500 万人口中，吸毒成瘾者超过了 200 万，是贩毒者一个重要的潜在市场。更主要的还在毒巢“金新月”毗邻的印度种植鸦片是合法的。由于美国约翰逊、佩尼克制药公司需要大量的鸦片及衍生物制造用于止痛的咖啡，便对其种植鸦片予以巨资补贴，实际上就在资助印度的海洛因生产。1989 年美国白宫的一个白皮书指出，现在印度库存的鸦片已达 2000 吨。所以国际贩毒集团在香港等转运渠道被中国警方封堵后，就纷纷通过南临“金三角”，西接“金新月”两大毒巢的交通枢纽成都，把大量“金三角”的毒品沿着南丝绸之路倒流回运天府之国，北向长安，然后踏着古丝绸之路的故道，从人迹罕见的大西北

把毒品偷运出境。于是，当年象征着中外文化文明进步的丝绸之路罩上了一层浓浓的毒雾……

最近几年来，在云南通往甘肃的南北丝绸之道上，活跃着一群群组织严密的贩毒团伙。他们与西亚诸国的穆斯林，语言习俗十分接近，进行毒品交易容易得手。他们有严格的分工。一般从中缅边境的瑞丽、畹町、芒市至大理的下关，我警方设卡布点，检查甚严，便由当地的贩毒分子把毒品想法搞上来，在当地或在昆明交给西北“军团”，由他们押送前往西安、兰州，然后交另一批人偷运出境。有的甚至从“金三角”接货后，就暗地进行武装押送至昆明或成都，再转道出去。虽然云南警方多次严厉打击，西北“军团”竟然像滚雪球似的一年比一年扩大。有的是夫妻联袂，有的是父子组“团”，还有的是兄弟结帮。

美丽神秘的罂粟花已随着贩毒的西部“军团”从“金三角”来到了贺兰山下安家落户，从零星种植发展到大面积的种植，从家庭院落走向责任田栽种，出现种植罂粟为主的“专业村”“专业户”。据飞机航拍和警方进山侦察，莲花山、子午岭林区种植鸦片已成如火如荼之势，甘肃西部地区种植罂粟花，从 1988 年的五六个地区，发展到 1990 年 14 个地区、市。

（责任编辑：刘家驹）

要找寻炎黄时代的古文字

胡厚宣



唐兰先生曾经在1935年写过《古文字学导论》，1949年又写了一本《中国文字学》。他当时的主要论点是说，文字的发生在夏以前；又说中国的历史还是应该从黄帝开始，中国有6千年左右的文明史。在山东发现大汶口文化遗址以后，唐兰先生连着写了四篇文章，强调中国的文明史有6千多年。这个观点曾经引起了不同意见的讨论。我想到，《荀子·解蔽》篇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韩非子·五蠹》篇说：“古者

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好书者众矣”，说明发明文字的不仅是仓颉，仓颉所以独传者，是因为他专门研究文字。仓颉是黄帝的史官。《汉书·古今人表》，许慎《说文解字·序》，还有好多书里都说得清清楚楚。我从前看了唐兰先生的著作，又看了有关仓颉作书的古书，当时觉得这真是一种传说而已。但是后来我反复学习研究，感觉这个传说还是有根据的，什么道理呢？就因为我这些年学习研究了甲骨文字。

甲骨文从1899年我们才认识，到今天已经发现得很多了。国内有9万多片，香港台湾有3万多片，国外13个国家有2万多片，一共是154604片。

最近在安阳又发现了一坑。这一坑到底有多少，现在还没有正式公布，我还不清楚。自从商亡后，殷墟不知道经过多少次的破坏。我们发掘商朝大墓时，发现有早期的破坏，有晚期的破坏，有近代的破坏，所有的大墓里面都是经过盗掘的。甲骨文如果不经这些破坏，不知道有多少，是大量的，数字我们难以估计。

最近，考古所在殷墟发现的大坑，同当年的127坑可以媲美。有很长的文章，有完整的大龟，有很重要的材料。1936年挖掘的127坑，我参加了整理，一共是17000多片，里面都是大龟、大字、长文。这些甲骨文字

已经很成熟，很进步，决不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说文解字·序》里所谓的“六书”，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在甲骨文里都可以使用，特别是假借字相当多。根据这些残余的甲骨文字，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生产的发展、统治机构、地理分布、社会组织、阶级关系、文化、科技。最近关于商代历史的热门，天文、历法、星宿、年代、农业、气象、蚕桑、纺织、田猎、战争、奴隶、俘虏、文学、科技，各方面都有争论，都有研究，都有文章和书。我们前天请香港的饶宗颐教授讲演，就是讲的卜辞文学、商代文学。我们研究甲骨文不仅是研究它的文字，还可以从中研究商代各个方面的历史，特别是商代的社会性质。

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甲骨文以前就没有文字吗？好多人都估计，甲骨文以前文字至少还有一千年的历史，甲骨文决不是原始的文字，决不是中国文字的起源。盘庚迁殷至纣灭亡，有273年，商朝前期的文字在哪里？商朝以前的文字在哪里？全国的考古学界和古文字学界都注意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仰韶文化时期，西安半坡、临潼的姜寨，有很多的陶文，经过C₁₄的测定，是大约在公元前4900年到4200年左右。大汶口的文化，是公元前4300年至1900年。龙山文化是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陶器上的姑且不算文字吧，就是刻划。

上海博物馆沈之瑜馆长，一定要陪我到青浦去看看。我看了以后，感到实在是伟大。这个玉器实在好，上面有刻纹。良渚文化最主要的在浙江，还有上海附近的马桥。我们现在不敢确定，良渚文化这么进步的文化有的一些什么。另外好多地方，都在找甲骨文以前的文字。例如，河南舞阳发现一个字，曾经拿到北京来给我看，我确定说这是文字。陕西考古所有两位同志写文章说，发现史前时代商以前有文字，也拿来给我看。我说这也是文字。另外山西南部一个文化堆里也发现了文字，拿来给我看。山东长岛也发现了古文字。这一看也像是文字。但是有一个问题，材料太少，还不能跟甲骨文衔接起来。现在我们全国的考古学界、古文字学界、古史学界、古地理学界要结合起来，找寻炎黄时代的古文字，找寻甲骨文以前中国原始的文字，一定还有很辉煌、很长期的历史。

（胡厚宣：河北望都人，81岁，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



齐越的话筒生涯

●刘淮

“北平新华广播电台， 现在开始播音！”

1949年1月31日晚8时许，北平西长安街3号国民党北平广播电台播音室。一个面容苍白瘦削的男播音员正在值班放唱片。厚重的门被推开了，一位身穿灰色军服，佩戴白底蓝字“军管会”臂章的高个儿男青年走进来，表情严肃地递给他一张纸条，示意立即播出。于是全北平听到这样的声明：

“各位听众！从今天起北平宣告解放。本台奉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立即停止广播，等待接管。从后天，2月2日上午起，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将使用本台原来波段播音，请注意收听。”

从此北平上空再也听不到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和靡靡之音了。这一

天，国民党傅作义将军与中共代表的和平谈判达成协议，国民党军队开始撤离市区，人民解放军入城接防，电波马上开始向四面八方传播着令万众欢腾的消息：“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在众多的女声播音中，出现了一个高亢激昂气势磅礴的男声，他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高个儿青年——齐越。

当年他27岁，原是北平的中学生。抗日战争时期，化装通过日军封锁线去大后方，考入西北大学外文系学俄语。由于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当局通缉，1946年奔赴解放区。先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社，后调新华社口播部当编辑。1947年8月16日，他又调到口播部的播音组。从此，齐越开始了他的话筒生涯。

选中他主要是形势的需要。那

时，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发起强大攻势，捷报频传。广播战报，对国民党官方讲话，宣布俘虏名单等等，迫切需要刚劲有力的男声。而齐越，口音纯正，又有朗诵的才能，试音以后，中选了。齐越先学会了播记录新闻，接着参加对蒋军广播。3个月以后，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打电报表扬他，说：这个男声播得好，很有培养前途！

1948年5月下旬，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音组迁到河北平山县以西的张胡庄，编辑部设在陈家峪，距党中央所在的西柏坡两公里。9月24日晚上，编辑部传来重要消息，播音组长孟启予抓起稿件飞跑进播音室，激动地宣布：“各位听众！现在播送刚刚收到的济南前线捷报：进攻山东省会济南的人民解放军，已经完全占领商埠和外城全部，现正在内城进行最后的巷战。……”

捷报刚刚播完,电话铃响了,耳机里传出编辑急切的声音:“不要结束!还要播解放济南的消息!”啊呀,晚了!播音员已经道了“晚安”。编辑部领导当即决定:不关机,加播号外!女声男声轮播,多播几遍!

齐越和孟启予拿起稿子跑进播音室,这时播音刚刚结束不到一分钟。

“陕北新华广播电台,XNCR!各们听众,人民解放军今天下午5点钟全部解放济南,全歼守敌,无一漏网,战果正在清查中!”

接连播了七遍,才算结束。这个号外能有人听见吗?齐越有点担心。

听见了!就在这时,一支部队正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即日起改名为北京。同一天,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

10月1日北京举行开国大典,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同时转播实况。播音组副组长丁一岚和齐越担任实况广播员。

三时整,天安门广场上的军乐队奏出《东方红》,毛主席走到城楼检阅台中央。齐越在城楼西侧立即对话筒播出:“各位听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就要开始了。现在,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登上天安门城楼……”

在国歌乐曲声中,毛主席按动了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上升。齐越望着蔚蓝色天空中飘扬的国旗,禁不住热泪盈眶。

阅兵式开始,朱德总司令乘车检阅东长安街上的三军部队。接着各兵种以分列式陆续进入广场,通过主席台前。收音机里传出了齐越昂扬的声音:“现在,人民海军的队伍最先进入广场……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海军队伍。”

装甲部队在地面隆隆行进时,天空中出现了涂着“八一”军徽的飞机,编队飞过天安门上空。广场上的人群沸腾了。帽子、手绢、报纸飞舞起来,欢呼声如海潮。这是新中国第一代年轻的空军,其中有驾机起义的国民党空军军官,也有他们的先行者刘善本。他是第一个驾机飞往延安的国民党上尉,正是听了延安新华台的广播,他才毅然脱离国民党寻求光明的。此刻他正飞抵广场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几十万群众的检阅。

当最后一队骑兵奔驰过去,天安门广场各色的灯亮了,异彩纷呈的焰花升向天空,瑰丽难灿。群众开始提灯游行。欢呼声震天动地。

晚上9点20分,毛泽东主席宣布大会结束。

这时,丁一岚和齐越在话筒前已站了近7个小时,可他们一点也不觉得累,越播越起劲。这两位播音员以无比豪迈的气概播了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情景,向亿万人宣告:巨龙醒来了!东方破晓了!他们——丁一岚和齐越,便是那引吭高歌的金鸡!

周总理与“周总经理”

一天晚上,新闻节目中有一条消息是周恩来总理接见资本家,人名、职务一大串,有如绕口令,齐越播得有些吃力。忽然,连他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把“周总理”播成“周总经理”了。他当时就发觉了,特意重复一遍以示改正。新闻播完,齐越写了检查。这是一个事故,一个政治性错误。

在党支部大会上,工会会员大会上,齐越又作检查。怎么错的呢?齐越当时说不清,他说:“这条消息是周总理接见各私营企业的经理,通篇都是这个经理,那个总经理,……我就顺口一溜,播错了。”

检查没有通过。总支书记、中央台副总编辑温济泽问他:“1948年,你播3000字的中央文件时为什么没有出错?现在播一条几百字的短消息反而出错呢?”

那是1948年5月29日,在张胡庄播《中共中央关于1948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3300字,当时的编辑部主任温济泽指定齐越播,给他写了一封短信:“今天播送的中央指示,十分重要。主席亲笔指示,叫不要播错一个字。请你们万分注意。”时间紧迫,离播出只有一个小时。齐越不敢有丝毫懈怠,集中精力阅读和领会文件精神,同其他播音员研讨具体播法,结果无一字播错。而今短短几百字,怎么就错了呢?错得这么荒唐!副署长范长江以他一贯幽默的口气批评道:“咱们国家又不是开铺子,哪来的经理,怎么能有个总经理呢?不应当出这样



▲参加接管小组接管国民党北平电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

在北平线上的山村振臂高呼:“打得好!干得漂亮!”“学习华东野战军,打大歼灭战!”在国民党统治区那密不透光的房间里抄收陕北台新闻及文告的地下党员,在椰林蕉林中企盼祖国解放的海外华侨,都眉开眼笑。甚至那些坐卧不宁、寻觅出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也在倾听。共产党进军的战鼓越敲越响了!

就在这战鼓声中,齐越和陕北台的全体工作人员从太行山下的土窑洞开进北平国民党电台的西式楼房。

开国大典实况广播, 全球洗耳恭听!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

的错!”哄的一声台下笑了。齐越没笑,他心里难受。

一天,齐越同孟启予、丁一岚在中央台接待室会见了一位身材瘦削衣着朴素的女同志,是她点着名要见延安台和陕北台播音员的。她一见到他们,非常地热情,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原来解放前她是上海的地下党员,常躲在地下室里抄收延安台和陕北台的广播,交给同志编成小报,秘密印发出去。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时刻,她听着那遥远的亲切而有力的声音,心里盼望有一天能见到他们,道一声“辛苦”。现在,她的愿望实现了:“感谢你们,是你们把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传播给我们,使我们在黑暗中见到光明!”她一再致谢,齐越却避开了她热情的目光。唉,如果她知道眼前的人,出了那么大的纰漏,她还会这样看着我吗?

左荧是齐越的入党介绍人,延安时期的老同志,他找齐越谈心,说:你在党的广播事业中做了几年播音工作,它的重要性你是知道的。任何革命工作的成果都是一点一滴取得的。革命事业要靠千百万人在不同的岗位上付出心血啊!

为了不再出错,齐越采取了防范措施。如保证播音时有充沛的精力,他合理安排作息时。准备稿件时,用符号标明:“加重语气”、“断句”,“前后句须连贯”等等,决不草草浏览,仓促上阵。遇到拗口或容易念错的字句,标明警觉符号,格外小心。他兢兢业业,一字一句体会稿件中的思想感情,全身心投入。

从此,他再也没有发生过差错,播音的技艺日益精进,逐渐形成了他那雄健有力的个人风格。

我离不开话筒啊!

“齐越,低头!”

“低头!低头!!低头!!!”

台下狂呼乱叫,台上几个大汉,有的强按着齐越的脑袋,有的拧胳膊,

膊,但稍一松手,齐越又昂起头来,两眼喷着怒火。

时间:1966年一个夏夜。

地点:北京复兴门外广播剧场。

“造反派”头头当场宣布:由于齐越态度恶劣,抗拒群众运动,立即停职反省!于是,没收了他的出入播音区的证件,从此,他被迫离开了他为之呕心沥血20多年的战斗岗位——话筒。

齐越每天坐在小黑屋子里“停职反省”,写交代材料。他昔日的战友,著名播音员孟启予、丁一岚,无一幸免。寒冬来临,不知是哪个造反派头头想起,让“牛鬼蛇神”在屋里写材料,太便宜他们了,便把他们赶到楼道里“摆摊儿”,进行活人展览。齐越的“摊儿”设在广播大厦三楼“勤务组”门口,一张方几,一个小凳,墙上贴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齐越必须低头认罪”的大字标语,还贴着一幅漫画:一条毒蛇张着大嘴,凶狠地吐着芯子,画下面写着:“没有冻僵的毒蛇。”这显然是借用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里的话,指齐越是反动派。

1969年国庆节前几天,齐越、丁一岚等被召集在一起,“革委会”成员告诉他们这一伙“牛鬼蛇神”:节日快到了,要保证首都的绝对安全,必须立即离开首都,到郊区农场去,因为他们都是“不安全因素”!

齐越心中一阵阵发冷。从开国大典起,他和丁一岚一直站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旁,转播检阅海陆空三军的盛况和群众游行的欢乐场景。那时候,他是“安全因素”,受信任受尊重,1964年,他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忠心耿耿工作了20多年之后,反倒成为“不安全因素”了?

但他哪里知道,“四人帮”派驻广播局的“联络员”已经到播音部,指示专案组“要特别注意齐越”。看来上边有人对他着实不放心里。

节日过后,“恩准”回家,齐越常

常在黄昏时分独自一人走到广播大厦对面的人行道上,隔着马路凝望。依旧是灯火辉煌,编辑、播音员、机务组的同志们,想必又忙得团团转,但是他齐越却站在一边,无所事事。费寄平、夏青、葛兰这些他亲自选拔和培养的著名播音员也都靠边站了。齐越的眼睛搜索着大厦第四层楼上的一面窗户,那是播音部备稿室,曾是他朝朝暮暮伏案的地方。有多少篇振奋人心的消息、通讯、评论,在灯下经他仔细地准备、练读,并且用笔标明哪里是重音,哪里该停顿,哪里上下语气要连贯……,这一切,伴随着他青春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泪水涌上他的双眼。嘲笑、谩骂、诬陷、批斗,一切非人的待遇,他都可以忍受,但是,他离不开话筒!他的生命,他的青春,他的理想,都和它连在一起的呀!他执著地希求着:“我要播音,我要播音,我要播音……”

周总理过问了

1971年“五一”节过后不久,一天,在广播大厦西门里的小道上,齐越匆匆地走过。他刚从农场被叫回来,以为又有什么批斗会等着他。一个年轻记者擦身走过时,悄声对他说:“你能回来,是总理过问了……”说罢,径直向前走去,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齐越望着他的背影发愣。是真的?他将信将疑。

原来,1969年10月19日夜晩,周总理召集总参通信兵部、邮电部、新华社和广播局的负责人,研究战备工作。谈到广播电台的战备工作时,周总理说:“延安时期那几位播音员的声音,现在想起来还很亲切。不知道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孟启予、齐越现在哪里?”周总理还加重语气说:“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正是周总理的关怀,齐越才重新回到话筒前。

齐越清楚地记得,开国大典那一天,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离总理那

么近,《东方红》乐曲响起,中央领导人来到了,齐越对着话筒开始转播。这时,总理刚好从他身边走过,微笑着向他点头致意。有如春风拂过,齐越心头暖洋洋的。他竭力控制住激动的感情,广播阅兵典礼和群众游行实况,把幸福、欢乐、自豪融化在每一字每一句里,让全世界人民听到新中国的声音!

从此,几乎每年有重大集会的日子,齐越都登上天安门播音,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往往在大会开始前,便来检查安全保卫措施和广播工作的准备情况,嘱咐工作人员不能出半点差错。有一次,周总理关心地问道:“转播要到两点吧?中午饭怎么办?”负责机务的李伍答道:“转播完我们回去吃。”没想到,中午时分,服务员端来了一盘点心,说是总理让送来的。

1959年9月,广播大厦建成不久,一天晚上,齐越同著名女播音员潘捷正在播“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忽见周总理站在播音室大玻璃窗外静静地听着,直到这个节目结束。齐越、潘捷走出播音室,总理同他俩握手,笑着说:“我来看看你们的工作,是不是让你们紧张了?”他们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广播局局长梅益代答道:“看来并不太紧张,您看看他们播音,他们也没出什么差错啊!”总理点点头,又嘱咐他们:“广播大厦建成了,比起延安窑洞来条件好多了,你们一定要用延安精神做好工作。”

“用延安精神做好工作”这句话,从此就成了齐越的座右铭,他严格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年青的播音员们。

1963年春天,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新闻、广播工作者的代表。周总理来到播音员们聚集的桌旁,同著名播音员夏青、林田等人一一握手。当他得知齐越因病住院没有来,对夏青说:“回去告诉你们的领导,去医院看看

齐越,了解一下治疗情况。”齐越听说后,久久暖在心头。

1972年夏,齐越在总理的关怀下,恢复播音工作。一开始,只分配他播简明新闻、对农村广播和少年儿童节目。而联播节目、重要文告仍然没有他的份儿。尽管如此,他播出以后,总理办公室还打来了电话,说听见齐越的声音了。

最使齐越难忘的是1973年2月2日这一天。那天下午,在人大大会堂举行首都人民庆祝越南停战和平协定签订大会,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将要发言。齐越的任务是播读黎笋发言的中文稿。从1965年转播国庆节游行实况以后,将近八年他没有在重大的场合播音了。如今,要在这个大会上向全国全世界广播,自然不能出一丁点儿差错。齐越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从寒气袭人的广场走进大会堂。

三点整,水银灯骤亮,映照着一个稳重潇洒的身影,掌声雷动!啊,周总理来了!全场沸腾起来。齐越睁大了眼睛望着,总也望不够。

黎笋开始讲话。接着就要播读中文译稿了,就象一个胆怯的小学生上台演讲前,齐越的目光碰着总理的目光,总理正慈爱地注视着他,仿佛是在问候:“你好吗,齐越?”又仿佛是在鼓励:“别担心,会播好的。”就在这一瞬间,齐越顿觉神清气爽,不安的心情消失了,他顺利地完成了50分钟的播读任务。

话筒前话筒外一个样

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青年教师刘洪庆,在熙熙攘攘的长春市大街上远远地跟踪一位老者,躲躲闪闪,唯恐那人发现。那老人是谁?广播学院的齐越教授。他1975年从中央台调到广播学院,是全国播音系统第一个获得教授头衔的人。刘洪庆眼看着他走进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大门,才松了一口气,在松树跟前坐下守候。1979年初夏,长春街头,和风

拂面,雪松青翠欲滴,刘洪庆无心观赏,心里却一阵阵焦急。

这次,齐越带青年教师刘洪庆、马桂芬、陈雅丽三人到东北地区实习讲学,同时为省市地方台和广播站培训播音员。离开北京前,播音系的领导和齐越的爱人杨沙林都嘱咐刘洪庆照顾好齐越的生活,因为他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各种疾病。但见齐越走到哪里都拒绝特殊照顾,总说:“我是来工作的,不是作客。”

刘洪庆深知他这位老师的倔脾气,这次来长春以前,他便对吉林省台的播音组长孙国栋再三叮嘱:“你们可不能给老头儿安排特殊住处。吃也不能特殊,就买饭票,吃食堂。”孙国栋满口应允。但是,下了火车,齐越一行四人便被送到吉林省委第一招待所,那是接待中央首长的去处,花树繁茂,清静幽雅,电视、电话、沙发床一应俱全,一人住一晚上得几十元。

“我去找他们去!”齐越气呼呼地拎上包就走了。这时已是下午四点多钟,旅途劳顿,还未歇息。刘洪庆一路小跑,好不容易追上了。“齐老师,我陪您去。”“不用!我自己去。”声音含着恼怒。刘洪庆实在放心不下,便尾随着,又怕齐越发现,使尽了躲闪腾挪的本事,直到老头儿走进吉林台的大门,才长吐了一口气。

在门口坐等了好一阵,齐越才出来,脸上阴云密布。刘洪庆忙上前问讯。原来吉林台确实没有空余房间,只好暂住省委第一招待所。这一夜,齐越心情难宁,对同屋的刘洪庆说:“你看,我录《把一切献给党》,却住这么讲究的地方,一宿得多少钱!好受吗?”在齐越看来,为人行事,话筒前和话筒外应该一个样。既然他应邀要为哈尔滨台录制《把一切献给党》,他就应该像书中的主人公那样,为国为民艰苦奋斗,直到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而现在,自己却住进这样高级的房间,花费人民



▲齐越和北京广播学院青年教师们在一起



▲出席党的十三大，在小组会上发言



▲齐越在疗养院，与夫人杨沙林（右）作者刘淮（左）合影

的血汗，于心何忍！勉强强住了三天，这三天，他都没睡好。第四天，齐越终于搬到一家小招待所，离吉林台近，同省台办的播音员学习班的学员们住在一起，虽然环境嘈杂，一宿只需两块钱，齐越感到睡得踏实顺畅。

听众是我的良师益友

齐越又坐在话筒前了。但不在播音室，也不是录音室，而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面对审判席的第一排右侧。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名罪犯一一从他面前走过，站到被告席上。正义的审判开始了，举世瞩目。这是1980年11月20日下午3时。亿万人民早已守候在电视机旁，观看这一重大历史时刻的场景。江青一身黑服，由两名女法警押解，继王洪文、姚文元等九名罪犯之后，也站在被告席上。在整个审判期间，齐越的任务是朗读江青罪证的证词。他在话筒前，历数江青祸国殃民残害无辜的罪恶，上至共和国主席，下至30年代曾热心帮助过她的女佣。事实俱在，令人发指。

开庭后的一天，齐越正读着一份江青迫害一名老干部罪行的证

词。墙上挂的幻灯屏幕上打出了证词原文。忽然江青打断齐越的朗读，以挑衅的口气叫道：“什么‘他’？是单人旁的‘他’，还是女字旁的‘她’？”气势汹汹，旁若无人。齐越怒不可遏，冲口而出：“投影上有，是女字旁的‘她’，说的就是你！”这锋利的声音，大义凛然，江青无言以对。

齐越离开了播音岗位，但没有离开话筒。他离不开听众，听众也离不开他。他的声音仍然从中央台到地方台源源播出，在各种群众集会上回响。他朗诵诗歌、长篇小说，又登上了播音艺术的新台阶。《在彭总身边》、《把一切献给党》、《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事》、《巍巍昆仑》等播出后，听众反响非常热烈。

鼓舞、感染了不少一代人，许多人是听着他的声音长大的，还有的人家是祖孙三代都聆听过他的声音。在黑龙江五大莲池市有个孟会冰。他爷爷1947年听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唯一的男声——齐越，广播解放战场上一个接一个的捷报，以及瓦解军心的《对蒋军广播》。父亲是医生，50年代在朝鲜战场的坑道里听齐越播《谁是最可爱的人》，后来成了当地广播电视新闻编辑，先进工作者。如今，三代人又坐一起，倾听齐越那苍凉悲壮的声音——《在彭总身边》，又一次次感动得流泪。

“我就是听齐老的声音长大的。”北京电子元件厂的木工师傅周宝仁，1991年8月11日走进笔者家门，第一句话就这么说。他是笔者特意请来谈谈他与齐越的交往的。

“50年代上小学的时候，我喜欢鼓捣矿石收音机，同学给我起外号叫‘短波’。我天天听齐越的声音，还有夏青、葛兰、孟广嘉……”

“每天早上7点半听完新闻，我就上学。多少年，齐越的声音一直没断。到了‘文革’时期，齐越和一批著名播音员的声音听不见了。换上了一拨儿新的，有的嗓门儿又高又尖，‘大批判’，杀气腾腾……”

“到1989年10月《北京晚报》发表了齐越的照片和文章，我才知道他生病住院了。我给他写了第一封信。

“我总想为齐老干点什么，表表心意。我在信上说：‘我1983年到一建公司，在菲律宾、泰国驻华使馆工地学习内装修，还到西城喷漆厂学习烤漆喷漆技术……如果您家中需要装修，别忘记找我当个参谋，为您美化家庭服务！’”

齐越素来不愿麻烦别人，这次也不例外，他回信说：

“多年来我挤住在两间无过厅的楼房内。去年广播学院在西直门盖了楼，又分给我两间。这时我卧床住院，经我老伴到处奔走，好容易把新房两间，换了紧挨原住处的一间住房。因为我们实在无法搬动，在接你来信前不久，我老伴找人喷刷装修过了，所以就不再麻烦你了。”

这下惹恼了周宝仁，他感到“愤慨”，并立即写信提出“抗议”：“为什么搬家之事不及时向我打招呼？您既然知道您二老‘无法搬动’，就该写几个字给我，我招呼我的同学、亲朋好友、同事们共同出力为您帮忙，还有什么不好开口呢？”

“例如：厨房装抽油烟机、水池挪位置、装淋浴用热水器、封阳台窗户等等，只要是您家中有装修活，您毫不犹豫地拨电话找木工室木工周宝仁，我认真负责完成您下达的各项任务，不妨一试。

“说明：我有收入，自己解决吃饭之事，渴了有自来水喝。我不怕吃苦，只要做事让您二老满意，我比吃顿饭还高兴。全国支援灾区，我有能力支援您！”

周宝仁的“愤慨”引来了齐越的邀请。1991年10月2日，周宝仁终于在齐越家中会见了他从声音上熟

悉了整整40年的播音艺术家，晤谈了大半天。过后，这位木工师傅又写信表达了感谢和希望。

“齐老：您具有一种明知明天就要枯萎的花也要给它浇水的心灵！您明知我是一个残疾人（按：周是跛足），还经常在信中关心、爱护、鼓舞我生活的勇气而不是歧视我，我特别感到温暖如春。”

信的末尾，周宝仁发挥了他丰富的想象力写道：

“齐老，过几年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条件成熟，胜利在望。日常您多加锻炼，到时您往开幕式主会场播音室一坐，有宋世雄老师陪伴您，一呼一应，一唱一和，喊出21世纪的强音：‘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现在我和小宋在新落成的国家体育中心会场向全世界几十亿观众、听众实况转播奥运会开幕式！’行啦，以后的词让宋世雄编吧。第二天我把录音带交您保存！”

“齐老，目前当务之急就是安下心疗养。”

永不消逝的声音

1991年5月的一天，齐越正在北京西山脚下的工人疗养院的院子里练习走路，迎面过来一位胖胖的中年人。“您就是齐越同志吧？”“是我。”“您听这一段：‘蒋介石是著名的运输大队长，好久业务荒疏，看来手痒难耐了，那末，就等他再送一批美国武器来吧，我们将照例接收，不给收条。’”“怎么，快30年了，您还记得？”“当然，您播的声调语气，那股正气，那讽刺挖苦劲儿，绝了，我怎么能忘得了。”

这中年人叫闻胜利，是北京西山风机厂的一位工程师，30年前他是北京40中的学生，经常听广播。1962年6月24日听齐越广播关于

台湾国民党军队企图“窜犯大陆”的一篇时事述评，其中有些话至今记忆犹新。同样，重庆的一位老听众，907厂的黄玉衡，曾把他历年所听印象深刻的篇章，列出长长的一串清单寄给了齐越。在万千听众的心中，齐越的声音是永不消逝的。他们能从纷繁的广播节目中，分辨出哪是齐越的声音，即便在十年浩劫他停播多年后复出的时刻，听众也能立即察觉。1979年的一天，哈尔滨一个老听众方元下班后忽然听到黑龙江台传出他熟悉的刚劲有力的声音，他高兴地对妻子说：“你听，这是齐越的声音。他又开始播音了。”“不会吧，齐越同志在北京，来黑龙江干什么？”方元说：“你别急，听到最后报名，就知道是谁了。”夫妻俩打了赌，丈夫赢了！

齐越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播音员，从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开始，直到80年代中期，播音生涯长达30年之久。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他呼唤着黎明的到来，在新中国走向鼎盛的时日，他用声音描绘壮丽的山河！他是中国播音史上承前启后和丰碑永存的艺术大师。党和人民也给了他很高的荣誉。1964年，他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4年，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一级荣誉证书。1986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党员。1987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现在人们不再听到他的广播了，可他的声音永不消逝！永不！

（责任编辑：仲文）

（刘淮：女，湖南华容人，63岁，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著有《穆青和他的报告文学》、《双枪红司令乌兰》、《芦苇深深》等。）

轩辕治国

蔡柏顺

黄帝出巡

黄帝战败蚩尤之后，一统天下，定都于有熊（河南新郑）。他巡视各地，给山川河流定名。据说大隗山、嵩山、少室山、太室山、黄山、黄河都是由黄帝定名的。

为了寻求富国之道，黄帝每天起早贪黑，爬山涉水，四处寻访，几乎走遍天下。农夫女工，老弱妇孺，无所不问。由于长期奔波，费心操劳，终于累病了。可他还不肯休息。文武百官，跪地求他养病，这才勉强到风后岭上找了一处地方，准备休息一段时间。

这天，他刚闭上眼睛，就梦见离西州西边，台州北边，距离千里之外，有个华胥氏之国。这个国度里的老百姓没有私欲，人人心底善良，互相尊重，对亲属都一视同仁。人人勤劳，财产共有，过着富裕安乐的生活。黄帝对此十分羡慕，他想，既有这样的好地方，我身为百姓拥戴的黄帝，也要把天下治理得和华胥氏国一样美好。

黄帝的病情略有好转，便下山来到各地巡视，继续寻求治国之道。一天，他正在山上望，发现山沟下有一位牧羊老人，就前去拜见说：“长老啊！我想富国强民，可有什么好办法吗？”那老人上下打量着他，说：“想治好国家倒有办法，就是不知你有无真心。”黄帝说：“我是真心实意来请你赐教的。”老人说：“如今你是一国之主，何必受那么大罪呢。”黄帝说：“为民父母，替百姓操劳是天经地义的事，吃点苦算啥。”老人说：“好，若有真心实意，你需斋



戒七日，然后，独个儿步行，到翠妫河畔，就可以得到宝书一本，神图一张，里边记的全是治国之道。”老人说罢，就赶着羊离去了。

黄帝按照老人的交待，斋戒七日，病还没好，就出发到翠妫河边去了。

黄帝一路上翻山越岭，涉水过涧，不辞辛劳，来到翠妫河边。只见一条大鱼逆流而上，一翻身就不见了，河面上却浮现了一张绿底红字的图画和一本红皮书。黄帝急忙上前，正要去取，突然从空中飞来一只仙鹤，衔住图和书顺着黄帝的来路飞去。黄帝不顾一切，直追过去。仙鹤像是故意在逗他，飞得又慢又低，

一直不离开黄帝的来路。黄帝的鞋子也不知啥时候跑掉了，光着两只脚，踩着树杈子、野蒺藜，鲜血直往外流；衣服也挂破了，披头散发，满面尘垢。对这些他全不放在心上，只是一个劲儿地追赶那只仙鹤。直到第二天黎明，他已经累得头晕眼花，腰疼腿酸，定神看时，仙鹤却不见了。只见那鹤发童颜的牧羊人正站在风后岭上，满脸笑容地对他说：“这是王母让我送给你的礼物。”说罢，把那张绿图和红皮书送给了黄帝。

黄帝接过来一看，原来是《神芝图》。图上画有一棵草，有9片绿叶，闪闪发光。这时他才明白过来，这9片叶子指的是他统治下的九州，红皮书里写的正是治国之道。黄帝正要拜谢这位牧羊人时，那老人却不见了。黄帝获得宝书后，按照书中的指点，更加重视农耕，提倡以农为本。他又请来学问家岐伯，史官仓颉，和他一起整理文字，制订法令，使当官的不徇私，老百姓和睦相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百姓越来越富裕，国家越来越强盛。

黄帝访仓颉

轩辕黄帝一心为民办事，备受百姓拥戴。天下贤才志士前来投奔的越来越多。

一天，一个叫沮诵的人来见黄帝。他说：“听众多百姓讲，你广罗天下贤才，处处为民着想，我愿尽微薄之力，向你推荐一个人，我的朋友仓颉会造字，用他造的字来记事记物，方便许多。仓颉愿意把他造的字奉献出来。”

黄帝听沮诵说后,非常高兴。他知道,他的臣民们为了记事,曾想出许多办法,像结绳记事,用绳子作记号,大事打一大结,小事打一小结,若有特大要事就打一个特大的结。还有的在竹子或木板上刻划豁口,也是按豁口的大小深浅,记录事情的大小。虽然这些方法也可取,但究竟不能完全表达人意,时间隔久了,也就慢慢忘记了这些符号的意义。今见沮诵说仓颉造字,真是太好了。黄帝急欲见仓颉,看看仓颉造的文字,便问沮诵,仓颉在哪里。沮诵说:“仓颉因劳累过度,卧床不起,等他病好了,再让他来见你吧。”黄帝一向求才心切,等不及仓颉来见他,于是命常伯备好鞍马,让沮诵带路,前去拜访仓颉了。

仓颉住在山脚下的一个小村落里。黄帝和他的随同一进村,就见房舍的墙里墙外到处都画有羊头、马头和各式各样的符号。当他们走进一间草屋时,只见一个中年汉子躺在炕上,手指还在肚子上不停地比划着,这就是仓颉。沮诵向躺在床上的仓颉介绍说:“黄帝不辞辛苦前来看你了。”仓颉早闻黄帝大名,忙侧身想坐起来。黄帝忙上前把他按下,并连连说,要他保重身体,还把送他的饮用之物交给了他。

仓颉被黄帝的真诚所感动,就把自己创造的文字介绍给了黄帝。黄帝看着满墙密密麻麻的符号,听着仓颉有趣的解释,一把抱住仓颉说:“你为百姓真是立了一大功啊!”当即封他为史官,请他一道共事。仓颉欣然同意。

黄帝觉得仓颉能造出一套字来,实在了不起,就让他讲讲造字的经过。

仓颉谦虚地说:“造字的事并非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只不过多留心,把大家创造的符号集中到一起,才形成了文字。”

他说:“渔夫用的网罟,效法于蜘蛛;打仗用的阵法,效法于蚂蚁。

有一天,我看见河上泛起一个大龟,龟背赤色,却有一些青色花纹。我忽然联想到,它那背上的花纹,莫不是一种文字,于是,我就起了造字的念头。有一天,见一玩童用木棒在墙上左画一只羊,右画一只鸡,还有一头牛没有画成。我忽然想起,若把羊、鸡、牛的头画下来,不就成了文字吗。又一天,我在山中遇一长者,他低着头似乎在地上寻找什么。我走上前去问他,才知道,这是位老猎人。他正在辨别蹄迹,分出哪是虎、哪是狼、哪是牛、哪是马的蹄迹。老猎人的举动使我明白了造字也要注意找性。于是,我更加仔细地观察日月星云、山川湖泊、飞禽走兽,取其性,画成符号。所以说,光靠我一个人,即便奋力造字,毕竟力量单薄。若千万民众,都来留心,共同造字,必然能造出更多更好的来。”

黄帝听了仓颉的这一席话,感动地说:“你为民造字,功高如山,若能把这些文字推广开去,使天下百姓都能懂能用,记下百事万物,这该多好啊!”黄帝带着仓颉召集各部落酋长议事,把仓颉介绍给大家,又把他说出的文字在各部落传播出去。

黄帝学医

黄帝体恤民情,常下去察访。他发现许多百姓死于疾病,又无医治办法,十分焦急。

有人向他推荐民间有几位懂医道的人,特别是岐伯、雷公,被人们称为神医,若能把他们请来,共商为民除病害的大计就好了。

黄帝不辞辛劳,经过多日寻访,终于找到了岐伯。一天,岐伯随黄帝正走间,发现路旁有十几个人卧地瑟缩,黄帝忙问岐伯:“这些人得了什么病,能有办法治吗?”岐伯摸了摸病人的手腕说:“他们全是伤湿、伤风、伤寒所致。若治此病,必须燃火烘烤,多烤些时,再配些草药,加以酒醪,每日饮之,定会慢慢痊愈。”黄帝又问:“此病是否可以预防?”岐

伯说:“凡治病,必先查其病因,若防此病,不能久坐湿地,久滞水中,为防筋骨瑟缩,必常常舞之蹈之,活动拳脚,使筋血通达;若野宿在外,必需燃烧篝火,烘烤腹背,然后才能入睡,自然就能防此疾患。”

黄帝听岐伯讲罢,觉得他学识实在渊博,真是难得的人才。他也更觉得医道重要,下决心向岐伯求教,以救死扶伤,解人之难。

黄帝问岐伯:“寻察病因,可有妙法?”岐伯说:“我自幼喜欢医道,曾漫游天下,四处求教。我曾求教于神农氏炎帝,对于诊病之法,我所知道的是:一曰望诊,观其脸色,身形,便可定其疾病;二曰闻其声,就能辨其病;三曰问其情,用以推察病状;四曰切其脉,品察经络,以查病因。”岐伯又说:“以我之见,真正的疗法和方剂,藏于民间。据我所知,还有俞跗、少跗、雷公、伯高等,有的精通脉诊,有的熟悉药性,有的专司验方,若能把他们请来,汇其精萃,不怕不能找到救死扶伤的医术。”

黄帝向各个部落征集医术和方剂。不多日,献草剂者从四面八方纷纷而来。黄帝命令仓颉用文字一一记下。黄帝又把雷公、俞跗、少跗等人请来,向他们索问医学之道。他说:“我听说诸位在医病方面有许多经验,请讲给我听,使我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行吗?”

岐伯首先答道:“你考虑甚远。我认为,治民与治己,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者,唯顺之才能成功。顺者,并非单指阴阳脉论,气之逆顺,管理百姓人民也一样,必须顺其志,才能把部落治理好。”

黄帝说:“讲得很好,可又怎样调理病的疾病呢?”岐伯说:“热中宜以寒调,寒中宜以热调,解其便也。胃中热则消谷,胃中寒则胀满,肠中

寒则鸣飧泄。胃中寒，肠中热，则胀且泄；胃中热，肠中寒，则疾肌少腹痛。”

黄帝又问道：“胃中常热，光想吃凉东西；肠中恒冷，光想吃热东西，寒热乖和则损于性命。若纵欲则加病，逆志则生怒，二者不兼，到底先顾所欲，还是先治其病呢？”岐伯说：“应当逆其志以治其病，方能保全生命。不可根据病者要求，任其所欲，导致病重，乃至危及生命。如果把此道理讲清楚，病人也不会不听的。”

黄帝又问：“如何治法呢？”岐伯说：“春夏先治其标，后治其本；秋冬先治其本，后治其标。”

黄帝继续问道：“怎样才能使人少生病或不生病呢？”岐伯说：“衣食起居，应该适度。寒无凄凄，暑无出汗，饮食时热毋灼灼，寒毋沧沧，寒温中适，故气将持，乃不致邪僻。应该知道，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此皆久所为病也。”

从此后，黄帝汇众家之长，经过多日苦心磋商，由他亲自主持编撰出中国最早的经典医书《黄帝内经》共18卷，其中《素问》、《灵枢》各9卷。后人又注释为30卷，一直流传至今。

黄帝选妻

轩辕黄帝整天为百姓们费心操劳，乡亲们对他十分敬重。但他一直没有娶妻。不少人带着漂亮的姑娘找上门来，可黄帝总是婉言谢绝。黄帝的母亲附宝早就想给他成个家，劝他说：“这么多人来找，你总得挑选一个呀！”黄帝笑笑说：“外表和长相只是一个方面，要紧的是看她有没有真本事。”

一天，黄帝出外打猎，看见一个女子在山半坡一棵大桑树下，正一手扶着树干，一条腿跪在地上，从嘴里往外吐丝，地上已堆集起一个个像瓦瓮那么大的茧。黄帝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看呆了。那女子吐出的

丝结成的茧有金黄色的，有银白色的，都闪光发亮，非常好看。黄帝看得入了迷，心想，我今天竟遇上一个会吐丝的女子，真是连做梦也想不到。自从邀来有巢氏、神农氏，吃的住的都不愁了，可百姓身上还披着兽衣兽皮，多么难看。若能用这些丝纺织成布，做成衣服，该多好啊！

正想着，眼看那女子吐完丝起身就要走了，黄帝急忙走上前拦住。那女子看了他一眼，说：“你有什么事吗？”黄帝说：“我看大姐会造丝，能否教教我。”女子说：“俺爹娘有交待，想学造丝，非丈夫不准传授。”黄帝听罢，心里怦怦直跳，他抬头看了看那女子，只见她长相一般，脸皮黑，嘴唇厚，身材也不高，看来不是个美女子。可是又一想，看人不能光看模样，她有吐丝的才能，有这样一位妻子，不是很好吗。于是就毫不犹豫地向女子求婚，这女子也应允了。

黄帝说：“我们虽然订了亲，可不知道大姐家住哪里，从何而来？到何处去。”那女子说：“我原是王母娘娘的侍女，名叫嫫祖。有一次，我到王母的花园里去赏花，见那花园里有株五色香草，上边结满了果实。我看果实好看，又有香味，便随手摘了几个放进嘴里。谁知，满嘴甜香，不知不觉就咽下去了。没过多久，直觉得想往外吐。便蹲在地上，一会儿就吐出一堆丝来，接着，不知从哪又飞

来了几只彩蛾，围着香草飞来飞去。我想，若把这香草籽喂彩蛾，他们不也会吐丝吗？果然，飞蛾吃了香草籽后下了一窝子，子又慢慢地变成蚕。我又用香草籽喂蚕，那蚕便真的吐出丝来了。这五色香草，原是仙草。我摘了仙草的果实，犯了天规，王母就把我打入凡间。”嫫祖还说：“当年您从天宫下凡时，说的要为百姓解难的话，我全都听见了。我想，无论怎样我不能空手下凡，我要把珍藏的香草籽带到人间，为人民造福。没想到，今日在此地与你相逢。”

黄帝听了嫫祖的一番话后，非常感动。嫫祖又对他说：“北山坡上，我已养出一片蚕来，正在吐丝，那些蚕都吃桑叶，长的又肥又大，我们去看看吧！”黄帝随她走去，翻过山梁，看到蚕结的茧，五颜六色，个个大如桃子。黄帝高兴极了，说：“你为天下百姓立了一大功啊！我马上派人来，帮忙收茧。”

黄帝带着嫫祖回到部落，并把选嫫祖为妻的事告诉了附宝。消息很快传了出去，男女老少，成群结队地都来向黄帝表示庆贺。

嫫祖到来就带领部落里的妇女们养蚕、栽桑、缫丝、织锦，然后裁剪成衣裳。从此，人们有了遮体的衣服，结束了穿兽皮披树叶的生活，后人为了不忘她的功绩，在农家的织机房里都要挂一张像，这就是嫫祖。

（责任编辑：尚弓）

欢迎订阅《炎黄春秋》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要求，本刊自1993年1月起由双月刊改为月刊，每月11日出版。

定价：每册2.98元，全年12期共35.76元，半年6期共17.88元。批量包销办法另议；少量临时需要者，收款后即寄刊物，每册另收邮挂费0.30元。

银行汇款户名：《炎黄春秋》杂志社；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北京地安门分理处；帐号：032—144230—76

邮局汇款：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炎黄春秋》发行部；联系人：张勤；邮政编码：100802；电话：6016633—227 6846929—3243；

汇款时，务请写清订阅人（收书人）的详细通信处、姓名和邮政编码，字迹切勿潦草！

需要发票者请注明，款到后立即邮寄发票。

新年新话

又是一年芳草绿。

改革开放的春风正绿遍中华大地。

诞生于改革开放春潮的《炎黄春秋》，在广大读者、众多作者与专家学者，特别是若干老革命家和各方人士的关怀支持下，度过了一岁半的婴儿期，开始受到了人们的注意与喜爱。

在改革大潮更加涌起的天，我们决定从今年元月起，由双月刊改成月刊。宗旨方针不变，将保持并发展原来的面貌、风格和内涵，继续为读者提供下列内容的纪实文学、生动报告与历史回顾，这就是：

关于中国现代革命历程中各阶层、各民族的杰出人物与历史

事件；

关于我国各界各方、海内外海外代表人物的成就贡献与奋斗道路；

关于当代改革新潮中的新人、新事、新景和新问题；

关于古代、近代主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追述探踪；

关于古往今来中华文化的创造成果、优秀人物和胜迹风物……；

除对于上述著名人物的宣扬介绍，也欢迎对于普通劳动者默默奉献的如实反映；

除对于历代英雄人物的正面纪颂，也欢迎对古今“反面人物”的揭示评说；

除对于伟大胜利和丰功伟绩

的热情讴歌，还需要对失误失败和历史教训的冷静反思……。

这都有赖于读者、作者和各方人士对我们的扶持帮助，特别是批评指导。因为我们刊物虽然出满10期了，他毕竟还处于幼年阶段。要在刊山报海中办出自己的特色，只有遵循中共十四次代表大会重申的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忠于历史，面对现实，敢讲真话，不拘一格。既不要迎合低俗，又不自命高雅，更不冷面说教，力争做到多色多味，雅俗共赏，既讲思想性、知识性、可读性、科学性……又讲真实性，以不负所有关心支持者对我们的期望。

本刊编辑部

1993年元旦

冯玉祥轶事三则

刘作忠

1 冯玉祥任陕西省督军时，一天巧遇从终南山猎获两条野牛归来的美国人安德思和英国人高士林。冯玉祥问他们：“你们到终南山打猎领许可证没有？”二人回答说：“我们打的是无主野牛，不需经人许可。”高士林还说，他在中国15年，所到之地，没有不准打猎的。

冯玉祥气愤地说：“野牛是中国境内的动物，不经地方官许可，私自打猎，是违法行为……你们15年没有遇中国政府禁止打猎，那是他们睡着了，我没有睡着！”

2 冯玉祥幼年失学，深以为憾，入伍后勤学不倦，虽然贵为统兵大帅，依然接受教育。他在北平任陆军检阅使时，曾礼聘数名教师为其讲授各课。而且还专门规定：每日下午7时至10时授课期间，不准任何人入室打扰。

某日，冯的参谋长未经冯许可闯进室内报告紧急军务，冯玉祥见后极不耐烦地说：“我说过上课时间不准进来，你进来干什么？”

参谋长说：“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死了怎么办？天大的事情也不能打扰我的学习，

去！去！去！”

第二天，冯玉祥找来一块长木板，亲自写上“冯玉祥死了”五字，每到上课时就挂在门上，下课后再取下来。

3 1944年春的一天，冯玉祥自重庆乘船至江津县发动爱国献金运动。举行爱国献金大会那天，东门外大操场上挤满了群众，主席台上坐着各界代表。冯在会上讲话说：“抗日战争已到了最后关头，军费支出浩大，且不说飞机大炮代价昂贵，大炮一响，银子百两（当时德国制造的15公分口径的榴弹炮炮弹，每发约值银币百余元），就是全国几百万大军，人人一顶军帽，这个大操场就堆不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希望各界同胞踊跃捐献！”各界代表听完冯玉祥的动员后，纷纷认捐，轮到最有钱的县商会主席却不肯多认。这时，冯玉祥走到商会主席面前说：“我冯玉祥为前方流汗流血的将士请命，向你跪下了！”说罢，双膝跪地，主席台上的代表和大操场上的人见状也跟着一齐跪下。商会主席在众目睽睽之下，狼狈不堪，只得增加捐献金额。



陈立夫与丁小路的乡谊

江辉 寇丹

6月初,93岁的台湾孔孟学会陈立夫先生,把他手书的条幅寄赠湖州邮电局职工、业余微刻家丁小路,答谢他以精湛的技艺和书画修养,为陈立夫先生完成了一方别致的印石。

这方2寸高的象牙色冻石上,刻有神形逼真的陈立夫先生近期玉照。肖像下方刻有96岁高龄书画家谭建丞写的《九如歌》。其余3面刻有元代大书画家、湖州人赵孟頫写的《吴兴赋》全文共千余字。印石上的螭虎印纽和底部陈立夫名章,都由丁小路一气呵成。整方印章及微刻格调高雅统一,气韵生动。这方珍品由来大陆探亲的陈夫人妹妹孙禄梁、妹夫俞世基先生在5月份带回台湾后,陈立夫先生在赞赏之余,写了“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回赠丁小路。

近年来,陈立夫先生非常关心大陆和湖州故乡建设,和故乡人有不少飞鸿往来。当他知道故乡出了一位造诣颇深的微刻家时,就转请谭建丞先生代求一方。

丁小路今年47岁,从小喜爱书画篆刻。中年致力微刻创作后,已完成数百件石、竹、牙、紫砂等作品。他以石质微刻的《茶经》被加拿大华人收藏后,又微缩古代名壶10把,上刻7千余字《茶经》3卷,博得国内外行家的叹服。他去年完成的10方近代吴昌硕、张大千等书画家肖像及小传,14方辛亥革命历史人物肖像,小传,都把微刻艺术提高到一个新阶段。陈立夫先生就是看到他叔父陈英士的微刻肖像后,才希望自己也拥有一件的。

湛露賢姬伉儷

承冰華瑞轉來

賢伉儷從大陸帶回家鄉食品多種彌

足珍貴謹敬謝

丁小路先生惠賜高章,四面都刻有精

微之字,為地難得之寶貝,今既有相片,可

以之予人,必用此七鏡七談申謝之

已振之以幸福字,由譚建丞先生刻

致,想可及此,收到美意,西申謝,並誌

感

丁小路

二〇〇九

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

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

小路先生雅正 徐之入

陈立夫为访台 大陆记者题辞

大陆记者首批赴台采访团一行 18 人，去年九月正式访问台湾，其中人民日报社瞿象乾、新华社端木来娣、光明日报社翟惠生、团结报社卜林龙、现代中国社魏秀堂等 5 位记者拜访了国民党元老、94 岁的陈立夫先生。陈先生分别赠送他们手书条幅留作纪念。

無私無我之公成已成物之誠之主人
達人之仁不偏不倚之中日新又新之行斯五者
為中華文化之精義也

象乾先生雅正
吳興隆主人

1994年9月

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
必失之

意全先生雅正

吳興隆主人

1994年9月

中國為文化之國因其文化為人
類謀和平幸福故終為全人類所
仰望者也

林龍先生雅正

吳興隆主人

人各為其文化爭光榮其所以不願外
來文化所制者歐諸國及蘇聯最近之政
變其基本原因在此

秀堂先生雅正

吳興隆主人

士而能容剛而不屈中而無偏正而遠
邪斯四者為中華民族之特性故能屹
立於世界而永存也

宋煥女士雅正

吳興隆主人

1994年9月

脱发患者的福音 “青春痘”的克星

赵章光及其 101 系列产品曾荣获

第 36 届布鲁塞尔国际发明博览会“金质王冠奖”

第 16 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博览会“特别金牌奖”“莫斯科发明大奖”

第 80 届巴黎国际发明博览会“五洲金质奖”“产品金牌奖”

第 1 届北京国际发明博览会“产品金牌奖”

第 14 届纽约国际发明博览会“金质产品奖”“金奖”

中国卫生部中医部“神农氏”奖

聪明
可快经顶



- 章光 101 对斑秃、全秃、普秃有特效。
 - 章光 101A 对脂溢性脱发有特效，斑秃亦有效。
 - 章光 101B 止痒、除屑、防脱生发。
 - 章光 101D 发宝，尤其对脂溢性脱发有特效。
 - 章光 101E 青春美之露（又名“101E 粉刺一扫光”）能消除面、胸、背部皮肤“青春痘”（粉刺、暗疮）。
 - 章光 101 养发香波是老中青青年均可使用的润发养发佳品，具有显著防脱、护发功能。
- 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化妆品卫生标准（GB7916-87）
- 地址：北京朝阳区劲松西街 225 号
 - 电话：(01)7712874 7711632 7718965 784080
 - 传真：(01)5158943 邮编：100021
 - 101 国际贸易部（100022 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24 号）
 - 电话：5158943 5158960
 - 101 门诊咨询邮购部（100031 北京宣武门内大街 169 号）
 - 电话：6018007

北京章光毛发再生精联合总厂



统一刊号：CN11-2817 定价：2.98